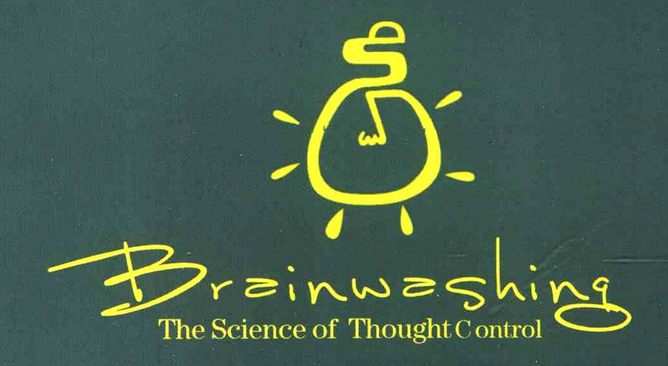


洗脑心理学

[英] 凯瑟琳·泰勒/Kathleen Taylor 著
杨炳钧 王汐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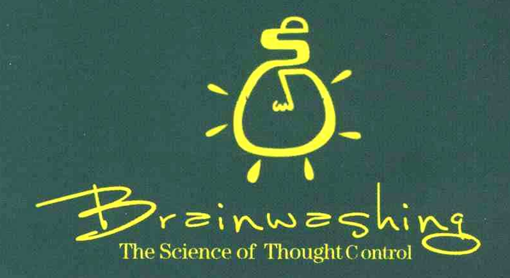


英国心理类年度图书奖
英国心理健康协会推荐图书

思想也有卧底
控制无处不在



洗脑心理学



教育和媒体其实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他们维持并复制国家领导者的思想（渗透到年轻成员）。

——路易·阿尔都塞

任何信仰，无论是否可靠，无论是有充足的理由支持或仅由偏见支撑，都可以通过刻意的操控或无意地利用主流机构而对人们进行反复灌输，最终使人们将其看作真实的思想而被广泛研究。

——默里·埃德尔曼

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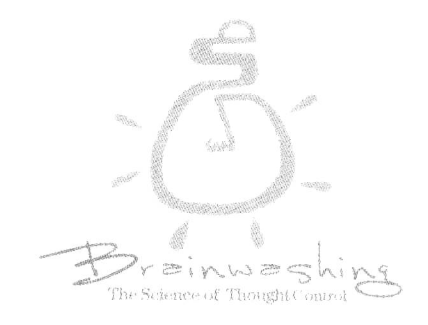
上架建议：畅销/心理


ISBN 978-7-5624-7222-3

定价：46.00元



[英] 凯瑟琳·泰勒/Kathleen Taylor 著
杨炳钧 王汐 译





版贸核渝字（2011）第5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洗脑心理学/(美)泰勒(Taylor,K.)著;杨炳钧,王汐,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9
(心理自助系列)
书名原文:Brainwashing: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
ISBN 978-7-5624-7222-3

Ⅰ.①洗… Ⅱ.①泰…②杨…③王… Ⅲ.①心理学—通俗读物 Ⅳ.①B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026738号

洗脑心理学
XiNao XinLI Xue
凯瑟琳·泰勒 著
杨炳钧 王 汐 译
策划编辑:王 斌
责任编辑:敬 京 版式设计:李彦生
责任校对:谢 芳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紫石东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20×1020 1/16 印张:16 字数:270千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222-3 定价:46.00元

前　言

洗脑就像意识和情感一样,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它本质上是极其危险的想法,幻想着能够完全控制人的思想,这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洗脑从根本上侵犯隐私:它不仅仅试图掌控人的行为,而且还试图控制人的思想。这唤起了我们最深层次的恐惧,威胁着人们的自由乃至身份,但我们对它却知之甚少。自20世纪50年代(洗脑研究的顶峰时期)以来,对大脑及其行为的前沿的科学认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鉴于此,是时候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个神秘而又可怕的现象了。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1部分:折磨与诱惑**(第1—6章)集中讲述了洗脑的历史由来和社会心理。"洗脑"这个概念实在十分宽泛,不久前这个概念还被广泛用于一切试图改变人们思想的活动。对于这个概念的合理性,本书从很多领域进行调查,包括宗教、政治、广告与媒体、教育、心理健康、军事、刑事审判制度、家庭暴力以及刑讯。我们发现,洗脑是引发社会影响的一个极端形式,社会心理学家仍在研究和理解其中的机制,而且这种影响的强度差异巨大。我们探讨了包括个人、小团体和社会的一系列相关情况,发现"洗脑"所产生的各种影响都具有如下特征: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欺诈,或者二者兼有。

我们也同样看到了洗脑的可怕之处,害怕我们的思想被粉碎,然后按照别人的意愿重塑。我们对于洗脑的恐惧来源于一种观念,即认为自己是自由、理智、坚决的个体。我们乐于认定自己的思想坚不可摧,纯洁而不可改变,这与宗教意义上的"不朽灵魂"颇为类似。我们更愿意认定,思想就像钻石,在高压下能够保持自己的形状,直到最终(在洗脑的力量下)破碎。我们往往相信心理力量源于理性,所以我们视情感为一种软弱。我们自认为拥有自由意志,能够自己选择是否受他人影响。要想理解我们对于洗脑的恐惧是否合理,得先考证以上这些想法的准确性。

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地去了解人的大脑,所以**第2部分:头脑中的叛徒**(第7—11章)是关于神经系统科学的。请注意:这是本书最难的部分。如



果不深入细节根本没有办法谈论神经，大脑拒绝被简单化。本书囊括了初学者指南和一些简图，书中尽量少用神经科学的专业术语。我引用了很多例子，这些例子看起来与洗脑并无多大关联。请耐心些，这样做是有原因的。首先，在洗脑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代科学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伦理上讲这方面的研究是有禁忌的。其次，在弄清洗脑这一反常过程之前，我们得明白大脑在正常情况下是怎么工作的。第二部分的主题——大脑的变化，信念，情感，大脑是怎样引起行为、自我控制和自由意志——每一个都很复杂，都需要进行充分的解释。所以，为了能够阐述清楚，有些地方的描述可能过于大胆。

第二部分指出，把思想当作固定而静止的做法有误导性。比起钻石，思想更像是具有延展性的黏土。人类并不完全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具有顽固的唯理性，因此每一次行为的后果是可以预测的（正如刑事责任原则认为，每个被审判者都可以自由行动、理性选择）。人类是先出生而后被塑造，我们各有各的个性，但同时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环境所塑造——尤其是那些从所处社会环境当中获得的观点和相应的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影响也能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我们低估了这一点。

第 3 部分：自由和控制（第 12—15 章）。这部分针对洗脑这个崭新概念，探讨其内在含义。第 12 章讨论“个人”，考察是什么因素使一些人沦为受害者，一些人成为施暴者，又是什么使一些人无法抵御洗脑，或被洗脑的恶意特质所吸引。第 13 章提出了类似的关于社会而非个人的问题。洗脑这个概念，从极权国家开始出现，便与政治有着深刻的联系——那么什么才是思想掌控的社会动因呢？第 14 章将视角从当前转移到未来，讨论科学发展对洗脑技术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能抵抗洗脑吗？我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采取预防措施。我提出了一些方法，让每个人都提高自身能力，抵御受到非自愿行为的影响。

但是，作为个人能做到的也仅此而已。洗脑并不是什么控制思想的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捷径。相反，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核心在于运用人们日益熟悉的各种心理过程对思想本身造成破坏。这听起来似乎让人宽慰一点。不过，“反洗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洗脑毕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我们的最佳防卫也必须在社会层面发生：只有政治才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基于这一认识，洗脑可能会出人意料地集聚在对政治的讨论中。在本书中，我尝试着回答了很多问题，尽力解答：洗脑是怎样一个过程？它究竟是否存在？它是如何起作用的？现在还有洗脑吗？我们怎样才能

防止被洗脑?

此时此刻应该向帮助过我的人致以谢意。我衷心感谢直接或间接为此书作出贡献的所有人,包括在正文中那些被引用到的学者们,他们很有说服力的素材都被我善意地"掠夺"入书。如果有误,责任在我个人。我要特别感谢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和海伦·萨瑟兰(Helen Sutherland)博士,因为他们对书中部分内容热情而又耐心地进行了阅读,不仅提出了建议,还慷慨地提供了一些原始资料。彼得·汉森(Peter Hansen)博士也为部分章节进行了点评。艾伦·泰勒(Alan Taylor)先生为第10章提供了一幅图片,安迪·班尼特(Andy Bennett)提供了图10.3的图片,欧洲委员会提供了查询帮助。凯茜·维尔克(Kathy Wilkes)博士为本书的创作慷慨地投入了大量时间,并提出了宝贵建议,2003年她的早逝对我和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同样向蒂姆·李特尔伍德(Tim Littlewood)博士和他的同事们致以由衷的感谢,如果没有他们也就没有这本书。

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给了我宝贵的出版机会。特别感谢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Rodgers)和玛莎·菲利翁(Marsha Filion),他们极为慷慨地鼓励我,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批评我。阿比·黑登(Abbie Headon)、黛比·萨克利夫(Debbie Sutcliffe)和迈克尔·蒂尔南(Michael Tiernan)也都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书稿出版计划的审稿人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教授、迈尔斯·休斯通(Miles Hewstone)教授和"审稿人B"给出了细致并极具建设性的评审报告,这都对本书的成型有着极大的帮助。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休斯通教授还阅读了初稿的全部内容,并给予了极其珍贵的点评。约翰·斯坦因(John Stein)教授在神经系统科学方面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我同样要感谢牛津大学,它教会了我很多(不仅仅是神经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些都为我撰写此书提供了极大的动力!

最后,非常感谢艾莉森·泰勒(Alison Taylor)、大卫·泰勒(David Taylor)和吉莉安·赖特(Gillian Wright),是他们始终如一的帮助和耐心铸就了本书——同时也提高了我的思想水平。谨以此书献给对我有极大影响的这三个人!

笔行至此,作者们常常会说"写作本书是一次发现之旅",我不禁希望我的航行仅仅是个开始。写作《洗脑》的确教会了我很多,我希望你们能像我一样地享受这一旅程。




目录
CONTENTS

第 1 部分

折磨与诱惑

第1章 “洗脑”的起源

系统并强制性地将固有思想——特别是一些政治思想——从人的头脑中移除，然后用另一套思想取而代之；在极权国家里，这个过程是针对持不同政见者而实施的一种强制转变。

《牛津英语词典》中对“洗脑”一词的定义

洗脑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思想，继而控制这个人，使其变成一个像机器一样的人，但为达到此目的而实施的暴行却不为外人所知。洗脑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机器，将全新的信仰和思维模式植入非自愿的个体。这就等同于寻找一个奴隶族群，不同于过去，他们完全可以被相信且永远不会反叛，会像昆虫一样本能地服从命令。

爱德华·亨特[①]，《洗脑》

“洗脑”一词诞生于严酷的战争。战争能够对人类造成众多奇怪的影响。莎士比亚曾提到战争的疯狂，《圣经》也一样。再近一点，威廉·萨金特[②] 1957年出版的书《头脑战争》详细地讲述了“二战”期间他作为精神病医生与老兵相处的故事。他们大多患有一种叫做“弹震症”或“战斗疲乏症”的病症，而今这种病被称为“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萨金特指出：无论是士兵还是平民，在创伤经历的影响下，都显示出了性格的反常变化，情绪和行为的强烈波动，暗示感受性的惊人增强，以及自控能力的丧失。很明显，战争的压力会对人类的大脑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但是，洗脑并不仅仅像神经症或精神病那么简单。这种阐述或许仅能被

---

① Edward Hunter(1902—1978)：美国记者，中情局特工，因其开创性地使用“洗脑”一词而为人所知。

② William Sargant(1907—1988)：一位很有争议的英国精神病学家，因其传教热情以及他所提出的精神病治疗方法，如外科手术、深度睡眠疗法、电休克疗法和胰岛素休克疗法而闻名。

归纳为洗脑过程的一部分，但这也仅是迫使受害者迈向屈从洗脑者蛊惑这一目标的一小步而已。中情局特工爱德华·亨特 1950 年公开提出洗脑的概念，其所著《洗脑》一书本身就是对洗脑很好的宣传。“洗脑”被看作一种精神掠夺，它完全进入了贬义词的行列：它是由施害人实施于受害人的行为，它的意图在于打破受害人对于先前信仰的忠诚，捐弃前嫌以便接受新的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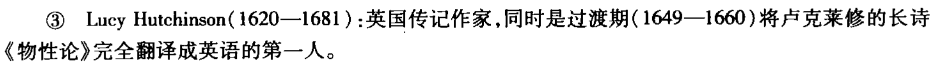
起源和同源词

亨特指出“洗脑”可以追溯到西方人所熟知的孟子时代（孟子是公元 4 世纪的一位儒学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洗脑”便成为长久以来人们用“洗刷”和“清洁”这两个词暗喻人类大脑、精神或灵魂清理的早期例证。在英国，17 世纪诗人露西·哈钦森[3]对该现象作了很好的阐释，这远在孟子之后，却比爱德华·亨特早了近三个世纪。这个虔诚的女基督教徒在翻译了哲学家卢克莱修[4]的作品后，发现其作品“亵渎了上帝”，然后她写道：“求诸真理之泉，荡涤内心的丑恶和野蛮，服用良药以抵御一直以来被人类才智所荼毒的思想。”最终，哈钦森选择用（基督教的）真理之泉洗涤了她因翻译异教徒卢克莱修作品而产生的腐蚀。

“洗脑”一词的诞生反映了人们希望标记那些可怕而新近之危险的需求。“洗脑”这个概念使美国人避免了直面自身就罪大恶极的想法，这就是基督教教义中所暗示的原罪（还有来自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正如卓乎林[5]和欧波同[6]在《心灵机械手》一书中所提到的：洗脑“听起来像是辩解”，表面上将责任转移他处，以免把自己看得太紧；这种安抚人心的能力使它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想法”。

“洗脑”最初是一个国家掌控的过程，由极权主义政权实施的针对持不同政见的公民或外国人的过程。但是，“洗脑”一词的使用决不仅限于其原始的政治领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广告、媒体、教育、宗教和心理健康等行业，都被指控有洗脑倾向。这扩大了亨特提出的“洗脑”一词的用法。罗伯特·利





③ Lucy Hutchinson（1620—1681）：英国传记作家，同时是过渡期（1649—1660）将卢克莱修的长诗《物性论》完全翻译成英语的第一人。

④ Lucretius（公元前 99 年—公元前 55 年）：罗马诗人，哲学家，其唯一著作是有关伊壁鸠鲁学说信仰的哲学史诗《物性论》。

⑤ Alan W. Scheflin：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心理和行为控制专家。

⑥ Edward M. Opton：同卓乎林合著《心灵机械手》，另著有《福利母亲就业的相关因素》《人格》等。

夫顿[7]哀叹道,“通过反对公共饮用水氟化处理,反对心理健康立法,或是反对任何团体组织的方法而不负责任地滥用该词,都无疑把枪口指向了他们真实的对手乃至假想的敌人”。在“洗脑”一词进入英语语言的第11个年头,他的书于1961年第一次出版。今天,“洗脑”并不仅仅只是非正式的贬义词,通常还有讽刺意味。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反共热潮中,“洗脑”只不过是一个非正式的概念。但它却令人生畏——惧怕失去控制、自由意志乃至身份。作为红色恐怖的另一致命要素,它迅速开始激起大众的愤怒。这与“邪恶”一词(也因其通俗易懂而流行),还有更早的“巫术”及“鬼附身”(自从审巫案或更早的时期开始,就困扰着美国人)很是相似。尽管“鬼附身”这一概念在社会的日益世俗化中逐渐失去了市场,但可以说,“洗脑”事实上就是“鬼附身”的世俗等价物,只不过那并非是一人之力而是超自然作用的洗脑罢了。当然,“洗脑”这一概念自从诞生,就不时地反复出现在公众的意识里。它通常针对一些特定而备受瞩目的事件作出回应,在这些事件似乎用其他解释都行不通时,这“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掩盖的是人们对自身的了解还存在诸多缺憾这一事实。

如上所述,亨特提出“洗脑”这个概念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人类自从觉察自己有意识起,便开始试图改变他人的思想。通常是出于好意:希腊语 εὐαγγέλιον(福音,好消息)为我们带来了“福音主义”,而拉丁语 *propago*(延展,栽培)却衍生出了传道部(由罗马天主教会设立的一个红衣主教委员会,目的是监视外交使团)。“教育”一词来自 *educere* 的字面意思,“再教育”只不过是第二次尝试教育而已。同样,“思想改造”带有认知改善的积极意味。“教化”一词源于拉丁语 *doctrina*,意思是有知识或有学问的人,但自17世纪进入英语词汇便越来越带有负面色彩。此外,“条件反射”一词源于 *condicere*,是委派、安置或安排的意思,因伊凡·巴普洛夫[8]训练狗听到铃响便分泌唾液而为人所知。传播喜讯,展现最好的一面,学习,筹备,没什么比这些更加有益了。只有“强制劝说”——精神病专家埃德加·施恩[9]在他的同名书中用以代替“思想改造”的近义词——暗示了影响技巧的黑暗面。

---

⑦ Robert Lifton(1926—):美国精神病学家、作家,主要因其在战争和政治暴力心理以及思想改造理论方面的研究而闻名,是心理历史学技术的早期倡导者。

⑧ Ivan Pavlov(1849—1936):俄罗斯著名生理学家,1904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奖。

⑨ Edgar Schein(1928—):精神病学家,前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如果有人反对你，你可以把他干掉，但这很冒险。其实可替代的方法早已被早期人类创造并发展起来了。利夫顿指出了四种方法：胁迫、劝告、治疗和领悟。“胁迫”意味着：“你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改变，不然……有可能包括处死这一极刑。”“劝告”则通过调用更高层次的道德权威来游说：“你应该按照我们的建议进行改变，这样才能变得更好。”“治疗”意味着：“你可以在我们的指引下改变，这样就会变得健康，并且可以摆脱痛苦。”最后，“领悟”意味着：“如果你愿意面对新的思想和方法的话，那么你可以改变，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像很多劝说方法一样，思想改造也同样运用这四个层面的方法。但是，利夫顿所说的“思想极权主义”（倾向于极端，具有极权主义政权思想特有的孤注一掷的思考模式）更倾向于运用前两种方法，即“胁迫”和“劝告”。

在部落间相互征服的时期，各种类型的游说艺术已经颇受重视。《圣经·旧约》的“出埃及记”（第4章，10—16节）记录了摩西面对神的安排时，说，“主啊，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来硬着心肠拒绝神。神回答道：“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个能言善道的人……他可以做你的代言人。”甚至更早的记载要到伟大的犹太先驱亚伯拉罕，他在和耶和华商议罪恶之城“所多玛”的命运问题时，成功地让耶和华应允了一个承诺：只要能在所多玛城找到十个善良的人，那么就可以赦免该城。尽管不幸的是最终只找到了一个善良的人——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得，但亚伯拉罕这种善辩的态度却并未遭到惩罚。“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当耶和华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想起了亚伯拉罕，就把罗得从倾覆的废墟之中救了出来。”[10]对当代的公关专家来说，能够成功游说万能的上帝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就思想改造而言，很明显《旧约》中“胁迫”“劝告”的例子很容易找到，而“治疗”和“领悟”却不太容易。）

随着帝国行政负担的加重，想要控制国民的欲望也越发迫切。军队暴动被视为最大的威胁，但军队不可能随处安置。而且，在与犹太人作战时，罗马帝国发现以牺牲大量将士为代价其实是事倍功半的。某些体制，比如波斯帝国（大约公元前550—公元前330年）就采取了务实、自由的方式：缴纳税款，保持和平、风俗和自己的信仰，而其他体制则比较专制。每种文化都不断发展着各自复杂的管理系统：间谍网络，为了维持税收正常运作而进行的阶层管理，胁迫或贿赂地方官员、法律部门和社会机构。其中很多都主要依赖于强制这一方法，比如残酷地进行身心折磨的严刑拷问。我们从有关强制的丰富遗产中发现洗脑的诸多技

⑩ 见《创世纪》，19章29节。



巧都与强制的特征有关。的确,洗脑和心理折磨的界限十分微妙,而费力地对其进行区分也是毫无意义的。我将会在第5章详细阐述这个问题。

“洗脑”诸方面

很明显,关于“洗脑”一词,有很多方面需要澄清。第一,我们谈到“洗脑”就必然要涉及政治:这两者是相互交织的。像上帝、爱、自由一样,“洗脑”对不同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这是由个人背景和人生规划所决定的。这一点本身并没有丑化“洗脑”。如果我们能解释人与人间互相改变思想的各种不同机制,那我们还需要亨特提出的这个术语吗?我想那就不需要了。可能会有无神主义者说自己可以避免使用“上帝”一词,决定论者确信自由意志仅仅是幻觉,并且他们从不说“我选择”,生理学家认为激情就等同于“亲爱的,我的荷尔蒙正大量分泌”。但是,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在用爱、选择和(弱化了的)宗教这些词。同样,“洗脑”这一术语的运用也并不局限于那些用来解释它的过程。无论解释圆满与否。

第二,洗脑有很多方面是能够得到清楚解释的。“洗脑”不仅可以作为贬义词用在政治上,也可以作为完成控制类科学过程的功能性说明。那些声称“洗脑简直是一派胡言”的怀疑论者认为“洗脑”这一过程根本不存在,反对人的思想会按照《满洲候选人》[11]中展现的那样被完全地主宰。剧中主角在被洗脑后按照指令行凶杀人,杀害的对象甚至包括了他所仰慕的女孩。我会稍后再回到怀疑论者这个话题上。现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异议只考虑了洗脑机制方面的某些内容,却忽视了其他方面。但洗脑并不仅仅是一系列的技巧。它也是一个梦想,想象着我们可以最终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马修·阿诺德[12]在他的《吉普赛学者》中如下描述这种神秘的能力:

> ……按照他们的意愿统领的艺术,
> 大脑的运作,
> 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加以约束。
>
> 阿诺德,《吉普赛学者》,第45—47行

洗脑比普通的游说更具野心,也更具有强制性。与其他早期同根词(比如教

---

[11] 《满洲候选人》:一部拍摄于1962年的美国电影。

[12] 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

化)不同的是,它更紧密地同现代机械论技术联系在一起。洗脑是一个系统处理未驯化人类的过程,一旦得逞,便可以重塑他们的身份。它具有大量洗涤人类身心的技术,这也给20世纪留下最惨痛的记忆——奥斯威辛大屠杀和广岛事件。梦想着控制他人是行动强有力的决定因素,他们不应该被轻易地忽略。

最后,洗脑作为"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它可以被伪装起来,拉一道屏风遮住无知的深渊。当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或是懒得去寻找其他解释的时候,我们便会使用它。当面对一些特别的事件——比如自愿性的集体自杀,或是被绑架者同情绑匪——我们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将之归为"被洗脑",例如,琼斯镇惨案或帕蒂·赫斯特[13]案,我们必须给它找个说法,但又没有其他说法可以充当。在第二章我会再次回到琼斯镇的案例上来。但目前,帕蒂·赫斯特的故事就是我们所提供的三个案例研究的第一个。我们可以以此阐述自诞生以来的半个世纪里,洗脑这一概念的一些运用方法。

案例研究:帕蒂·赫斯特

1974年2月4日,美国媒体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4]的女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孙女帕蒂·赫斯特,被一个自称为"共生解放军"的组织绑架了。她被蒙上眼睛,绑住手脚,关在一个柜橱里几个星期,在以性命相逼的情况下,身体上遭到了性侵犯,被迫与共生解放军成员发生了性关系。同时,他们还向赫斯特的公司索要赎金,包括价值数百万美金的钱财和食物,并且要求释放因谋杀而入狱的两名共生解放军成员。

同年4月14日,帕蒂·赫斯特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她在旧金山同共生解放军一起参与银行抢劫,在此之后,她公开谴责她的家人,并表示效忠于该共生解放军。最后,她于1975年9月被捕。在此之前,她至少还参与了另外一场武装抢劫,在与警察的枪战中,6名共生解放军成员丧生。她把自己所做的事描述为"城市游击战",并且宣布了她的革命信仰。在审判之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了抢劫

⑬ Patty Hearst(1954—):美国报业女继承人、社交名媛、女演员、绑架受害者、被判刑的银行抢劫犯。她的绑架案件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典型案例。

⑭ 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美国报纸出版商。他建立了美国最大的报业连锁,其管理方法对美国新闻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时她是否出于自愿。被告方指出她是被迫的,是被洗过脑的,这双管齐下的辩论把“洗脑”的概念推到了风口浪尖。原告方反驳说:如果她在抢劫银行时是被迫的,那就不存在被洗脑;如果她被洗过脑,那就不存在被迫抢劫。原告方还将问题集中在了一些事实上:帕蒂曾经与共生军分开居住长达好几个月;她有足够的机会逃跑,并获得枪支;旧金山银行抢劫案的录像带显示她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她曾42次以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当回答可能遭到控诉或有危险时,公民有权不作回答)作为庇护。最后,陪审团站在了原告一方,将帕蒂·赫斯特送进监狱。

帕蒂·赫斯特被洗脑了吗?她的案例阐明了“洗脑”这一概念的四个重要方面:目的明确性;受害者在被洗脑前后所持信仰上的“认知差异”;信仰发生变化的时间尺度;以及之前已经说过的,“洗脑”是作为“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

目的明确

洗脑是一个有目的、有意图的行为,也就是说,洗脑者蓄意行为的实质就是洗脑。这种目的未必就是恶意的——洗脑者可能由衷地认为被洗脑者将从“再教育”中受益——但是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具有恶意则是由看问题的角度决定的,所以敌意并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真正重要的是这个行为是否是有意的,并且是为了改变被洗脑者而施行的。

然而,有目的地试图改变他人思想本身并不构成洗脑,否则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就得把所有律师逮捕了(在英美国家的司法体系中,改变陪审团成员和法官的想法起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了解“洗脑”这一概念的另外三个重要方面。

认知差异

首先,与旧信仰相比,新信仰具有一种陌生感。试想,如果一个狂热的足球迷宣称,他被洗了脑后才认为他所在球队的队长事实上是全世界最好的球员。这或许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同情或兴趣。但是,一个被绑架而后因武装抢劫被捕的美国年轻女继承人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帕蒂·赫斯特优越的出身背景与共生解放军的理想之间的差异太大,以至于在她受审时“洗脑”成为了一个很受重视的解释。

其次，在当前环境下，洗脑受害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新获得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对于在集中营里接受改造的战俘来说，接受特定的信仰体系是他们唯一有望免除折磨的办法。就像通过其他常规方法获得的信仰一样，通过洗脑而得到的信仰或许不能真正惠及其信仰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能是有害的。

时间尺度

信仰和性格伴随成长而不断变化。我现在对于圣诞老人是否存在的看法和我年轻时就是完全相反的。我是不是被成人世界洗脑了？不。我仅仅是长大了，慢慢地接受了其实根本没有圣诞老人这个事实。但是，再来看我的朋友基斯，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如果基斯消失了一个月，然后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重新出现，那么我可能怀疑他被什么人施以了某种不正当的影响；但如果我十年没有见他，那我很可能将这个转变归因于自然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新旧信仰转变的时间越短，被洗脑的可能性就越大。

权宜之计

最后，正如之前提到的，洗脑（当它不是用作贬义词使用时）通常是一个“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一般是在其他概念都解释不通的时候，我们便会使用“洗脑”一词。比如，在帕蒂·赫斯特案例中，她是否被洗过脑的争论源于一种差距，即她作为典型资本家后代出身和表明自愿加入激进暴力左翼集团之间的差距。

我们还需要把洗脑的另外两方面考虑进去。第一是信仰的力量，以及在洗脑过程中和洗脑之后，被洗脑者在新观念受到冲击时所作出的情感反应。例如，应对邪教受害者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新信仰和极端情绪状态有关。理智地挑战这一信仰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也是相当困难的。被洗脑者对任何挑战都持有敌对态度，并拒绝参与理性辩论；他们认为新信仰是“神圣的”，是理性所不能及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想法，但被洗脑者的敌对反抗却是极端的。新信仰的内容也可能使局外人感到怪诞不已——尽管这又仅仅是一个视角问题。

一般认为，洗脑就是从一个坚定信念转变为另一个的过程。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因了解遭受洗脑的人而感到震惊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最初的美式生活方式的信仰与那些洗脑之后的人所接受的信仰是一样坚定的。这可能是

真的,也可能不是。美国是二战的战胜国,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主宰。在一个刚赢得战争,并且自由和个人主义是重要思想的相对自由的社会中所持有的信仰,并不需要像那些认为自己受到外界威胁的专制社会中那样坚定不移。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那些持有坚定思想的人,其强烈的观念也会随时间渐渐淡化,通常还伴随着极度困惑以及偶发的心理疾病。

第二个方面是使用武力和恐吓:即强制劝说过程中所用到的强制措施。尽管在洗脑过程中会经常实施武力,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相反,许多邪教会向他们的受害者示好,而不是采取暴力。况且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暴力,其实也是相当困难的,就像帕蒂·赫斯特案一样。最值得令人关注的是:某些声称自己被洗脑的受害者,实际上是非常崇尚自由意志的,并且习惯于自己选择命运,而不是被他人胁迫。

接下来的案例清楚地展示了洗脑的这两个方面;同时也证明了亨特所提出的洗脑技巧大多都是以古老方法为依托的,尤其是在刑讯方面。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洗脑案例,它发生在"洗脑"一词诞生的四个世纪之前。其受害者是英国新教大主教及神学家托马斯·克兰默[15]。

案例研究:托马斯·克兰默

克兰默大主教是一名学术大家,也是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新教改革家。在亨利狂暴的天主教女儿玛丽继承英国王位之后,克兰默在1553年9月14日被遣送到了伦敦塔。生于1489年的克兰默,已年过六旬,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人。他被判为叛国罪,并处以死刑,而11月13日审判那天却没有被告律师出席。但由于他在新教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玛丽政权的软弱,他没有被立即执行死刑。他反而成了系统地进行试验的目标,最后使得他公开放弃自己的信仰,并且皈依天主教。

1554年3月,克兰默同狱友拉提美尔和里德利主教被遣送到了牛津。从那时起一直到他去世的两年间,克兰默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折磨,生活质量上发生了重大而不可预料的变化。他被笼罩在他人的势力之下,被剥夺了自由以及读书的特权。他所信赖的密友圈也

---

⑮ Thomas Cranmer(1489—1556):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英国宗教改革的领导者,坎特伯雷大主教。但他被玛丽皇后革职,于1556年在牛津被处以火刑。

被转移了。孤独、耻辱、恐惧使他陷入了极度的心理压力。公开谴责、私下劝说,还有宗教辩论,这些都严重打击着他知识上的自信和精神上的自足。

有时,这种压迫会迸发为一种公然的恐怖行为,就像克兰默被迫看着拉提美尔和里德利在大火中痛苦地死去一样。那景象使他心惊胆战,他颤抖着签署了那些需要他签署的文件。随后,他发现自己妥协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期望从女王那里得到的宽恕也落空了。他确信玛丽的严酷是因为自己没有满足她的要求,于是他彻底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并公开认错。最后,天主教接受了他,并对他表示热烈欢迎。从被迫害开始,克兰默周围的牧师们就同情他,像同情被救赎的罪人那样。尽管他仍然得死,但他的灵魂得到了救赎。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非但克兰默没有办法逃脱即将来临的死亡(无论一个人多么坚信灵魂不朽,但面对死亡仍然是恐惧,甚至痛苦的),就连监狱长也犯了两个致命错误。第一,允许他联络了他依然活跃的新教徒妹妹。她对他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无疑削弱了他对新信仰的崇敬。第二个错误是当克兰默想到自己儿子而失声痛哭时,一位牧师的反应极其冷酷。一位"父亲"嘲笑另一位父亲的不幸。克兰默透过自己的痛苦看到了这种讽刺了吗?对于这位极度孤独的老人来说,原本为他信仰的转变而表示热烈欢迎如今却变得如此虚伪。其实,一丁点儿的同情也许就能够赢得他,但这个对他遭遇的无情蔑视无形中冲垮了之前的所有威逼。克兰默对于自身心理扭曲的不安也必定随之增长,因为没有宽容施舍于他,他没有什么可在乎的了。最后,令其抓捕者惊骇的是,他进行了一场刑前演说,当众谴责了自己的背信弃义,最后毫不后悔地英勇就义。

克兰默经受了数月所谓的心理折磨。被剥夺了特权、朋友,还有最终的希望。当他看到自己的同僚以他曾被威胁过的方式痛苦地死去的时候,他理性的根基以及作为新教徒的身份遭到了打击。恐惧、悲伤、孤独等主要情绪和威逼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对于克兰默信仰的理性攻击似乎已经动摇了他,但这绝不是他决心归顺的唯一原因。他的屈服是由巨大压力造成的:命运的持续不确定,失去

心爱书籍以及朋友的离开,目睹同僚被火活活烧死,这一切都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积极情绪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克兰默一直希望自己的屈服可以平息玛丽的愤怒,并使其免于火刑。在所有强烈的感情下,他感到极度疲劳并难以招架,最终选择了一条唯一可以逃离这个大旋涡的方式:顺从。同样,不久之后,出现了两个强烈的情感刺激——与妹妹相见,以及当他因儿子而哭泣之时,一位牧师表现出嘲弄的态度——导致他信仰转变最终失败。

克兰默的案例表明:洗脑技巧是历史悠久的强制说服的一部分,往往包括身心方面的折磨。我们会在第5章中了解到:洗脑的诸多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优化,在克兰默生活的时代已经很完善。将不确定性当作一种心理武器来运用;使被洗脑者暴露在一群怀揣目的信仰的人群中;迫使被洗脑者远离旧信仰环境,并扫清一切可能加强其旧信仰的机会,比如:同朋友交谈;以性命相要挟,制造生理痛苦,或二者兼施;孤独,丧失隐私,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牧师在控制克兰默时有意地运用了这些手段。

对于那些在集中营里改造的战俘来说,半个地球之遥,四个世纪之后的遭遇与克兰默经历的基本相同。因为他们与家人和朋友隔绝,有时甚至还脱离了其他狱友,有时受到性命的威胁,或是受到身体上的虐待。通常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命运会如何,就像克兰默一样,在监狱里的大部分时间都面对着自己。每个个体通常都被放进一个“信徒”的小团体里,被迫参与长时间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每个人都要作详尽的自我批评,并要求接受其他组员的批评。这种用在战俘身上的批评的目的是“提出政治思想观点”,“克服错误思想,纠正各种意识形态的错误,提升觉悟,有助进步”。如果有人坚持记日志的话,那么日志就成了公共文件,在会议上经过审查,评估其思想的进步性,拥挤的生活环境根本不可能有隐私。最后,像很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当单纯的重复达到一定量的时候,那些经受改造之人的思想也就麻木了。成年累月,通过每天数小时的讲座、宣传报、广播,或是讨论会,稳固了其思想。精疲力竭无疑促使被洗脑者从精神上投降。克兰默在与天主教神学家长期、乏味的口水战中,也必定有过极度的疲乏。

被洗脑者与环境

人不是独居动物。

伯特兰·罗素[16],《西方哲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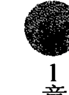
从有关洗脑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洗脑—— 一种邪恶而令人恐惧的把人从自由公民变成行尸走肉的魔力——实质上是一个需要至少两个参与者的社会过程。周围的信号一直在改变着我们的大脑,但我们并不会把引人注意的鸟鸣、新鲜面包的气味,或是疾驰而过的车声称为"洗脑"。洗脑需要一个或多个强制方或被迫方,像其他劝说形式一样,不管洗脑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都会涉及洗脑者和被洗脑者在社会层面的相互作用。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直接改变人类大脑(除了通过粗暴的方式,比如:刀、子弹、药物和额叶切除术),我们不得不依靠间接的方法:改变大脑接收的信号。这只能通过操控被洗脑者的生理或社会环境来完成。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在改变着他人的环境:我们都是影响他人的技师,但有程度之分。洗脑是一种极端形式:洗脑者的目标是完全控制被洗脑者的世界,继而最终控制他的思想。

梦想着控制他人的人更有可能诉诸极端的、非双方自愿的劝说方式,政府便是如此。我们将前者称为精神变态,将后者称为极权主义,但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都喜欢专制,都喜欢将世界简单地分为好与坏,都赞成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并且都对被洗脑者表现出极度的不尊重。"洗脑"一词是从极权主义政府演化而来的,这些极权主义者向世人展示了洗脑的主要职能,这个部分会在第2章讨论邪教时重现。

那么,极权主义国家或个人怎样才能实现对他人的控制呢?对于政府,罗伯特·利夫顿提出了八个心理主题,这些主题都具有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思想的特征(见表1.1)。"环境控制"就是试图主宰"个体与外界的交流(包括所有看到的和听到的,读到的和写到的,经历的和表达的),甚至其内心的自我交

[16]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20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也是20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罗素也被认为是与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怀特海一同创建了分析哲学。他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有着巨大影响。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流”。“神秘操控”是指“用一种在自身环境中自发产生的方式操控他人,激发其特定行为和情感模式”。神秘操控往往指较高的目标或超自然的力量,比如命运、历史之手,或上帝,或选民,或指代表超自然力量的某个控制机构的神性或半神性地位。然后就是“要求纯洁”,这是伴随极权主义思想与生俱来的二元对立思想,包括:政党与非政党;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信徒与非信徒;善与恶。正如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17]在《动物庄园》中的那句口号“四条腿的都是好的,两条腿的都是坏的”,这便是动物们遵循的基本指导方针。所以,那些老套的善恶二元论导致了有毒害的又不切实际的纯洁上的要求:上帝选民国度之外的元素都应该摒弃,以免玷污那些被拯救的人。

表 1.1 罗伯特·利夫顿的极权主义八大主题

1. 环境控制	控制个体与外界交流,继而控制个体对现实的认知
2. 神秘操控	以一种看起来自发的方式唤起特定的行为和情感模式
3. 要求纯洁	深信所选定组织以外的元素都应该被排除,以免玷污组织成员的思想
4. 忏悔崇拜	利用并坚持忏悔从而最大程度降低个人的隐私
5. 神圣科学	将意识形态的基本教义看作是道德上不可挑战,科学上极其精确,以此来提高权威
6. 语言加载	将复杂的思想压缩为简明扼要的短语以阻止独立思考
7. 教义至上	教义比任何人类经验都更加真实
8. 决定存亡	控制组织成员及非成员生活质量和最终生死存亡的权利

利夫顿的第四个主题是“忏悔崇拜”,它反对个人隐私,推崇将忏悔作为最终目的,将其用于剥削和控制,而不是安慰。他还列出了“神圣科学”,就像神秘操控试图操控道德和精神诸多方面那样,神圣科学被应用于意识形态教育,神圣科学,在道德上是不可挑战的——挑战将使挑战者沦为“非人”——在学术上则是精准的;“这样,终极的道德景象就变成了终极科学”。“语言加载”是一个麻木精神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最深远、最复杂的人类问题被压缩成为简单的、高度简化的、权威且好听的语句,方便记忆也容易表达”。这个过程

[17] 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其代表作有《动物庄园》和《1984》。

的目的是制止独立思考。这些"阻止独立思考的话语"暗示了群体团结,以及政党对语言的控制,最终控制思想。

最后,利夫顿认为极权政体的另外两个特征是:"教义至上",即教义比人类个体的任何经历都要真实;"决定存亡",也就是给予政党的特权,政党不仅决定着其信徒的命运,同样也决定着那些控制范围之外的非信徒的命运。该权利源于政党的信仰:通往真理的路只有一条——"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由我,没人能到圣父那儿去"(《约翰福音》,第 14 章 6 节)——只有他才知道这条路,错误的道路必须排除。就像基督教的诸多分支(除了加尔文教派,此教派相信宿命论),他们认为思想改造可以将非人改造为人。因此原则上并不能进一步作出以下假设:不光错误的道路,就连信徒也同样要被毁灭。这点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臭名昭著的纳粹:正如历史学家丹尼尔·戈德哈根[18]所说,"纳粹思想最具毒害性的因素是,他们深信犹太族的生物特性使他们无法得到救赎"。

案例研究:《1984》

乔治·奥威尔书中孤独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19],生活在一个由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三方势力交战的时期。他的家曾经在伦敦,现在在大洋国,他效力于地方极权主义政党。他的工作是篡改政党的政策记录,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作出与之前政策直接冲突的决定,也能表面上保持前后一致。为了操控历史,他被要求尽最大努力,因为政党要做到毫无瑕疵:"绝不允许任何教义或政治联盟的变化,因为思想的变化或政策的变化就是承认软弱。"

但书中的极权主义政党并不仅仅局限于操控历史。利夫顿提出的八个主题(见表 1.1)也明确体现了,这个体制就是思想极权最有力的例证。环境控制保证了党员在任何清醒之时都能严格遵守思想控制的纪律。每家每户都能收到政党控制的频道,通过此频道来了解外部世界的所有信息。这个频道是双向的,是潜在的当局监视手

---

⑱ Daniel Goldhagen(1959—):美国作家,哈佛大学前政治学及社会研究副教授。他因两部有关大屠杀的作品《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刽子手》(1996)《道德审判》(2002)而引起国际关注和广泛批评。

⑲ Winston Smith:乔治·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主人公。外围党员,在真理部记录司从事篡改历史的工作,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对所处的社会产生怀疑。



段。“思想警察”可以通过电屏在任何时候监视任何人。当局鼓励人们定期地通过“两分钟仇恨”释放群众情绪,他们可以群情激奋地直接反对政党的敌人。“党员是不能有私人情感的,需要一直保持热情。党员应该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和内奸无比仇恨、对胜利无比鼓舞、对党的力量和英明感到五体投地的那种狂热情绪之中。由清贫、不如意的生活引起的不满情绪被刻意地显露出来,然后通过‘两分钟仇恨’的手段将其消散掉。这样,可能产生怀疑或反抗情绪的投机思想被提前扼杀在了习以为常的内在纪律中了。”

像“两分钟仇恨”这样刻意安排的节目体现了神秘操纵计划“自发性”的特征以及忏悔崇拜的疯狂自虐。《1984》一书自始至终提倡纯洁和共鸣:温斯顿的工作就是净化历史。该政党美化他们的专制政府,认为他们的神圣科学不容挑战。即使教义一天天变得自相矛盾,他们还是被置于个人经验之上。温斯顿的工作要求他接受,甚至强化这样的政策主张:大洋国正在并一直以来都在与欧亚国交战,尽管他记得有段时间东亚国才是他们的敌人。另外,毫无疑问政党有权决定生死。

温斯顿是一个被记忆折磨的反叛者。他从反叛的视角讲述了政党施行思想控制的过程。这是一个语言修正的过程。政党逐步地推行“新话”—— 一种删减版的英语——“危险”词汇,比如“自由”都已不复存在。目的是缺少了这些词汇表达的某些概念也将逐渐淡化直至消失:“新话不是为了延展思想而是缩小思想范围。”那些留存下来的词汇都承载着意识形态,都是利夫顿“阻止独立思考的话语”的明显例子。

但政党的真正实力和骇人之处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温斯顿从来不知道哪些人支持他——所有人都是潜在的间谍。更糟的是,因为没有法律,所以严格地说,无所谓什么叫做违法;然而,任何非传统的行为都会遭到惩罚,而这惩罚就是消灭——一个人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消失了。没人知道什么是危险,什么不是,到底谁是“思想警察”,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抵御错误的主张,所以他们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而且因为信息都掌握在政党手中,所以他们又生活在极度的无知里。模糊地记得事物曾有所不同的温斯顿渴望朋友,渴望有人和他说话,渴望有人理解他。这想法本身就是“思想罪”,他知道这种想法

将促使他做出越来越多的鲁莽行为。当局旋即介入。温斯顿经受了拷打、精神崩溃和“再教育”。从对专制政府的憎恨和惧怕,转而爱上了专制政府。

但这都还好,一切都还好,斗争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爱上了专制政府。

奥威尔,《1984》,第240页

作为过程的洗脑

奥威尔斯巴达式的小说将我们带进了一个受害者和施害者都在运用强制手段的世界。他阐述了政党控制方法的目的性之本质,温斯顿改变信仰前后的认知差异,以及转变发生的较短的时间跨度。就像克兰默、帕蒂·赫斯特一样,武力、强烈情感、重复,以及身心折磨都很明显地施行于温斯顿。温斯顿所遭受的“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当他被带进当时带有神秘性的101房间,他被这一终极恐惧震慑了:老鼠将从他的脸上啃过。这使得他彻底屈服。

《1984》也表明洗脑本身不止是简单的劝说。第一个是受害者采纳的信仰类型。它们不仅与先前的信仰相差甚远,而且可能与现实或绝大多数信仰无关,甚至是对受害者不利的(正如宗教信徒被迫害的时候)。政党自己创造的现实可能与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毫不相干。这一点在《1984》里明显贯穿于整本书,书中描述了无处不在的毫无意义的配额、胜利,以及永无休止的反对无常敌人的征战。

声称被洗脑的受害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感性。当他们处理亲戚或是局外人问题的时候会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他们可能会对一切挑战新信仰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敌对情绪。故事的结尾,温斯顿回忆他先前的态度是“造成痛苦的、无用的误解!”回想起之前,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固执”“任性”。亨特引用了宣传短剧中一个学生愤怒的话语:“看到隐藏在美国教师和教授面具之后的杀人刀锋,我无法忍受;听到他们音乐剧背后的枪声和轰炸声,我无法忍受。现在我彻底明白整个形势了。”行为上的改变可能表现得非常极端,比如:信徒的亲属经常抱怨他们的亲人“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1984》的结尾,温斯特确实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和之前书中的那个变化无常的主角大相径庭。在反抗的日子里保持的激情消失了,他所关心的事情已经集中到了眼前的生活。淡忘了所有真理、记忆和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电视和酒单。

作为观念的洗脑

……人们曾居住的世界和现在一样……，都分不清究竟是崇尚秩序还是嗜好压迫？

德·托克维尔[20]，《论美国的民主》

“洗脑”通常被看作是一个“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但新的解释会促使人们不再需要这些概念，这使得提出“洗脑”这一用法显得多此一举。本书余下的部分将介绍一旦被标签为“洗脑”后的另外几种解释，这些解释都是在该词被创造之初就已经存在的。可以看到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能够为我们研究“人们如何相互影响”提供大量的启示，从日常交流中偶然、短时间的影响到通过刑讯和威逼而引起的改变其人生的后果。尽管很多人（包括美国政府）都花费时间、金钱去研究“洗脑”这一过程，但这些案例研究并没有为这一“神秘”过程提供任何证据。当然，这些研究认为：作为一个过程，洗脑最好是用作一个集合名词来描述各种在双方非自愿情况下思想变化的技巧，这种技巧已逐渐得到了认知和理解。

但这种解释与洗脑的另一方面毫不相关，即其作为潜在极权主义威胁的概念性本质。我们再次回到奥威尔的《1984》，在温斯顿极度痛苦的转变时期，对他实施刑讯的奥勃良[21]给出了一个明确而带有明显福音派特征的声明，指出了洗脑和极权主义之间的联系：

最后你向我们投降的时候，这肯定是出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并没有毁灭异教徒，因为他是抗拒我们的：只要他抗拒我们，我们就不可能毁灭他。我们改变他的信仰，我们捕捉他的内心，我们重新塑造他。我们把他所有的邪恶和幻想统统烧掉；我们把他拉进我们的阵营，并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真诚的、全心全意的。在杀死他之前，我们要将他变成我们的一份子。对于我们来说，错误思想在世界任何地方存在都是不可容忍的，不管这思想有多么隐秘，多么无力。

奥威尔，《1984》，第205页

---

[20]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著作有《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和《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1856）。

[21] O'Brien：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的人物。核心党员，思想警察头子，参与对温斯顿的拷打。

这种说法让人心寒地想起了托马斯·克兰默的案例,这是极权主义的终极幻想:不单是行为,还包括世界上每个大脑的每个想法都遵循一种思维模式。人们渴望成为真正的超人,这超人不是被基督教徒顶礼膜拜的上帝,也不是被穆斯林歌颂赞美的真主阿拉,而是一个疯狂独裁的上帝。他要求我们不断完善,粉碎一切自由、越轨或是改变的可能性。除了彻底的毁灭,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更为可怕的观念;这种观念令人毛骨悚然,这一特征是单纯的毁灭所不具备的。

※本章小结

弄清洗脑这一根本变化过程,或许可以帮助解密众多常人思想的运作情况。那些促成这一突变发生的因素首先以不同组合方式,随着时间不知不觉地对铸就我们的性格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这促使我们质疑其根本原因而非表面现象。

丹尼斯·威英[22],《被操控的思想》

本章介绍了"洗脑"这个概念,并探究了其不堪承受的历史,概述了洗脑作为"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作为一个或多个过程的描述,以及作为危险观念的情况。在之后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这个极权主义的终极幻想究竟有没有实现过,以及能不能实现。而且,我们也将讨论洗脑的主张——梦想完全控制。它对我们和我们的自由意志作出了何种评价?在追逐这个梦想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22] Denise Winn:英国记者,专攻心理学和医学。是《今日心理学》杂志的编辑。代表作有《被操控的思想:洗脑、调节和教化》。

第 2 章　上帝还是组织?

如果连上帝都支持我们的话,还有谁敢反对?

《罗马书》,第 8 章 31 节

自从 1950 年第一次有“洗脑”这一概念的阐释起,它就一直在世俗文化中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它潜伏在电影和惊悚剧中,并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的鄙视,人们普遍认为“洗脑”是特定极端精神创伤的结果,是评论者在处理无法解释的问题时万不得已采取的权宜说法。这种创伤不是偶然,通常由一个或多个人受政治或宗教动机驱使而强加给他人。本章中,我将探讨究竟这些动机是什么,以及它们得以兴起并变得如此危险的社会和心理背景。

被诅咒的强权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近期最严重的精神创伤发生在美国。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清晨,一架载满乘客的喷气式飞机撞击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楼中的一幢。在这发生后的几分钟内,全世界都以为这仅仅是一场可怕的意外事故。但紧接着,第二架飞机又撞击了双子大楼的另一幢,第三架撞击了五角大楼,第四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被乘客制止,因为他们通过手机得知了之前的几次袭击,设法制服了劫机歹徒。世贸中心的双子大楼倒塌了,死亡人数也达到了上千人。那些和我一样,亲眼看到整个事件发生或是看到电视直播的人,都不会轻易忘记当时记者报道时发颤的声音,就连他们都觉得难以置信,他们竭尽全力描述所看到的一切。对于那些卷入其中的人们和美国人民来说,“9.11 事件”留下了深深的伤疤。

悲剧发生之后的最初几天,在搜寻尸体和恐怖袭击实施者的同时,有人将“9.11 事件”描述为极其邪恶的举动。当然,也有人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不仅在之前曾有过试图破坏世贸中心的行为(那与基地组织有关,“9.11 恐怖袭

击事件”也与这个组织有关)发生,而且美国之前也遭受了来自本国民众的,发生在本土的恐怖事件。1995 年 4 月 19 日,蒂莫西·麦克维[①]出于政治动机,轰炸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政府大楼,导致 168 名政府人员和平民死亡,超过 500 人受伤。麦克维袭击本身就是最近的一次由政治和/或宗教动机引起的恐怖袭击,世界性的恐怖主义事件远可追溯到 1950 年之前。自从“洗脑”一词诞生,该词的黑暗面就不断地引起一轮又一轮的讨论,“9.11 事件”也不例外。

宗教和政治

> 救赎它的是……的观念,以及对这个观念的无私信仰——可以为此调整、跪拜,甚至牺牲。
>
> 约瑟夫·康拉德[②],《黑暗的心》

在改革后的西方,宗教和政治越来越趋向各自为政(至少是在原则方面),比如:美国宪法和法国政教分离政策。但基地组织的情况表明,在其他国家并非如此。这个截然不同的组织的头目是富有的沙特异政者奥萨马·本·拉登[③],他被称作是“激进的穆斯林”,但这个组织除了传播伊斯兰教以外,还声称其政治目标是消除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霸权。例如,本·拉登声称的政治目标是:把美国军队赶出沙特阿拉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宗教原因导致的,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亵渎了这块神圣的土地。政治和宗教在“9.11 事件”及许多其他冲突之中紧密交织,密不可分。

英国世俗评论者惯于利用大加润饰的宗教形式,经常对宗教冲突的独特危害性评头论足。但值得争论的一点是:究竟该不该归罪于宗教。事实上,即便是要区别宗教动机与其他形式的动机,那也相当困难。比如:人们经常谈及的典型宗教冲突地区北爱尔兰,当地两大团体的瓦解就是各种复杂的动机所致:对于地位、人权、民主权益的担忧,以及害怕遭到镇压、击溃,甚至消灭的

---

① Timothy McVeigh(1968—2001):制造 1995 年 4 月 19 日俄克拉荷马大爆炸的元凶,是“9.11 事件”之前美国最为致命的恐怖活动。2001 年 6 月 11 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重刑犯监狱将其执行注射毒液的死刑。这是 1963 年来美国联邦政府首次恢复对死刑犯执行死刑。

② Joseph Conrad(1857—1924):生于波兰的英国小说家,是少数以非母语写作而成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年轻时当海员,中年才改行写作。一生共写作 13 部长篇小说和 28 部短篇小说,主要作品包括《黑暗之心》(1899)、《吉姆爷》(1900)、《密探》(1907)等。

③ Osama Ben Laden(1957—2011):基地组织的首领,现被指为美国 2001 年“9·11 事件”的幕后总策划人,并被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名单的首位,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通缉犯”。

恐惧。

但毫无疑问，某些特定动机，包括宗教和政治理想，能够促使人们对他人实施可怕的暴行。对比为自由而战的法国革命和为真主而战的巴斯克民族主义，抑或是基地组织，尽管这些动机表面上不尽相同，但他们似乎有着一些共同特征。他们都运用抽象、模糊、承载价值的思想，将其同强烈的情感联系起来，然后利用这个综合体为贬低反对者找到合理借口。

概念

政治和宗教都将某些相当抽象的概念作为核心概念（如自由、国家、上帝），我宁愿称之为“虚无”。这些虚无的概念非常模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正是由于这种模糊性，使得理性辩论无法与之抗衡；其实，这种理性辩论的参与者是在彼此迷惑。他们常常运用这种“粉饰法”掩盖其目的中不切实际的想法、暗藏的陷阱以及其他邪恶的因素，抑或是希望唤起众人的情感回应，从而提高受众对其议程的投入程度。同抽象与模糊这两个特点一样，虚无概念也承载着价值（第 9 章会具体探讨这个话题）。这一点极其重要，因此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情感包袱，鼓励其信徒建立某种优越感。

情感

虚无概念的抽象性特征使其信徒避免专注于实际困难和实际问题（比如：怎样确定上帝想要什么，或是究竟何时才能实现自由），但这些概念并非远离现实。这些概念将自身同具体的、高度情绪化的例子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力量。人类的大脑习惯于同时联想感知到两种刺激。一个熟练的演讲者会利用这一点，比如设法将一个或真或假不公事件同虚无概念联系起来。英国内战后不久，约翰·弥尔顿把一个有点抽象的宪法问题——议会是否有权利处死查理一世——同战争、毁灭和屠杀联系在一起：

> 一个国王因其臣民的福利而获得如此之多的圣约、利益和荣誉，那他还能乞求什么呢；他为什么蔑视法律和议会……七年战争毁灭了他最优秀的臣民，他应该思考为什么大家把逃跑当作一种恩惠，成千上万被毁灭的基督教徒死得不明不白，被屠杀过的尸体玷污着大好河山，他们哭喊着要报复那些本应让他们好好活着的人。
>
> 弥尔顿，《国王与法官的就职》，第 285 页

结果

虚无概念大都充满血腥。它们被看作比生命还重要，并通过两条规则来促进这一过程。第一，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第二，不接受该思想的崇高性的人将被看作低人一等。换句话说，虚无概念鼓励极权主义式的思考方式，正如罗伯特·利夫顿所描述的那样(见第1章)。因此，他们常把恐怖主义合理化。但是，对于那些受害者，或是旁观者来说，很难想象人类竟然可以对同胞做出这样的事，能够明知故犯地、冷静地驾驶着载满乘客的飞机撞向摩天大楼，或是炸毁一栋酒店，或是看着小孩无辜的眼睛，然后朝他的头开枪。为了探求该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我们用到诸如邪恶、疯狂，或是洗脑这样的词汇(如果知道谁是操控者的话)。我们明显地表示出敌意，甚至是愤怒，这种显而易见的外部威胁加固了恐怖主义者的投入。

显然，在英格兰这个长期习惯容忍并厌恶激情的民族，国教已日渐摆脱福音派暴乱，并朝着宏图愿景不断迈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大而空的概念的不信任为英格兰带来了诸多益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思想冲突发生在1688年，新教徒奥兰治亲王威廉与天主教徒詹姆斯七世(苏格兰)和詹姆斯二世(英格兰)发生冲突，其中抽象的宗教理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今的英格兰教会更加专注于细节。它同社会福利、政府倡议一起，以各种富于创造的形式支持着当地社区，在贫困地区建立中心站，教授电脑技术和其他与工作相关的技能，进行监狱探视，帮助社会上最贫困的居民。结果如何？英格兰国教竟遭到众人鄙视，其原因在于缺乏激情，但事实上，它却做了很多善事(远远多于对它的批评)。在英格兰，有人因自身信仰而惨遭杀害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

和宗教一样，政治也是如此；在写作本书时，英国正处于一个同主流政客思想仅有极小差异的阶段。和复杂的日常管理技巧相比，国家领导人似乎很少关心宏图愿景。很多人抱怨这使政治变得无聊，使公民变得冷漠，尤其为年轻人提供了其他释放精力的方式。这是坏事吗？可能是，但当政治变得激动人心的时候，结局往往也是血腥的。在追随崇高事业快感的横扫之下，人们更容易犯下暴行，进而引发观察者如下的评论："他们一定是被洗脑了！"回想一下，英国最近一次疯狂的政治运动，是杀害了上千人的17世纪内战。许多人选择漠视这场政治交战。

不幸的是，和平对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来说都是白日梦。这些国家中，出于宗教或政治动机的团体经常给他人或自身成员带来死亡、伤害和恐惧。为



了更深层次地探究这类团体获得(通常相当大的)权力的过程,我们必须研究具体的案例。我选取了两个著名并且典型的邪教案例——尽管宗教和政治动机不是其唯一驱动力,但也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两个组织起初宗旨都是高尚,甚至乌托邦式的理想,并且都起源于美国——这个自由又注重人权的国度;他们不是虚构的故事,应该受到谴责的并非只有那些来自异国文化的神奇力量。两者都以谋杀、教派的解体以及众人的苦难和受害者家属的浩劫而告终。这两个教派都是家喻户晓的,所以在这里我仅大致描述。我将重点介绍卓乎林和欧波同在《心灵机械手》中所描写的"曼森家族",以及施瓦·奈波尔[4]关于琼斯镇大屠杀的作品:《黑与白》。

小规模邪教:曼森家族

查尔斯·米勒斯·曼森被委婉地描述为一个拥有苦难童年的人。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在16岁时就生下了他,即使在她未入狱并与小曼森待在一起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对他有任何照顾,小曼森在众多极不情愿的亲戚手中几经转手。从9岁到32岁,他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少管所和监狱中度过的,尽管在那里他经受了暴力,但这为他提供了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生活体系。他学会了生存所必需的坚韧以及其他技能:尤其是,我们大多必须具备的技能,如做社会变色龙,即按照我们所交往的人的喜好去做事。(回首过去,有谁没在自己敬重的老板面前感到过不安,又有谁当自己需要某种能力来完成某事之时,因意外获得该能力而颇感不安?)同样,这种人际交往培养了曼森对非主流宗教和哲学的兴趣,其中包括:神秘学、东方神秘学和科学论。

尽管他极力恳求留在监狱,但在1967年他还是假释出狱。曼森在32岁时发现自己正处于六十年代的反文化热潮中。突然有人喜欢他,欢迎他,愿意倾听他所讲的每一个字(他的学习经历使他能够深刻地讲授他们想听的话题)。他能够熟练地知晓人们想要什么,并且明确地给予他们。在监狱里经过生存压力和如何远离麻烦的磨炼,使他快速地成为"花癫派",他能够读懂他人思想的能力似乎是天

---

④ Shiva Naipaul(1945—1985):出生于西班牙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英国和特立尼达小说家兼记者。

然而成的。他的身边聚集了一群女性，并进入了这个“家族”，他献身于自由恋爱及对领导的盲目崇拜。他用性激发女性追随者，但也鼓励她们谈论自己，这样他就可以了解并发现她们的弱点。比如，有些女孩和自己父亲的关系很不好，曼森让她们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然后和她们做爱。他作为“慈父”的身份不仅使那些女孩远离了之前的生活（同自己的父亲发生性关系是严格禁止的），而且使她们无比地相信曼森。他向她们提供了缺失的爱。

曼森试图将流行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这个梦想持续了一年之久，但他的尝试失败了。最终至少短时间内，他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得到了和“甲壳虫乐队”一样的名气，但他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同一领域的成功。这一点是否使他觉得前景黯淡，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清楚的是他曾和撒旦信徒组织有过接触，他开始谈论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开始在“家族”中使用更加暴力的控制手段。由于与世隔绝，并高度依赖曼森的情感满足，“家族”成员们接受了他在她们人生各个方面的至高权威。他通过使用药物、侵略性的讯问，以及不断地重复教条来巩固其权威。他还开始利用宗教符号明确自己的身份——基督、上帝和撒旦——并带领“家族”举行奇怪的仪式，包括杀牲畜、饮血，并模拟谋杀和暴力。

在某个时期，曼森认为即将到来的大灾难来得还不够快，需要助其一臂之力。由此诞生了“杀人王曼森”这个概念，与此同时，曼森还促使他的“家族”去完成这个任务，他相信这个血腥的革命将会重塑新的社会秩序。1969 年 8 月的两个夜晚，他们实施了这个暴力运动，残忍地杀害了洛杉矶的七名富人，包括怀有身孕的女演员莎伦·塔特。

面对着被刺穿和毒打的尸体，用被害人的鲜血写着的“猪猡们去死吧”“战争”“杀人王曼森”，以及被罪犯销毁罪证的犯罪现场，民众感到震撼、恐惧和困惑。被捕后，由于谋杀者和受害者之间缺乏必要联系，人们更是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怪异。一个年轻的妇女无比镇静地详述了他们屠杀莎伦·塔特和她未出世孩子的场景，这使人们无法理解。另外，起诉方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曼森并没有出现在犯罪现场。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起诉他曾对这些年轻女性进行过洗脑，使她们接受了这一“死亡哲学”。

采纳洗脑这一证据使起诉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的目的是

将曼森及其信徒绳之以法，通过提出曼森对其信徒的洗脑，证实他的行为对案件的发生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但是，如果曼森的那些女孩们确实被洗过脑，那么她们又如何能对所做出的罪行负责呢？开庭之时，起诉方回避了这个问题，被告也没有强调这一两难状况，加之被告方也没能提供精神失常或其他可以减轻罪行的证据。加州联邦上诉法院在裁定这桩案件的时候，持有同之前纽伦堡法庭相同的意见，指出同伴压力，身为教派追随者，或是受到极具魅力领导的影响都不足以减轻一个人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他们同样支持领导人应负责任的观点。被告查理·曼森被定罪为一级杀人犯，又被送回了监狱，而这次是终身监禁。

曼森的人际交往技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准，但如果没有围绕在他身边的组织团体，他不可能如此臭名昭著。组织和组织内机制对于宗教和政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将探寻这种组织形成和发展之下的心理机制。但是，首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案例研究。

大规模邪教：琼斯镇大屠杀

琼斯镇是一个社区组织，1977 年由教士吉姆·琼斯在圭亚那与世隔绝的丛林中建立。转移到丛林反映了人民圣殿教（琼斯于 1956 年创立）和旧金山组织（人民圣殿教的最初根据地）关系的恶化。和查理·曼森一样，至少是在教会成立之初，吉姆·琼斯极富人格魅力，被他的追随者视为充满仁爱的神。人民圣殿教宣传手足情、共生、社会供给，以及劳苦大众的归属感。早期，他将大部分理想都付诸行动，实施了大量的社会救济方案。在自力更生的冷战时期的美国，这种社会主义行为可能助长了琼斯组织被世人怀疑的态势。

可对于追随者来说，琼斯是位上帝派来建立乌托邦的救星。琼斯镇成立于 1977 年，随后很多前来参观的外来者都相信他们瞥见了一个地球上的天堂。即使是那些脱离琼斯镇的人也高度赞赏他们所看到的那些行为的道德标准。狂热的基督教传教士努力地构建着他的农业公社，生活很是艰难，但琼斯选对了地方。因为选址与世隔绝，所以公社很容易控制，外部对社区的敌意也迫使居民紧密地粘连在一起。并且当时的圭亚那是进行实验的有利场所。当时圭亚那受

到福布斯·伯恩汉姆的独裁统治，并且该组织伪称自己的理想同人民神殿教相似。然而事实上，正如施瓦·奈波尔在《黑与白》中指出的：圭亚那政府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强盗行为，自身就包含了最高层次的腐败犬儒主义及思想动机"，如此聚焦于伯恩汉姆的个性，致使政府变成了仅为"他的狂热、欲望和幻想……任性影射"的制度。他其中一个幻想就是偏执的：在大屠杀时，圭亚那的军事预算已达到了医疗预算的四倍。伯恩汉姆热烈欢迎人民圣殿教来到自己的国家，而吉姆·琼斯以公开支持他作为回报。

但其他人并不看好这项新兴事业。的确，琼斯镇事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两极化。一方面是美丽的天堂，另一方面是可怕的地狱。叛逃者和琼斯信徒的亲友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相关亲友团"。施瓦·奈波尔令人信服地指出该组织装腔作势的态度和举止，以及他们对于黑色琼斯的痴迷，都促进了琼斯镇迫害的不断升级。尤其是叛逃者感到稳固地占领了道德高地，通过洗脑知识的加固，他们对自己和他人在琼斯镇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负责任（有人在想他们究竟是如何设法叛变的）。公社的传言被贪婪地传播：琼斯用控制思想的邪恶力量欺骗和操控、折磨其追随者，他甚至获取了一颗原子弹，并计划接管整个世界。

1978 年 11 月，经过数月渐增的偏执和急剧升级的肉体苦难，有关琼斯镇的评论众说纷纭。琼斯得了恶疾，公社里的话题涉及了开采、死亡，美国社会反对黑人及贫民所制造的暴行、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法律诉讼、索赔和反诉，以及来自叛逃者有关琼斯全副武装并计划大规模自杀的警告之中，国会议员里奥·赖安⑤领导了一支包括"相关亲友团"和记者的代表团前来参观琼斯镇。11 月 14 日，代表团的飞机在圭亚那降落。此时，一辆载满武装人员的卡车埋伏于此，国会议员赖安不幸成了遇难者之一。四天后，琼斯实施了一个精心筹划的自我毁灭计划。邪教成员因饮食不良、疾病和剧烈的身体劳动而精疲力竭，他们可能感到乌托邦正在逐渐消失。当然之中的极少数似乎也曾对琼斯有关通过在美味汤中加入氰化物而制造大

⑤ Leo Ryan（1925—1978）：美国民主党政治家。他从 1973 年担任加州第十一议员选区美国议员，1978 年琼斯镇大屠杀前不久被人民圣殿教成员谋杀在圭亚那。

规模自杀的决定进行了反抗。最后，这个事件造成了九百多人死亡。

邪教的心理

狂热者编织着梦想，

一个教派的天堂。

英国诗人约翰·济慈⑥，《海伯利安的陨落》

每个邪教都是独特的，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宗教方面：尽管世界上主要宗教都起源于邪教的说法值得商榷，但绝大多数都变得越来越组织化，已经失去了其多数邪教特征。但是，就像上述两个案例显示的一样，有一些现象是共同出现在邪教和宗教之中的（至少是在早期）。包括：领导者和追随者严格的分化；反对当下权威；随着新运动的展开，偏执地致力于树立自己的形象；罗伯特·利夫顿提到的过分简单化、二元论思想（善与恶，信徒与异教徒，被拯救与被诅咒）；易于产生乌托邦的想法。最后，邪教与宗教及其他组织的不同在于他们自我毁灭的频度和强度。

领导者和追随者

和曼森一样，琼斯是一个极富魅力的领导者，他认为自己遭受过迫害，并拥有一个苦难的背景——即穷困潦倒的经历、破碎的家庭环境、遭受歧视，以及遭受其他社会不公。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位领导人都开始在精神疾病的边缘摇摆。邪教通常主张紧张、孤立和偏执的环境，被药物、性，以及强大的社会力量所驱动。随着领导者和追随者一步步脱离现实，他们在邪教世界（其中领导者就是上帝并且一切都很好）和外部世界（其中领导者是无名小卒并且每个人都是敌人）的差异中不断承受着压力。邪教的追随者通常认为他们的领导者是神圣的，或至少也是受托于至高权威（上帝、命运、历史的力量，或符合他们特定世界观的任何虚无概念）来改造世界的。

另外一个与邪教相关的因素是生理或心理年龄。多数追随者容易在十几岁或二十岁多岁，还处于未成年的时期（还没有完全安于自身现状，寻求邪教可以提供认同感和安全感）就加入邪教。他们经常被认为是迷失了自

---

⑥ John Keats（1795—1821）：杰出的英诗作家之一，也是浪漫派的主要成员。代表作有《圣艾格尼丝之夜》《秋颂》《夜莺颂》《拉弥亚》《致秋天》等。

我，甚至连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满足自己的需求了。此外，对于那些被他们抛弃的主流社会的年长成员来说，他们的这些需求令人尴尬：正如琼斯镇大屠杀所显示的那样，许多邪教追随者都是空想家，虔诚而强烈地寻求精神启蒙，不仅如此他们还寻找机会帮助其他人。邪教不仅是一条获得救赎的道路，而且还在这冷嘲热讽且充满敌意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表达善意的机会。不同于主流宗教，邪教带有与生俱来的反对权威的快感。当代的邪教还在其他两个方面区别于主流宗教。第一，邪教趋于年轻化，强调创新能力和激进主义。尽管邪教吸引年轻人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典型的邪教领导花衣魔笛手（起源于中世纪的传说），但这可能一方面与年轻成员占绝大多数有关，另一方面与当时迷恋年轻化有关。第二，邪教通常更加严格地控制信息。“尽管宗教对于加入其中的人意味着自由，知情同意，但仅仅是他们加入之时才是自由的，一旦加入后却没有知情权，而一旦有了知情权，就不再拥有自由了。”

叛逆与偏执

邪教通常抵制既定学习和权威（比如：曼森从科学论转变到撒旦崇拜主义；琼斯反对美国资本主义）。因为这种拒绝和强烈的情感有关（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可能将其描述为恋母情结，这是把自身定义为独立个体过程的一部分），邪教成员通常认为被他们拒之门外的外部世界也有着同样强烈的情感，并会作出反击。这就产生了极具内敛力的偏执感，在很多情况下（就像琼斯镇惨案），这至少有据可依。比如，不管是否是合法成年人，邪教成员家庭通常都会不遗余力地拯救“误入歧途”的后代。20 世纪 70 年代，对被诱拐的邪教成员进行反洗脑的过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健康产业，然而这还是遭到了相关人士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反洗脑过程比邪教本身的行为更像洗脑。

简易和纯洁

邪教成员喜欢把邪教以外的一切事物妖魔化，并以此将暴力行为合理化，甚至必要化。他们的灾变社会观就是把社会看作邪恶和腐败，一个在未来梦想实现之前必须毁灭的世界。琼斯的追随者担忧一切事物，从克隆到绝育再到精神外科；他们相信，这些在法西斯种族主义者手中都是潜在的武器，都能够很快压倒美国。这个将要被毁灭的世界包括所有不接受他们信仰的人——



对于邪教来说,这些人都是亵渎神灵的。就这样,在1972年,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教对另外一家怀有敌意的报社文章作出了"报应总会降临到那些鲁莽地跨越圣殿的人身上"的回应。相比之下,邪教成员则是被拯救的民众,只要他们保持这个成员身份,他们就是圣洁的。讽刺作家汤姆·莱勒[7]是谱写抗议歌曲的民歌手,很好地捕捉了这一自鸣得意的态度:

我们是民歌军,
人人都很迁就。
我们痛恨贫穷、战争和不公,
不像你们那样守旧。

莱勒,"民歌军",《未来思维》

和宗教一样,邪教一般都怀抱承诺:一个乌托邦式的信条,与上帝选民们可以得到的辉煌未来相比,当下的黑暗微不足道。同许多抽象思想一样,邪教的愿景不仅模棱两可,而且无法验证;当然,除非邪教设定一个世界末日的具体时间。换句话说,乌托邦式的想法使虚无思想更加虚无缥缈,也因此更加危险。正如汉娜·阿伦特[8]所指出,"除了提出控制当前,以及通过宣称只有未来才能够展现其优势外,几乎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避免争议"。

与琼斯相同,曼森极度痴迷即将到来的天启。他感到自己被选中并去领导人们进行实现天启的革命。但"杀人王曼森"这个概念并不是他的原创。邪教领导经常强调自身的原创性,其实相同的思想已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出现过了。的确,当我们把曼森的谋杀案件和最早的西方天启模式《圣经启示录》(这本书对他产生了强烈影响)作对比的时候,曼森的谋杀案件小得可怜,这是一个试图扮演上帝的悲哀举动。原版(根据《圣经启示录》的第16章)中,曼森希望"杀人王曼森"能带来所谓注定的"恶疮":江河、海洋变成"死人之血",大火、痛苦、黑暗、干旱、雷电、撼动世界的地震,以及大冰雹,也就是大灾变。

暴力结局

最后,自我毁灭的倾向是邪教最令人恐慌的一个方面。多数人类组织都

---

⑦ Tom Lehrer(1928—):美国创作型歌手,讽刺作家,钢琴演奏家和数学家。他最为著名的是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精粹诙谐的歌曲。

⑧ Hannah Arendt(1906—1975):原籍德国,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集权主义的起源》。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

有这样一个模式：诞生、发展、稳定和衰落；但有些邪教并不是这样，他们是以大灾难的形式而告终。他们都是家喻户晓的，其造成的大量伤亡使之进入公众视线。曼森惨案、大规模自杀，以及琼斯镇大屠杀，乌干达发生的“复兴上帝十诫运动”、韦科惨案，还有太阳圣殿教，都登上了世界新闻的头条；像韦科惨案一样，他们都是在外界不知晓的情况下直接作用于各自组织内，直到毁于一旦才为世人所知。

20 世纪诞生了众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用现代科学去了解它们的机会。随着心理科学的发展，我们第一次运用心理学方法去研究人类组织。从那时起，社会心理学家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团体组织是如何创建和运行的，以及把个体凝聚在一起或分散开来的种种压力。本书不是社会心理学教科书，我只是将大量文献中的一些方面归纳起来而已。尽管社会心理学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当作洗脑，但它确实为我们弄清洗脑本身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没有什么比它研究像邪教这样的组织来得更加清晰明了的了。

为什么组织如此重要？

个人主义是一个强大的信条，它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极具影响力。从镜子里看自己就是赞美傲然独立的自我，一个坚如磐石的自己。鉴于此以及我将提到的一些组织的负面影响，提出以下问题是有价值的：为什么组织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尤其是在处理虚无概念的时候？答案来自于现代哲学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观点即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⑨]对于私人语言概念的批评：

> 试想一下如下的例子。我想用日记记下特定感觉的重现。为实现这个目的，在我有这样感觉的日子，我都用符号“S”标记在日历上。

这个符号“S”就是私人语言中的一个词语——一个表示“特定感受”的词。只有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怎样才能知道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呢？

> 我能指出这种特定的感觉吗？而这并不是一般普通的感觉。但是当我把这个感觉说出来或是用特定符号记下来时，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个感受上——并从心理上指向了它——但是这样做有何意义

⑨ 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出生于奥地利，后人英国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 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 呢？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通过定义可以帮助建立一个符号的意义——但这是在我集中注意力的情况下才能被精确完成的，因为这样我才能把符号和感受的联系深深印在心里——但“我深深印在心里”只不过是说：这个过程只能使我在今后能够记得这个正确的联系。

我知道“S”代表什么，是因为我在遇到和以前相同情况的时候使用这个符号来代表我的感觉。但我怎么才能确定这两次的感受是一样的呢？感受的定义过于模糊，尤其是当这个感受可以估量的时候。我们能说我兄弟举着自己女儿时候的那种开心，在连续的两天里都是一样的吗？更难说我父亲给我拥抱时的开心是与我兄弟抱女儿时的开心是相同的了。这是因为尽管我们都将这种感觉称为“开心”，但并不意味着我父亲的感觉就和我兄弟的一样。同样，我也不可能完全肯定地说我会正确地记得我的感觉，并且可以在面对不一样的感觉时不用“S”记录。换句话说：

> 在当前情况下，我没有关于“正确”的标准。人们可能会说：所有可能对我来说是正确的东西都是正确的。这只能说明现在我们还不能讨论什么是“正确”。

为了检验是不是每次遇到相同情况时我都用“S”记录，我不能完全依赖自己的判断，因为这个标准会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只有把自己和他人的用法进行对比，才能找到一个独立的标准。意义并不是外部强加的，词语的意义是根据我们如何使用它来确定的。语言必须是共享而公共的，可以相互借鉴和参考的。对于虚无概念也同样适用，因为它们毕竟也是通过语言表达的。我们需要参考他人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不仅仅因为人类个体无法匹敌，甚至不容轻视社会几百年来通过道德争论（如为什么重新改造车轮?）积累下来的知识，还因为我们无法依靠自身准确地记忆（可估量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一旦走向极端，无论对于掌控者还是受害者来说，控制的梦想都如此致命的原因。我们身边需要拥有一些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事物（和人），因为他们的独立性是使得我们能够确认自己生活在现实中，并检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们用来塑造他们的思想和话语依然“正确”的唯一方式。

我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组织，能够使我们信任自己的语言，以此来评估并记忆用该语言进行交流的思想。但是，如上所述，对于强大的虚无概念来说，当组织得出与“本质冲突的”概念相矛盾的结论时，问题就出现了。我们没有必要进入《1984》的虚幻世界中去寻求“战争就是和平”或“自由就是奴役”

的处境，我们的自身世界就充满了这种状况。有时这些组织刻意地试图操纵公众意见，但有时他们又强烈地、执着地相信自己的准则。通常遇到这样激情狂热的状况，我们就会给它贴上"邪教"的标签。

邪教的构成

如上所述，邪教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组织：通常有一个领导者和一定数量的追随者（他们所处的地位可能不尽相同，比如：新手、能手、领导者面前的红人，等等）。领导者和追随者为组织带来了不同的需要，也从组织得到了不同的满足。用心理学的话来说，领导者提出自己拥有神授的能力，而追随者则依赖于领导者。他们被一个共同的"认知图景"捆绑在一起：一个思想、信仰、态度和感受的集合体。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具体探讨领导者及其追随者。但不管如何任意定义，仍有一些心理机制是存在于各种组织之中的。也有一些对许多邪教都十分普遍的机制。我们需要考虑邪教组织在成员间实施思想统一时所运用的技巧，然后将其与洗脑中运用的极权主义技巧进行比较。

组织内与组织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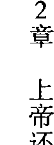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相遇。

拉迪亚德·吉卜林[10]，《东西方民谣》

从我们最低级的知觉过程到治疗他人，将事物分类是人类大脑最基础的活动。如同许多视觉幻象所显示的，偶尔巧合或空间迫近即已足够。如果在我们看到一个事物的同时听到了声音，除非事先知道，我们通常会假定此声音是该事物发出的。在整个生命过程中，我们在集合、分类中获得了不计其数的概念范畴。我们以此加快了理解世界的速度。如果我能够将一个新鲜事物判断为"猫类"范畴，我会立刻反应出这个新事物的所有储存信息（"食肉动物""可能喜欢乱抓""不会舒服地待在我的厨房里"）而不用重新思索。这使我省下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这绝对是一个生存优势。

打开任何一本流行的神经科学书籍，你可能都会找出吹捧人类大脑极其

[10]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出生于印度孟买。代表作有《营房谣》（1892）、《七海》（1896）、《生命的阻力》（1891）、《丛林之书》（1894—1895）等。他于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该奖的作家。



复杂的语句。这种复杂性使人类置身于他人必须应对的复杂事物之中。如果不想在社会交往中磕磕碰碰,那么我们就需要捷径。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些启示,我们会看到广告人是如何赚到我们的钱的。现在,我们可以注意到分类是我们所寻求的一种策略。如果我把一个人定义为一个组织的成员,那么该组织的相关信息就会使得我对这个人的反应沾染上该组织的相关特点。

维特根斯坦指出:一个没有概念界限、没有可能反例的概念,其传播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可能"这个词至关重要,因为实际的反例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我可以把你定义为"需要排泄之人"组织中的一员,尽管我知道事实上这个组织没有反例:每一个人都需要排泄。"需要排泄之人"这个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可以轻易地(即无须将自己捆绑于相应逻辑)想象出一个不排泄的人:电影中随处可见这样的人。对组织来说也一样,定义一个组织——我们——就暗示着可能性,以及通常实际存在的组织外——他们。这种定义组织内(我们)和组织外(他们)的倾向(被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是歧视的核心所在)对我们来说再寻常不过了,他们会根据极具欺骗性的标准将人分为"内""外"两种:不仅仅根据性别、年龄、外貌或信仰,更有甚者居然还会依据心理实验室中实验者的任意指派。

一般而言,自然组织(那些不是出于研究原因而建立的,如社会心理学组织)鼓励成员之间相互吸引。这种吸引并不仅仅局限于浪漫或性:我们喜欢和"能够给我们提供回报"及"在基础层面比如:信仰、兴趣、个人背景,以及价值观方面与我们相似"的人交往。我们也往往对在地理或功能上(例如:网络世界)与我们邻近的人(或物)产生吸引力:我们反复地遇到他们,似乎增加了对他们的好感。从事社会交往的人会把他们的体态动作、声音和面部表情同步化,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意识到这些:这就导致他们行为和情绪的聚合,一个被称为"情绪感染"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伊莱恩·哈特菲尔德[11]等在《情绪感染》一书中提出的。感染可以增加感知相似度,从而提高相互的吸引力。因此我们可望在邪教中发现成员之间不仅有共同的信仰与兴趣,还有共同的背景与基本价值观。我们也可望发现,作为一个邪教成员,该成员会认为那是值得的,可以满足领导者和追随者的需要。对邪教深入的分析(比如艾琳·巴克[12]

---

⑪ Elaine Hatfield(1937—):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⑫ Eileen Barker(1938—):社会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前任成员,人权研究中心顾问。她是宗教运动信息网络的主席和创始人,致力于研究邪教和新宗教运动等团体。

的《文鲜明教会的创生》)表明:事实的确如此。

不管组织是否是自然形成的,它都会对思想和行为产生极大影响。在权衡他们作为成员的投入和所得时,人们的依据通常是成本效益比。这会促使他们为了加入或逃离某一组织而付出极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会影响组织成员身份的评估:难以加入的组织会唤起更多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组织有如此可怕的入会仪式的原因)。一旦成为组织成员,他们就会持续受到组织规范和组织角色的影响。就像帕克斯[13]和桑娜[14]在《团体业绩和交往》中所指出的,"规范告诉我们何种行为是否被其他成员接受"。例如:尽管没有明令禁止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发生性行为,但每个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应该做的事情。组织成员都被给予了特定的角色,比如规定他们成为一名慈善机构的出纳员。规范和角色都起到了之前提到的启发功能:他们加速并抚平了组织间的关系,使组织更加有效,身处其中更加舒适。

每个人都是众多不同组织的成员,他们的不同体现在成员所占有的认知图景的数量:即他们对于每位成员的重要性。同一个业余足球队的不同成员,看待成员身份也是不同的:比如,一个长期怀有抱负的运动员和只想进行一些体能训练的同事,两人的感受肯定是不同的。同样,对于同一个人来说,也可能有两个不同的组织成员身份。我弟媳可能把自己定位为"一名会计师"和"一名伯明翰市民",但与后者相比,前者在更大程度上显示了她的身份。与其他日常组织相比,邪教占据了成员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它们显得很突出,甚至接管了成员的认知图景。

自身与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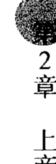
人,自负的世人,
置身于暂时的权力,
却忘了自己易碎的本来面目。

威廉·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

"认知图景"这个概念——我们所占据的心理空间——与我们自身是紧密相连的。就像我们同时隶属于很多组织一样,我们定义自身的方式也多

⑬ Craig D. Parks:华盛顿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著作有《社会困境》(1996)、《团体业绩和交往》(1999)等。

⑭ Lawrence J. Sanna:华盛顿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著作有《团体业绩和交往》(1999)等。



种多样。几个世纪以来,自我认知一直是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勒内·笛卡尔[15]以一种基督教的传统方式将其设想为统一的精神对象,而我将这种观点比喻为“钻石观”。现代的关于自我的观点认为自我更加多元、更易善变。我之后会再次回到这个话题上,但现在我只能说本书采纳的有关自我的观点是沿着多元路线走下去的:我将自我定义为个体大脑所持有的一切信仰。这就意味着一般情况下,我们仅是片面地定义自己为“科学家”“英国国民”,或其他任何说法。这是有意而为之的;除了列举信仰所花费的时间外,我们不想把自己归类于“需要排泄之人”。但不管是否被承认,组织成员身份在我们的认知图景中都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而且组织信仰是我们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包含了一个隐含意义:组织对我们越重要,我们就越可能体现出组织和自我的等同关系,认为组织的福利让我们受益,组织的危险会威胁到我们自身。

社会心理学中最好的公认发现是那些关于“自私倾向”的发现。每个人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偏爱自己,如果认为自己可以不自私,那么我们就是有意的;但通常情况下都是潜意识的,不管是在共享资源还是解释行为的时候。在自我及组织内的延伸也一样。例如:我们喜欢把自身(或组织内成员)的成功归结为内部因素(“我自身的能力使我得到了那份工作”),而将组织外成员的成功归结为外部因素(“面试官和他父亲一起打过高尔夫”)。对于失败,情况就完全相反了(“面试官对我有偏见”“他没获得那份工作是因为他懒惰”)。这种偏爱组织内而贬低组织外的行为是一些偏见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而邪教可能会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组织内成员美化为上帝“拯救的”孩子,而把邪教组织外的成员妖魔化、诅咒化,由此认为教派外的成员都有道德问题。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这些机制自有道理。组织为人提供了周遭环境;因此,友好的组织成员提倡友好,并不断加强组织凝聚力,被定义为“为了使成员融入组织而施于其身心的所有力量的结果”。如果过去你帮过其他成员的话,将来他们更有可能帮助你,所以青睐他们比青睐组织外成员更有实际意义。对吉姆·琼斯的邪教而言,从发展的早期他们就对组织外充满了敌意。琼斯的追随者委身于他;对他们来说,浪费时间、精力在他们试图毁灭的外部世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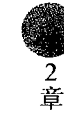
⑮ René Descartes(1596—1650):著名的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他为“近代哲学之父”。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观念不同的人往往相互排斥;正如罗伯特·海因莱因[16]的《陌生国土上的陌生人》中虚构例子所显示的,即使最初邪教领导的偏差得到接受,但反对迟早要爆发。

组织压力

组织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素被捆绑在一起,包括因组织完成既定目标而感受到的成功,组织对于成员的价值,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匹配程度,成员间相互的好感,以及外部因素(个人目标能够在组织内外得到满足的程度)。一旦效忠于一个组织,成员们就会调整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使之更加接近其他成员,差异会刺激紧张神经并威胁到组织的团结。这就导致了一个邪教思想中最常见的问题:现实漂移。地位较低的邪教成员倾向于将自己的信仰向地位较高的成员偏移,尤其是邪教领导,但不可能逆向。如果领导者的信仰和现实世界高度一致,就会使其他成员受益:他们的认知图景就会更加准确地表现现实。不幸的是,领导者的信仰往往与现实相距甚远,由于他们受到追随者的鼓舞而变得更加极端。许多邪教领导都偏爱抽象、模糊,因而不容置疑的观念,这能够进一步减小现实检验的可能性,然而邪教在成员身上施加了强烈的环境控制,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可供检验的现实情况都是由组织环境提供的。这常见于"集体盲思"现象,即发生在臭名昭著的猪湾惨败事件中的现象。美国政府一系列灾难性的决策加剧了美国和古巴的紧张局势,一度处在核战争的边缘。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非凡领导才能,决议会议的封闭性,决策人所持强烈的反俄信念,以及类似于"未来自由世界"抽象观念的重要性,共同促成了对于极不现实,甚至极其危险的政治形势的评估。

邪教通常具有高度的凝聚力,成员们共享着许多信仰,履行着相同的日常行为和仪式,有时甚至穿着同样的衣服。由邪教境况而产生的情绪,以及邪教教条简单化的本质导致邪教信仰诱人地简单,秉持信仰的愿望也十分强烈。一旦一个人信奉了某种信仰,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丢弃它都会感到难受,就像丢弃了身份的一部分一样。面对密友的反对和对领导者的敬畏,想要一走了之几乎是不可



---

[16] Robert Heinlein(1907—1988):美国硬科幻小说作家,被人称为科幻先生(Mr. SF)。他的作品不但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可信性达到了罕有的标准,而且也提高了科幻类的文艺水平评价标准。他和艾萨克·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被称为科幻小说三巨头,被誉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美国科幻空前绝后的优秀作家""美国科幻黄金时代四大才子之一"。

能的。随着组织越来越具凝聚力,对其成员的影响越来越深,组织和外部世界的差异也越来越大。组织常常实行非常严格的界限管理,使其不受外界的影响。这可能包括针对任何"异常"行为。相反,这也同样会带来组织外的敌意,就进一步巩固了组织内的团结。

组织成员身份可以提供两点令人欣慰的感受:成员并不孤单,而且不用承担责任。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组织能够成为拥有自身权利和行动力的实体,通常被领导人格化,领导扮演了超自然保护神的角色,免除个体自己做决策的痛苦。在强大组织中分散责任可能是最危险的现象,因为这会减弱正常的、使大部分人望而生畏的社会约束力(比如:担心被责备和惩罚),从而降低暴力行为的门槛。曼森家族的封闭特性有效地孤立了成员表示反对意见的直接感受,尽管他们足够理智并知晓如果他们杀人的话就会被判刑。但什么样的社会可能把他们看作杀人犯,这些已有信息远敌不过来自所处环境的信息:那些受害者不是真正的人(不是我们的一员),而且事实上自身并不承担因谋杀该承担的责任。

邪教是极权的吗?

第一章讨论了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利夫顿提出的如何判断某个信仰体系是否为极权的标准(见表 1.1)。鉴于这些标准,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最为危险的邪教都可以称为极权。环境控制和神秘操控是其典型特征,这些特征通过邪教仪式和物理隔绝(例如:选址在圭亚那丛林深处的琼斯镇)得以体现。仪式(比如:入会仪式),以及组织内外的区分彰显了邪教纯洁性的要求。忏悔崇拜是邪教成员生活的主体(比如:集体祈祷),与此类似的是邪教不容置疑的教条:利夫顿所指的神圣化的科学。语言加载的现象经常出现,随意瞥一眼邪教文学便可以看出:邪教往往希望成员们可以为教派的存在而甘愿牺牲自己。教条至上与决定存亡并存——许多邪教领导都被赋予了可以决定其追随者命运的权利。事实上,曼森并没有屠杀他的家族,但吉姆·琼斯却选择了结束他数以百计追随者的生命。

邪教成员被洗脑了吗?

由第 1 章得知洗脑包括很多方面:侮辱性、时间性、符号性(虚无概念)及概念不易界定性。邪教通常被我们定义为组织外,经常遭到我们的唾弃,遭遇

到时我们也常常简单懒散地解释它们,用诸如“洗脑”这样的词加以区分,但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洗脑”。“邪教”这个词蕴含了贬义,但有时的确至少能为其成员带来不少益处:减轻心理痛苦,改善情绪健康,减少药物使用,健康饮食,以及作为减压的生活方式。当然,多数邪教还是通过极力要求成员改变生活方式而增加了他们的压力,比如:放弃世俗物质。但邪教也同时提供了可以释放痛苦的机制,比如:从其他组织成员那里得到强烈的积极反馈。

第1章也提出了洗脑情境下的几个特征,包括情绪的运用,以及可能被接受的信仰的怪诞本质。在邪教中,信仰体系脱离现实或不利于信徒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曼森的追随者们最终都被捕入狱,琼斯的追随者们都以自杀告终。如果深层的未被满足的需求通过邪教成员身份实现了,那么尽管这种印象是浅表的,这一过程中蕴含的信仰改变却是巨大的(比如:一个忠诚的资本家放弃了所有家产去追寻乌托邦的理想)。邪教以外的人常常发现,那些身处其中者在极短的时间内人格就发生了改变,同他们交流十分困难,这些人要么充满敌意,要么对他人的观点充耳不闻。在很多邪教中,强烈情绪都被用来增强成员对组织的投入与忠诚。一旦邪教建立,便采用强制手段来维持信徒团结在组织内(正如琼斯镇发生的“相关亲友团”事件)。然而,马克·加兰特[17]指出:邪教成员并不总会采纳与自身意志相抵触的邪教观念;而是“在自发交谈中,联系必须通过一种微妙(或欺骗性的)的方式得以保持,不能胁迫个体顺从组织观念”。如上所述,不同的邪教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所区别。有的运用胁迫,有的运用欺骗,有的仅是成功地迎合了特定人群的需求。大多数邪教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领导人的个性。例如:一个偏执的领导人会增加邪教的危险系数。

该怎么理解“洗脑是一个过程”呢?我们知道大多数邪教的骇人一面可以通过对组织凝聚、情感粘连,还有责任分散的社会心理研究加以体现。似乎并不需要这一特定的被称作“洗脑”的过程来与其他心理过程进行区分。极端邪教运用的暴力(比如曼森家族和琼斯镇大屠杀)似乎比其他人类组织使用的武力都更加强大。对于组织的信仰其实就是自身信仰的一部分:组织对成员越重要,组织所侵蚀的认知图景范围就越大。认知图景仅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即使最细密、成熟的自我也是有限的宝库。这就意味着,当组织一点点侵蚀个体的时候,成员们就越来越无法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独立个体。当组织

---

[17] Marc Galanter: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南亚研究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和政治学院教授。

成为一切,个人责任被分散到整个组织的时候,领导人就获得了作为独裁者的极权控制。这种现象是完全能够发生的,并不存在什么魔力。广岛原子弹事件被描述得十分恐怖,甚至连宗教术语都引用了进去(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18]引用印度教经书《薄伽梵歌》的著名语录——“我将要变成死神,成为世界的毁灭者”)。但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也真的被发明核能的物理学家预见了。广岛原子弹没有魔力,它遵循了物理定律。同样,琼斯镇的空气也没有魔力。

洗脑的象征性层面,即梦想控制,在很多邪教中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宣称当大灾变到来之时,只有自己可以存活,并且继承新的天命;世界上其余的人都将死去,不然也要被奴役。此时此刻,邪教领导通常坚持严格控制成员的生活,常常鼓励他们把领导人当作上帝或是上帝派到地球的使者。事实上,“控制蠕变”倾向正是宗教和政治体系的特征,同时也是众多暴力和自毁性邪教的特征。总之,作为一种神秘的心理技巧,洗脑已成为我们解释邪教的一个额外条件。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控制幻想,用洗脑来解释邪教也是极为贴切的。

是什么使一些组织变得险恶?

我不相信有什么不可交流;这正是一切暴力的源泉。

让·保罗·萨特[19],《什么是文学?》

上述的例子显示了促使一个组织危险化的一些因素,不论是对自身还是对外界。其中之一是心理和生理上的隔绝。缺乏外部世界的反馈不仅仅使组织成员很难追踪自身道德准则的变化,而且还增加了他们的受威胁感:很多孩子都知道,一间黑暗的空房比一间相同的亮着灯且可以看到陈设物的房间更易引发恐惧。对于危险组织,来自外界的冲击对组织集体意识的威胁似乎很大。正如琼斯镇大屠杀,这种偏执并不总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时所觉察到的反对组织的人真的就在那儿,蓄势待发。

组织规模也很重要。对人类来说,在组织成员达到 150 人时,似乎就出现

---

⑱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⑲ Jean 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 20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特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 1964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

了一个倾斜点。罗宾·邓巴[20]指出:“在这样的规模下,命令能够得以执行,难以驾驭的行为能够在个人忠诚以及人与人直接接触的基础上得到控制。但更大规模的组织,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似乎“一旦一个团体超过了150人,成员就变得越来越难以通过单纯的同龄压力来控制”。相反,取而代之的必须是有条理的管理等级制度,否则组织就会分裂成相互竞争的子组织,从而失去整体团结。因此,规模较小的组织更容易以一种伤害性的方式履行自己的信仰,正如获悉已久的各种政治派别的恐怖分子。很多宗教或政治运动都有一个“社会彗星”的结构:一个小型的拥有忠实信徒的核心组织,后面跟着一群不很忠诚的追随者(例如:动物权利或福利保护运动组织)。这似乎表明:针对小型恶毒组织的一剂解药是急剧增加其成员数目,以期内讧解决问题。但不幸的是,这会造成组织分裂成更多有害的子组织。

另一相关因素是这些组织通常拥护的思想类型。他们的目标和邪恶都表现得无影无踪,因此有很明显的价值负载。强烈的情感促成了投入与忠诚。他们也被告知组织有着优越性,认为在周围的人入地狱之时,自己却是被拯救的臣民。但是在这种优越感中也并存着与生俱来的鲜明的忧患意识,因为他们清楚自己仅仅是黑暗大环境下的一束亮光。(第5章中可以看到,高度尊重和对尊重的威胁结合在一起十分危险,在对采取人身攻击的犯罪分子的讨论当中我们还会再次探讨。)这种忧患意识促使组织成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让我们回到宗教和政治的话题上来,其核心概念都是虚无的,从观念上将其信徒的情绪升温。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暴行总是和宗教或政治动机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但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其具体内容,而是观念本质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忠诚的无神论者常常通过引用宗教战争和原教旨派恐怖主义,来指责宗教制造的大规模伤亡。但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被称为20世纪耻辱的大规模杀戮却是由无神论者引起的。约瑟夫·斯大林的恐怖主义统治见证了对宗教机构的大范围镇压,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死伤。哪个宗教会在其良心上沾有如此之多的血迹?这些思想体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致命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无神论主义”或“宗教主义”,而是因为其思想的虚无性。相同的

[20] Robin Dunbar(1947—):英国人类学家、进化心理学家,研究灵长类动物行为方面的专家。最著名的是他提出“邓巴数”定律,也称150定律,是指能与某个人维持密切人际关系的人数人限是150人。



论据也适用于政治。这些依靠虚无概念促进极权主义思想的体系(组织,个人)是非常危险的。

※本章小结

组织是人类存在的重要形式。通常组织可以惠及或安抚其成员:尽管西方邪教成员支持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背景的生活方式,但可以为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益处,这被视为理性的选择,资本主义的有效解药。但邪教采取同所处社会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一事实无疑向这些社会设想发起了挑战,并煽动了极端敌意,尤其是来自邪教成员家属的敌意。反邪教运动创立了洗脑这个名词,它自诞生就沾有邪教宣传的恶臭,是一个打击敌人的有力手段。

对于反邪教分子的担忧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有时,组织尤其是小型组织可能是相当危险的。这种情况尤其会出现在他们高度团结的时候,组织成员身份对于个体成员来说变得极其重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受到组织外的迫害),或是抽象、不容置疑的思想与强烈情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抽象、模糊的思想和强烈的情感都是宗教和政治信仰体系的特征,他们通常与危险组织(其成员随时准备攻击或杀戮组织外成员)联系在一起。这些组织通常会显示出极权主义思想特征。他们运用一系列的步骤吸引和维持新成员。有些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以至于被贴上了洗脑的标签,但这些全部都可以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加以解释。细致的研究往往会揭示特有组织机制的运行,并且表明能够满足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深层次需求的方法,就是成为邪教的一份子。

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最大限度降低组织危险的方法。我们将细致地研究究竟是哪些特质使一些人成为领导者,而另一部分人成为追随者;我们会再次回到梦想控制。但首先应该探讨以下两个十分常见情形下的洗脑问题:媒体和教育。

第3章　劝说的力量

我们应该相信:雄辩的口才可以让人接受一切。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①],《斯多葛派悖论》

第1章中我们了解到,当运用强制手段来追求思想上的控制时,洗脑是如此地猛烈、私密、痛苦和可怕,比如一些邪教中发生的事件。但人类也努力将洗脑应用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广告媒体和教育。尽管动机不同,但都试图改变思想,都有着巨大的威力。不同于强制性洗脑,它们一般很少使用胁迫的手段,而是依托于暗中说服。两者都构建并传播同一套关于世界的信仰或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将个人社会角色定义为国家主体,教导他们在现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我们可能永远无法阐释清楚意识本身,并且提供广告或相关课程的人甚至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强化一种特定的观念。换句话说,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②]所说,"教育和媒体其实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他们维持并复制国家领导者的思想(渗透到年轻成员)"。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强行植入他们的信息,这个过程可能是强制性的或暗中的,也可能两者兼施;比如广告和教育,与强制洗脑相比几乎没有胁迫成分,但它们到底有没有暗中实施洗脑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依次进行研究。

---

① 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罗马共和国著名演说家和政治家,被誉为"拉丁语雄辩家"、散文家。也被认为是三权分立学说的古代先驱。

② 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共产党员、哲学家。他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在国际上赢得了读者。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影响下,他的作品出自于对当时为人们所广泛探讨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主题的挑战,从而提出了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概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广告与媒体

广告可看作是一种长久蒙蔽人类智慧以期从中赚钱的技巧。

史蒂芬·里柯克[③],“完美的推销员”,《愚蠢的花园》

在西方国家,王朝时代已经过时。20世纪本应该注重平等、后天优势以及群众力量。但即便老牌王朝垮台了,也会有新的取而代之。其间的人将决定一个世纪的基本轮廓,其影响也会持续到下个世纪。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④]提出了现代性爱观,而他的侄子爱德华·伯奈斯[⑤]却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广告业。本书并不是介绍广告业历史,或详细分析广告人如何运用技巧诱惑我们购买产品。我将要探讨的是:销售人员、政府,以及其他服务行业常用的说服方法,也就是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⑥]所说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目的是为洗脑的解释提供借鉴。

西奥迪尼在他的《影响力》一书中把说服技巧划分为六类有影响力的武器(除了赤裸裸的利益诉求,西奥迪尼认为这是必然的)。首先,敢于承诺和言行一致的陷阱就是利用了人们更愿意表现得表里如一这一特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经过劝说而作出一个小小的承诺,那么我们接下来很可能会作出更大的承诺。但如果大小两个承诺其实是同一类的话,我们其实是不太情愿作出许诺的。西奥迪尼列举了一个打电话恳求捐资的例子:通话人首先询问你的健康状况。“通话人这样引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显示友好和关心。而是让你用礼貌而浅表的自我评价作出回应,比如‘还可以’‘很好’或是‘我很好,谢谢’,这是你对表面礼貌的询问作出的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但一旦你开诚布公,说一切安好,那么募捐者就会轻易地将你逼入救助那些境况糟糕的人的境地。”测验显示了一个潜在原理:宣称自己幸福的人通常“认为在承认自身境况不错的情境下表现吝啬是极

---

③ Stephen Leacock(1869—1944):英国出生的加拿大教师、政治科学家、幽默作家。他是20世纪初英语世界最著名的幽默作家。

④ Sigmund Freud(1856—1939):犹太人,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被压抑的欲望绝大部分是属于性的,性的扰乱是精神病的根本原因。著有《性学三论》《梦的释义》《图腾与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⑤ Edward Bernays(1891—1995):奥地利裔美籍人,公共关系和宣传领域的先驱,被称为“公共关系之父”。他把古斯塔夫·勒邦和威尔弗雷德·特洛特的群体心理学思想与其叔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结合了起来。

⑥ Robert Cialdini(1945—):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终身校董事讲席教授、研究生特聘教授。曾任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协会的主席,并获得了协会颁发的突出科学贡献奖。他的研究发表在许多杂志上,包括《社会心理学手册》《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等,其著作《影响力》已被翻译成26种语言,在全球售出了200万册。

为不合适的”，这个原理表明，以上的话语操作非常有效。

第二个产生影响力的武器是利益互惠：我们通常会很感激施予我们恩惠的人，不管这个礼物是多么地微不足道或不需要。这就使我们有可能被施恩者轻易劝服，因为为了摆脱这种感激之情，我们会回赠一个更有分量的礼物。社会心理学家安东尼·帕拉康尼斯[7]和埃利奥特·阿伦森[8]在《鼓动的年代》一书中也讨论过“奎师那知觉运动”的案例。哈瑞·奎师那通过让门徒赠送捐赠人每人一朵鲜花的方式，成功地提升了每况愈下的收入。

另外两个被广泛应用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依赖于说服者的权威性及亲和力。有关权威的一个例子是利用电视中扮演医生的演员（但其根本没有行医资格）来推荐医疗产品。演员的权威是虚幻的，但人们仍然愿意购买产品（我将在第4章回到权威性这个问题上来）。有关亲和力的例子是利用电影明星、运动员以及满面的笑容来销售产品。

西奥迪尼的最后两个产生影响力的武器利用了稀缺原则和“社会认同”原则。稀缺原则利用了我们的本能，即：如果某产品被人为地限制了可得性或强调了稀缺性（“限量版”“存货有限，售完即止”，等等），那么该产品必定被认为珍贵。社会认同原则是：我们并不是为自己考虑，而是出于从众心理，相信“这么多人都渴望得到这个产品，一定不会错”的假设。除了一些灾难性的失败（西方股票交易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假设通常都很有效，因为这些假设的确是其余五个产生影响力的武器的基础。这也是产生影响力的武器得以发展的原因：经验替我们节省了思考的时间和精力。有时，当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时，我们会停下来思考自身所经历的外部影响；当不能停下来思考时，我们就成为了被利用的对象。

《韦氏大词典》给出了两个“洗脑”的定义。第一个与第1章给出的《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相似，即：“强行灌输以诱导某人放弃基本的政治、社会及宗教信仰和态度，并接受与之对立的经过严格控制的思想。”第二个是：“通过宣传或推销说服。”第二个定义与第一个定义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运用压力驾驭受害者理智思考自身处境和信仰的能力。这种对于理智的驾驭正是优秀的广告所要达到的目的。失败的做法则是给人时间和空间去思考“它是很好，但我

---

⑦ Anthony Pratkanis（1957— ）：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心理学教授。他是经济诈骗犯罪、恐怖分子和独裁者宣传、营销和消费者行为，以及潜意识说服方面的专家。

⑧ Elliot Aronson（1932— ）：美国心理学家。他被列入20世纪最杰出的100名心理学家。最出名的是其发明的减少不同种族间敌意和偏见的拼图教室法，认知失调研究，以及出版了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

不想要或不需要这个产品”。广告便会因此尝试超越理智并直接深入情绪。通常这个方式是唤起一个负面情绪(内疚、焦虑),然后指出购买该产品是唯一或最简单地移除这种情绪的方式。另一种可能是,该产品与一个正面情绪联系在一起,以鼓励对方产生购买该产品带来愉快感受。广告商可能运用喧闹的音乐、明亮的色彩、快速的节奏等来阻碍对于广告的批判性分析,分散观众的注意力,使其远离“这仅仅是一则广告、一种销售产品的方式”这个事实。更加成熟的广告会运用幽默作为一种积极的增强剂:让一个人笑是使其对你的处境产生同情的好办法。无论具体的方法是什么,目的总是一致的:不要对我们的产品进行思考(否则你可能决定不要它),仅仅吸收“拥有我们的产品会改善你们的生活质量”这一信息即可。

利用我们的情感和懒惰是否就构成了洗脑呢?正如我前面说过,胁迫并不是广告行业的选择。多数广告人最有可能接近胁迫的途径就是对商品统一承保,但这不同于面对被动的广告受众。至少在原则上,广告受众是可以自由转换,要么丢弃宣传小册,要么起身泡茶,等等。大多数人都这样做。依靠介入的媒体可能减少这种自由度(例如: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看到广告牌)。但这并不存在强制你必须看或是必须买。

在小说中,洗脑经常被描写为一种高压下的折磨,但洗脑故意改变人的信仰的概念本质并不需要什么强制。广告并不是强制性的,但它却在有意地设法改变人们的思想。企业推销自己的产品并不是出于偶然,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赚取顾客的钱财来增加自己的收益。企业经常声称他们的产品能够满足顾客的特定需求,他们只不过是在提供顾客需要的产品。有谁能否认这些应该得到满足的需求呢?

但对于所谓消费者需求的爆炸性增长,我们应该持怀疑态度。大脑把强烈情感和抽象观念加以联系的能力意味着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将一个产品同某种基本欲望联系起来。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某种特定产品,而是为了满足某种基本欲望;但我们把产品当作了替代品(想一下为什么当我们把该产品带回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莫名地失落)。一个传统但如今很少在现代主流广告界中看到的广告——在某种轿车的促销广告中,汽车阀盖上画着半裸的美女(广告商假定其受众是男性和异性恋)。汽车是能够把人从甲地舒适而便捷地运送到乙地的一种机器,在设计和构造上大部分非常相似。虽然一个卧躺在汽车前部的性感女人反倒是把画面弄花,并且即使她脱光衣服也不可能在提升汽车性能方面起到任何作用。同时并不是渴望买车的人真的能在自己的陈列室里看到这样的场景,但广告商却假定顾客会把这一堆金属和塑料同性欲联系在一起。这种暗

示是很明显的:购买该产品可以满足你的欲望并改善你的性生活。有人会说:在这种商业广告中,弗洛伊德和伯奈斯邪恶地相拥在了一起。

广告和承诺欲望实现之间的联系当然不局限于基本需求。与需求替代品相反,新的需求是可以被创造的。的确,20 世纪得到明显认同的新需求大大增加,其数量说明至少人类还是有活生生的创造力。举例来说,多年来某些企业发现了一种十分有用的生理渴求:上瘾。对于人类来说,除非极其不幸,是不会天生需要尼古丁、鸦片或其他易成瘾的东西的。然而,摄取这些东西会使身体状况失常,并产生大为不同的需求(以求得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售出的产品就不是替代品:他们直接满足了成瘾者的需求。这些需求的强大力量,以及成瘾性带来的舒适感使得这些产品的利润极其丰厚。

广告业当然是以改变观念为目的的。广告商期望改变你的认知图景,使你之前对 X 品牌的冷漠、讨厌,或一无所知转变为对该产品的喜爱。更为理想的情况是,你冲出房间,以最快的速度买下该产品。但真实情况是,你更有可能在超市看到它时将其买下;你可能选择 X 而不是 Y 品牌,或者你可能想“只是试试看”。理论上,一个成功的广告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人的观念,使你有意或无意地受到控制,认为获得该产品就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个观念可能与现实无关(究竟买新车可以为你的性生活带来多少帮助?),况且这对你的存款结余极其不利。但即便是一个很成功的广告,也仅仅是改变少量观念而已,其他方面几乎不曾涉及;据我所知,还没有看到相关记录说某个人看了一则广告后就立即改变了性格。所以,洗脑在认知图景方面产生的整体影响与广告的影响力并不能同日而语:我们讨论的是侵蚀,而不是地震。

那些把广告说成洗脑的人,其意图并非孤立某些特定的广告,而是谴责大量广告在一定时间后对我们文化环境所造成的积累效应。电视、电影院和新闻媒体中的暴力行为也引发了类似争论。并不是某个血淋淋的谋杀造成了当代青年的麻木不仁,也没有哪个单一的含糖广告致使肥胖不断攀升,但视觉暴力的净影响力却非同小可。这难道不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吗?

实际上,有大量证据显示:我们所在世界的大众传媒模式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对“真实生活”的描绘可以在完全没有被察觉到的情况下塑造我们的行为,这种描绘可能有点像邪教分子对于现实的看法,与真实的事物相差甚远。例如,英国和美国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对于犯罪的恐惧与遭受犯罪的实际风险的比例很不相称,对这种恐惧的关注程度恰恰反映了媒体对于犯罪问题的关注程度。电视节目向人们提供了极其扭曲的现实版本。帕拉康尼斯和阿伦森在《鼓动的年代》中指出:在电视的世界里美人儿要比现实世界多



得多，当然医生和律师也是如此，而正面的榜样，如科学家、年长者、残疾人或少数民族却比现实社会少得多。我们都以为自己知道电视里的是假的，但美国的相关研究表明：电视看得多比电视看得少的人更容易形成扭曲的种族主义世界观。电视不仅影响人的行为，也会影响人的态度。

这把我们带回了第1章有关洗脑作为改变信仰之手段的探讨，尤其是迄今为止的观察显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不得不依靠改变受害人周边环境的这种间接方式来改变其信仰。广告批评家们所关注的可能并不是某一广告内在的神秘及虚构的力量。因为没有什么神奇的手段会使人看了宣传品牌X的广告之后非此物在手而夜不能寐。有时人们表现得似乎只有拥有某个商品生活才能完整（如果你对这一点表示怀疑，不妨在圣诞节前去逛逛玩具店），这并非出于什么魔法，而是由于受到西奥迪尼所称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的操纵（就玩具店而言，缺货是由于故意限制库存引起的）。相反，让批评家头痛的似乎是广告及媒体以不知不觉的微妙方式塑造大众思想的手段。我们可以从本地超市上百种杂志中选择任何一本——但我们从来不曾停下来问问为什么所有杂志都含有如此之多的性与肉体诱惑，为什么封面上的面孔根本就不代表读者群，为什么有些话题被详细报道，而有些却被完全忽略。一定是有人为了牟取暴利作出那些决定，但显而易见这些人不是我们。

换句话说，广告批评家们担心广告和媒体会使得我们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容易操控。有人（或有些人）——媒体、政府或其他——正在为我们制订日程，告诉我们——不是该怎么想——而是想什么。再次借用帕拉康尼和阿伦森的说法，"试想一个人在电视上反复看到赞美雪佛兰优于福特的竞争广告，那么这个人不大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因为一个广告而转变自己对于汽车品牌的喜好。但是，大量的汽车广告很可能促使一个人想拥有一辆车，而根本不考虑其他交通方式"。这样的广告也为观众注入了一种标准，当他们去买车的时候，很可能会进行一番辨别。这种标准对于大多汽车广告中特写的畅通路面十分适宜，但却不太符合多数司机都会遇到的交通堵塞之类的状况。每个汽车广告都会或多或少地发表对于公共交通设施的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层偏见日益加深，使得顾客们紧紧地和自己的汽车座椅"焊接"在一起。

躯体世界

在研究激昂的观点时，我们常常会对其根源感到恐惧。将广告和媒体批为"洗脑"，我认为对它的恐惧与对激活洗脑本身的恐惧本质上一样：害怕失去控制乃至个人身份。第1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乔治·奥威尔是如何描绘这种恐

惧的了。20 世纪另一部悄悄潜入人们内心的著名小说给广告批评家的这种恐惧起了一个名字，那就是《美丽新世界》。

与《1984》相似，1932 年英国作家阿道斯·赫胥黎[9]在小说中描绘的反面乌托邦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但其极权主义的本质并不像奥威尔描绘的那么直接，恰恰相反，它是伪装在自由选择之下的极权主义。《1984》中居民的需求遭到了压制或疏导，在《美丽新世界》中居民的需求却得到了满足。他们就像天堂的天使一样，别无所求。他们可以选择何时服用"体细胞"类药片，一种完美的幸福药片，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自己的朋友和活动。但他们的未来，以及社会地位都是在出生之前就由基因决定好了的。他们必须按照社会的要求做事，甚至大部分人连想象做其他事的能力都丧失了。

如果有一个机构可以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那么我们便会心甘情愿地成为其奴隶——这种想法反映了之所以非邪教成员惧怕邪教的一个原因。如第 2 章所述，邪教领导人对其追随者发挥作用的一方面就是满足他们的需求：个人加入邪教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够在那里找到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东西。同样的恐惧（这种恐惧可以使人接近赫胥黎小说中平静的"躯体世界"）也可见于对广告的批评。赫胥黎在前言中写道："真正有效的极权主义国家应该由行政集权政治领袖及管理群掌控着一群奴隶，而这些奴隶们都不需要强制，因为他们安于这种被奴役的状态。在当今极权主义国家中，使民众安于奴役是其任务所在，这个任务被分配到了各个职能部门：政治宣传、报纸编辑和学校教师。但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仍然粗糙而不科学。"

这就是由对洗脑的指控直接引发的对媒体的防备。我们正生活在或能够立刻生活在躯体世界之中吗？我们是否会仿效遭到同时代讽刺诗人朱文诺[10]蔑视的罗马市民，放弃权力去追随任何能够让我吃面包和看马戏的人？我们所有的需求（或足以使我们顺服的需求）都能通过幸福药剂得以满足吗？如果不能直接得到满足，我们的需求是否可以转化为有利可图的消费行为？信息真的能够控制，甚至将我们洗脑为仅仅追逐某种特定欲望（想要一辆新车，或是最新款时装，等等）并忘记其他需求（长期思考和精神上的自治）吗？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能够彻底获得自由或是完全被奴役吗？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这种恐惧并不新鲜。在 19 世纪末就见诸于赫伯特·



⑨ Aldous Huxley（1894—1963）：多产的英国作家，共创作 50 多部小说、诗歌、哲学著作和游记，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

⑩ Juvenal：罗马诗人，《讽刺》的作者。在公元 1 世纪晚期到 2 世纪初期较为活跃。

乔治·威尔斯[11]的《时间机器》一书。书中描绘了美丽淳朴的埃洛伊人,他们是遥远的人类后代,居住在一个一切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的天堂。威尔斯笔下的主人公乘坐时间机器到了未来(这为威尔斯的小说提供了标题),主人公惊恐地发现这种天堂般的生活是致命的:莫洛克族捕获埃洛伊人并以此为食物,莫洛克族也是人类后代,但是更低层的物种。这种让人恶心的感觉也可以在威尔斯之前大约10年的弗里德里希·尼采[12]的作品中有所体会,那是一段查拉图斯特拉[13]著名的关于人类宗族未来的描述:

> 我将为你们展示终极的人。
>
> 爱是什么?创造是什么?渴望是什么?星球是什么?终极之人眨着眼睛如此地问。
>
> 地球已经变小了,而终极之人跳到了它的上面,他使得每样东西都变小。他这个种族就像跳蚤一样无法被消灭;终极之人是活得最久的。
>
> "我们已经发现了快乐。"终极之人眨着眼睛说。
>
> ……
>
> 厌恶与怀疑被他们视为罪恶。他们偶尔会使用一点点毒药:那会制造出欢乐的梦境。而到了最后,他们会用大量的毒药来换取欢乐的死亡。
>
> 他们仍然工作,因为工作就是娱乐。但是他们会小心地娱乐而不至于精疲力尽。
>
> ……
>
> "我们已经发现了快乐。"终极之人眨着眼睛说。
>
>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9—10页

关于对躯体世界的恐惧的第二点,是它聚焦于自由。像尼采作品中终极之人一样,躯体世界的人们都获得了幸福。目前我们不断地被灌输,幸福是我们都应该去追逐的崇高目标,那么那些反面乌托邦者为什么让人恶心呢?为

---

[11] 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1895年出版《时间机器》一举成名,随后又发表了《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多部科幻小说。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和预言家,曾是费边社的重要成员,会晤过罗斯福和斯大林,撰写了《基普斯》《托诺—邦盖》《波里先生和他的历史》《勃列林先生看穿了他》《恩惠》《预测》《世界史纲》等大量关注现实,思考未来的作品。

[12] 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他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

[13] Zarathustra:拜火教的创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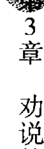
什么当弥尔顿作品中的撒旦声称“服役天堂还不如去统治地狱”时,我们会对其表示同情? 即便现代权威如何劝说,我们似乎更倾向于将自由置于幸福之上。“生命、自由和荣耀”“自由、平等、博爱”“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作为英国、法国,还有美国革命分子们的战斗口号,这三个伟大的信条塑造了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其中自由是核心。埃里奇·弗洛姆[14]在《惧怕自由》中指出:我们像渴望自由一样地惧怕自由(获得自由需要付出努力甚至是伤痛),但这种矛盾的态度并不会减损人类给自由赋予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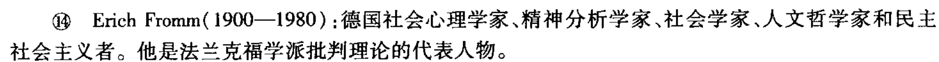
对于躯体世界的恐惧在当今现实世界中能找到什么依据吗? 我们是不是正在一步步接近《美丽新世界》中那种令人惊骇的极权主义呢? 在第1章中,我探讨了罗伯特·利夫顿所划分出的八个主题——环境控制、神秘操纵、要求纯洁、忏悔崇拜、神圣科学、语言加载、教条至上、决定存亡——这些都是能够在极权环境下找到的特质(见表1.1)。

没有控制者的思想控制

想象一下如果所有广告的来源都符合同一个主导思想,那么其影响该有多么深远。不过,我们的处境看来和进化论相似:设计显而易见,但没有设计师(对于神创论读者而言,进化论并未严格指出一定不需要设计师,而只是说在自然选择发生的过程中设计师并不需要出现)。这种进化论的类推促使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15]引入了模因论,这是对文化传播的“强遗传性”隐喻,把思想比作“模因”,可以不断自我复制,然后通过大脑间的模仿进行传播。多数人都接受了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文化和文化思想,而不明确提及模因论引发的争议,但由于模因论极为方便,难以抗拒,所以我将用弱式进化论进行类推。依据这种类比,在无须重要媒介操控的情况下,思想也可以传播、改变、聚合或分离。问题是设计师或施动者缺失又是如何影响着利夫顿所说的八大主题呢?

影响微乎其微。环境控制变成了环境标准化:没有了党派强加的控制,我们看到的是施加在文化产品(报纸、广告等)上的选择压力,这促使他们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彼此相似。我们周围的大部分媒体从根本上都是由相似的寡头政治所控制,这些媒体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这只会加速趋同化这一进程。销售的需要使媒体变成了时尚的铁杆粉丝,忙碌的人们渴望“简单的信息”,简短的





[14] Erich Fromm(1900—1980):德国社会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人文哲学家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

[15] Richard Dawkins(1941—):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著名科普作家、生物学家。是全世界在世的最著名的无神论者。代表作是《自私的基因》。

新闻或是大标题,都导致了对于简单化的需求,这与意识形态对纯洁性的需要有着惊人的相似。有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恋童癖者往往是邪恶的,而那些受害者都是无辜的。我们很少看到小报会一本正经地说恋童癖患者和"正常"人一样,也会受到自身经历和环境的影响。那么纳博科夫[16]小说中挑逗的孩子——洛丽塔的情况又如何呢?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情况是看不到的;但事实上,她常常漫步在大街上,或是出现在时尚杂志的页面上。忏悔崇拜也十分受欢迎,"真实的"人将自己的生活呈现在媒体上,当然收入也不菲。在面对警察和相机时,我们丧失了大部分保持沉默的权利。语言加载在广告中十分常见,像"新的""必需的"这样一些词承载了比其原意多得多的含义(我经常看到"必需的"产品广告,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些产品是我必需的)。我们也在现代教义中看到过神圣科学的元素,大众文化很少会对这些教义发起挑战(比如:认为英国人极其容忍),看到关于抽象理想的神秘操纵使得我们一听到(例如:性别歧视和多元文化等术语)就会陷入情感怪圈。最后,政府在决定存亡的问题上有着极大的掌控权(如:美国公民的死囚区,或是"9.11 事件"之后未经审判便遭拘禁的外籍侨民),大众媒体在决定存亡的问题上也很有发言权,至少在决定名声方面。一个可能的例外情况是利夫顿的第七个主题:教条至上。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个人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强大的信条。

简而言之,不同之处不在于性质而在于程度;当前有极权主义思想倾向,但并不太极端。我们正处于通往躯体世界的途中,但还未到达。仍然有人向普遍认可的信念发起挑战,反对知识标准化。许多人抵制消费主义梦想,或只是把它当作有价值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对广告持有健康的怀疑态度,仔细倾听政治辩论,不相信在报纸上读到的大多数新闻。他们意识到了操控者的动机,这个动机不断地在脑海里盘旋,提醒他们小心谨慎。他们可能没有读过罗伯特·西奥迪尼的作品,不过他们积极地去停下来思考,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对此进行探讨,这就是抵制劝说的根基。

当前广告业的一个局限性在于大众传媒不能准确地将目标指向个体,原因很简单,他们对客户了解不够。一个人能否相信推销员连珠炮似的套话取决于很多因素。最明显的一个因素就是出售的商品是何物。尽管两种影响企图都可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我对于福音派基督徒劝服我去教堂礼拜的反应绝对不同于接到提供厨房用品的代理商的电话时的那种反应。对于不受欢迎

---

[16] Vladimir Nabokov(1899—1977):俄裔美籍小说家、文体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同时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著名作品有《庶出的标志》《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说吧,记忆》《阿达》《透明》《劳拉的原型》等。

的来电者，如果我想结束他企图对我产生的影响，那么我要做的就是告诉他我住的公寓不是我自己的，而是租来的。但对于福音传道者，我却要大费口舌，罗列出一大堆不去教堂做礼拜的理由，因为过去我就深入地思考过宗教。而对于与在他人房屋中租住毫不相干的买厨具之事，我压根就没想过，更不用说是深入思考了。影响技巧的成功与否在于所出售的商品本身，而不在于技巧，要看其是否与我有关。即使是明显的大众化的物品，比如钱，其相关程度，以及影响技巧的成功与否，也都因人而异。即使在贪婪的西方，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毫无附带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他人提供的现金。

目标个体的性格和履历也会左右影响方式的效果。比如：有些人十分抵触推销商品的言辞中出现"必需品"或"必需"之类的词语，而更喜欢强调自由选择的方式。有些人更有可能对权威引向的方式作出回应("买吧，对你有好处")，有些人更喜欢魅力四射的推销员("为了讨好我就买吧，你想要讨好我，不是吗?")，有些更轻信于暗含的威胁("买吧，要不然你的健康将受到损害")，等等。当然，销售人员的性格与影响企图的成功紧密相连。我们可以欣然地向一位关爱动物权利的可爱老妇人捐献爱心，却可以漠然走过胡子邋遢且板着脸孔的为救助非洲人而筹钱的年轻人。即便她的钱可能是用来制造长钉炸弹，而他的钱却可能是用来救命。西奥迪尼等人指出，亲和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

案例研究：文字劝说

换句话说，所销售的商品通过作用于目标个体的性格及经历来施加影响(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我们是否会停下来思考取决于独特的个人背景，不仅包括当下的刺激，还包括易于获得的记忆，使得我们利用过去来解读当下。作为一个案例，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这段文字：

> 一个妇女开车(driving)送孩子上学，然后返回家的举动并不能视为是一种母性的关爱，而是自私自利的独特展现。为了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还有自己孩子的未来，我们必须说服这位不停穿梭于学校的(school-running)母亲改变其行为。

这段文字在试图向我兜售一些理念。但在没有很多背景知识的情况下，我无法解读这则信息。我需要知道英语词汇"driving(开车)"的意思，我还需要理解开车在这里意味着使用的是一辆车，而不是一条鞭子。我也可能联想到记忆中的其他文字、新闻节目和朋友的辩论，或是任何能够告诉我英国正在进行这样

一场辩论的消息:母亲开车送孩子上学能否减轻交通阻塞,是否比让孩子自己步行或骑车上学更能促进孩子健康。在阅读这段摘要之前,我从没有遇到过"school-running(穿梭于学校的)"这个形容词,但语境使得这个词的意思十分清楚。作了基础解释之后,我现在可以开始就我个人的想法来评价这段文字。

这些评价将受到我自身经历的影响:我对待孩子和交通的态度,我的住所离学校是远还是近,以及我读到这段文字时的感受。然而,这段文字本身也会对我造成影响,尽管我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段节选的一个特点在于一些词语的对比:一方面,有令人无比温暖的"母爱",另一方面,又有令人万分寒心的"独特"和"自私自利",这种强烈对比微妙地促使我站在了这位被人攻击的母亲一边,而远离了那些限制她开车权利的人。这段文字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注重重复概括("为了……的发展""社会""经济""穿梭于学校的母亲")。喜欢抽象名词的人可能会欣赏这些词,而其他人就会感到距离感及非人性化。

最后,像这样孤立开来谈的文本范例并不多见。它取自《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整篇文章其实是明确批评节选段落所持的立场的。我也曾读过大卫·阿罗诺维奇[17]的其他文章,并且经常阅读《观察家报》,对它崇尚自由主义的特点非常了解。这篇文章出现在"评论"板块,我知道这个板块特许各抒己见的散文,所以我期待着一篇捍卫自由主义立场的文章。此外,我的认知图景包含了这样一个观念(雅各布·塔尔蒙[18]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中这样说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政治是个不断摸索的过程,而政治制度则是表现人类独创性和自发性方面非常实用的工具"。像罗伯特·利夫顿(见第1章)和其他人一样,塔尔蒙也将自由主义实用学与极权主义对于抽象和专制的偏爱进行了对比。所以,我对这段节选中大量使用抽象名词的解释并没有参考阿罗诺维奇的(自由主义)立场,而是用它来表达(并微妙地诋毁)其反面观点。这些背景,甚至于更多信息都可以在我阅读阿罗诺维奇或其他人的文章时为我所用。你拥有着与众不同但同样丰富的背景。然而,直接获取这些数据对于你我来说都不太现实:生命太短暂,停下来思考太费神,根本没有时间让我们培养清楚解释各种内涵的习惯。通常情况下,除了对文章的基调或特色有个总体的感知,这种联系并不会引起我们过多的注意。在阿罗诺维奇的指引下,

---

[17] David Aaronovitch(1954—):英国作家、播音员和新闻记者。他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赢得2001年政治新闻奥威尔奖以及2003年"专栏作家年度奖"。

[18] Jacob Talmon(1916—1980):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现代历史学教授。他创造了极权主义民主和政治弥赛亚主义这两个术语,代表作是三卷本的"救世主义思潮"研究,即:《集权主义民主的起源》《政治救世主义》和《国家的神话与革命的幻象》。

这种联系还为我们头脑中的记忆增添一些感情色彩(赞同或不赞同)。换句话说,情感作为一个捷径,在无须明确搜寻的情况下,概括了我们认知数据库的内容。我们将在第9章再探讨这一要点。

劝说方面的心理学专家指出:如果积极对待,成年人至少可以抵制产生影响力的武器。仅仅是因为其他人都已拥有了该产品,或为了刺激需求该产品的供应受到了人为限制,我们也可以躲避责任陷阱,拒绝回报,忽视那些希望我们购物之人的权威及亲和力所带来的影响,下定决心不购买产品。对洗脑一词的内在恐惧,以及对于失去控制和身份的恐惧在于:无论是什么样的过程,其力量势不可挡,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受影响的。只要有个人影响企图的存在,我们就有可能受到广告劝说的侵害,而且这种力量是无法抵抗的。

不幸的是,这个令人欣慰的结论并不适用于媒体,广告只是媒体这个更大的意识形态工具的一小部分。广告告知我们产品信息,而且大部分广告对于其目的而言都还相对比较诚实。除去那些直接获取的片段信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关于世界的其他信息,就必须依靠各种各样的大众传媒体系,因为那是当前强大媒体的组成部分。这也正是洗脑可以渗透之处。想想利夫顿的八个主题。环境控制是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最显而易见的,比如世贸中心倒塌后,报道充斥着报纸、广播、电视,还有网络;但它更加微妙地呈现在日复一日重复的令人厌倦的主题中,类似的形式令人麻木(时尚杂志就是很好的例子)。要求纯洁和复杂问题简单化,忏悔崇拜和语言加载都是小报的显著特征,当然这绝不是小报所独有的。对于神圣科学、神秘操纵、教条至上,以及决定存亡这几个主题,只需看一看媒体如何对待那些质疑其文化霸权的读者,便可想而知了。"出版自由"和"公众利益"被看作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为了寻求报道,个人隐私毁于一旦,名誉彻底摧毁。我们在第13章中将会看到:媒体可以成为有力的控制民众的武器。

教育

我们并非不需要教育,我们并非不需要思想控制。

平克·福劳伊德[19],《迷墙》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教育,一个国家通过教育控制年轻人的思想。当然,正规教育仅仅是将孩子塑造为成人的一部分影响因素:来自父母,尤其是同龄人,媒

⑲ Pink Floyd:英国摇滚乐队,因迷幻音乐而取得国际性的成功。他们运用哲学歌词、声波实验和精致的现场表演,是流行音乐史上商业化运营最成功且最具影响力的组合。

体广告,以及他们自身遗传基因等各方面的信息,都影响着一个人的成长。但至少在理论上,教育是每个孩子按照一定标准塑造着自身的经历。它也是一个公共程序。教育对整个社会都有影响,包括那些仅接受过初等教育的人。

和广告相比,我应该少花点时间谈论教育,因为我认为两者在很多方面相似。尽管教育的控制者——国家——可以清晰地加以辨别,但两者对于洗脑或平克·福劳伊德所说的“思想控制”的恐惧却有着共同的基础。广告和教育都是大众观念塑造的过程,适用于各种年龄段,大量利用我们对于启发法的偏爱来简化生活。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广告和教育塑造者的动机及技巧。

教育与广告的差异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对象、结构和动机。第一个方面更多的可能是展现问题而不是现实:教育的首要对象是儿童,但广告针对的却是成年人。针对儿童的广告是有限制的,尽管这些限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严格;当下令专家们担忧的是高糖和高脂肪类食物正让儿童处于肥胖症的危险之中。同样,成人的“终身”学习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实际情况是:儿童接受了大部分的教育资源,而大部分广告则针对成人:司机、房主,以及掌握“财政大权”的人。

在结构层面上,教育也不同于广告媒体。我们知道广告通常都是十分标准化的(空荡荡的马路上的汽车,极其整洁的房子里的美女,等等)。然而,这个标准却是通过不断发展、不断尝试才获得的,并不是出于积极设计;糟糕的广告仍然时不时出现,诸如热情奔放的嘲讽广告或其他媒体广告。教育受到的控制更多——教师经常抱怨控制太严,为了迎合政府的官僚主义,他们要花费很长时间来完成各种报告。目的是公平: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拥有相似的基础知识来为成年后的生活作准备。

对于那些既受控于教育又受制于广告的人来说,第三种差异最为重要:动机。广告的主要目的是销售产品。消费者能从商品中得到何种益处并不是广告商首要关注的事情,除非这种益处能够增加销售额。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孩子成长为公民,至少大体上教给他们获得成功以及贡献社会的技能(正如当今英国政府提出的口号所说:“创造机会,释放潜能,获得成功。”)路易斯·阿尔都塞以及他的学生米歇尔·福柯[20],还有很多人都指出:学校就像监狱,是一个极权主义环境(尤其是在寄宿学校,这种情况是十分真实的)。不过,尽管这些评论很有吸引力,但并不完全正确。学校的社会环境确实可以证明孩子

[20] 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思想史家和文学评论家。

能够成为出色的极权主义者,能够熟练地控制语言和行为。在威廉·戈尔丁[21]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中相同而令人厌恶的精神暴行随处可见,这些精神暴行促使不幸的受害者以自杀告终,就像小说中皮基的谋杀那样。但任何学校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确,戈尔丁小说中的孩子们没有受到学校和成人对其行为的控制。他们决定存亡所必需的条件就是成为具有压迫性的可怕组织的一名成员。

教育就是学习事实和掌握规则。这些事实建立了一个对于成人生活或多或少都有些用处的知识库。但是真正给予教育以力量的是规则。这是因为与事实不同,规则是可以被推广的,也就是说可以运用到新的状况中去。教授规则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是要以学习一定量的事实作为基础。因此人们往往把学校描述为让学生沉浸于事实的无聊之地。

教育和批判性思维

但最好的教育并不仅仅是教授知识,而是传授批判性的思维:为了避免屈服于情感压力,具有在行动之前停下来思考的能力。这不是思想控制,恰恰相反,那是思想自由。即便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该技能的运用方面也无法达到完美。但即使不完美也足以使一个人能够摆脱"刺激驱动",不断地对直接环境——最亮的颜色、最大的声音或是最诱人的广告——作出反应。被启发式的回应所驱使,随时依靠本能和情感生活,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非常轻松的生活方式:思考费力费神,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情感也同样令人精疲力竭,尽管短时间的反应可能无伤痛痒,但长期来看对身体和生存并非最为有利。正如我们仅仅是因为方便而去吃汉堡包,尽管累积的动脉脂肪总有一天会杀死我们,但我们对情感的依赖也同样会对自身造成极大的伤害。

至少在西方或理论上,智力环境都致力于削弱社会专制的力量(我们在第15章将回到这个概念上来)。本质上,其目的是反极权主义:教给孩子成功所需的技能,促进其日益增长的独立性,让他们接触对立的观点,教给他们行动之前停下来思考的能力。基督徒赞美上帝"服务于完满的自由"。理想的状态是,我们从相似的角度审视教育,将其看作自我服务,在这个世界上它给了我们更多的自由去理解并行动。例如:英国国家课程要求高级历史专业的学生

[21] William Golding(1911—1993):英国小说家、诗人,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小说富含寓意,广泛地融入了古典文学、神话、基督教文化以及象征主义。他的第一本小说《蝇王》(1954)突出了他历来所探讨的主题:人类天生的野蛮与文明的理性之间的斗争。这部小说也奠定了他的世界声誉。

不仅仅学习英国历史(要求做三篇学术论文)、欧洲历史(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历史做一篇学术论文),还要学习世界历史(1900 年前后各一篇学术论文)。对于初期世界历史,可以有如下选择:

> 伊斯兰文明(7—16 世纪);中国秦朝;从秦始皇到忽必烈时期的中华帝国;满族入侵到明帝国的灭亡;从莫卧儿帝国到英国人踏入期间的印度;秘鲁文明;北美土著民族;美国黑人;西非帝国;幕府将军统治下的日本;德川时期的日本;腓尼基人;毛利人;穆罕默德和麦加;非洲伊斯兰教帝国;锡克人马拉塔人;祖鲁王国。

课程期望学生"将所研究的不同时期和区域内所发生的事件和变迁之间联系起来,比较社会和经济结构、文化和政治发展,以此来培养他们的理解能力。他们评估并利用信息来源,运用历史知识分析过去并解释为什么历史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展现和解读"。当你仔细思考所提供的案例研究以及学习用多种方式解释过去所暗含的批判性思维时,你会发现似乎现代英国已经发展成熟,并足以认识到出于思想原因而操控教育可能会导致相反的作用——极不灵活的极权主义思想完全不能适应我们飞速变化的后现代世界。那么,究竟是平克·福劳伊德错了?还是因为那些孩子的童年遭受不幸呢?

教育的理想和媒体谋求利润的动机相去甚远:教育的目的是使我们更加自由。并不仅仅包括是否有更加多的择车范围这样虚幻的自由,还包括可以向广告商提问他们不愿回答的那些问题的自由,即:关于其他可选的公共交通工具,司机的长期健康,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等。我们应该有权利选择思考还是不思考,也就是说,不仅要提供给我们作选择的信息,还提供如何思考的技能。这些技能对于我们抵制从最温和的广告到最恶毒、最强制的思想控制的各种技巧的影响十分有效,也正是为了学习这些技能,我们才指望教育。

教育和思想意识

> 在这里我们必须寻求的首先是宗教和道德准则,其次是绅士作风,最后才是智力能力。
>
> 托马斯·阿诺德[22],《针对橄榄球学者的讲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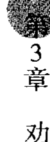
[22] Thomas Arnold(1795—1842):英国近代教育家、历史学家。他是广教派英国国教运动的早期支持者。他在 1828—1841 年担任橄榄球学校校长期间,进行了大量改革。

不幸的是，教育时常缺乏这些高尚的意图。教育不仅在传授思考能力和批判性分析上常常失效，而且还会无法避免地遭到由塑造未来市民的思想所引发的思想虐待。《爱尔兰时报》(2003 年 8 月 14 日)报道过一个前苏联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极端案例。如果你还在通过英国国家课程初选文摘以寻求思想加载方面的证据的话，以下的例子会给你的研究带来灵感：

> 昨天，亚历山大·卢卡申科[23]总统下达命令，发起了一场被后人批判为苏维埃式教化的运动：从白俄罗斯的每个企业中挑选"思想"教师来教育政府工作人员。"渗透每个人的灵魂和思想当然是一个极有挑战性的艺术，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工作在这些机构中的)人们必须获得最高级的资格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卢卡申科先生在一场政府思想会议上如是说。

这种引人注目的极权主义态度并非卢卡申科总统所特有。有些学校就把穆斯林男性儿童训练成自杀性炸弹的牺牲品，有些种族主义者教自己孩子说黑人应该被驱逐出英国，如有必要可以采取暴力驱逐。一些美国学校反对讲授进化论，因为这和圣经的创世论背道而驰。教育和宗教的关系是争论的根源，但宗教是唯一特别显著的意识形态实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实例。由于篇幅限制，我仅再举一个例子：一名新纳粹教师的惊人案例。

这个故事发生在加拿大亚伯达省的一所学校。发生在加拿大这一点本身就十分令人意外：如果我随机选取一些市民让他们列举最有可能有极权主义教育制度的国家，加拿大的得票数不会很多。但是，一个叫做吉姆·吉格斯卓[24]的极富感染力的基督教教师却能够成功地将极端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强加于高中学生，以至于这些学生全盘接受了纳粹意识形态。一个学生写道，在种族大屠杀发生之前，"受犹太人操控的暴徒在公园里游荡，重击儿童的头，强奸妇女之后把她们淹死，切开男人的胃使其流血至死"。发生在加拿大？当家长投诉并要求处分吉格斯卓时，接任他的老师向学生们展示了纳粹集中营的照片，人们最终发现吉格斯卓所描述的都是伪造的假象。一个学生直到被送到德国的达豪集中营参观之后才转变思想。在纳粹暴行正待完全凸显的 20 世纪 30 年代，吉格斯卓并没做什么，他付诸行动已经是二战后几十年的事了。



---

[23] Alexander Lukashenko(1954—)：白俄罗斯总统。1994 年 7 月当选首任总统，2001 年 9 月连任，2006 年 3 月当选第三任，2010 年 12 月当选第四任。

[24] Jim Keegstra(1934—)：加拿大一公立学校前任教师。1984 年被指控公开发表仇恨言论罪，该判决经上诉法院改判而后又被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这一判决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成为加拿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案件。

该案例形象地体现了教育被极权主义者利用的危险性。

※本章小结

洗脑一词经常被用于广告和教育领域中，因为这两者都关注于改变人的观念。当然，没有哪一个广告可以把一个自由思考的人变成行尸走肉的消费者。但是，大量累积的消费文化充斥着极其老套、未经检验的假定。我们或许认为自身已经对这些假定产生了免疫，但社会心理学的大量证据显示并非如此。只因为我们往往对假定不加细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一直忽视它。消费文化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财富带来幸福，每一个需求都能够，也应该被立即满足，追求体格完美是权利也是义务。这些假定观念在西方已经广为接受。但极少甚至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比以前更开心更安全。

广告试图把我们变成快乐的消费者，教育力图把我们变成优良的公民。尤其是，教育企图控制年轻人的思想，这使得教育被指控为洗脑。而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原则就是来自教育，这与广告类似。尽管教育时常缺乏实践，但其目的却是提升个人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买东西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借助可能梦想的描绘，广告也会给我们带来过高的期望。“买它可以使你们幸福”就是一个信息，我们买了，但发现自己仍然不开心。相比之下，教育并不明确承诺幸福，但它致力于更大的收益，以此来使更多人进入它的消费场。最糟糕的情况是，它可以扭曲和损毁年轻人的思想；而最好的情况是，它可以传播一种至关重要的技能——停下来思考并辨别真假。我们沉浸在信息的海洋里，但如果没有理解、选择和分析的能力，我们不可能很好地运用这些信息。

下一章中，我将探讨另一个被指控为洗脑的领域，这个领域有着强有力的反响，即：奇怪而令人不安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

第4章　期待治愈

描述性标签并不能提供因果认知。

罗伯特·L.泰勒[1],《精神还是肉体》

在第1章中,我们已经提到了有关"洗脑"一词核心字面含义的比喻:用水洗涤和净化。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另一个密切相关的比喻:治愈。自"洗脑"一词诞生以来,很多类比都把洗脑和治疗变态心理联系在一起。

医生和恶魔

众多评论家都强调过心理学、精神疗法和精神病学中"精神疗法"的手段与洗脑及其前身——刑讯——所采用的强迫性手段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实施强制手段去说服他人的人会有意利用医疗模式来为他们的行为找到正当理由,向其"病人"(即被洗脑者)描述说,这样做是为了他们好。这种"治疗"和"健康"的措辞还可能结合其他模式。一种常见模式是福音派宗教改造中的"罪过"和"忏悔"之说,宣称目的是拯救患者(或被洗脑者)的灵魂。另一种模式是"斗争"之说:即治疗者(或洗脑者)试图控制或腐蚀患者(或被洗脑者)的敌对势力(或敌对思想意识),斗争目标是将患者(或被洗脑者)从种种错误的信条中解放出来,实际上就是奉行了圣约翰的名言"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8章32节)。不用说,洗脑者将真理视为其进行思想垄断的一种计谋。

乔治·奥威尔对语言的力量一直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他为我们提供了滥用权力者如何利用"美德"模式(如治疗、救赎、解放)的清晰例证。例如,在小说《1984》中,拷问温斯顿·史密斯的奥勃良在向温斯顿描述党的目标时就

---

① Robert L. Taylor:精神病医师顾问、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家庭医学前临床副教授。

明确地运用了医疗模式。"你要我告诉你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是为了给你治病。是为了让你神志正常！温斯顿，你要知道，凡是我们带到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治好走的。我们对你犯下的那些愚蠢罪行并不感兴趣。党对外在行为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思想。我们不单单要摧毁敌人，还要改造他们。"

反精神病学家面临的挑战

医生们常常要面对来自行业内部的批评。在面对米歇尔·福柯"把工厂、学校、军营和医院这些机构弄得像监狱一样，这岂不奇怪？"的反问时，一些心理健康的业内人士会回答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对福柯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诸如 R. D. 莱恩[②]和托马斯·萨斯[③]等反传统精神病学者来说，将一个人划定为精神病患者的种种过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疗，而是国家针对那些有社会反常行为的个体（强制地）行使权力。这些批评家认为，"不得不生存在社会中"这一事实给那些无法处理好社会关系的人施加了诸多压力，使得他们做出令自己和他人都很苦恼的行为。莱恩甚至将精神分裂行为定义为"一个人为了能在某种难以生存的情境下生存而采取的特殊（行为）策略"。理想情况下，"治愈"这类人即意味着变革社会，消除有害压力；但相比之下，另一种方法却要简单得多，即将社会压力的受害者界定为行为异常、精神失常或有精神疾病的人群。这种措辞给这类人贴上"非人"的标签，罗伯特·利夫顿在第 1 章中就告诉了我们，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这不仅剥夺了这类人的权利，将他们送进精神病院，（并/或）进行强行治疗（理论上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但主要是为了社会的便利），而且为了保持更大范围"正常人"对于纯洁的需求，必须剔除这类"非人"。正如托马斯·萨斯所言：

>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就像患了肝病或肾病的人一样，一些人患上了由心理或性格所致的疾病；患了这种"精神疾病"的人在心理和社会地位上都低人一等；人们认为，由于"精神病人"很可能无法"了解哪些东西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必须由其家人或国家来关照他们，哪怕这种关照意味着违反他们自身的意志，对他们强行干预，或

---

② Ronald David Laing（1927—1989）：苏格兰的精神病学家。

③ Thomas Szasz（1920—2012）：精神病学家和学者。

将他们禁闭于精神病院中。

我认为这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概念、观念和做法都是错误的、违反道德的。

萨斯,《制造疯狂》(*The Manufacture of Madness*),第XV页

萨斯的意思并不是说"怪异的"行为不存在,他甚至也不是说有着怪异行为的人可能不想或不需要帮助,以求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麦克白那样"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萨斯认真地解释道,他的批评并非指向心理治疗或者"契约性的精神治疗",因为在这样的治疗中,病人自愿地签订合同,并向治疗医师支付费用,以便直接获得心理健康服务;而且,使用暴力或欺诈手段的治疗医师将受到相应的处罚。萨斯的批评所针对的是他所称的"公共机构式精神病治疗法",因为"公共机构的精神病医师属于公职人员,由私人组织或公共组织(而非其表面上的'顾客')对他们的服务给予报酬;其首要社会特征是使用暴力和欺骗性手段"。他主要反对的是这种治疗的强制性——认为只要个体有反常行为,外界就有充分理由剥夺他们的自由。正如莱恩评论道:"就对物种生存的威胁程度来说,经过精心调教的轰炸机飞行员比在精神病院里被骗说体内有颗定时炸弹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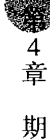
25年后,罗宾·道斯④在他的《纸牌屋》(*House of Cards*)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担忧,他认为心理治疗和精神疗法中有太多的内容建立在可疑的科学基础之上。在谈及美国心理学协会(APA)对其从业人员的授权过程时,道斯指出:

教授以及为商业组织或政府部门工作的"组织机构的"或"专业的"心理学者不该被授予从业资格,理由是这些人本质上并不是在为个体的客户服务。这种观念与APA道德规范相矛盾,因为APA道德规范明确规定,心理学工作者应当为个体提供评估或治疗服务。

道斯,《纸牌屋》,第177页

像萨斯一样,道斯也指出:这些公职人员能够对其所评估的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大到决定生死存亡,比如评判被指控为谋杀者的人时。正如道斯所说,"如果心理学家断定杀人者'不可救药',应判处死刑,那么很难说他们是

④ Robin Dawes:卡耐基·梅隆大学社会学和决策科学学院教授。其在心理评估和决策方面的研究得到普遍认可。



在为这些人的最大利益着想。"他们为服务于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对于那些被认定为无可救药的个体,相比康复改造而言,更喜欢采用"切除术"(采用身体极刑或社会禁闭),正如希特勒否定犹太人一样。这让人联想到第1章中讨论过的极权主义态度。

与反精神病学家的"社会影响力"假说相对的另一端是当下影响较大的精神病学的生物/医疗模式,该模式认为,精神疾病是身体疾病的一部分。备受批评的美国精神病学界的官方指导手册——《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缩写为DSM),或欧洲精神病学界所参照的类似手册——《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其所界定的300多种情形无疑是极好的例证。正如道斯提到的,一些DSM症状和精神疾病一样,都有"易于理解的病因、生理特征、一系列相关的行为表现(症状)以及持续的过程"。伴随免疫失调性狼疮出现的精神疾病之症状就属于这种情况。

然而现行DSM版本的诊断范围包括从我们熟悉的(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到着实怪异的症状(如身体畸形恐惧症,患者要求通过手术移除他们身体的健康部分)。事实证明,有些"障碍症"——如阅读障碍、品行障碍和人格障碍——存在较大争议。许多患有诵读困难的儿童的家长都强烈反对对儿童进行精神疾病诊断;很多人格障碍的评论者也对将一个人的整体人格界定成疾病的做法表示担忧。以"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缩写为APD)为例(其"初级阶段"为品行障碍),我们很难设想这种"障碍"人士如果没有这些"障碍"会是什么样子;当然这并不是在说精神分裂症所产生的幻想之类。APD的判断标准包括欺诈,不能提前计划,争强好斗,缺乏责任感和同情心。虽然APD的诊断根据的是行为,并且上述标准也是对行为的描述,但这些标准对很多人而言听起来更像是性格特征,而且是非常令人不快的特征。尽管精神病是"由众多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反常行为来界定的",但APD"患者"(通常不清楚他们是否是患者,至少要等到他们触犯法律)有时也被称作精神病患者。换言之,如果一个人被评估为精神病,那么他可能具有残忍暴戾、冷酷无情和欺诈成性的性格特点,并且举止恶劣。正如生物医学模式所暗示的那样,我们完全不清楚残忍、冷酷和欺诈与脑功能问题有多大的关系,也不清楚如何用药物和其他方法对其进行治疗。未经本人同意而通过"暴力或欺骗性手段"对人格障碍患者进行治疗,其危害近似于洗脑过程中的强迫性人格改造。

一些评论者反对严格地区分精神正常和精神失常，这种区分，在精神疾病的社会影响力模式和生物医疗模式中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其他评论者，有的质疑诸如脑叶切断术这种强行治疗手段的运用，有的对药物疗法或精神疗法的有效性表示怀疑。现代心理健康运动的队伍中存在着一大批批评者，并且这场运动前所未有地繁荣。为什么会如此？很多人断然将其归咎于“权威”——这是第3章描述的罗伯特·西奥迪尼所提出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之一。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心理健康专家都企图哄骗客户，给其施压；确实有少数骗子专家，但绝大部分专家都是善意的。然而，产生影响力的技巧并不一定就带有欺骗性思想：权威人士可能是真的（比如开处方药的医生），也可能是假的（比如演员在一个著名电视剧中扮演的开处方药的医生）。经国家批准，加上多年训练的支撑，心理健康专家认为他们具有真正的权威。再次引用道斯的话，我们接受他们的权威，因为“我们频频地听说他们是专家，而我们极易接受宣称是权威人士的人所说的话”。要明白为什么权威是如此强大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我们得重新讨论一下社会心理学。

权威的力量

那是我的愿望、我的命令；我的意愿即是充分的理由。

朱文诺，《讽刺》，第六卷

对于权威的研究很早就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展开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学科领域最重要的人物都到了美国，以逃避纳粹德国的独裁政权。西奥多·阿多诺[5]等提出了“权威人格”（通过阿多诺权威量表进行测量）的概念：个体对权威人士极为恭顺，但对无权人群的态度极不友好。他们认为父母过于严厉的管教使一些孩子将天然的攻击性转向较弱的目标发泄，而不是直接向其父母表现出来。这些孩子长大后，在心理上更倾向于服从权威——被认为是其父母的代表，有置身于等级体系之中的需求，并喜欢运用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虽然后来的研究提出了有关“权威量表究竟能衡量什么”的质疑，但权威主义仍颇具影响。密尔顿·罗基奇[6]的研究扩充了人格类型，使其超越了右翼

⑤ Theodor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

⑥ Milton Rokeach（1918—1988）：波兰社会心理学家，曾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南加州大学任教。

意识形态(权威量表“F scale”中的字母“F”指代“fascism”,即“法西斯”)。高度权威主义分子常常高度评价独断和偏见的等级评定,而且不管他们有着什么样的世俗观念或宗教观念,他们都会这样做。罗基奇则认为,重要的是信仰的类型和结构,而非其内容。

权威主义人格理论很快遭到了挑战。批评者认为,权威主义人格理论将偏见归为“个体人格塑造的动力,这低估了当前社会环境对塑造公众态度的重要作用”。因为它忽视了影响偏见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而且,作为一个有关个体差异的理论,它也无法解释权威主义为何在纳粹德国中会如此盛行。再者,如果只是某几种人格的人容易盲从,那么有幸生活在一个较为自由的国度(有着鼓励父母开明的政策)的人,大概就可以对其身边独断专横者的任何威胁置之不理了吧。

在斯坦利·米尔格兰姆[⑦]踏入心理学名人堂之前,很多人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在他一连串著名的实验中,斯坦利对仅有某些人易受权威影响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将研究的焦点从人格转向行为,表明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自由思想的美国学生(与喜好权威的传统德国人形成对比),如果受到心理学家的指示,也会对他人施以危险电击。这些实验表面上是有关学习的,而实际上却是在欺骗被试者,使其以为他/她是在给另一个志愿者——即“学习者”(其实是另一个实验参与者,假装接受电击)——实施电击。被试者给“学习者”进行学习测验,当“学习者”犯了(预先设计好的)“错误”时,就会受到来自被试者的电击。如果被试者犹豫了,实验者会指示其继续执行。

根据第3章讨论过的罗伯特·西奥迪尼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之说,我们会发现,米尔格兰姆不仅运用了权威这一产生影响力的武器,还运用了敢于承诺和言行一致的武器。刚开始设定的电击量是很低的,随着实验的进展,电击量逐渐增加至危险水平。所以刚开始相对比较容易承诺参与实验,并完成最初几个级别的电击。但每一次被试者同意增加电击级别时,他/她就陷入了一个敢于承诺和言行一致的圈套,使他/她越来越难以抗拒。对于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来说,这种圈套是他们最中意的一种手段。这就是为什么通常要训练士兵,使他们在面对被俘和审讯的威胁时能做到只提供自己的姓名、军衔和编号,其他信息一概不说的原因。

---

⑦ Stanley Milgram(1933—1984):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从事了大量研究,由于对从众行为的研究而著名。

米尔格兰姆邀请了“精神病学家、研究生、行为科学系的教师、大学二年级学生以及中产阶级成人若干”来预测会有多少被试者完全听从实验者，并实施最高级别、有可能致命的电击。所有人的答案几乎都在1% ~2%——这个猜测数字基本接近总人口中虐待狂所占的比重。可惜，米尔格兰姆研究的不是针对虐待狂的。在实际实验中，高达2/3的被试者都完全服从了实验者的指令。这种盲从不是由于少数人的人格“失常”引起的，相反，米尔格兰姆认为：

> 这也许是我们的研究得到的最根本的教训：仅是做自己工作，本身并不怀有任何恶意的普通人，也会成为一个可怕的破坏性过程的实施者；另外，即使当他们所做事情的毁灭性效果显而易见，且被要求执行与其基本道德标准不相符的行动时，也只有极少人采取必要的办法来抵制权威的指令。
>
> 米尔格兰姆，《服从权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第24页

米尔格兰姆对其研究发现的解释集中于他所提出的“代理转换”。他设想人类(和其他生物体)能够在两种状态下活动：“自发”状态和“代理”状态。当人类自发活动时，人类是自私和自由的，他们的行动受自身控制，并服务于自身需要。如果社会完全由这样的独立个体构成，那么生命将可能接近托马斯·霍布斯[8]著名的自然状态观：“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匮乏。”米尔格兰姆认为，人们要想在同一地域共存，这些个体成员就必须约束自己的自私行为。例如，他们必须学会不相互攻击。他认为这种抑制是个体良知的基础。

人类生活在各种极其复杂的组织之中，并从中获得相当多的生存益处。一旦人们成为一个复杂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他们能够共同实现的东西就远远多于各自努力所获得的。社会系统常常将其自身组织成不同的等级系统，使得若干成员的行动由所在等级系统中更高一级的成员来协调。然而，这种协调(控制)只有当每个成员都牺牲一定的自主性时方能有效，因为若非如此，个体自控和系统控制将会发生冲突；这不仅使个体感到不适，还会破坏集体效率。因此行为和态度的转变——代理转换——是必需的，正如米尔格兰姆概括道：“具体来讲，就是当一个人进入一个权威系统时，他就不再认为自己是根据自己的目的行动，而是把自己看作是按照他人意愿行事的代理人。”这种代

---

⑧ 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他于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一书为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奠定了根基。

理思维的例子包括导弹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9],他是二战后到美国工作的众多纳粹科学家之一,汤姆·莱勒讽刺道:

> "一旦火箭发射升空,谁管它们落到哪里呢?那不归我的部门管。"沃纳·冯·布劳恩说。
>
> 莱勒,《沃纳·冯·布劳恩》

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出现了挑战传统权威的趋势。医生、教士、公共部门员工和政治家的声望都多少有所下降。随着宗教和公共部门影响范围的缩小,随着新时代运动深入医学领域,传统权威的影响力已经逐渐减弱。但是,权威仍是全世界各个社会一个普遍而必要的特征,而且它对洗脑者极其有用。

服从权威的思想是通过(和前一章一样,在此我借用路易·阿尔都塞的观点)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及强制性国家机器逐渐进行灌输的,这些国家机器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媒体、宗教和政治组织,以及教育和刑事司法体系。由于服从对维护一切意识形态都必不可少,因此可以将服从看作是"元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服从远远超越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服从的回报通常是晋升到社会体系中的更高一级,"这不仅激励了个人,同时也使社会结构得以持久存在"。反对权威者将遭到排斥,并有可能受到惩罚。米尔格兰姆说,如果我们要服从,那我们肯定将权威看作是正当而中肯的:这些判断依赖于情境,权威的命令也取决于情境。"因此,在军队,长官可以命令下属去执行非常危险的任务,但他不可能命令下属去拥抱他的女友。"归根结底,只有接受"支配一切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例如,在米尔格兰姆的实验中,认为科学是"一项正当的社会事业"),权威才能为我们所接受。因此,服从权威不是盲从——它关键取决于心理情境和社会情境,以及当事人的信念。

米尔格兰姆罗列了反复出现的主题,以此总结了他的研究成果,这些主题描绘了顺从者"代理状态"的特征。首先是趋向性——趋向于将注意力放在行政管理和技术性细节上,而不是从全局观或道德观角度来看待问题。道德以服从为中心,服从本身被定义为一种美德。个体常常非常重视纪律、责任、忠诚和能力等美德,而这些美德"恰恰都是维护更大系统的手段和必要条件"。语言措辞上发生变化,各种委婉语掩盖了行动所隐含的道德因素。责任通过

---

⑨ 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德国工程师,在火箭技术和太空探测等方面都有辉煌成就。他先后为著名的V—1、V—2火箭的诞生,美国第一颗卫星的发射成功,以及第一艘载人登月飞船"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作出突出贡献,而美国航天飞机的研制也是自他手中发端。

等级体系得以分散，而组织常常将亏德行为指配给不同的个体：纳粹分子确保挑选死亡集中营人选的人员远离操纵毒气室的人员；公众常常被当作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一个"实现较高意识形态目标"的合理举措；人们的异议，甚至评论都是不提倡的。

是不是觉得很熟悉？这些主题与罗伯特·利夫顿对极权主义的讨论是相一致的（见表1.1）：在语言中载入委婉语；为了社会体系的利益抑制个人自主性，而将教条置于个人之上；将思想意识视为神圣科学而毫不质疑地接受；决定他人存亡以致对无辜陌生人（明显地）实施有致命危险的电击。米尔格兰姆的"代理状态"，是由人对权威合理性和中肯性的认可引发的，它似乎是极权主义运作的一个强大推动力。换言之，极权主义不是一种怪异的畸变，而是一项长期的冒险，它产生于我们所处社会的同一心理机制。将这个结论运用于本章的中心议题，可以得出以下判定：心理健康专家在凭借他们权威性取得影响力的同时，也面临着陷入极权主义思维的危险。他们的工作是改变他人的头脑，那么他们是否会因此而容易背上洗脑的罪名呢？

极权主义与洗脑

一个人惧怕洗脑是因为害怕失去控制，甚至失去自己的特有身份。这种恐惧在被指控为洗脑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现代西方文化已经为此提供了标志性的作品：《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政治）、《1984》（媒体）、《美丽新世界》（药物学）和平克·福劳伊德的音乐专辑及同名电影《迷墙》（*The Wall*）（教育）。各种标记、控制和治疗异常者的心理健康行业也在其标志性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由安东尼·伯格斯[⑩]小说改编，斯坦利·库布利克[⑪]的标志性电影《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影片中的主角备受厌恶疗法的折磨。我们之前提到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精神病学运动认为，至少机构式精神病治疗是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因为它的职能是宣传和维持当权者的意识形态，而且手段残暴专横。这公平吗？

和他之前的其他人一样，罗宾·道斯也认为，各种心理健康行业的确过于

⑩ Anthony Burgess（1917—1993）：英国作家和作曲家。代表作有反乌托邦讽刺作品《发条橙》。

⑪ Stanley Kubrick（1928—1999）：美国著名的电影导演。他在完成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大开眼界》四天后去世。著名作品《奇爱博士》《2001太空漫游》《发条橙》《闪灵》等都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他同时也是一位多面手，除担任导演外，他还常常担任电影的剪接、摄影、音效等工作。

依赖权威，加之我们喜欢界定组织内和组织外，这会产生一种着实毒害社会的力量。然而，与其说这是精神病治疗和精神疗法无可变更的事实，不如说这可能是人性所致的自然结果。例如，自愿付费的私人精神治疗可以免遭托马斯·萨斯的批评。萨斯针对那些带有强制性的精神治疗向人们敲响了警钟。机构精神病治疗似乎会表现出一些极权主义的特征，但再重申一下，极权主义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一种关于"是"或"不是"的分类。而且心理健康的各个专业差别甚大，其范围包括从温和的短期治疗（使用或不使用化学药物），一直到机构禁闭和强制外科手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的精神治疗都是极权主义的，事实上，有的疗法要比其他疗法更具极权色彩。

关于教育，我在第3章中论述过，虽然现实可能常与理想有一定差距，但教育的理想应该是反极权主义的：它寻求提升——而不是降低——个人的自主性和知识自由。精神病医师罗伯特·利夫顿在他的《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一书中对精神疗法作过类似的论述。他虽然承认"在组织方面，精神分析和其他任何科学、政治或是宗教上的革命运动一样，很难维持刚开始的自由精神"，但他认为，"精神分析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各种精神疗法，在精神上与极权主义是截然相反的。的确，精神分析对个体心理进行的艰辛而富于同情的种种研究，使它完全符合西方的传统思潮：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以及自由的科学探索，而这些思潮在历史上都极力反对极权主义"。精神疗法强调人的独特性，与极权主义思想所采用的千篇一律的普遍化肯定是完全对立的。当然，如果我们一直持这种观点，会极其伤精费神——毕竟，公式化思维使我们的大脑活动变得更加简单，难怪精神治疗医师像教育者一样，很难达成自己的理想。

一个比精神分析更为现代的例子是认知行为疗法（简称CBT），其目标是教会病人一些有效方法，以审查和变更不受欢迎的想法（比如"自动思维"，它导致人们遭受抑郁症的折磨）。这种自动思维，顾名思义，就好像突然就从脑子里冒出来的极其消极的想法，其特征表现为内疚、无价值感、自我厌恶，甚至有自杀倾向。CBT帮助患者停下来思考：患者不是毫不怀疑地接受消极思想（从而影响到其情绪和行为），而是将消极思想看作是抑郁症的一种特征，懂得没必要很认真地把消极思想当作"正常"思想来看待。这样一来，消极思想对患者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就会逐渐减小。后面我们将看到，停下来思考的能力是所有反极权主义"思潮"以及对各种极权主义政权反抗的一个特征。CBT的目标就是提高患者的这种能力，从而增强患者的控制感。

※本章小结

心理健康行业告知了我们哪些东西应该要忽略：各种思想共生混合体——被我们称之为“自我”——可怕的脆弱性。由此引发的恐惧足以说明人们与洗脑之间的争斗为何如此惨烈。然而，我们在第1章中了解到，洗脑拥有诸多方面，比如作为一个过程、符号或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等。本章中，我们知道，社会心理学就心理健康行业阐释了很多，不再需要把洗脑当作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随着我们对产生影响力的武器（尤其是权威这项武器）和社会心理现象（比如责任分散现象）的了解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我们能够用一套更加科学的概念来取代洗脑这一神奇过程，虽然这些概念还没有完全被理解，但它们却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然而，认识洗脑不是简单的理性解释。《发条橙》真正恐怖的并不是其高度审美化的恶徒暴力，而是以治疗为名对其中的人所做之事。我们不了解自己，而且越是不了解，就越担心当自身面对限制我们自由之人时，没有能力捍卫我们的自由。洗脑象征了我们在所珍视的思想国度中的无助；它打击了我们这样的感受：自我高于一切，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大脑是我们能够安息的地方。它代表着我们的恐惧——害怕我们的行为与性格不符、超出我们的控制，害怕我们醒来时发现自己做了可怕的事情，就像忠诚的德国公民从纳粹主义的噩梦中醒来一样。洗脑代表了服从的阴暗面，而且只要心理健康行业仍然高度依赖权威，对于洗脑的恐惧就难以平息。实际上，可能不消除这种恐惧会更好：它促使我们进行有益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又会鼓励我们质疑权威，并在精神疾病治疗中尽量减少暴力的使用，鼓励我们质疑使用暴力的动机和方法，限制为想要或需要帮助之人所提供的救助，然后把剩下的都交给法律来处理，因为法律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只要精神病治疗和各种精神疗法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它们就是反极权主义的，并且我相信，这种自由精神是很多精神治疗行业从业者的一个真实的动机。至于教育，它也包含了很多相同的目标，精神治疗的理想是神圣的，尽管现实可能与之不相符。

第5章 “我提议，你说服，他洗脑”

人类天性，历久犹存；
假以时机，皆成暴君。

丹尼尔·笛福[1]

前面几章我已经分析了诸多社会活动中的洗脑问题，包括宗教、政治、广告、教育、精神疾病治疗和心理治疗等。执行这些活动的机构都致力于改变人们的思想，它们都是路易·阿尔都塞所指的高压意识形态工具，它们皆试图通过强制灌输、隐秘传播或极力说服来宣扬一套能够影响人们行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本章中，我将根据前几章的观点，简要讨论另外两个社会机构：军队及刑事司法系统。在对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时，我将以暴力成人关系为例来说明一对一的洗脑问题。最后我将探讨一种最为恶毒的社会活动：刑讯。

军 队

军队比法律和哲学更催人老：它使人更容易接触具有破坏性和摧毁力的细菌；同时它又更彻底地遮蔽人，使其接触不到激发人和保养人的那些思想。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比尔比》

一国军队提供了国家防御和进攻的主要手段，攻防对象是由该国意识形态所界定的国内外的敌人。军队独特的意识形态功能就是：将从小接受“杀人有罪”的思想教育的公民转化成自愿杀人的施动者。为达到此目的，军队强调服从权威。正如斯坦利·米尔格兰姆的实验所示：即使是高度社会化的、自由的或温和的人，只要他接受了发号施令的权威，那么说服他并使他借某个理由

---

[1] Daniel Defoe（1660—1731）：英国作家，新闻记者。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被誉为“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创造了与困难抗争的典型人物鲁滨逊。

而伤害他人就惊人地简单。埃里亚斯·卡内蒂[②]说,这种"命令体系"可能"在军队里表现得最为清晰,但几乎没有哪个文明是命令触手所不及的,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的身上不存在命令的印记。"

权威既定的社会角色使权威较易被人接受,军队的权威正是由其保卫国家的角色赋予的。通常是国家——而非军队本身——为人们接受军队的权威提供了最充分的理由。视不同情境而定,这种理由可能清晰而具体,如保卫本国国土和公民,或保护盟国公民。如果找不到具体的理由,便会找一些较为抽象的理由,如自由权益、价值观念或"我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等。如果理由很容易遭到挑战——即当为这些理由辩护的从政者之权威不一定被认可时——那么理由越具体越好。政治权威非常强大时,哪怕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也有足够的说服力。

人们在实施行动时,如果知道其行动是受国家要求、经国家批准的,则有助于增加他们的服从度,并因此减小实施行动所带来的压力。当事情出现问题时,人们可能会拿出"只是在服从命令"的理由,例如,二战后纳粹士兵就用这个理由(为他们的罪行开脱)。一国的士兵通常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执行任务:他们会认为自己所接受的命令都置于一个被公认的法律和政治框架内,这个框架的规则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一些诸如杀人的极端行动,即使是一场遵守《日内瓦公约》的战争,也仍会令实施杀人者感到极大的压力。

因此,军事训练已经发明了许多减轻压力的方法。正如你可能已经料到的那样,这类训练强调服从、忠诚和纪律——这些品质有助于维护和宣扬当前的意识形态,并通过军事和政治等级体系使责任得以分散。训练还采用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打压独立思想,限制个体自由。特别是在现代战争中,由于运用并着重强调科技,使得扣动扳机或扔炸弹的攻击者与被射中或炸得粉碎的受害者之间拉开了距离。距离越远,进攻者可能越血腥、越残忍。的确,正如历史学家乔安娜·伯克[③]提到的,二战期间对美国步兵进行的一项大范围的调查发现,"那些没离开美国的士兵最痛恨敌人,而在欧洲服役的美国士兵比在太平洋真正杀害日本兵的美国士兵更恨日本人"。或者像小说家约翰·巴肯[④]很早就说过的"你会在国内记者和政客身上发现更多的憎恶情绪"。

科技还使得很多复杂的活动成为可能,这些活动对注意力和技术有较高

---

② Elias Canetti(1905—1994):瑞士的现代主义小说家、剧作家、传记作家和非小说类作家,198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③ Joanna Bourke(1963—):历史学家,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

④ John Buchan(1875—1940):第一代特威兹穆尔男爵,苏格兰小说家及政治家,曾任加拿大总督,代表作有《三十九级台阶》。

的要求。因此就有了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5]所说的“低层次思维”，他将其描述为“一种具体的、狭隘的、死板的思维方式，只关注当下，关注手头所做事情的细节”。只要是曾完全投入某个活动的人，都体验过低层次思维。鲍迈斯特的描述让人联想到第4章中讨论过的斯坦利·米尔格兰姆的“代理状态”。19世纪哲学家威廉·汉密尔顿[6]在他的《形而上学》中给出了大量的例子，其中包括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故事，他于公元前212年不幸身处锡拉库萨[7]，当时该城正遭到罗马人的进攻和突袭。

> 众所周知，阿基米德当时正全神贯注地思考几何问题，虽然他最先意识到锡拉库萨遭袭，但当罗马士兵闯入他房中时，他却喊道：“Noli turbare circulos meos”（拉丁文，意思是“请勿打扰”，至少是说不要打扰几何学思考）。

心理学家罗宾·瓦拉赫尔[8]和丹尼尔·韦格纳[9]已将低层次思维放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框架内，他们称之为行动识别理论。该理论首先就认为大部分行为是不确定的，更确切地说，就是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用不同标准和不同术语来描述行为。例如，对于我的手指运动，我可以说是关节和肌肉的收缩（机械描述，将我的手指当作一个机器）；也可以将其描述为点击鼠标的运动（功能描述，表明该运动的最直接目的——和鼠标进行互动）；我还可以说我将光标移动到我想设置为斜体的文字上（意图描述，指出我的心理状态）。这三种描述迥然不同，但它们都描述了同一种活动。

瓦拉赫尔和韦格纳认为“虽然人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思考任一行为，但他们通常只用一种方式思考某个行为”。也就是说，原则上我知道我可以用很多方式描述我的手指运动，如果有人给我施压，我可以列出一长串的描述方式。但在某个特定时刻，我的脑子里只有一种描述方式是活跃的，而且只有这一种描述与我行动时的动机有关。当我移动手指时，我思考的是我要把光标移动到哪里，肌肉和关节的想法不会影响我。

---

⑤ Roy Baumeister（1953— ）：社会心理学家，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主要研究自我、社会排斥、归属感、性、自我控制、自尊、自我挫败行为、动机、侵略、意识和自由意志等。

⑥ William Hamilton：苏格兰哲学家和改革者，他曾于1838年到1856年间在爱丁堡大学任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

⑦ 锡拉库萨（Syracuse），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海港城市，公元前734年由来自科林斯的希腊人创建。

⑧ Robin Vallacher（1946— ）：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心理学教授。

⑨ Daniel Wegner（1948—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他将实验心理学应用于精神控制和有意识的意志，并发起交互记忆和行动识别的研究。

某些手指运动——比如用枪指着某人——与道德描述相关(如“杀人是有罪的”)。这些描述的根据是将人本身看作终极目标,看作是有价值的独立实体,而不是仅仅把人当作一个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如果当我即将移动手指扣动扳机时,我脑中活跃的是道德描述,那么我实施该行动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因为只要涉及杀人,我在道德上便带有极强的抵触心理。但假如我想把我用枪所指的那个人杀掉,那我就必然会激活另一种描述来取代道德描述。如果只关注行为的低级细节,而不是其高级含义,那么扣动扳机将变得简单得多。韦格纳提供了一个紧张的入室窃贼遭到屋主阻止的例子:

> 因此,一个起初打算“自我保护”的行为(携带一支枪),在一时情急之下可能最终演变成“扣动扳机”,而过后才恍然明白其行为更大的意义——在道德上意味着“杀害了一条生命”。虽然窃贼所做的所有事情(带枪、开枪)最终可能都会被视为是蓄意的,但明确的意图(杀人)却可能是他之前没有想过的,或者说与他的行为不相符。
>
> 韦格纳,《意识意志的错觉》,第 160 页

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使得凶手不去考虑受害者作为人的身份。一如鲍迈斯特所言,“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使杀人者的行为更加有效,还使行凶者不会感到丝毫内疚”,干扰自己的行动。因此就有了汉娜·阿伦特的著名概括:恶之庸常化。当人们的兴趣过分执迷于技术性问题和官僚作风时,杀人之举就会变得简单得多,战争中的杀戮也是同样的道理。

正如乔安娜·伯克所指出的,军事训练不是简单的盲目服从训练。士兵们确实要接受服从训练,但很多士兵都坚持要对自身行为负责,并将尚未谋面的敌人也看作活生生的人,同样是人肉之躯。想知道为什么吗? 别忘了,参军——尤其是对于那些自愿服役而非被征入伍的士兵来说——并不总是一种强制而消极的经历。一个成功士兵所能获得的益处包括健康的体魄、技术技能和身份地位的提高,并获得一种集体认同感和支持感,这种感觉与从邪教中所获得的感觉比起来一样强烈,也许更强烈些。尤其是在精英部队,其成员在训练后都认为自己是优等兵,并把部队当作他们的家(有时部队给予他们的精神支持比自己家庭曾经给予他们的还要多)。在对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越南战争的详细评论中,伯克认为,要培养优秀士兵,像仇恨这样的负面情绪并不如军队集体中所倡导的爱和友谊这些积极情感有效。仇恨摧毁一个人的自控能力和行动效率,“容易使士兵的手在射击敌人时颤抖”;它还会使士兵不敢确定行动的正义性,反过来又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心理冲突。伯克强调说,“与此相反,战友之情是一个绝佳的动机,认定敌人威胁到了战友间的友谊,这被普遍认为是对敌人实施致命攻击的最强烈的激励因素。”人们用兄弟之爱、父亲之



爱,甚至是异性之爱来比拟和形容士兵间的“伙伴系统”。这些积极情感可以是极其强烈的,而且像曼森家族这样极具危害性的邪教一样,一个有着明确外部敌人的狂热集体环境为杀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理由。

军事训练是洗脑吗?这里要再次提及前几章中的内容,即“洗脑”这一术语的各种明显用途:侮辱、强制过程、姑且采用的概念或极权主义理想。通常军事技术评论家要么怀有强烈的和平主义规划,要么寻求将权力从军队中转移出去。这些评论家认为,对于非征召入伍(即强制征兵入伍)的军队,“洗脑”就是一种侮辱,因为洗脑排斥自愿选择(一个人可能会自愿接受洗脑,但成功的洗脑会剥夺自由,将选择权移交给洗脑者来操控)。军事训练可能会使人发生改变,但它不是把人变成机器人。事实上,个人自发性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留给士兵自己做决定的空间通常是相当可观的。从功能角度来说,把平民转变成士兵的各种过程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并越来越为社会心理学所理解,而这些研究资金——至少在美国——大部分都来源于军费。相应地,洗脑已经不再作为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

洗脑这一概念可被用作极权主义理想,这可以用来警醒那些试图把军事权限扩展到平民领域,以此来减少公民自由权利并增强国家控制的人。只要这种概念用法使用得当,它就可以激励大众对可能有的压制保持警惕。在西方,很多人都宣称自己是自由的保卫者,但这通常只是表面现象。正如第3章中讨论到的广告一样,媒体舆论通常十分相似,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对意识形态的侵蚀保持警觉或许不是件坏事。

刑事司法

纵然世界灭亡,也要让正义得以伸张。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语录

国家侵蚀其公民自由权利的另一个领域通常是刑事司法系统。法律不仅用广泛公认的术语界定犯罪行为(如杀人、强奸、贪污等),有时其界定方式非常精细又颇具争议。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令人费解的英国药品法,主要是出于种种历史原因,该法禁止被广泛使用的药物大麻和摇头丸,却继续容许生产和买卖酒和香烟。认为摇头丸让人失控,大麻让人死盯天花板,而酒精却令人更具攻击性,烟草让人生病的看法,当然是一种漫画式的夸张。但客观测算的死亡数据却可以得出相似的观点,正如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10]在他的《搜

[10] Richard Davenport-Hines(1953—):英国历史学家和文学传记作家。他最为人所知的是诗人奥登的传记。

寻忘却的记忆》(*The Pursuit of Oblivion*)中所证明的一样。达文波特-海因斯的这部作品对西方的药物政策进行了雄辩有力的批评,他批评了一个在1996年宣称"去年(1995年)有数百苏格兰人因药物死亡"的反药物压力组织,他指出,"1995年死于药物的实际人数是251人,其中155人死于鸦片吸食过量,96人使用像对扑热息痛这样的止痛药自杀死亡"。这样算下来,1995年因药物造成死亡(包括合法药物)的人数还不及因烟草造成死亡的人数的2%,不及因酒精造成死亡的人数的7%。该年份和该国家都不无代表性:

> 在英国,每年约有10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的疾病,有3万~4万人死于与酒精相关的疾病和事故,而仅有500人死于使用扑热息痛。平均下来,每年因滥用海洛因和酒精致死的人数各约150人,而因滥用安非他明导致死亡的人数约为25人。在英国狂欢时期的头十年里,高峰期曾有约50万人每个周末服用迷幻药物,其间约有60人因此而死亡——平均每年死亡6人。
>
> 达文波特-海因斯,《搜寻忘却的记忆》,第391页

这些数据让人们怀疑:对非法药物歇斯底里的判断并非源自数据的理性评价,而是源于一些其他的因素。人们害怕这些药物,不仅是因为它们能对人的精神状态产生强烈影响,引起极度兴奋和幻想(酒精也会产生这种作用),还因为它们总是与许多令人不快的特征有瓜葛:贫穷、肮脏、社会排外、暴力和犯罪。人们常常用小报式语言——通常是用在令人憎恨的敌人、连环杀人魔或是致命传染病上的语言——来形容这些非法药物,就像我们诟病精神病那样诟病这些药物。吸毒者常常被描绘成危险而肮脏的人,因为他们"极端兴奋"或"滥用成瘾",他们被认为缺乏一般的社会约束,行为难以预测,因而令人恐惧。对付他们的办法只有消除、隔离,或者——可能的话——进行康复治疗(当然不会合法化)。所有这些办法都意味着丧失自由,也都包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吸毒者无法令别人相信他们所做的事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这些就是在意识形态上被界定为非人或局外人的特征,他们成了社会群体反感的焦点对象。

人们极尽所能宣扬这样一种观点:非法药物是有害的,而合法药物则是无害的。这其中的部分原因难道是问题药物的使用者多来自弱势群体,因而相对较容易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攻击目标吗?与其他所有群体一样,当社会中的人们有明确憎恨的敌人时,似乎社会会变得更加团结,追随者会变得更加顺从,领导者的位置也会变得更加牢固。药物法规作为刑事司法系统的一个方面,其保护、威慑及减少危害的功能却似乎难以令人信服。这种说服力的不足削弱了人们对整个刑事司法体系的支持,因为它给人们留出了反驳的余地:刑事司法系统的主



要功能是增强国家对公民的控制。米歇尔·福柯宣称,“今日之刑罚的理想境界可能是一种模糊的律例:为了寻求最精细的观察和分析而进行无休止的调查,同时审判过程也可能在构建一个永不了结的卷宗”。个人受国家管制越严密,个人行为就越能够被精确地预测,政府也就越能有效地处理其事务。

这种控制是洗脑吗?如前几章所述,对洗脑的根本恐惧是害怕失去自我控制,惧怕的不仅是自己的行为,而且连自己的思想都受到局外者的操控。思想其实十分难以把握,在我们支配所谓的自我时,观察得越细致,就越是迟疑不决。但我们渴望能够效仿维多利亚时代威廉·欧内斯特·亨利[11]象征着自信的著名诗篇《不可征服》(*Invictus*):

> 我是我命运的主宰,
> 我是我灵魂的舵手。

我们不想把自己当成随因果之风飘荡的稻草,而愿意把自己当作悉心把握航程的理性主体。世界可能并不是完全可预测的,我们的行为甚至可能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完全预测。这就促使我们以为由他人来预测我们的一切行为可能更合意——尤其是当他人通过预测对我们实施控制时,即使这种控制违背了我们的最大利益。人可能在一个较早的年龄阶段就经受了社会化,接受了服从的观念,但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被他人(特别是被非公认的权威)预测或控制时,他们的反应常常会非常消极。社会心理学家杰克·布雷姆[12]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抗拒”。然而,要发生这种抗拒,“抗拒者”必须认为这种反抗是可能的,否则他们便会采取服从、沮丧的态度和行为(习得性无助)。

这些反应——反抗或习得性无助——在基督教各种涉及宿命论的不同传统中都有所体现,这种宿命论认为上帝是终极(万能)控制者,他自始至终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这种宿命论的世俗等同物便是强决定论——无神论者的宿命论;强决定论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由早在我们出生以前发生的诸多事件所决定的,这些事件可以一直追溯到宇宙形成之初。一些基督徒强调上帝的慈爱:“不错,上帝的确是幕后操控者,但他爱你,他深知你的最大利益,而且因为他是万能的,他远比你更清楚什么是对你有利的,你又何必烦恼呢?”另一些人更强调

---

⑪ William Ernest Henley(1849—1903):英国诗人、批评家和编辑,最著名的是其1875年的诗《不可征服》。

⑫ Jack Brehm(1928—2009):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心理学名誉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情感,尤其是情感强度以及情感与动机的关系。

我们服从上帝这一权威的义务(这种权威不是菲利普·普尔曼[13]《黑暗物质》三部曲意义上的权威,而是所有力量真正唯一的源泉),实际上就是强调习得性无助。认为"没有人在幕后操控,但我们依然是玩偶"的无神论者发现很难支持上帝慈爱之说,因为原因和偶然性是不能被人格化的;他们历来都诉诸宿命论,或某种兼容论——一个旨在调和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观点的总称。(在第11章中我将重新回到这一话题。)所有这些传统,无论差异有多大,都是我们对于失去控制的恐惧——对洗脑最根本恐惧——的一种回应。

家庭虐待

至此,本章所分析的各种情形已涉及了诸多社会机构以及它们与个体的关系。然而,谈论意识形态的理论家们通常将家庭——"专制的学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4]这样形容家庭)——归入意识形态工具之中。各种形式的家庭虐待可以归结为一个最简单的状况:一人之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

这种基本的社会互动关系可能是最强烈、最具有毁灭性的一种关系。一个老练的施虐者能够运用产生影响力的技能库里的任何一种技巧,从权威影响到承诺陷阱到纯粹暴力;结果,起初权力上微小的不平等不断发展,最后权力严重失衡,使得被虐的同伴实际上变成了"奴隶"。这些施虐者实现了对其受虐者相当程度的控制,这种控制比目前为止提到的任何一种情形——可能除最极端的邪教以外——都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洗脑。洗脑所需的一切即是需求的不平衡——受虐者认为其伴侣的"爱"比她的爱更重要,所以,为了使伴侣开心,她愿意妥协退让。她也许习惯了这种社会互动关系:一个伴侣的一次妥协换来了另一伴侣更多的特权。她可能还会接受社会化,使其对社会地位较高者表现得更加毕恭毕敬。施虐者会小心地佯装,表面上看起来他在她所看重的每一个方面都比她优越。如果她以她的智力为傲,他会比她聪明;如果她为她的薪水而得意,他的薪水会比她更高(如果不比她高,他会找一个很好的不比她高的理由)。他会无情地利用她易于妥协的特性,极力地贬低她付出的价值,而无限地夸大他所作的每一次许可。

虐待清晰地展现了精神控制手段的渐进特性。人类大脑是不错的新奇事物

---

[13] Philip Pullman(1946—):英国英格兰小说作家。是畅销奇幻小说《黑暗物质三部曲》的作者,被认为是"继《魔戒》作者 J. R. R. 托尔金之后最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奇幻小说家"。目前正撰写黑暗物质三部曲的续篇。

[14]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支持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

探测器，但这种探测是有门槛的，低于该门槛则探测不到任何变化，并且如果要长期追踪感知的话，大脑必须作出特别的努力才行。也就是说，它们很不擅长探测长期的、不断累积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的每一步都非常微小的话。一开始，施虐者会利用这种弱点，在一些微小的方面试探其伴侣的忍耐性，也许时不时地说几句刻薄话。受虐者开始时可能会把每一次的人身贬损看得微不足道，会想"他很累，他过了糟糕的一天，他不是故意的"。除非她作特别的努力，并将伴侣的话语概念化为施虐整体的一部分（将其当作是施虐者计划或非计划的一场协同作战），不然她就注意不到这些话语或话语对其自尊心不断累积的影响。想想沸水煮青蛙的实验：如果水温升高的速度足够慢，那么青蛙则绝对不会跳出来，而会被活活煮死。施虐者也是一样，他慢慢地像棘齿那样一点一点地增加控制。每当其受虐者不反抗、不设定忍耐底线或守不住这种底线时，下一步的侵犯将会一点点地更加有危害性，在这个过程中，受虐者对其自身能力的自信会慢慢减弱，而对其施虐者能力的认知却会逐渐增强。如果他的身体更加强壮，她便会接受这种习得性无助。聚焦于其弱点、毫无价值的反复辱骂，以及对她的孤立会强化这种习得性无助行为。她可能还会变得事事依赖施虐者，尤其当他像某些邪教一样，要求她断绝与朋友、家人的联系之时。

要是受害人真的反抗了，施虐者会道歉，马上装出迷人的一面，稍后再作尝试。或者他会用威胁的手段：抛弃、羞辱、对她或她的孩子施暴。如果她威胁他，他知道如何利用她的内疚感，他摆出无助的举动常常会十分奏效。但随着关系的发展，她的前摄意识会逐渐降低。她曾经爱过、可能现在还爱着，但已开始令她畏惧的人，不断地贬低她的能力，这会改变她的自我形象，直到她认为自己不再是具备威胁能力的人为止。我们真的会像别人看待我们自己一样看待自己，例如，限制一个人表现的有效途径是：告诉他（她）其在工作中一无是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施虐者能把他的伴侣从一个能动的个体转变成一个被困的、被吓倒了的木偶，她的认知水平急剧萎缩，甚至已经感知不到摆脱苦境的可能性。施虐者不仅用言语或情绪施虐，并/或使用身体暴力，而且还会营造出一种环境，使受害者在其中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是一个无助的可怜人。外人可能会对受虐者的容忍限度感到吃惊，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妇女、儿童或男人成为受害者的过程有什么非凡之处。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之所以常常会认为某些事物不同寻常，是因为我们不了解造成这种事物不寻常的种种过程，这无疑是条不言自明的真理。孔雀和珊瑚礁令人惊叹，尽管它们现在作为自然奇观吸引着我们的眼球，但如果我们了解了它们及其同类物种的进化史，我们便不会觉得其漫长进化史中的每一步演进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发生在孔雀和珊瑚礁身上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施虐者及其受害者。

虐待和洗脑

我在书中的其他地方已经指出,社会心理学家越来越能够对促成洗脑的诸多过程作出解释。我们对“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洗脑这个概念的需求正逐步减少,神秘的(洗脑)过程已变得不那么神秘。我们仍然把“洗脑”作为贬义词使用,这表明我们并不赞成施虐者对受虐者实施控制,也许还表明我们对形成这种压迫关系的特殊曲折过程还不够了解。然而,我们承认这种关系发展的步骤大体上能够被理解,并且洗脑所包含的过程并不神秘。

施虐者的行为和极权主义政权行为之间的相似点也是能够识别的,正如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利夫顿所描述的那样(见表 1.1)。通过环境控制,施虐者寻求对受害者外部环境、大脑所受刺激进行控制,进而支配她的思想。施虐者还会要求受害者实行忏悔崇拜,不允许其有任何隐私,受害者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极权主义政权的特征:都有一种特定的、牢牢坚守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政权实施神秘操控和语言加载,坚持要求纯洁及其神圣科学,并强调教义至上。极权主义政权认为他们所持的意识形态是好的,与之对立的意识形态是坏的。那么,施虐者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 同所有意识形态一样,施虐者的意识形态也是一整套信念,而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其信念中心地位的是施虐者的优越性。施虐者一方面极力加强其权威与受虐者无助感之间的对比,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他对她的控制(必要时还会使用暴力),通过这些做法来强化这些信念。

罗伊·鲍迈斯特认为,如果个体对自身有较高的评价,且这种评价受到了威胁,那么他就会比自尊心较弱的个体更具暴力倾向。(他的书《恶》详细论述了这一与众人直觉截然相反的论题)。换句话说,暴力是对自我威胁的一种反应,而自我威胁是指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与其自我形象相悖,且对自己不利。那些自尊心较强,但成绩平平的人受到自我威胁的可能性较大;而那些真正杰出的人和那些成就普通但承认自己普通的人,则不会频频受到自我威胁。这种观点意味着,如果个体的自尊心达到了心理变态的水平,那么他们就会犯下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暴力罪行。引用罗伯特·黑尔[15]《良知泯灭》中的话就是,“他们非常自恋,过于夸大其自我价值和重要性,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权力感,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是更高级的生物,有权根



⑮ Robert Hare(1934—):主要研究犯罪心理学。他开发了用于诊断精神病和预测暴力行为可能性的黑尔精神病性量表。

据自己的法则生活”。上述推理是正确的:专家估计,北美的心理变态者约占北美总人口的1% ~2%,但却犯下了近一半的严重罪行。正如黑尔所评论的,“心理变态在我们社会中的普遍程度与精神分裂症不相上下,而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颇具破坏性的心理疾病,对患者及其家庭都带来了撕心裂肺的痛苦。尽管如此,比起心理变态者对个人、社会、经济所导致的巨大危害,精神分裂症所带来的个人痛苦和伤害就算不上什么了。几乎每个人都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困于心理变态者撒下的天罗地网之中。”

心理变态目前仍是一个知之甚少的领域,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构成心理变态的诸多内在特征也一定程度地存在于一般大众之中,包括施虐者在内。并不是所有施虐者都是心理变态者(虽然有些是),但很多施虐者都具有鲍迈斯特所提到的自尊心极强且十分脆弱的特点,有剥削他人的行为倾向(把他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且缺乏同情心的特点。

再来看看极权主义政权和施虐者的类比关系,我们不难发现,施虐者会像极权主义政权一样利用各式手段:神秘操控、神圣科学、语言加载、坚持要求纯洁,并强调教义至上。自我威胁毕竟是异类意识形态的表现,所以遭到了最大限度的排斥(要求纯洁)。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斥责除其自身以外的所有事物,施虐者常常会在语言中加入一些过分简单化的、轻蔑的言辞,这些言辞常常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不仅贬低受害者本人,而且也贬损受害者的家人、朋友、经历背景及所持观念。受害者的身心健康,甚至不如维持施虐者脆弱的自我重要(教义至上),而且不允许受害者对此进行挑战,尽管施虐者可能拿不出其所施行为的正当理由。就像神圣科学一样,他的优越性先是被其自身,随后被其受害者认为是理所当然。他利用神秘操控,在其与受害者的关系中极尽所能地建立一种近乎全能、超自然的地位。最后一个主题——决定存亡——无须举例。以英国和威尔士为例,其政府数据显示,每年约有 79 名儿童死于暴力,这些凶杀大部分由家庭暴力所致。

当然,承认以上观点并不等于否认暴力行为成因的复杂多样。类似地,人类在互相控制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机智”与孔雀或珊瑚礁比起来,同样令人惊叹,尽管这种“机智”很难令人赏心悦目。但自我与自我形象的议题,同自由一样,都是所有关于思想控制手段讨论的核心。为了理解思想控制的种种可能性,很有必要对这些话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将会在本书第二部分对其进行研究。不过首先还是来看一下洗脑的另外一种情形。

刑 讯

第 1 章中托马斯·克兰默的案例表明,与洗脑相关的各种手段是如何从

刑讯所使用的手段中演变而来的。正如彼得·索德费尔德[16]在《刑讯》(*Torture*)中所指出的,刑讯的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绝不是普世皆同,但通过使用刑讯来撬开嫌疑犯之口、逼其招供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代,以及希腊罗马文明和中世纪欧洲的律法。”出版于1486年前后,迄今为止最著名的中世纪政治迫害指南《锄恶利器》(*Malleus Maleficarum*)中充斥着各种刑讯手段。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法庭(公开)刑讯和公开羞辱总体成下降趋势(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描述了这种变化)。自2002年12月9日起,据联合国网站记载,所列的193个国家中,有四分之三的国家都已签署了《联合国反刑讯公约》或是已成为该公约的协约国。然而今天,很多政权仍在“非官方地”使用刑讯。“国际特赦组织”是最旗帜鲜明地反对刑讯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一个组织,其在2002年的一份通讯中称:“《国际特赦组织2002年年度报告》显示:47个国家存在司法外审判死刑;31个国家存在司法审判死刑;35个国家出现‘神秘失踪’;111个国家出现刑讯和虐待案例;至少56个国家存在政治犯。”国际特赦组织“相信真实情况远比统计数据高得多。”

应该注意的是,刑讯是一个多变的、流动的概念。尽管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即刑讯的特征是(通常由国家机构)故意施加剧烈的痛苦或不适,但个案的分类则会随视角变化产生巨大差异。朝鲜战争期间的一项关于共产主义审讯手段的研究提到,美国战俘把监狱的饮食,尤其是只允许他们在简短的特定时段内到户外放风,当作“魔鬼式折磨”。然而,欣克尔[17]和沃尔夫[18]在《共产主义对“国家敌人”的审讯和教化》中指出,“向囚犯提供的食物与普通农民或士兵的食物并无差别”。

对洗脑“经典”范例的描述(比如“洗脑”一词的发明者亨特的描述)使洗脑与刑讯之间的相似性变得更加凸显。各种心理及身体刑讯方法都很普遍,尽管欣克尔和沃尔夫评论道,“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几乎从不使用手铐或脚镣,也极少殴打身体。真正的身体殴打当然有悖于公开的共产主义原则,而且也违反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法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法规之所以禁止身体殴打,表面上是因为身体殴打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而实际原因则是,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看来,要使犯人顺从,直接的身体暴力是一种并不奏效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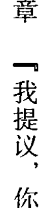
但是,身体殴打只是身体酷刑的一个方面而已,“另外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做法是要求犯人在审讯期间一直站立或保持其他痛苦的姿势”。剥夺睡眠、隔

---

⑯ Peter Suedfeld: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

⑰ Lawrence Hinkle:美国精神医学家。

⑱ Harold Wolff:美国精神医学家。



离,以及限制可视范围、限制饮食和大小便的方法也会被使用到。这些做法模糊了心理酷刑和身体酷刑的界线;它们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正如亚瑟·科斯勒[19]在《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中所展示的那样。欣克尔和沃尔夫提到,“隔离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一样的:将人完全隔离,使人极度无聊,产生焦虑、不确定心理,让人疲劳、睡眠匮乏;遭到排斥、不友好的待遇、难以忍受的压力;以及对顺从的奖励和肯定”,一系列的因素将身体和心理成分混合在一起。当然,有些心理控制的手段并不涉及身体酷刑,但身体酷刑却无疑会产生心理上的影响。

刑讯具有极权主义性质:和洗脑一样,它的目标是控制受害对象。约翰·康罗伊[20]在其关于三个西方民主国家(英国、美国和以色列)之刑讯的书中,举出了刑讯者的如下具体目标:“获取信息,惩罚、迫使个体改变信仰或忠心所向,恐吓某个社会群体。”其中,第三个目标最易让人联想到洗脑。心理学家埃尔温·斯托布[21]提出,刑讯的动机可能是出于实用上的考虑,如通过恫吓来加强政治控制,或是出于“心理”的原因,如“为了真实的或假想的伤害而进行报复,或渴望建立自己的优越地位、提升自我”。同样,这种对控制的强调也让人联想到对于彻底征服的渴望,而彻底征服正是思想控制的终极梦想。

斯托布说,与其他形式的极端伤害行为一样,刑讯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分析:第一个层次是分析个别施害者的心理;第二个层次可以将施害者和决策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第三个层次的分析可在社会范围内开展的,哪些文化和历史特征引发了容易导致极端伤害行为的心理过程和动机”。接着,斯托布讨论了它的社会心理因素:服从权威、组织内和组织外的区分、意识形态的作用、责任的分散,以及成为刑讯者的渐进性。

康罗伊也强调了刑讯的社会因素。例如,他探讨了其所谓的“可刑讯阶层”,即那些被社会认为可以对其进行刑讯的社会成员。理论上,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否应该实行刑讯,我们可能都会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刑讯,但在实践中,人们更加灵活多变。康罗伊认为,“如果被施予刑讯之人不是自己的敌人,那么刑讯更容易遭到人们的谴责”“只要‘可刑讯阶层’被限定在社会底层,那么刑讯几乎不会引起多少抗议,越是逼近自家门口,人们越容易进行反抗”,“被社会公认的可刑讯阶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在刑讯较为常见的地方,司

---

[19] Arthur Koestler(1905—1983):英国籍匈牙利作家和记者。他在1940年出版了反极权主义小说《正午的黑暗》,由此赢得了国际声誉。

[20] John Conroy(1786—1854):英国军官,担任肯特公爵夫人及其女儿维多利亚公主的审计官。

[21] Ervin Staub: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前任心理学教授。他是和平与暴力心理学博士项目的创始人,致力于研究助人行为与利他主义,以及大规模暴力和种族灭绝心理学。

法支持常常站在施害者一边，而非受害者”。换句话说，许多刑讯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施行的：其中的施刑者知道，他们所处社会的大众对其所作所为要么公开赞成，要么视而不见。通常，这里包含了一种“正义世界”的思想：旁观者认为实施刑讯的当局肯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不太可能是虐待狂（认为当局的这种行为是合理和正义的）。因此，旁观者有意无意地得出一个结论：刑讯受害者肯定是罪有应得；他（或她）因此不值得被尊重。这个结论会导致对受害者的极端敌视，正如诗人布朗宁[22]作品中的旅行者所说：

> 从未有过一头畜生让我如此憎恨；
> 他必定因为邪恶而活该受这等罪。
>
> 布朗宁，《罗兰少爷临于黑暗塔下》，第 83-84 行

对无辜者的这种贬损正是刑讯所带来的副作用，常见而悲惨。

※本章小结

在前几章中已经强调过，洗脑完全是一个社会事件，其中不仅需要施害者，也需要受害者。本书中分析的所有社会情境都涉及了意识形态施动者，他们代表了被整个社会广泛认识并认可的各种形式的权威。这种社会认同隐性或显性地为产生影响力的人的活动提供了必要支持。

洗脑并非理性说服，它包含了隐秘或胁迫手段。它从刑讯演变而来，与刑讯有着诸多共同点，很多所谓的对洗脑情境的描述都包含了心理折磨或身体酷刑。洗脑和刑讯都寻求支配其受害者。与洗脑相比而言，刑讯可能不太关心受害者的福利，例如当施刑者已经事先知道受害者将会被处决之时便会如此。然而，洗脑和刑讯都具有极权主义倾向，都从官僚作风的角度——而非自身角度——将受害者当作可以操控的器具；二者都旨在消除受害者的独立身份，因为这种独立性与身体和思想的完全控制不共戴天。

在下一章中，我将探讨不同程度的影响、说服和胁迫，讨论思想控制手段如何发生变化。

---

[22] Robert Browning（1812—1889）：维多利亚时代第二大诗人。诗集有《戏剧抒情诗》《戏剧罗曼司和抒情诗》《男男女女》《剧中人物》等，他还创作了《斯特拉福德》等 8 部剧作。

第6章　洗脑和施加影响

爱自由即爱他人；爱权力即爱自己。

威廉·哈兹里特[1]，《政治评论》中的"论时报"

在前五章中，我分析了"洗脑"一词的来历和演变，以及洗脑与诸多改变思想之情境的关联，这些情境包括：宗教和政治团体（第2章）、广告和教育（第3章）、精神疾病治疗（第4章）以及出现在军队、刑事司法系统，甚至是人际关系中各种形式的社会控制（第5章）。现在是时候从这些例子中总结一些关于洗脑特性的结论了。

第1章对"洗脑"一词产生半个世纪以来的四种较明显的用途进行了区分。作为一个政治上被广泛使用的贬义词，"洗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受到人们的关注，并遭到了批评，而且这个用途至今仍非常普遍。遇到难以解释的现象，因不明就里而将"洗脑"作为一种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这在刚开始时无疑占了上风，但随着社会心理学的发展，那些令亨特困惑不已的人类行为已经能够通过具体理论得到合理的解释，进而使得"洗脑的用法越发明晰"。媒体在某些情境下，比如报道邪教，暗指某种邪恶、神秘而又令人心满意足且极度兴奋的活动时，仍会诉诸洗脑一词；但大多数社会学家可能会说，洗脑一词本身并不能作为一种解释。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具体的、魔法般的过程叫做"洗脑"，更确切地说，"洗脑"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一系列具体的社会心理过程的总称，当"思想改造术"被用于影响一个人或一群人时，这些具体的社会心理过程便可能部分或全体发挥效用。

洗脑的类型

正如第2—5章所示，涉及改变思想的那些情境并非一成不变。邪教和政

---

① 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国散文家、评论家、画家。他热衷于争论，擅长撰写警句，谩骂和讽刺性的文字。他最著名的散文集是《席间闲谈》和《时代精神》。

治党派通常都有等级体系，有一个首领和众多追随者，且双方的需求通常是互补的。这些社会机构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织的力量。这些组织可能具有高度的强制性，而且最终不仅主宰了领导群，也主宰了追随者的认知图景。它们实施我所提及的强制洗脑，不管洗脑者是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如虐待伴侣或儿童），还是在一个大的社会体制中担当角色，强制洗脑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涉及个人，且极具强迫性。

广告的强迫性要小得多。一个邪教可能会试图将一种意识形态系统全部强加给其追随者，但一个特定的广告却旨在改变几种特定的（与产品相关的）观念。广告一般也反映了当前人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并且在这种意识形态范围之内运作——当下，大部分英国电视广告都以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自由为背景。广告具有“一对多”的社会结构——由少数人产生的一种影响形式，瞄准一个相对不变的受众群体。甚至对于精致的广告也是如此，这一点与邪教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种暗中洗脑，其影响单独看来很薄弱，但时间一长，积累到一定数量，就会形成一种几乎不可挑战的文化背景。例如，当我们每天都面对着数以百计的广告时，我们无法说是某一个广告造就了消费文化。然而，把这些广告放在一起，它们背后所蕴含的信息就会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

不管是强制性洗脑还是暗中洗脑，从电视广播到恐怖主义，都属于更广范围的影响手段。回到之前提及的认知图景的比喻，我们可以说，一个企图产生影响以改变人内心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从最轻微的说服——如微风拂过草地，到灾难性的武力强制洗脑——如地震或火山喷发。很多意识形态机器既使用武力手段，也使用隐秘手段，家庭虐待即为一例。此外，正如前几章所示，很多个人及社会因素都会影响到任何一个影响企图的性质与成败。这些因素包括：目标个体的性格、态度、行为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差异性；试图产生影响力的人的目标、在影响手段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影响企图所发生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传播影响的社会结构。胁迫的程度和类型，以及目标对象和施虐者的相对社会权力，也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心理学家已对影响及社会权力作过大量的研究。

第 3 章中，我们探讨过罗伯特·西奥迪尼著名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分类体系（敢于承诺与言行一致、利益互惠、社会认同法则、说服者的权威及亲和力以及稀缺原则），最初就是源于广告和销售领域。另一个分类体系是约翰·弗伦奇[②]和伯伦特·雷文[③]的“社会权力基础”，这个分类体系在组织心理学和

② John R. P. French（1924—2006）：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名誉教授。他最为人所知的可能是他与伯伦特·雷文在 1959 年合作的著作《五种社会权利基础》。

③ Bertram Raven（1926— ）：美国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名誉教授。

职场心理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约翰·弗伦奇和伯伦特·雷文区分了社会权力的六种来源：奖励、胁迫、合法、专业、参照和信息。雷文的解释如下：

> 试想一个管理者用来纠正其下属工作方式的权力基础：奖励（给顺从者升职或加薪）；胁迫（对于不服从者，以降薪等惩罚相威胁）；合法（强调管理者有权实施这些行为，而下属有义务服从）；专业（管理者熟知在一件事中怎么做是最好的选择）；参照（唤起一种互相认同感，以便下属在其行为中模仿管理者）；信息（悉心向下属解释为什么纠正后的行为最终对其有利）。
>
> 雷文，“权力/互动及人际影响”，第 218 页

思想改造术的改造目标可能是信念、情感或行为，它可能依靠权力、隐秘手段或理性说服，它可能引诱或威逼，最终使改造对象要么感到反感、憎恶和无助，要么感到欢喜、感激和权力提升。总之，思想改造术要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像所有的刺激反应模式那样改变被改造者的大脑。

正如亨特、乔治·奥威尔及其他人所描述的，强制洗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胁迫和情感，依赖于权力的不平等，以及强烈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产生于团体，尤其是小团体之中。强制洗脑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强制洗脑未被西方政府广泛采用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出于伦理方面的顾虑，但有时主要是出于前一个原因。然而，诸如邪教或恐怖主义组织这样的小团体却能够使用极端的手段，因为他们能更彻底地控制受害者的环境。他们还可以将外部世界作为一种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威胁，以激起受害者内心的恐惧和焦虑（而自由、和平和安全的民主团体则必须作更大的努力才能使这些策略为人所信服）。洗脑旨在改变行为，但行为是次要的：洗脑的主要目标在于改变受害者的思想，使其符合洗脑者推崇的意识形态。无论受害者如何抵抗，不管他先前的观念多么迥异，他都有可能被改造。理想情况下，受害者的认知图景会发生足够大的改变，使其不仅影响到与强加意识形态直接相关的信念，而且还影响到其他所有信念，不管这些信念多么微不足道。于是，所有的行动和感知都可以用新的信念去重新解读。

洗脑背后的思想

就像心理学家所说的，洗脑既是一个认知概念，也是一个情感概念：它既运用理性，又利用情绪（在本书第二部分我们将看到，这两者的对立并不是绝

对的)。情绪非常重要,而且其力量可能极其强大。洗脑唤起人们对失去控制的恐惧、对被他人利用和支配的恐惧,以及对失去个人身份的恐惧。这一点上,它与指令幻听极为相似,这种强迫的内在声音能够使精神分裂症患者感到极度恐惧。在社会环境中,洗脑与醉酒一样,其受害者都会因为无法有效控制自身行为而遭受谴责(虽然酒醉者当时认为自己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不同于醉酒的是,洗脑攻击的不仅是受害者的自我控制感,还有其自我认同感。行动的支配来自外部,但一个被成功洗脑的受害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会自愿为最终的行为承担责任。对这一点而言,洗脑与精神分裂症刚好相反,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感觉到命令其行动的声音来自外界(外星人、美国中央情报局、魔鬼,或者任何其他可能的东西)。

洗脑也有认知的成分:确切地说,它借用了许多关于我们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已在前五章中多次出现过,但我想有必要在这里整理一下,因为它们对我们认识思想控制,以及思想控制所引发的问题十分重要。

权力思想

对权力的定义纷繁各异,但都集中于一点,即个体施动者按照某种方式行动的能力。因此,除非你是上帝,否则你的权力就是某一特定领域的权力;肉体凡胎的人类能够做某些事,也就必定有其做不了的事。权力的概念与控制和影响的概念密切相关,而且在前面社会权力的语境中已讨论过,权力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颇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④认为,权力的动机——他将其定义为"寻求权力的内在需要或倾向,或意图对他人产生强烈影响"——是产生社会行为的三大基本动机之一(另外两个动机分别是获得成功的需要,以及社会归属感,即对社交和拥有朋友的渴望)。

改变的思想

一个人的权力不仅取决于他(或她)做什么,还取决于其行动被他人接受和解读的方式。社会权力即影响他人的能力,确切地说,就是改变他人观念、态度和行为的能力。思想控制的各种过程必然包含改变,原因很简单,人类世界决不像想象的那样容易合作。



④ David McClelland(1917—1998):美国社会心理学家,1987 年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

因果思想

哲学家大卫·休谟[5]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点:因果关系是我们自认为很懂而实则不然的观念之一。休谟说,导致我们做因果推论的不是我们的推理能力,而仅仅是事物"不变而有规律的联系"的实际经验而已。这个观点尤其适用于预测:

> 这两个命题远非一回事,"我发现一个客体总是伴随这样一种结果,因此我预测其他具有相似外观的客体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如果你不介意,我将承认:一个命题可以由另一个命题理所当然地推断而来——我知道,实际上这个命题总是这么推断出来的。但如果你坚持认为推断是通过一连串推理得出的,我希望你能给出这一推理过程。
>
> 休谟,《人类理解论与道德原则论》,第 34 页

三个多世纪后,丹尼尔·丹尼特[6]在其著作中区分了很多我们用来支持因果关系论断的要素。以"比尔绊倒了阿瑟,导致阿瑟摔倒了"这句话为例。这些要素包括因果必然性(如果比尔没绊倒阿瑟,阿瑟就不会倒)、因果充分性(阿瑟的摔倒是比尔绊倒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果独立性(可以将阿瑟摔倒和比尔绊倒他这两者分开来认识,从而一者可以不依赖另一者而存在)和时间优先性(区分因果的一个可靠方法就是注意到:原因总是发生在结果之前)。丹尼特还指出了其他的要素,比如因果之间的身体接触,或我们认为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施动者的观念"会增加我们作因果判断时的信心"。例如,当某一事件有多种原因时,我们对判断的信服程度将会大打折扣。但我们的判断还是依赖于因果概念。企图产生影响即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实施影响企图者之行为将致使受动者发生改变。

责任思想

我们的行为能力(作为行为发出者或来源)得到认可是我们进行社会互动的基础,这至关重要。伴随着这种施动感而来的是责任观念,有了这种责任观念,人类才得以解释自己的行为。对于荣与过、赏与罚的正确评价而言,责任必不可少。

---

⑤ 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人性论》(1739—1740)、《人类理解研究》(1748)、《道德原则研究》(1752)和《宗教的自然史》(1757)等。与约翰·洛克(John Locke)及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并称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

⑥ Daniel Dennett(1942—):美国哲学家、作家和认知科学家,主要研究精神哲学、科学哲学和生物哲学,特别是那些与进化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相关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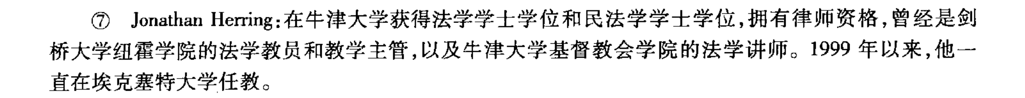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责任最具有分析性的可能要数刑事司法体系了，它通过分析责任来决定一个特定的行为(或不作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被告是否对其负有法律责任(能够承担法律责任)。英国的法律将犯罪行为分为两个要素：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泛泛地说，犯罪行为构成了“外在的”要素，如被告的行为以及该行为所造成的事态；而犯罪意图指“内在的”要素，如被告的意图和心理状态。这两个要素并不总能轻易地区分开来，例如，如果被告被指控携带攻击性武器，武器是外在因素，因此属于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但“攻击性武器”在法律上被定义为“蓄意伤害他人所携带的任何物件”；换句话说，犯罪意图才是决定性的。然而，尽管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有时可能是相互决定，但实施一个犯罪行为通常必须二者兼备。“没有哪种刑事责任是针对某种心理状态而规定的”，在英国的法律里没有，至少目前没有，尽管人格医学化(如本书第4章所述)的增强促进了这方面的发展。

自我思想

职责与施动行为需要一个可靠的施动者，这就引出了如何界定施动者的问题。人们通常想当然地将“自我”当作思想和行动的源头，是传统意义上感知的接收者。17世纪的哲学家勒内·笛卡尔将意识界定为自我的一个重要方面：纯粹、无实体，且独立于物质世界。依照这种观点，我们的思想就像钻石一样纯洁而透明。更接近现代的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不管自我是什么，它都不像钻石，而更像黏土：有可塑性、相互关联性，且依赖于物质世界，尤其是依赖于人类大脑这一物质实体。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认为，我们对自我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在所处社会中的角色，以及我们与他人的相互关系。看待自我的方式，对人们如何认识改变自我的行为有相当大的影响；“钻石观”比起“黏土观”要难改变得多。因此，对于洗脑而言，自我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自由意志思想

自由意志是犯罪行为这一概念的关键因素，因为被告人在实施某些行为或引起某些事态时必须具备自由意志才能构成犯罪。乔纳森·赫林[⑦]在《刑法》(*Criminal Law*)中指出，“犯罪行为必须是故意或自愿的，这是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说，“被告必须是本来能够避免其所实施行动的发生的”。这一必


⑦ Jonathan Herring：在牛津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和民法学学士学位，拥有律师资格，曾经是剑桥大学纽霍学院的法学教员和教学主管，以及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法学讲师。1999年以来，他一直在埃克塞特大学任教。



备条件排除了意外行为和他人身体上的强迫(受到严格意义上的身体上的逼迫,而不是以死亡相威胁)的情况,同时也排除了无意识行为和精神失常。无意识行为是指发生在意识和(或)精神控制范围之外的行为,例如由突发事件引起的反射性肌肉痉挛,以及在脑震荡后发生的行为。由自身原因导致的无意识行为(如由醉酒诱发的行为)是不具备正当辩护理由的。精神失常与无意识行为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精神失常的诱发因素是内在的(如疾病),而不是外在的(如突如其来的噪声,或头部受到打击)。但有一种情况没有排除在外,即激怒杀人,它是对强烈情绪的一种反应,例如所谓的“激情犯罪”中表现出的情绪。我将在第9章进一步谈论有关强烈情绪的内容。

司法体系如此,其他社会领域也是如此。我们在第11章将会看到,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人类价值。具有历史头脑的哲学家总结发现“意识”一词在英语中大概出现在17世纪。而表示自由的词语至少自9世纪以来就已成为了英语语言的一部分,并且自由的概念比以书面文字出现久远得多。时至今日,自由意志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它就像是数学方程式中的奇异点一样暗含于人类的行为理论之中。正如任何数除以零可以得到无数个可能的值一样,一旦投入到自由意志争论的大锅炉,人们就会感觉像是漂浮在迷茫哲学的各种可能性的海洋里。然而,自由意志是“自我”概念的核心,尤其是在现代的西方世界。自由意志之于洗脑而言不仅重要,实际上也是洗脑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当我们具有自由意志时,强烈的影响形式才会构成潜在威胁。否则,我们就像是在永无止境的因果循环细绳上往下滑的珠子,任何一种影响都只不过是在因果决定论世界中增加的一个动因而已。

※本章小结

谈论思想控制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及上述概念。有些概念(如改变)似乎相对来说问题不大,而有些概念(如自由意志)则数百年来一直困扰着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不过,当今的思想家比先前的思想家多了一个优势,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20世纪以来我们对人类的大脑和行为有了更多科学的认识。本书的第1部分给出了很多例子,描述了社会心理学如何增进了对行为尤其是集体行为的认识。本书第2部分将谈论神经科学以及人类大脑的各种奇迹。

第 2 部分

头颅中的叛徒

第7章　变幻莫测的大脑

没有哪种生物的内在意志能够强大到完全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乔治·艾略特[①],《米德尔马契》

这一部分将就“洗脑”中的“脑”一词作一些简单基础的科学解释。本章将主要探讨产生影响的技术所使用的核心机制,即大脑变化。因此,这要求我们应该对现代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有些了解。

魅力无穷的科学

神经科学,即研究大脑的科学,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产物,它源于人们相信任何事物都不会超出科学的解释范畴。与其姊妹学科遗传学一样,神经科学在20世纪发展起来,却被先发展起来的物理学掩盖了光芒,物理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人们也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遗传学承诺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吹嘘着自己有一天将如何征服世界。与这些浮华的年轻学科相比,神经科学就像灰姑娘一般沉默。但是有人预言神经科学必将超过它的这些姊妹学科,它不仅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的身体,甚至能改变我们创造出来的思想、自我和文化。

神经科学已经告诉我们,人类并非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那种生物,我们关于自身的一些最乐于接受的假设都是误断。人类的许多社交活动都是基于两个观念。第一是稳固性的观念:我们通常认为自己的思想就像钻石,即人格和记忆一旦形成,即使会变,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第二是自由意志的观念: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因此至少必须为我们的部分行为负责(即自觉行为)。当然,这些假设受到了世界上一部分科学家、哲学家以及作家

① George Eliot(1819—1880):英国小说家,与狄更斯和萨克雷齐名。其主要作品有《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等。

的质疑。甚至仅在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诸多人们如何改变,怎样受控制的例证。然而人的思想具有稳固性和自由意志这一观点,尤其是在西方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例如,英国刑事司法制度便是依靠自由意志这一观念来指派刑责并判处刑罚的。同样的,它也承认思想的稳固性:一名因谋杀罪被判入狱的犯人必须与他杀人时是“同一个人”,即他的性格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洗脑通过强加巨大的人格变化,从而使被洗脑者失去自由行事的能力,并且使其仍认为自己是在自主地行动。因此洗脑也能从上述两个观念(稳固性和自由意志)中获取力量。为了理解洗脑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需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自由意志是第 11 章的主题。稍后我们将在本章中就人格稳固性的假设进行探索。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参观一下神经元世界。

神经科学简介

如果你打开一本神经科学方面的通俗读物,在深入研读之前,你大体都会读到这样一句话,告诉你人类大脑有数十亿的神经元。最通俗易懂的理解便是将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数目与已知宇宙的原子数目进行类比。鉴于大多数人对理解如此巨大的数字概念存在困难,我在此就不再赘述。相反,我将尝试使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阐释人类大脑的复杂性:以地球作比喻。

科学与电脑制图学通过一块围绕轴心旋转的光秃岩石的合成图像,帮助我们猜测世界的起源。初生的地球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生物,经受着地震、火山和流星撞击的折磨,经过巨大变化才有了雏形。但随着逐渐冷却,初生的剧烈变化渐渐平息,继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地形风貌。与此同时,不论是在空中还是深海,一群聚集的化学物质衍生出一种特殊的能力——自我复制。自此以后,生命便不断繁衍,经历了彗星撞击、冰川时期及宇宙给予它的各种灾难,一直到现在,仍然生生不息。

地球的情况与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一样。早期的变化非常剧烈,塑造着我们仍不稳定的认知图景,决定着我们人格的主要类型。这段时期,即使是一颗流星撞击都会对其未来的发展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渐渐地,一切开始趋于稳定,早期的激烈情绪开始平复,变化的速度开始放慢。正如年轻的地球上生命的繁衍,每个物种都会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而文化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塑造着它。思想,就如同数以万计的居民,在神经

世界里繁衍生息。一些思想如同化石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而大多数思想会悄无声息地消逝。与生物一样，思想也可以进行清楚的归类，每一种思想又都是独一无二的。思想可以像生物一样进行复制，并且能够在大脑间进行传播，未来甚至极有可能在两个世界之间进行传播。

一些生命形式经历长期的进化，已经形成了复杂的躯体、大脑，以及社会交往行为。就我们所知，只有一个物种发展出了语言及繁荣的文化，但大多数缺乏这些天赋的物种也对它们周围的世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尽管生命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地球的面貌，然而地球本身并不需要生命。正如世界末日的散布者一直所预言的那样，人类在未来某个时候会灭亡，所有生命都将死去，即使这样，地球也不会在绝望中毁灭。它只会一如既往地绕着轴心旋转。正如作家萨曼·拉什迪②所写道：

> 我们抬头仰望星空，希望星星也低头俯视我们，我们祈祷有星星可以让我们追寻，有星星在天堂的另一端带领我们走向宿命，但这一切只是我们的幻念。我们仰视银河，深深地爱上它，然而宇宙却并不像我们关注着它一样关注着我们。不论我们多么希望得到星星的关注，但它们还是只待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转着。
>
> 拉什迪，《摩尔人的最后叹息》，第 62 页

大脑也是如此。即使去除大脑中的"精神居民"，即使思想和文化消亡，或不再建立，大脑也仍然存在。它们只不过是失去几乎所有使其有趣的事物罢了。剩下的便是如同我们的姊妹星球——火星一样的荒芜景象：它提醒着我们这座星球的原始面貌，以及当生命繁衍终结之时，这个世界的模样。

试想现在我们要探索一颗新的行星，我们不仅要了解该行星上形成陆地、海洋和气候的各种自然力量，而且还要记录各个物种，解释它们的进化过程。这么一想象之后，你就对神经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有了些许认识。大脑的研究者就像是带着工具和知识的星际先驱：神经解剖学家负责绘制大脑地图，神经药物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细胞生物学家及神经遗传学家负责研究大脑运转的机制，脑成像专家负责从"太空"拍摄美丽的照片，从性别到血清素，各种现象

---

② Salman Rushdie（1947— ）：印度小说家、散文家。代表作有：1981 年获英国布克奖的《午夜的孩子》以及 1989 年初出版并引起轩然大波的《撒旦诗篇》和 1996 年的《摩尔人最后的叹息》等。

都有无数的专家在探索。由于研究范围的激增，神经科学内部势必是片段的结果，因此无法从整体上对其进行概述。然而，某些基本原则还是得到了一致的认同，我接下来要阐释的便是这些基本原则。

大脑由什么构成？

大脑，如同身体里的神经，是由神经元构成，神经元是传输信号的专家。它包括细胞质和细胞核，细胞核内含有核心机制，比如 DNA（脱氧核糖核酸），细胞的基因便是由 DNA 组成。每个神经元都可以通过一条被称为轴突的长长的突起发送信号，同时通过稍短的叫作树突的突起接收来自另一神经元的信号。通常，每个神经元都有一个轴突和多个树突，因此可以同时从其他细胞接收成千上万的信号，但一次却只能发送一个信号。每个神经元的轴突都延伸至另一神经元（让我们知道我们脚趾感觉冰凉的神经轴突从脚延伸至脊髓，长达一米甚至更长）。但是，轴突并没有触碰到接收信号的细胞。这两个神经元之间细微的间隔被称为突触。（见图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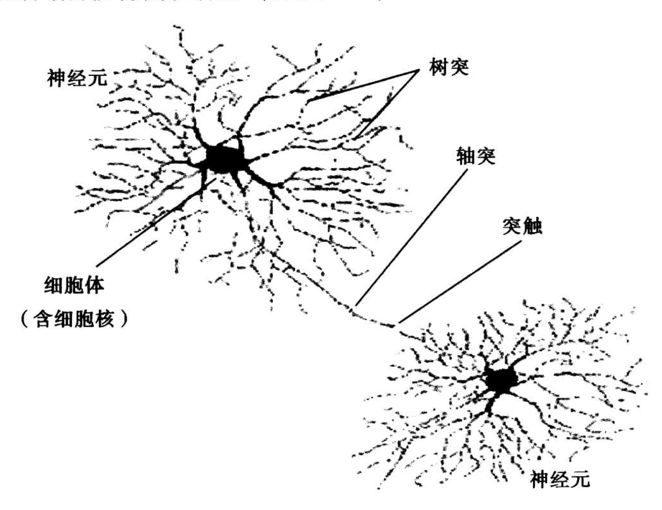


图 7.1 神经元由一个细胞体构成——包含指挥这个神经细胞运转的核心机制——从这个细胞体上延伸出多条树突和一根轴突。树突接收其他细胞的信号。轴突可延伸一米或更长，它将细胞的信号发送至其他神经细胞。轴突末梢和下一神经细胞之间的微小缝隙（图示中有所夸大）是突触。通过突触，信息便可以从一个神经细胞传至下一个神经细胞。

神经元在何处?

只有当每个神经元细胞都存活、呼吸并且处于富含各种微粒的脑脊液(CSF)之中时,神经元才能发挥功能。这些微粒中,其中一些是中性的,另外一部分是带正负电的离子。

它们大小各异,从最小最简单的(离子,如钠、钾、氯化物)到体积稍大、结构更复杂的(如蛋白质、脂肪、药物、病毒)。大脑从血管吸收所需的营养素(如葡萄糖和氧气),血管以一种特殊的细胞排列组合而成。这种排列方式使血液成为大脑的重要保护屏障,负责控制哪些物质可以进入大脑,哪些不能进入脑中(见图7.2(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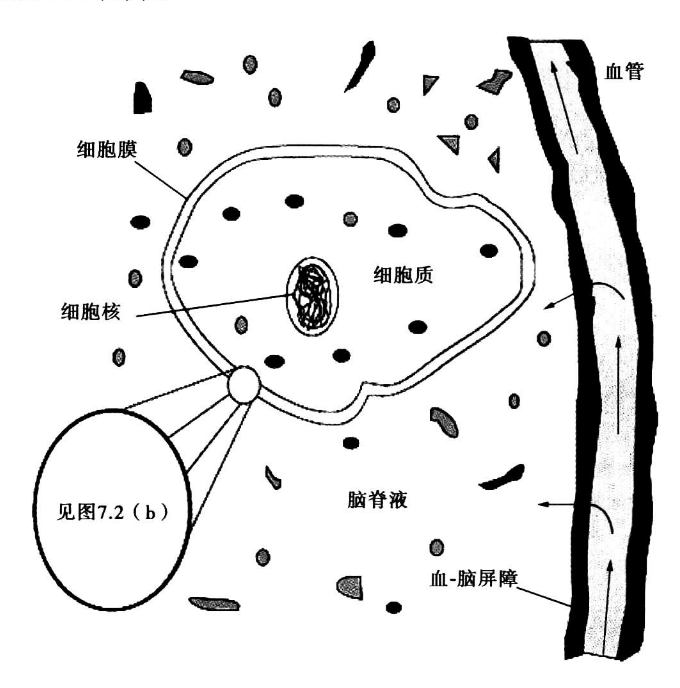


图7.2(a)　以上是一幅简单的神经元图示(为简便起见,轴突和树突并未在图中标示)。神经元被细胞膜环绕,内含有细胞核和细胞液。细胞核中又包含细胞基因,蛋白质便是由基因编码形成。细胞质中含有细胞运转的大部分机制,包括产生能量,将蛋白质从生产地运送至所需处,修复破损,生成轴突与突触间传导的电信号。细胞质中含有许多离子(带电粒子:由图中填充有颜色的小颗粒表示)。当神经元停止工作(即没有发送信号)时,细胞质中所含的负离子就会多于神经元所处的脑脊液中的负离子。任何细胞都含有多种正、负离子以及不带电荷的分子。

(神经元)内部与外部

神经元的皮肤就是细胞膜,它由一种叫作磷脂的双层脂类分子构成。就像国家的边境,细胞膜决定着细胞的形状,理论上来说,它会将不速之客阻挡在外。大多数国家都有很多入口,一些入口有人守卫,而另一些却没有。细胞亦是如此。磷脂细胞膜有很多孔洞。一些孔洞无人看守,但只允许某些分子,如水和钾,渗透进入;另一些入口由受体把守,必须通过特殊信号(通常来自另一神经元)才能被激活,这些细胞膜孔洞的大门才会敞开,让分子进入细胞(见图7.2(b))。细胞有一条恒定的可以穿过细胞膜的双向通道。与国家一样,细胞也有复杂的内部机制以处理进入其内部的物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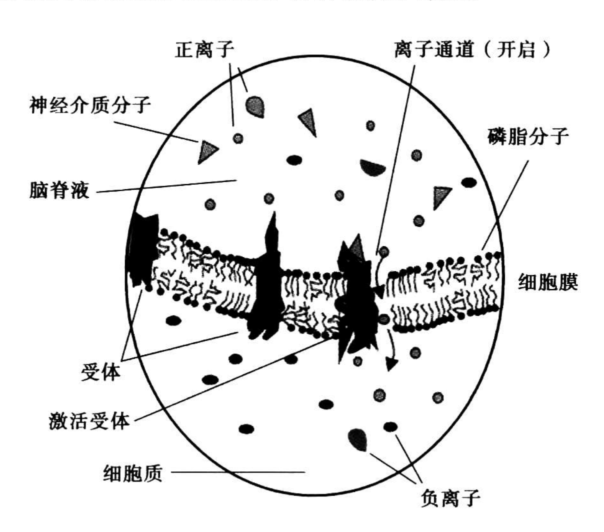


图7.2(b)　是细胞膜的一部分,它由双层磷脂分子构成。细胞膜中嵌入的是受体,以及神经传递素锁定时可被激活的复杂分子。每个受体都只能对少数几个特殊的分子作出改变形状的反应。这种反应会引起细胞内部发生诸多变化,包括(如图所示)开启离子通道。因为休息状态的神经元相对于脑脊液来说带有负电荷,那么正离子便会穿过开放的离子通道进入细胞。这是因为它们受到其他正离子的排斥(在脑脊液中的正离子较多),同时又受到负离子的吸引(细胞中的负离子较多)。如图所示,正离子(图中的灰色填充颗粒,用箭头标示运动方向)穿过开启的离子通道进入细胞。

神经元如何工作?

所有细胞都进化出了一种被称为"离子泵"的机制。正如受体管理哪些物质

可以进入细胞一样,离子泵可以去除某些离子(这与移民官员拒绝那些不受欢迎的移民入境是一样的)。神经元非常擅长管控离子的通行,它们可以精准地调控脑脊液和细胞质之间的电荷差。当神经元没有接收信号时,它们内部相对于脑脊液来说是负电荷。而当信号激活受体使正离子进入神经元时,细胞质所带的负电荷就会相对减少,从而产生一股电流——细胞自身的信号——从整个细胞传导至轴突末端,泵出正离子,相对脑脊液而言,此时细胞又带有了更多的负电荷,神经元从而恢复至停工时的负电荷状态,准备生成下一个信号。

神经元之间如何沟通?

从大脑角度考虑,突触才是真正的活动场所。细胞跨过这些细小的间隙便可以互相交流。它们用来交流的语言是一种释放出的信号物质。当电信号传至轴突末端,它会释放一小团化学物质,称为神经传递素(因为它们在神经元之间进行传递)。这些分子释放出来后,越过间隙,其中一些到达另一神经元,在那里找到神经元表面(即细胞膜)的受体,等待合适的分子到来。如果遇到相匹配的搭档,它们便能立即结合:就像锁和钥匙一样,神经传递素能立刻插入受体分子中,带它到达新的位置。当受体形状改变时,细胞膜的大门便会开启,能进入这扇门的任何化学物质都会改变细胞的电荷状态,并且触发一系列二级信号(即二级信使)。信息传递后,神经传递素便会脱离分子,由处于突触中的特殊分子(回收酶)进行回收;同时,受体恢复"被动"状态,等待下一次联络(见图7.3)。

学 习

尽管受体可以回到原来的位置,但细胞膜所在的细胞却再也无法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有时这种改变极其微小,但神经传递素分子的作用常常可以造成永久的改变,不仅影响细胞的电荷状态(这可能导致细胞生成自身的信号),而且还影响其基因机制。基因可开启也可关闭;这可以敦促阅读基因和制造蛋白质的机制加倍努力,或是放松休息。那些蛋白质可能变成更多即将被运出细胞膜的受体,又或者它们也许要在细胞内部完成工作。反过来它们也会影响神经元的内部环境。这可能导致细胞膜上的其他受体开启或关闭……以一种网状式无限循环的因果关系形式一直持续下去。

这为何有关系呢? 因为这种网状效应往往会改变细胞对于未来信息的接受能力。比如,更多受体运送至细胞膜,会让细胞对神经传递素更为敏感,从而更可能对自身信号作出反应。相反,将受体从细胞膜运离会使神经元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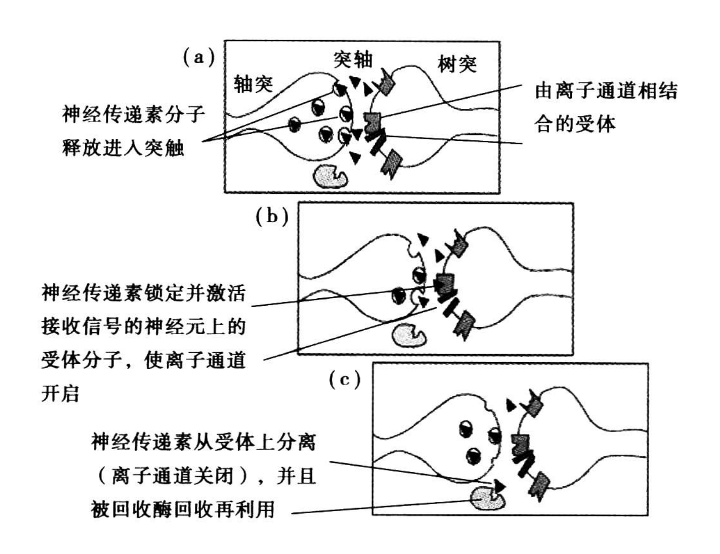


图 7.3　一个神经元通过突触与另一神经元传递信息的过程

图 7.3(a)显示了发出信号神经元(左)的轴突和接收信号神经元(右)的树突。轴突末端含有许多细小的囊泡,装满神经传递素分子(黑色三角形)。当神经元信号传至其轴突末端,这些囊泡便移至细胞膜,在这里它们将装载的神经传递素分子释放入突触。

接收信号的神经元的细胞膜含有各种受体分子(三个受体如图所示),其中一些结合有离子通道(其中一个如图所示)。

图 7.3(b)显示的是一个神经传递素分子(黑色三角形)锁定了接收信号的细胞上的一个受体。相应的离子通道已经打开。

图 7.3(c)展示的是神经传递素的回收过程。一旦神经传递素分子与受体分离,与受体结合的离子通道就会关闭,让接收信号的神经元细胞内外重新达到电荷平衡,为接收下一个信号做好准备。同时,回收酶将神经传递素从突触运走,将其转移回发送信号的细胞,从而,神经细胞可以长久维持其与"邻居"沟通的能力。

很快被输入信号激活。细胞能够改变其间突触强度的能力正是大脑为何能够从经验中学习的秘密所在。一般来说,两个神经元如果同时被激活,连接它们的突触往往会变得更加坚固。当一个神经元被激活时,加固了的突触会提高另一神经元被激活的几率。突触的活动能力可以影响神经元的活跃程度,由此,大脑可以根据收到的刺激刻画自己的认知图景。流水在地面上开辟出沟渠,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便会流得越来越顺畅,同理,信号在神经元之间流动,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后来的信号更容易传递。如果一种信号在神经元之间传递越频繁,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就越稳固。这也是为什么"重复"

会成为洗脑的一种核心手段的原因。

大脑的构造

人脑如同乡间宅邸一样,可分为两层楼。楼下是皮质下区域,包括小脑、丘脑、杏仁核和上丘,很多脑活动在这个区域完成,包括心跳、呼吸、体温调节、各种身体动作、部分学习活动,还有很多无意识的活动。下皮层有很多区域,一些处理输入(感官)信息,一些输出行动指令,一些信息是关于当下的位置和身体状态(这些组成了所谓的情绪),还有一些负责更为复杂的功能。有关皮质下区域的书籍很多,这里我就不再赘述,况且这也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楼上是大脑皮层,这里有自我、自由意志、意识,甚至"鬼神模块"都被认为存在于这一区域。大脑皮层分为两半,左脑和右脑,每一部分又分为四个主要区域,或称为叶。大脑后部是两个枕叶,两侧是目前人们还了解得并不多的顶叶(朝上)和颞叶(朝下),脑前部已经高度发达,由左右额叶组成(见图 7.4)。每一个叶包含许多子区域,神经元接收的信号类型根据脑叶和区域而各有不同。比如,来自眼睛的信号进入脑后的皮层,即枕叶,而来自耳朵的信号进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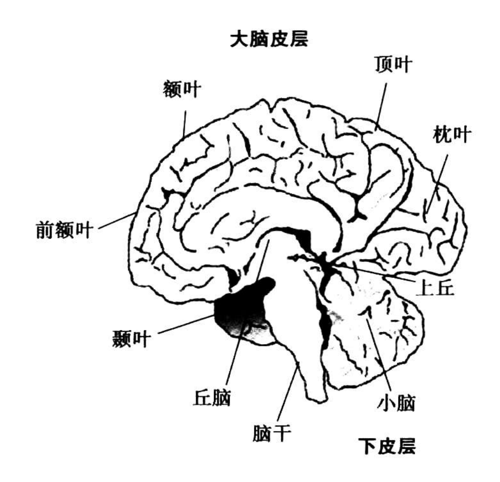


图 7.4　人脑的内侧结构图

图中已标示出大脑皮层的四个主要部分(额叶,颞叶,顶叶和枕叶)。内侧结构图展示的是大脑从中间分割的结构图形,一半大脑被切除,以便可以清楚地观察另一半的结构。(常见的还有侧面结构图,如图 10.1(a)所示,左边是额叶,右边是枕叶。)大脑皮层在下皮层上形成一个褶皱的层次。图中也标示了下皮层的四个主要结构——丘脑、小脑、上丘和脑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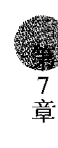
颞叶。而且,神经元输出信号也各有不同。在感官区域,脑细胞主要将信号发送至其他皮层区或皮层下感官区,而生成动作的额叶区主要负责发送指令至皮层下输出区:神经元的输出信号可快速到达脊髓,然后到达肌肉。

稳固的自我

经过以上的速成课之后,现在该回到本章的主题上了:稳固性假设。我们都对孩子身体成长的速度感到惊讶,事实上儿童大脑的变化速度更为惊人。然而,我们通常认为,如果没有发生意外事故或是罹患疾病,到一定年龄后,我们的大脑就基本维持稳定状态。比如,当知道阅读障碍是大脑出现了异常状况时,患这种病症的人通常很绝望:“我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因为他们认为大脑意味着永远无法改变。科学家告诉我们,自我意识与大脑有关,那么,自我意识也应该是无法改变的,或者说变化非常缓慢,即使有变化也得经历多年。稳固性这一假设于是以两种面目出现:一个与大脑相关;另一个则涉及自我意识。前者是现代的说法,而后者要早得多。成年人都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身的行为动机,掌控自己的思想意识。尽管我们不能对“自我”给出哲学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都没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思想上颠覆性的震撼,那么我们非常幸运,因为那是世上最恐怖的经历。心死与空虚在本应健康发展的自我中不断滋生,为抑郁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恐惧。而自我人格分裂,不管是由老年痴呆症,还是由精神分裂症造成的,都足以令人感到惊恐。人类恐惧任何可能威胁到我们身份意识的事物:毒品、疾病、大脑创伤、新科技,尤其排斥他人想要改变我们的企图,例如社会工程、影响企图(通常是暂时性的)、洗脑(其效果可能永久持续)。即使当我们想要改变自己而听从于治疗师和专家,以求追寻崭新的生活方式时,我们努力改变“自我”实际是期望“我们”(与签字接受治疗时的“我们”仍是同一个人)能够从中受益。典型的洗脑就是破坏这种期待的过程,这正是其恐怖之所在。

然而对大脑而言,稳固性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大脑时刻都在变化:每一次感知,每一次感官刺激都在改变着你的大脑。有时这种改变可能非常剧烈。比如,一些病人在截肢后会出现“幻肢”感。尽管只是幻象,但这种幻象非常真实,以至于能够感到幻肢的疼痛折磨。患者常说,幻肢紧紧地附着在身上,使他们无法放松。那这种幻肢疼痛感是怎么出现的呢?比如,当一只手被截去



时,大脑皮层区过去用来处理来自手的信号的神经元就不能再接受惯常的输入信号。但这些神经元并不会赋闲(神经元遵守严格的职业道德),它们会加入邻近的神经元组织,开始与这些"邻居"一样接收信号。因为管理手的大脑皮层邻近接收脸部信号的神经区域,所以以前的"手"神经元就变成了现在的"脸"神经元。但接收这些神经元传递信号的大脑区域并不知晓神经元输入的改变(从手变为脸)。对大脑区域而言,来自那些神经元的信号还是代表手部正在发生的情况,这就导致了上述奇怪的结果:用幻肢摸某人的脸,这只并不存在的手也会感觉到触碰。

并不是所有的脑部改变都与幻肢症一样离奇。有些变化十分微小且短暂,正如哲学家约翰·洛克③所说,"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或是特征,就好比影子飞过玉米地"。然而,尽管许多变化小到无人留意,但却可以累计,而且它们的网状效应会持续更长的时间。想想肌肉如何适应逐渐减轻的重量,比如说,一瓶慢慢减轻的浓缩果汁。喝果汁的人每次只喝一点以品尝果汁的香味,这样,每次瓶子重量的改变都不易察觉。只有当她再拿到一满瓶时,她才会惊讶地意识到原来早已经是"空瓶"的重量。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微小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大脑中没有留下记录。事实上,无论何时,我们脑中的绝大多数变化都是无法观察到的。

这种十分突出的盲目性恰恰巩固了稳固性这一说法,使我们变得非常保守,不明智地看待那些能够影响及不能影响我们大脑的事物。我们所知的毒品、疾病和伤害仅是少数人的噩梦,但即使对它们,我们也不愿承认自身身份已经发生改变("他"也许变成了另一个人,那是因为他被洗脑了,但"我"还是我)。任何其他东西都被认为对大脑没有影响——肯定对自我也没有影响——除非找到证据证实。这种保守原则与笛卡尔的二元论有关,它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我将其称为"钻石观"。二元论由哲学家勒内·笛卡尔提出,他将高级精神与低级物质严格分开,认为自我就是"会思考的生物",以一种神秘独立的精神实体而存在。假设真如笛卡尔所言,头脑和身体完全不同,那身体的改变就不应对头脑产生任何影响。

甚至早在17世纪,人们就对这种严格的二分法产生了怀疑。哲学家安

---

③ 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内科医生。最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被誉为"古典自由主义之父"。

妮·康威[④]长期遭受头痛症的折磨。她对身体如何影响头脑有很好的理解，在其死后于1690年出版的批判笛卡尔的书中她这样写道：

> 为什么精神和灵魂会遭受身体痛楚的折磨？因为如果精神与身体相结合时，精神是无形的，既然两者性质如此，那为什么当身体受伤时灵魂也会感到哀伤？……但如果一个人承认灵魂也与身体一样具有物质属性，…… 那么以上提到的所有难题就都消失了。我们便很容易理解灵魂和身体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
>
> 康威，《古今哲学的原理》，第58页

康威的论著发表时，笛卡尔已经过世，但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促使笛卡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是波西米亚的公主伊丽莎白，一位聪慧过人的女性，她提出了关于疼痛的问题，并且得到了笛卡尔的回应。康威的编辑注释道，"笛卡尔从未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只是建议伊丽莎白每年花几天时间在抽象事物上，而这些话他绝没有对任何一位质疑他的哲学理论的男性讲过"。

然而正是伊丽莎白公主的主张——疼痛是二元论原则下的特例——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从17世纪起，思考"自我"的发展史——如同我们各自建造的小木舟引导着我们驶过生命之河——已经演化出越来越多的例外。神经科学不仅证明疼痛、毒品、疾病、伤害可以影响大脑和自我，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药剂加入了这张清单。基因、荷尔蒙、压力、地磁场、温度、阳光、电线塔、辐射、我们所吃的食物，甚至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是多么脆弱的生物啊，不得不受到如此多的外界影响，其中大多数我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注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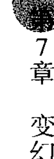
批评家大呼，但"我"还是我。这些仅为"表面文章"，一点信息素或是有机磷酸盐根本不足以影响"我"的本质。笛卡尔的信徒认为我们拥有"钻石观"，纯洁超脱，不会受周遭污浊世界的污染。我们的大脑就像钻石，在洗脑这种极端压力之下有可能崩溃，但较小的作用力根本无法改变其结构。那么，这种稳固性的说法正确吗？这种"表面文章"在何种情况下会发展成对自我身份的攻击？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几个常见的例子。

大脑供养

回想一下图7.2(b)所示的细胞膜。长期以来，神经科学家们更乐意去对

---

④ Anne Conway(1631—1679)：英国哲学家，柏拉图主义的遵循者。



不同的神经传递素和受体进行分类，而忽视了组成细胞膜的磷脂分子。如今，人们却发现磷脂对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细胞膜由何种磷脂分子构成，这至关重要。一些类型的磷脂分子长且直，因此可以紧紧结合在一起；而另一些则成波纹状锯齿形，因此结合得很松散（见图7.2(b)）。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呢？因为细胞膜上的受体在表达时是需要空间的。如果它们受到紧密结合的磷脂分子的限制，当神经传递素插入时，就很难改变自身的位置。这会降低细胞生成信号的效率和速度，从而降低整个大脑运转的效率。

换句话说，改变磷脂分子类型可以对大脑工作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多一些波状磷脂分子，少一些长直磷脂分子。如果你认准大脑是固定不变的，那么这种改变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实际上这很容易，你只需多吃些富含油脂的鱼类便可解决。

磷脂分子的脂类部分就像（或直或弯的）尾巴。它由脂肪酸构成，可能是饱和脂肪酸，也可能是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可在经过加工并能长期存放的食物中找到，它产生直的磷脂分子。不饱和脂肪酸可从鱼、坚果、绿色蔬菜中找到，它产生波状的磷脂分子。我们日常饮食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越高，磷脂分子在我们的细胞膜中就排列得越松散，这样细胞就越容易传递信号。细胞膜与人一样也会疲乏、损耗，所以大脑必须一直寻找新的材料来弥补这些损耗。因此，改变饮食结构，食用更多不饱和脂肪酸就可以轻松地改变你的大脑了。

这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变化。已有证据显示，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改善儿童的注意力，帮助治疗成人的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母乳对婴儿成长如此有益，正是因为其中有高含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所吃的东西，尤其是在年幼时所摄入的食物，会对你今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根据伯纳德·格施[5]主导的一项实验研究显示，即使成年后，不同的饮食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发条橙》的剧本中，已被判刑的英国罪犯通过几个月的治疗，暴力行为可减少40%。伯吉斯的支持者接受了厌恶疗法。参与这项实验的青年被试用了膳食补充品。

大脑中的“闪电”

我的下一个例子更具有争议性。它涉及颞叶，大脑的这一区域主要负责

⑤ Bernard Gesch：牛津大学心理学、解剖学、遗传学系研究员。

处理听觉、语言和记忆。有一种癫痫症叫做颞叶癫痫症(TLE),患者有时具有非凡的创造力(比如作曲家德米特里·萧斯塔科维奇,作家爱德加·爱伦·坡,画家梵高都被认为患有颞叶癫痫症),或者强烈的宗教体验(圣·保罗和圣女贞德也是颞叶癫痫症患者)。癫痫症的出现是由于神经元过分活跃,持续不断地发送信号。不过,一些正常人也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和宗教体验,虽然他们没有患癫痫症,但他们的颞叶神经元也是非常活跃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颞叶活跃性”现象。科学家认为,个体颞叶的活跃程度可从最低的神经惰性到高度活跃的颞叶癫痫症。

迈克尔·伯辛格[⑥]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精神体验通常因颞叶活动而产生。当然,宗教体验敏感性因人而异。比如,一些无神论者从未有过宗教体验(或者不愿意承认这种体验,就像一个天生的盲人不相信世界上有日落一样)。伯辛格的研究推论是,某些人不相信上帝,也许只是基因的问题:他们的颞叶活跃性太低,因此无法拥有或转换为精神体验。

颞叶活跃性的研究具有更深层的意义。伯辛格报告称,能够通过对右颞叶施加复合磁场的方法,引导志愿者产生精神体验。这表明宗教体验可能源自大脑活动与环境磁场间的相互作用。假以时日,科学技术就能随意提供这种体验了,通过物理方法让那些从未有过宗教体验的人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本质。他们经过这种科学技术的改造后,对朋友、家人而言,会不会就像是被洗脑了呢?又有谁知道未来的高科技能使我们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动摇的根基

坚持稳固论的评论家必然有很多理由。我们的大脑和自身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尽管我们并不是每次都能察觉得到。坚定的稳固论评论家必须论证: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管大脑遭受来自化学药品、磁场或其他任何东西的侵袭,“自我本质”都不会发生改变。无论我是否有注意力方面的问题,我都是同一个人吗?或者当我患有慢性头痛症、抑郁症,有宗教信仰,出现精神错觉自认为自己是上帝或(如果我患上科塔尔综合征)认为自己已经死亡,与我没有这些病症时是同一个人吗?显然,在决定“自我本质”这个问题上,某些大脑机能要比另外一些大脑机能更为重要。

---

⑥ Michael Persinger(1945—):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员,劳伦特大学教授,同行评议出版物多达200部。他因在神经学领域的实验而闻名。

那么自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神经科学家倾向于将它锁定于神经元之间的间隙。依照这个观点，自我便是大脑中所有突触活动的集合。然而，这个观点没有清楚地向我们解释我们最感兴趣的自我的那一部分：我们认为所有突触都是平等的，只是有一些比另一些更平等而已，这可以为乔治·奥威尔的观点提供辩护。许多心理学家指出，自我与特定现象有关，包括拥有一副躯体，能够对身体和外界施加影响，具有社会性（即与他人交往），有自我意识，不仅能够认识世界和自己的身体，而且还知道自己的想法和感觉。

根据黑兹尔·马库斯[7]和北山·忍[8]的划时代论著，除上述要素之外，将自我看作独立精神个体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是指“独立自主的人”（根据罗伊·鲍迈斯特的注释，对于个性的强调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比如，美国人通常认为个体应该“主要根据自己的内在想法、感受和行为来组织自身的行为，而不受他人思想、感受和行为的控制”。相比之下，亚非文化则注重相互依存的自我，“将自我看作周围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并且认为个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人所感知的各种关系中其他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

记忆的重要性

记忆的可塑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

伊丽莎白·洛夫特，《我们不断变化的记忆》

当你问一个人他是如何知道现在的自己与昨天的自己仍是同一个人时，不论这个人是什么出身，他们的答案通常都会指向：记忆。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是同样的自我，因为我们对过去自我的记忆显示我们自身并没有太大变化。我们非常依赖记忆，在出现失忆时会感到痛苦，比如费力找不知去向的钥匙，或是架在鼻子上的眼镜，碰到熟人却想不起他的名字。可能有人读过患者 H. M.（全名亨利·古斯塔·莫莱森）的故事，他是神经科学界非常出名的病例，他因一次癫痫症手术被切除了大部分颞叶，因此失去了形成新记忆的能力。又比如，在电影《记忆碎片》中，失忆症患者试图解开自身存在之

---

⑦ Hazel Markus：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兴趣包括文化、种族、情感、性别、动机和目标设定，等等。

⑧ Shinobu Kitayama：京都大学环境信息处理学院教授。著作有《情感与文化：相互影响的实证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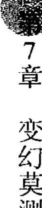
谜。尽管他们还认得儿时的朋友，但记不住半小时前看过的医生，因为大脑受伤之前的记忆仍然是完好无损的。即使父母死亡这类悲痛的事件，因为是更为近期的记忆，也无法得以保存。偶尔失忆的人很惧怕会完全失忆，不论是像 H. M. 的怪异健忘症，或是轻微的老年痴呆症都会令人恐慌。有一天我们会像习惯我们身体的其他缺陷一样，逐渐习惯我们的记忆力缺陷，但绝不会将偶尔的失忆看作是对自我意识的威胁。

神经心理学家丹尼尔·沙克特指出，失忆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他详述了七种“记忆之罪”：短暂易逝、注意力涣散、记忆障碍、张冠李戴、易受暗示、偏差和持续性。用沙克特的话来说，前三者是“遗漏之罪”，我们已经习惯并且经常抱怨的正是这几种失忆类型。记忆的易逝性指“记忆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或消失”；注意力涣散是指没有集中精力记住我们所需的信息；记忆障碍指的是在我们试图提取大脑中的记忆时产生沮丧情绪，这些记忆似乎只需稍加一点刺激就可以回来，但在需要时却总是无法提取。最后一个“记忆之罪”，即持续性，是易逝性的反面。通常，那些不愉快或是受伤害的记忆总是很难忘却，尽管我们非常希望忘记它们。极端情况下，它们还会以幻觉的形式出现，有时患者甚至认为自己正在再次经历以前的创伤。

沙克特提出的记忆的另外“三宗罪”也十分常见，但它们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失忆。错误归属（张冠李戴）罪动摇了稳固论，这也许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谈论这几宗罪的一个原因。因此沙克特这样描述道：

> 错误归属罪指记忆出处的指派出现了错误：即错把现实和想象混淆，或者将你从报纸上看到的新闻记成是朋友告诉你的琐事。错误归属实际上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常见得多，而且对法律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易受暗示罪是指当一个人试图回忆过去的经历时，他的记忆会被主要问题、评论或建议所占据。与错误归属罪一样，易受暗示会牵涉法律体系，有时甚至会破坏法律体系。
>
> 偏差罪反映了我们当前的知识和信仰对过去记忆所造成的强烈影响。我们常常根据当前所知，无意识地编辑或完全另外叙述以前的经历。
>
> 沙克特，《七宗罪》，第 5 页

遗漏罪可归结为记忆体系的缺陷。比如，记忆障碍就好比一个图书馆的员工不能为我们找到所需的书。而错误归属罪则不同：它们可能在我们毫无



意识的情况下发生,但它们并不是意外事故。这些过错都是我们自己犯下的,就像《1984》中的政党,是我们自己改写了历史,将原本分离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创作了完全不曾发生的记忆。这暗示了我们有可能犯下这些罪过,不仅要批判我们的记忆力,而且还要批判我们的判断力——不仅要怪罪图书馆,更要怪排放书籍之人——作家拉·罗什富科[9]讽刺道,"每个人都在抱怨自己的记忆,却没有人抱怨自己的判断力"。至于偏差罪,联系到这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每天都感觉自己是同一个人。因为大脑不断重塑我们的记忆,使得这种信心能够达到最大化。

模式化的自我

心理学家也探讨过个体自我的灵活性,认同莎士比亚戏剧中雅克所说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扮演多种角色"。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有很多不同的角色需要我们扮演。扮演这些角色不仅要演出一系列行为,还包括与之适应的思想、态度和感情。通过对过去某种经验的学习,比如和老板谈话,只要这个情境一出现,就会激发某种模式,就像一条捷径,省去我们再次摸索合适行为的麻烦。人类会无意识地激活既学模式。事实上,每当我们企图打破这种模式("应该告诉我的老板他管理方法上有问题"),而结果最终却被我们以往的行为模式("即使我明天离开,他也还是老板")所否决时,我们都会感到尴尬。高压环境更容易唤起固有的模式行为,进而压制其他想法。

人类善于进行分类,即将不同的模式分开,比如,与老板相关的反应模式不能与婴儿相关的反应模式混淆。这就使得人们在不同时间做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不发生冲突。因此纳粹死亡集中营里的官兵能够激活反犹太的行为模式,眼睁睁看着儿童被汽油烧死,接着回家又激活自身作为慈爱父母的行为模式,关爱地搂抱自己的孩子。

再者,似乎个体在分类能力上也存在差异。一些人可以对自己的思维模式进行严格的归类,比如一个连环杀手,他的邻居却反应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这么好一个人,平时连苍蝇都不会伤害!"而另外一些人则无法清楚地区分自己不同的思维模式。如果两种模式正好出现共同的元素,那么激活一个模式也就会激活另外一个。精神病学有一个著名的病例,一位精神分裂症的

---

⑨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作家兼政治人物。

女患者，让她列出自己的家庭成员时，她的回答竟是“父亲……儿子……圣灵”，这表明她的家庭概念模式和三位一体模式出现了重叠。我们中大多数人都能够避免这类不该有的联想，但疾病却让这位患者无法正常思维。

有时两种模式可能包含完全不兼容的信念。比如，当它们所于不同的情境时。如果一种模式处于活跃状态，而另一种模式处于非活跃状态时，则两者的矛盾不会引起注意。因此，皮特在作为律师时，他激活的是捍卫人权的思维模式，但回家后却虐待妻子，这时他的律师思维模式就没有启动。除非某件事或某个人碰巧同时激活了这两种模式，否则皮特就永远不会意识到他自身行为的伪善（即使被人指出来，他也还是会找到绕过这个问题的方法，比如辩驳称是其妻子的行为让她失去了她的人权）。我们只能认识到我们所有剧目角色中的很小一部分，即使是最善于反思的人也无法解开这些模式之间的所有联系，或者说解开模式发生冲突的所有症结。正如诗人沃尔特·惠特曼[10]写道：

> 我自相矛盾吗？
> 那好吧，我自相矛盾，
> （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
>
> 惠特曼，《我自己的歌》，第 1325-1327 行

遗憾的是，稳固论的假设已经无法自圆其说。“自我本质”已经从笛卡尔时期的单一意识流发展到无数的模式体，即包含思维、感受与行为的集合。一个这样的模式会在任何时候被激活，并且组成“活跃自我”。另一个模式则处于休眠状态，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准备派上用场——当我们从职场转换到家庭，从循规蹈矩转变为具有丰富感情的个体。考虑到这些变化的能力与灵活性，甚至是内部矛盾，也许洗脑带来的变化并不是毁灭性的。但如果我们的大脑思维具有可塑性，更像是黏土而不像钻石的话，那么洗脑就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它如同其他形式的影响一样，也可以通过心理学而得到解释。

模式化的大脑

如何把这些模式转换成神经科学的语言呢？很简单，大脑的组织原则就

---

⑩ Walt Whitman（1819—1892）：生于纽约州长岛，他是美国著名诗人、人文主义者，他创造了诗歌的自由体，其代表作品诗集《草叶集》。

是让每一个神经元在受到信号刺激时，都可以被激活（发送信号）。然而，这些输入的信号并不是整个事物的信息，它们只是世上各种事物的某些方面，比如颜色、声音、动作、身体感受。换句话说，一个独立的神经元不会对整个"物体"作出反应，而只会对一个或几个特征作出反应。因此，在视觉皮层中，一些神经元接收到视觉的刺激会发出信号，而另一些则不会；一些神经元会在物体左移时发出信号，而右移时则不会；一些神经元接收蓝色物体的信号，如果是红色物体则不会作出反应。而形成类似老虎这样完整物体的图像则需要一组神经元同时激活，并且这些神经元常常分布在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一些接收动物毛色的信号，一些接收条纹的信号，一些对动物的叫声作出反应，一些负责接收下皮层的信号，比如指示身体处于高度警备状态的信号。

那些接触过老虎的人，大脑中会形成"老虎模式"。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会形成一系列关于老虎的概念（"老虎是长有条纹的大猫""它们会咆哮"，等等）、态度（比如"恐惧！"）和行为反应（比如"逃跑！"）。从大脑的角度看，接收对老虎认知信号的神经元组会与其他神经元组联系，一些负责接收下皮层发出的情感信号，而另一些则发送信号让肌肉运动奔跑。随着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该模式就会成为一个范围更加明确的整体，也更容易被激活。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加强了感官部位、大脑后部以及（生成动作的）大脑前部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对猎物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秒之差就可以决定生死。训练有素的反应模式并不需要激活每一个神经元才能作出行动反应。因此，动物可以提前产生保护行为。从进化角度来看，宁愿冒着犯错的危险（将灌木丛的飒飒作响当作是捕食者的脚步声）也比等模式中所有神经元被激活（"它身形庞大，有条纹，我没有听到叫声……那就太晚了"），然后被吃掉的好。因此，模式中神经元的联系越密切越好。这样，只要一察觉到"条纹"和"身形庞大"就足以让它们作出"逃跑"的反应。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紧急情况下的反应异常迅速，完全不会在意恐惧、震惊或疼痛（有时甚至还没有注意到触发其反应的刺激物），直到作出反应之后才会注意到这些感受。

因此，反应模式，即习得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是神经元间联系模式的具体化身。当某种刺激激活其中一个或几个神经元时，这种联系越紧密，就越能更快地自动触发整个反应模式，进而更快地唤起与此模式相联系的思维和行为。前文已经提到，神经元被同时激活时，它们之间的联系会加强。刺激物活动越频繁越强烈，联系就越紧密。

每一个自我——从神经科学角度看都是神经元所有联系的集合——都包含一组成熟的思维行为模式（即特定情境中被激活的特定连接方式）。这种模式越牢固（学得越好），它便越有益于我们形成整体的自我认知。相反，不够成熟的模式并不会经常使用，而且还可能需要有意识地关注才能启用。它们之间连接的强度并不高，很容易被改变；这种模式的变化并不会让我们自身或是朋友感觉我们变了一个人。最牢固的反应模式会被经常使用，而且无须刻意思考（多年形成的偏见就属于这种类型）。它们之间的联系太过紧密，很难改变；因此如果这种模式突然变化，我们就会怀疑是不是身份个性上发生了改变，并且是由某种外部作用所造成的。如果这种变化影响到了一个人最牢固的思维模式，那么人们很可能将其归结于洗脑。

※本章小结

让我们回到前几章讨论过的强制性洗脑和暗中洗脑的差异上来。暗中洗脑的手段，比如洗衣粉广告，可能会改变几个无关紧要的观念，也许是在慢慢加强某种思维模式，将特定的洗衣粉和感官舒适联系起来。这会加强我们大脑中某些突触的活动，但是我们并不会感到自我的改变（尽管总体而言，广告确实极大地影响了人类）。而强制性洗脑是令人恐惧的，因为它威胁到我们最牢固的思维行为模式，即构成我们认知图景的核心特征。洗脑者声称，即使是我们最坚定、最熟悉、最难以改变的信仰，以及思想和态度也都能够被改造一新。如果广告是缓慢侵蚀，那么强制性洗脑则是地震或彗星撞击：是我们内部世界的大爆炸。第 14 章我们将从神经科学角度探讨这种深刻的改变是否有可能真实地发生。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更深入地了解一下信仰和情感，以及我们如何改变它们。

第8章 网与新世界

（鲍西娅）金丝一般的发网诱惑人心，男人见了就会被网罗，远比飞蛾投入蛛网还要快。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洗脑就是改变一个人的信念。因此，为了理解洗脑这一概念，有必要先了解信念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改变信念。在前一章，我阐释了以下观点，精神活动是由大脑中神经元间变化复杂的连接形式来体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连接形式在不同神经元反复相互激活下会变得更具组织性，从而形成固定的思维行为模式。那么这个观点与信念有何联系呢？我将从传统的角度来论述信念（而不是从神经学角度），把信念当作心理构念，寻求心理学对信念的解释。信念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影响因素，以及它们怎样与行为相联系？

信念是什么？

信念是最为复杂深奥的概念之一，我们能够理解它却很难对它下定义。信念涉及事物和情境，以及相信这些事物和情境真实性的人。比如，假如我认为我老板的管理技能像一只电鳗，那么我所用的这个比喻性评价便有效地描述了我老板的行为方式。该信念依附于我其他的信念——包括什么才是优秀的管理方式、我老板过去的行为，以及电鳗的行为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能已经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高度复杂的信念网络。

尽管这个网络很复杂，但这无法保证信念的真实性。新信息也许会要求我修正或废弃其中的一个或多个信念。比如，我本来认为电鳗总是随处游荡，而我对老板管理方式的比喻也正基于此。但后来我看了一档自然历史节目，从中得知事实上电鳗是高效准确的捕猎者。因此，我之前的假设就不成立了。如果我相信电视节目的结论，我就必须改变之前对电鳗的认识，同时还要修正对老板的评价。

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信念发生改变都会增加信念网络的整体的不一致性水平。现在，修正后的信念（“电鳗是高效的”）与其他相关信念发生了冲突（“我的老板像一只电鳗”），这会造成一种压力环境，即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1]命名的“认知失调”。当然，人类完全有能力维持自相矛盾的信念，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堕胎却支持死刑呢？反之亦然。然而，当我们注意到这种矛盾时，心里往往会感觉不舒服，尤其是当这些信念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时候。失调由强烈信念间的冲突引起，它是信念网络中出现信念不一致而要求改变的一种主要动力。信念协调是一种深受欢迎的“商品”。我们认为即使世界不完全合理，但也至少没有什么显著的矛盾，这个观念一直伴随着早期智人长达几个世纪，而且使其受益颇多。因此，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的信念——我们用来阐释世界的方式——出现了矛盾，那么我们便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出现了偏差。错误的信念对信念持有者而言是非常危险的，很多邪教成员及其家庭就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因此，人类常常不遗余力地去移除深层信念中的矛盾。

对于不那么重要的信念而言，要改变信念网络是非常容易的。这种脆弱的信念与其他信念之间的联系往往比较少（我不太了解电鳗，也不会花多少时间考虑我的老板）。最大程度的改变是改变受到影响的信念本身（我必须推翻我认为老板像电鳗的坦率评价），以及与其直接相关的信念（我必须对老板做另外的形容）。当并不关注该焦点时，需要进行调整的程度就会迅速下降（我不必改变我对优秀管理技巧的看法，也不必改变对老板的看法）。因此，脆弱的信念是从属于现实环境的，只要新信息要求其作出改变，那么信念者无需费力就能轻易地改变。

但是，如果受到新信息挑战的信念是根深蒂固的，结果则会大有不同。坚定的信念之所以坚定，是因为它们不断地在各种情境中得以巩固加强，或者经由非常强烈的刺激而形成，或许兼而有之。通常它们被深深地植入大脑的认知图景之中，并且与其他信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虔诚的上帝信仰者对上帝的信仰与其他信念并不是分离开的，相反，这为上帝的存在提供了情感基础。这样的信念很难改变。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有强制的外力作用，信仰者可能主动拒绝接受现实，产生幻觉，走入一个由幻想编织而成的新世界中。将这种情况比作一张网再合适不过了。抛弃一个脆弱的信念就像是砍断这张网边

[1] Leon Festinger（1919—1989）：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主要研究人的期望、抱负和决策，并用实验方法研究偏见、社会影响等社会心理学问题。他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有很大影响。1959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1972年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

沿的一根线,对整张网本身基本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而改变一个坚定的信念则是要砍断这张网的支撑线,网的整个结构都可能被改变甚至被摧毁。

题外话:术语

在本章中,我目前已经使用了三个术语来描述信念之间的联系形式:连接、网络和网。读者无疑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描述与前一章中对模式的描述十分相似。与信念一样,模式也与事物和环境有关。它们与对其造成影响的方法(行动计划)一起,都能体现我们想要改变的世界或自我的某些方面。信念和模式都是神经元间联系形式的具体化,这些联系的集合组成了我们的认知图景。我们还需要一个可以把模式和信念都涵盖进来的术语,一个体现精神事物(信仰、行为计划等)间联系的术语。我用"网"来做比喻(这仅是个人偏好:对我而言,"网"比起"网络"少了一些科技含义,更偏重有机事物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会使用"认知之网"这个概念,或将其简称为"认知网"。

信念的力量

要解释为什么坚定的信念如此坚不可摧,就需要研究促使某个信念变强或变弱的因素。与模式一样,信念的强弱即是其组成部分之间联系的强弱。这些组成部分通过神经元接收输入信号的活动得以体现,不论输入信号是来自其他神经元,还是来自大脑与身体和外部世界的各种界面接口。神经信号从感官输入,通过我们的大脑,然后输出信号指挥肌肉活动。对神经学家来说,经典的研究得最多的例子就是视觉刺激引起的反应。一个苹果反射的光,照射进入夏娃的视网膜,视觉信号刺激到她的视神经,然后这些信号经过大脑区域的处理,成为苹果的图像(不只是苹果的颜色),接着信号传递至运动神经,运动神经转而又把信号传给肌肉,从而导致了摘苹果行为的产生。

但是,这个例子并不仅仅是信号的输入与输出。信号输入可能来自外部感觉器官(比如眼睛)、内部传感器(如保持平衡的传感器或者告诉我们手脚所处位置的传感器),或来自散布更为广泛的部位,比如血管。荷尔蒙、毒品、食物或我们免疫系统释放的化学物质都可以到达脑脊液,而神经元就存在于脑脊液中,进而影响整个脑活动。同样,信号输出可以控制我们四肢的肌肉,或脏、肺周围的深层肌肉,或控制这些器官本身,其方式是直接通过这些器官内部的神经或者间接地释放一些化学物质,比如大脑释放的生长激素。换句话说,信号输入和输出的过程都包含化学物质的释放,这些化学物质可以与神

经元上的受体结合,从而影响神经元。或者也可以说神经元信号本身就是化学反应,因为神经信号就是由我们在第7章所讨论的神经递质传输的。

神经元的这种能力不仅仅受到神经递质的影响,而且还受所在环境其他分子的影响,这意味着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以及认知网(信念、行为计划等)都会因身体状态和外部信号而有所不同。第9章将会提到的情感就是身体内部输入信号的体现,即便就是那些不易被注意到的身体状态也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以压力荷尔蒙和认知之间的关系来举例说明,糖皮质激素能够影响感知压力和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其激素水平会随时间而波动,并且因人而异。一些人("百灵鸟型")的糖皮质激素水平在早上最高,而另一些人("猫头鹰型")则在白天稍晚的时候最高。实验表明,如果强迫猫头鹰型的人在上午作出社会评判,那么比起下午或晚上,他在作评判时更可能依赖于固定模式和偏见。同样,百灵鸟型的人在早上作出判断会比晚上更谨慎周到。换而言之,我们在某个情境下对于信念的选择会随血液中的荷尔蒙水平而发生变化。

神经元间的联系与信号输入的时机有关:如前所述,各个神经元必须被同时激活,其间的联系才能得以加强。神经元间的联系还取决于神经元接收信号的频率和差别性(或"凸显性")。凸显性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特性。对亮光刺激作出反应的神经元不像摄影师的曝光表,它们不会接收刺激物绝对亮度的信号。相反,它们利用与周围神经元间的诸多联系去接收相对亮度的信号刺激——光线与背景间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差异越大,对比越强烈,刺激物的凸显性就越高。这就使得我们的大脑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我们可以在阴暗的图书馆里阅读陈旧的手稿,也可以在正午烈日下仔细研读小说。同时我们也可能,或经常会落入销售人员的陷阱,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对比。罗伯特·西奥迪尼以卖衣服为例写道:

> 设想一个男人走入一家时尚的男士服饰店,他说想买一件三件套的西服和一件羊毛衫。如果你是售货员,你首先会给他看哪一件,才能让他花最多的钱?服装店一般会教其销售人员先卖最贵的商品。但按常识来讲,我们通常认为如果一个人刚刚花了很多钱买西服套装,他可能不愿意再花钱去买羊毛衫了。但其实服装商更了解顾客的心理。服装商的行为恰恰与常识相悖:先卖套装,因为这样的话,在顾客选看羊毛衫时,即使羊毛衫比较贵,但在套装的对比下也就显得不那么贵了。
>
> 西奥迪尼,《影响力》,第13页

频率、凸显性、时机,以及脑脊液中的物质……突触强度,与我们人类本身



一样,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另一个我还未提及的因素是科技——人为改变突触强度。我会在第 14 章再回到这个话题。认知网突触连接的紧密程度也很重要,因为脆弱的认知网往往比牢固的认知网更容易改变。

认知网与人类还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都群居生活。认知网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它们能否被激活取决于周围的环境,通常是刺激物或其他认知网。(正是这种相对主义倾向,即每个事物都会影响其他事物,使得科学,特别是脑科学,如此复杂。)试想一件未完成的艺术作品,比如一幅画、一首交响曲,其中一些部分已经完成得十分细致(高密度的颜料分子,或音符),而另一些部分却还只是初始的轮廓(未上色,或只有部分管弦乐)。在认知世界中,密度是由相关信念的数量决定的。在高密度区域(比如,大脑中与神经学相联系的区域),认知图景得到了很好的规范,认知网结构紧密、内容详尽。而在低密度区域(比如,包含类似电鳗信念的部位)仅有很少一部分认知网在这块区域上有所勾画。

密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输入信号到达认知网时,它们也许会同时激活周围的认知网。越靠近的认知网,就越可能被激活。而且,当认知网和邻近认知网被同时激活的频率越高,它们之间的连接强度就越接近。陆地地形中的坡度通常都比较平缓(地球上的缓坡、丘陵和斜坡比悬崖多得多)。认知图景也是一样,连接强度的坡度变化大多也都是平缓的。出现巨大差异的认知网邻近连接通常出现在低密度区域,这一区域还没有确立很多信念。因此,可以说该区域是我们大脑尚未被探索的阴暗角落,精神风化对这些角落尚未产生多大的影响。

精神风化:神经活动和意识的作用

可以说,习惯的形成与水道的形成十分相似。

伯特兰·罗素,《宗教与科学》

由认知图景类比引发的下一个问题是:认知图景是如何形成的?风化和侵蚀的精神等价物是什么?答案很简单:神经活动塑造我们的认知世界,就像水流塑造地球一样。但这个简单的解释却暗含了重要的含义。要找出这些含义,我们需要将神经活动和流水做进一步的对比,就水及水流方式的五个方面来进行对比,包括水道的大小、水流的畅通程度、水道的数量、邻近水道的变化情况,以及水道的形状。

水道的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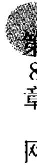
试想一个装满水的水库,有一条出水沟渠(比如,水库边上的一根出水管或出水口)。如果这条出水渠很窄(横切面积小),这时水流相对而言比在宽渠中会流得急一些(这就像水从花园里的水管喷出来一样,因为水管更细,所以水就会流得更快)。再试想如果水渠由易受侵蚀的材料制成,随着流水越来越多,水渠墙就会慢慢受到流水冲刷而侵蚀。水道将变得越来越宽,因此水流速度将逐渐减慢。但当水流得比较慢时,水渠变宽(墙慢慢被侵蚀)的速度也会放慢,当水流速度慢到一定程度时,就几乎不会对水池的墙壁产生显著的腐蚀效果。换言之,水道宽度和水流速度直接相关。假设水流速度相同,越宽的水渠变化越小,越窄的水渠变化越大。如果水库有两条大小不同的出水渠,小的那条出水会比较急(因此可能受侵蚀)。这也是为什么常见的一个防洪策略就是加深河道(如清理淤积的河沙)。

在这个比喻中,水道就相当于认知网,水道的大小相当于认知网的强度,而水流侵蚀作用则相当于是大脑增强突触强度的方法。当受到外界刺激时,比起脆弱的认知网而言,较为稳固的认知网不太可能发生变化,或者说变化很小。我可能只是看了一个电视短片后就完全改变对电鳗的印象,不需要太多努力,也不会感到难过。但要让我对老板的管理技巧改变观念则需要花很大气力,因为那是基于多年观察而建立起来的观点。

水流的畅通程度

当水流过地面,它会冲刷磨平障碍物,使流水更为顺畅。这一点也适用于神经活动。同一时间被激活的神经元会改变其间的突触,这样,信号便可以流畅地从输入信号转换为输出信号。这个过程就是神经学界所称的"自动化",也是我们如何学习包括写作到开车等技能的过程。认知网越牢固——越熟练——信号就可以越快越容易地通过神经元和突触组成的信号通道。

在第10章中我们会看到,大脑有促进信号传输流畅性的特殊机制,即引导信号传输至某一特定区域,这就相当于用拇指清除了覆盖在软管上的灰尘。小女孩在学习写字时,她需要集中精力注意每个字的结构、手的感觉,以及所写的标记。然而,对最牢固的认知网而言,其中的信号传输非常流畅,这时根本不需要有意识的关注就可以生成相应的行为反应。成年女人可以边写字边思考其他事情,如整句话的意义、这句话如何推动其观点、她更愿意做什么,或者下一步她需要做什么。她对怎么写这个字本身并不感兴趣。举一个更极端



的例子,驾驶技术熟练的司机在开车时,可以听收音机、聊天,甚至打一两秒钟的盹,或者以每小时130千米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他们的驾驶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自动化",以至于整个过程并不需要太多注意力。实际上,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正在做的事情上,可能会扰乱信号输入输出的流畅性,原本很流畅娴熟的动作反而变得笨拙费力。

水流与大脑活动这个比喻的一个含义是,比起微弱或复杂的刺激而言,强烈且简单的刺激可以激发起更快速的反应。第10章中,在探讨大脑如何联系感知与动作时,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最简单的刺激能够激起非常快速的反应,快到大脑其他区域还来不及记录这个刺激。我们可以在意识到刺激物或动作本身之前,就触发一个快速的眼动。强度与简单意味着速度,这同样适用于信念。越强烈、越简单的信念越难改变,因为它们的认知网通常在还未达到意识知觉时就已经被激活。它们就像短而直的水渠,我们还来不及阻止,水就已经快速地流过了水渠。

我们依靠大脑的这种能力来处理日常的绝大多数事情,而不需要打扰高层管理区域。如果"思考"是指有意识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大多数行为都没有经过思考。当我们学会一项新技能或一个新观念,它就会逐渐自动化,这样花费在意识上的时间就会减少,从而使得高层管理的额叶皮层区有空闲处理其他挑战。再者,试图产生影响力的人已经开发了很多利用人自动化思考模式的方法,自动化思考是人类在处理重复情境时用以节省精力而遵循的规则。(这也是为什么帕拉康尼斯和阿伦森列举的八个促销词语会包括"快速"和"简易"二词。)稀少=价值;可爱=值得信赖;权威专家的话=真理;这些以及很多其他的启发法可以避免我们陷入当今社会的信息旋涡。然而同时,这些启发法每天都在被零售商、政客及其他试图产生影响力的人利用,因为这些人并不想让我们仔细思考他们的言论主张。

水道的数量

如果水库只有少数几个出水口,那么在一定时间内流出去的水就会比较少。因为水流通过水渠的速度取决于水库中的储水量,所以如果水道数量比较少,水流的速度会更快(因为水库中有更多的水停留更长的时间);而如果水道数量很多的话,水流速度则会比较慢(因为水道越多,从水库中运出更多的水的时间就越短)。因此,防洪最常见的一个策略就是提供多个泄洪渠道。因为水道受侵蚀的速度取决于水流速度,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水道数量多,水流的速度就会更慢,因而水道受侵蚀的速度也就更慢;反之,水道数量

少，则水流速度更快，水道受侵蚀的速度也更快。

这个关于水道的原理同样也适用于“认知网”。强认知网传送的信号比弱认知网传送的同等强度的信号在输出时会更快（但弱认知网更易改变）。而处于该认知图景的认知网数量（认知网密度）非常重要：传输此信号的认知网越多，每个认知网的信号传输活动则越弱，认知网强度的变化也越小。这在心理学上是成立的。接收到新信息时，我更可能在一些我不精通的领域（即认知网的脆弱区域），以及拥有极少当前信念的领域（即几乎没有相应的信号传输通道）改变我的信念。而在我精通的领域，有高密度长时间建立起来的牢固信念；当信号输入至这些区域时，就可能激活一系列相关的认知网，但它对每个认知网的改变却微乎其微。一场时长仅为半小时的自然历史节目就可以完全改变我对电鳗的原有认知图景，但是读一本神经科学的书，尽管可能要花上几小时，却几乎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

邻近水道的变化情况

设想一个水库有两个出水渠道，水从里面流出来。如果一个水渠较宽，通过的水流速度往往更慢，而在窄的那一个水道水流得更快。因此较窄的水道受到侵蚀的速度会更快，进而导致水流速度很快减缓。这就是前文提到的水道大小与水流速度的关系。换言之，较宽的水道加宽的速度慢，而较窄的水道加宽的速度快（渐渐赶上较宽的水道）。最终，两条水道的大小会变得十分相近，水流速度也变得非常缓慢，几乎不会对水道产生显著的侵蚀作用。

认知网也可以达到类似的平衡，即达到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认知网间的连接强度基本不再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邻近认知网的连接强度也会变得与这些认知网相似，如此就会形成更为顺畅的认知图景。有意识地对自身信念进行反思可以促进这个过程，促进认知的整体一致性。举例来说，如果爱德华几十年来都认为同性恋非常令人厌恶，结果后来却发现自己尊敬爱戴的哥哥也是同性恋，他一定会进行一番艰难的反思，使冲突（认知失调）合理化，并消除其认知图景中的倒刺。他肯定会想出一种方式使其合理化，也许他会在原本的认知网中创造出一种子类型“同性恋中也有例外的好人”，他便可以把这种类型套用在自己的哥哥身上。实际上，在他有能力解决这种认知失调之前，这种缓解认知失调的动机很可能就阻止了他对此事的进一步思考。

复杂性

试想一下，水从一个装满水的水库流入另一个空水库，它们之间只有一条

渠道连通。我们已经知道水流的速度取决于水道的大小。然而,水道的形状也可以对其产生影响。连接两个水库时,笔直水道距离最短,这可以让水非常快速高效地流动,很快便可以充满另一个水库。而如果水道是弯曲的,水从第一个水库流入第二个所需的时间则更长。如果这条渠道有很多分支、缝隙或坑洼,那么水会渗透出去,导致水流更慢,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填满第二个水库。换句话说,水道形状越复杂,水流速度越慢。再想一想水流侵蚀水道的情况。比起复杂的水道而言,简单水道中水流速度更快,因此相同时间内,它受侵蚀程度更大,会变得更宽。

和水道一样,认知网的复杂程度也各有不同。简单的观念在与其他观念相联系时,只需相对简单的认知网即可。以我最喜欢举的磷脂分子为例(请记住我本身是个科学工作者;并非先入之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假的)。我认为,尽管通常它被称作血小板活化因子(PAF),但它的名字同样也可能被写作"1-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我的这个信念非常弱,因为我发现"1-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很难记忆。就大脑层次而言,我大脑中与对"1-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进行编码的认知网相关的联想非常少(此刻我仅能够找出两个)。虽然这个认知网看似复杂,实际上却相当简单。如果将其与"洗脑"这个单词的认知网相比,就很容易看出来了。"洗脑"是一个形式复杂、意义丰富、富于联想的概念。思考"洗脑"这个概念,可以引发许多其他认知网的活动;而思考"1-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却很难引发除了疲惫之感以外的其他联想活动。而且这个特殊的认知网存在时间非常短暂,只有在我实际看到这个名字时,它才会被激活,因为我根本记不住它。然而与之相关的两个认知网却并非如此,一个是我 PAF 的认知网,我对 PAF 已经有了一定认识,知道它比较复杂。另一个认知网则更为模糊——即 PAF 的另一个名字"1-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这个带有连字符的一长串东西。每当我想不起这一长串东西时,PAF 的认知网就会代替它。

信念越复杂,其认知网也就越复杂。这意味着越强烈的信念往往越简单,而这又与经验有关。比如认为所有避难者都不诚实这一抽象信念相对比较简单,但却可以非常强烈。而那些更为复杂的信念,通常来说更准确、更具体,比如,一部分避难者不诚实,但多数人是诚实的。简单的信念更容易在认知网中体现出来,并且更容易保留下来。这就是大字标题比哲学思辨更易记忆的原因。有时简单比准确的吸引力更大。因此,尽管英国国家党的政见比较极端(详见第9章),但却在最近的英国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进展。它传达的信息很

简单，（对某些人而言）很有吸引力。简洁使其更容易让人接受。

越牢固、越简单、越抽象的认知网往往会对行为产生越大的影响。想知道原因，我们可以回到通过一条连接通道在两个水库之间流动的流水的比喻上来。在这个比喻中，起先蓄满水库的水量代表由感官刺激（如一束光）引发的大脑活动量。而另一个空的水库则代表直接控制行为的大脑系统。受到刺激，即当水流至第二个水库时，大脑开始作出反应。如果有两条连接通道，一条短且直，另一条较为复杂，那么第二个水库会先接到短直水道（相当于比较简单的认知网）运送来的水（引发相应的行为反应）。

假设验证

对于水流比喻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认知网以及特定信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认知图景是对我们所在世界的反映，由周围的环境和每个细胞中的基因活动类型塑造而成。但大脑是一面很奇特的镜子，它会根据以往的经验，扭曲这个世界的某些方面，忽略另一些方面，过滤它接收到的每一个输入信号。镜子没有记忆，但大脑的历史深嵌于它的每一个结构之中，持续地影响着大脑预测猜想、思索解释以及反应行动的能力，甚至包括它看见的及没有看见的。

有证据显示，人的大脑会根据经验不断产生对周围世界的预测，即假设。人们根据对过去已发生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推导不久将来世界的可能面貌。当我掉了一只玻璃杯，我预料它会掉到地上。类似的预测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对行为所产生的作用。在我听到玻璃杯破碎的声音之前，我的身体会自动往后退，以保护自己。

当外部的行动指令信号从大脑运动皮层传送到脊髓和肌肉时，大脑皮层就会作出假设。同时，相同的信号又传回大脑皮层的感官和调停区域，特别是顶叶——这个能够判断身体空间位置的区域。即将发生动作的信息能够用于判断身体的位置，就像是动作已经发生，是对身体未来位置的预测，然后，一旦动作完成，便可以将这次预测与身体本身的信号进行比较。如果信号匹配，则没有问题。如果不匹配，那么警钟就会响起，大脑会被激发去查找造成不匹配的原因（更多内容见第 10 章）。这一点适用于身体，同样也适用于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我们的大脑持续监视并预测着我们的视觉、听觉，以及通过其他渠道所获得的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

大脑的大多数“假设验证”活动——将实际传入的信号与期待接收的信号进行比较——都发生在接收感官刺激过程的早期，甚至是在输入信号到达大脑皮层之前。感官信息最先从我们的眼睛、耳朵、指尖等部位通过神经传递至



大脑的丘脑区域，丘脑是灰质核的集合（灰质核团），位于大脑中心。丘脑得名于一个希腊单词，意思是卧室或内室。信号从丘脑出发传送到感觉皮层的各个不同区域进行加工处理，这些区域又将信号返还给丘脑，同时比较和评价它们所接收到的输入信号。这个比较过程的作用就像是过滤器，调整大脑皮层生成的预测性信号，使它们与丘脑传来的信号会合，同时调整输入信号使其更好地符合大脑皮层作出的假设。大脑皮层本身也会进行这种调整，因为它自身的许多区域都在不断地参与这种对话。输入信号无疑可以改变接收它们的大脑，但它们自身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改变，接受了调整，以便更加符合人们的认知图景。前面已经探讨过，这些活动的目的具有整体一致性：信号输入输出尽可能畅通无阻。

再回到流水的比喻上来，我们知道流水会找寻最简单的渠道，所以在开拓出新路径之前水流会从现有的渠道流出。同样，输入大脑的信号也会选择已经存在的认知网进行传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再创建新的认知网。相反，此处存在一个外溢效应：如果新的输入信号与大脑目前的结构不匹配，那么这些信号便不能通过现有的认知网传输。那么，要么认知网作出调整，要么就形成新的认知网以运走这些多余的信息，或者输入信号作出调整（比如通过皮层下的过滤器作出调整），直到它们更符合大脑的预期。到底出现哪种结果取决于现有认知网的连接强度。脆弱的认知网在遇到极具挑战性的输入信息时就会发生改变；前文已经提过，认知网屈从于现实。而连接强度大的认知网则会让输入信息作出调整，也可能形成新的认知网以解释新的信息。在这里现实屈从于大脑的期望。人们在接受挑战性信息时的适应程度似乎有所不同（当然这也取决于被挑战的对象），但总体而言，容忍的限度要比我们所期望的更低，似乎人类并不能承受太多现实的重压。

许多心理实验显示，人们的确能够经常看到他们所期望见到的事物。同样人们也可以非常巧妙地通过解释来消除一些令人讨厌的事实。你曾经有过因能言善辩而使自己脱离麻烦的经历吗？你是否有过面临同事的突然挑战，而后对自己面临挑战时的应对自如深感诧异吗？惊讶于自己令敌人哑口无言而又不落俗套的辩论吗？对所有人类文化而言，叙事的能力是最基本的能力。想要构思出连贯故事的欲望——一致性的另一方面——似乎是人类的普遍特征。

与其他特征一样，在某些情况下这也可能变得极端。一些脑部受伤的病人在编造故事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能力，这个过程被称作“虚构症”。这个让人不愉快的词汇——因为这些病人并不是故意在撒谎——指的是当遇到难解的信息时，“虚构症”患者可以作出极为复杂、让人难以置信的解释。比如，某些

类型的中风患者会患上一种“病觉感缺失症”，这些患者感知不到自身受伤的程度，甚至是全身瘫痪也无法感知。当遇到无法面对的情景时，比如，医生让他们走路时，他们便会立即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遵医嘱。另一个经典的“虚构症”病例是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②]所描述的一名科尔萨可夫综合征患者，他由于酗酒引起大脑受损，并且影响了他的记忆。这位病人对萨克斯完全没有记忆（尽管他以前见过医生），多次把他认错，对他的身份和职业作出了一系列不正确的推论。对每一个结论（萨克斯的身份和职业）他都有一套不错的说辞，但却完全不记得以前犯过的种种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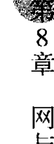
我们认知图景当前的状态不仅塑造着我们接收的信息，同时也影响着我们对这些输入信息的反应方式。大脑对信息的过滤并非始于皮层下的中转站，而是早在此之前，伴随着我们所采取的保护行为产生，这种保护行为是为了让世界变成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正如哲学家们所说，信念是“行动的理由”。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我们行动的理由，信念和认知网都可以为之提供理由。我们更愿意和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获取我们所认可的支持消息，而不愿意和那些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在一起；我们喜欢阅读书籍，但“不愿受到他人影响”；我们会忽略或避开那些可能戳穿我们精心编织的认知网的信息。

内隐的信念与易犯错的信念

将信念设想为认知网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大脑功能的各个方面。比如，在第7章我们区分了活跃自我与内隐（休眠）自我，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之间的区别理解成有神经活动通过的认知网和当前还没有被激活的认知网之间的区别。这种活跃—隐性的区别同时也适用于信念。当你在打电话时，你会相信听筒里传出的声音就是跟你说话的人的声音：在你的大脑中，基于对接电话人过去的认识而形成的认知网会被激活。同样你也深信放下听筒并不会致使什么可怕的东西从你左边鼻孔跑出来，但是这个信念一直是内隐的，直到你读到这本书才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并表达出来。

很重要的一点是，像其他认知网一样，信念能够在人尚未意识到的情况下便可形成并影响行为。许多影响企图正是利用了人脑的这一特点而暗中塑造信念。当你的注意力被推销员的喋喋不休或广告中的明亮色彩所分散时，你的大脑正在生成新的认知网或者加强已有的认知网，这些认知网代表着商品与某些

② Oliver Sacks（1933—　）：英国伦敦著名生物学家、脑神经学家、作家及业余化学家。他根据对病人的观察写了多部畅销书。



吸引人的特质之间的联系,比如美丽、财富、身份、性感。许多偏见也是这样形成的,通过反复经历家人、朋友、同事或媒体对偏见对象的消极反应,从而造就了偏见。如果社会暗示非常明显(比如他们的出处具有权威性),或者与强烈的情感相连,那么相关的认知网就会极其牢固。然而,怀有偏见的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暗示,因此会意识到自身的消极情绪(当然,她可能会将这种暗示当作一种偏见,即看作她自身性格中需要摒弃的方面,当然她也可能不会这么认为)。如果这种暗示不很明显,但却非常频繁(或者假设这个偏见在个体很小的时候便已形成),那么怀有偏见的人很可能并未意识到(或者之后才记起)这种暗示,继而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偏见。这种成见很难改变,因为不仅需要改变这种根植于内心的信念,而且首先要让这个人认识到自己确实有偏见。

这个方法的另一含义是信念和记忆(作为认知网的例证)由相同的东西构成,即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因此,信念的表现方式应该和记忆一样。比如,信念应该受到第 7 章中讨论的记忆"七宗罪"的影响,事实的确也是如此。如果信念未被加强,它们的确会随时间逐渐淡去(易逝性);但强烈的信念,比如因身体受伤而建立的信念,可能一直维持下去(持久性):如果一个孩子曾被狗咬过,那么即使后来他见到几条非常友好的狗,他仍会认为狗十分危险。错误归属罪、易受暗示罪、偏见罪也都可以影响信念,正如不真实记忆综合征一样:孩子,甚至是成人可能在他人质问的基础之上相信不真实的事情或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注意力涣散和记忆障碍罪不仅发生在记忆之中,也同样存在于信念里。举例来说,有时我们对某件事情抱有一种观点,但却想不起来,这种感受让人十分不安。此种情形下的信念和记忆是很难区分的。

信仰的力量

在第 2 章中,我引入了虚无思想这个概念,这种思想通常是抽象模糊,并且高度危险的,因为它们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激发起强烈的情感。虚无思想也被编码成为认知网的一部分,这些概念本身也许各有差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与人体外部输入信息的直接联系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但却可以从人体内部接收强烈的信号,大脑将这种信号诠释为情感。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探讨情感这个概念。目前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虚无思想能够从接收来的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的信号中(比如,情感也许与记忆或白日梦有关)获取能量,它不会接收直接从外部世界传来的信号,因为这些信号可以用来核查现实。这些认知网的强度并不依靠外界信息得以巩固,所以针对这些信息的争论并不能对其产生影响。正是信仰的这种"因为不可能,所以我相

信”的特质,使它不受逻辑和现实的影响,因此,虚无思想具有强大的毁灭性,这对想要成为洗脑者的人极具吸引力。

关于宗教的当代科学评论家,比如理查德·道金斯和苏珊·布莱克莫尔[③],他们主张信仰同宗教是同义词。他们将宗教看作一种恶意的思想控制,一种精神疾病或者文化毒瘤,应该摒弃。比如,布莱克莫尔在《模因机器》中写道“战争史主要就是一部人类为了宗教互相厮杀的历史”,她主张科学高于宗教,因为“科学的核心在于需要验证任何观点的方法。如果一个理论是有根有据的,那么科学家必须首先预测可能发生什么,然后进行验证”。换句话说,科学观点不能太抽象,必须建立在假设验证的基础之上。相反,宗教“建立了一套关于世界的理论,然后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些理论接受验证”。这些理论观点必须非常虚无飘缈,任何与真实世界的接触对其而言都是潜在的威胁。如果说科学是一个正常运转的大脑,那么宗教就是有精神疾病的大脑。当然这是有些偏激的指控。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必须对明显以偏概全的危险置之不理(就像我在整本书中的态度一样),因为科学和宗教都包含了大量的实践和信念。那么以上这样的指控公平吗?

当然不公平。很多宗教实践并不抽象,而与实际生活相关,考查处理社会问题的新方法,验证这些新的解决办法,学习应用世界各地的观点。宗教的核心思想肯定是抽象的,比如我们如何能够验证上帝的存在这个观念?但这不意味着信仰者就脱离了现实。我在第2章中已经说过,许多宗教人士扎根于世界各地,帮助弱势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许多人发现自己的宗教信仰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一些人丧失了信仰,一些人会发现新的信仰。如果宗教信仰完全飘缈、完全脱离现实,它又怎么会被经验所改变呢?

思考一下神经学中的几个核心理念:大脑可以处理信息,能够生成精神生活的每个方面,因此科学最终能够治愈我们所不欢迎的有关自身的任何方面。有什么实验能够证明大脑处理信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或者能够证明我们自身有哪一方面是脑科学最终所不能改变的?如果有人提出某项智能——X过程——并且声称它完全不受大脑变化的影响,他们也不会被奉为这项所谓新科学范式的奠基人。实际上,由于大部分科学期刊都十分保守,因此这种研究发现最不可能被发表。人们会认为要么他们是错误的,要么是疯了;或者X过程根本不存在;或者说即使他们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人们也会说“实际上在X

③ Susan Blackmore(1951—):英语自由作家、演说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文化基因的机器》(1999)。



过程期间大脑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是目前的技术无法侦测”。和宗教一样，神经科学本身也有核心的不容挑战的理念，必须有一些公认的基础理念才能使其得以发展。虚无思想并非宗教信徒的特权，无神论者和科学家也未能豁免。

正如第1、2章所述，重要的是思想的本质——认知网的结构——而非具体的内容。不论是道德观念、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还是科学观念，每一个信念都有自己的狂热追随者。伯特兰·罗素将纳粹主义定义为“新宗教”，但他为了切合自己的无神论主张，过分延伸了该词的语义，以致完全歪曲了“宗教”的含义：这些信条中完全没有上帝、灵魂或来世。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固守并不仅限于政治。科学家们对自己宠爱的理论也常怀有强烈的热情，从而导致盲从盲信。在这种情况下，人所出现的症状包括：通过打击提出证据之人来贬低与之相抵触的证据，非理智地对待批评，对冲突的观点（如宗教）作出浮夸的论述（通常会揭露其无知，因为发言者言辞中的无知是不可原谅的）。虚无思想是人类大脑构造方式的一种共同结果。即使这些思想是失败的，我们所有人还是无法摆脱其影响。

我之所以说“即使”，是因为这些思想本身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并不总令人厌恶。任何数学家都肯定抽象思维的价值。至于模糊性，我们所钟爱的许多文化艺术品都因此而魅力倍增，比如《蒙娜丽莎的微笑》，摩里茨·科奈里斯·埃舍尔[4]的“不可能存在的建筑”，以及亨利·詹姆斯[5]的《螺丝在拧紧》，等等。虚无思想，包括来自宗教的思想，使生命得以升华。多数情况下，它们赐予人们反抗压迫与折磨、渡过困境、抓住机会痛改前非，甚至是宽恕原谅的力量。可以说没有信仰的世界会缺少很多幸福的色彩，当然同时也会减少很多苦痛。世界上即使没有宗教可能也不会有多大不同，因为对非神秘的意识形态的信仰冲动仍然存在。

从意识形态信念角度来看，宗教与信仰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无论在实验室或大学，还是教堂、清真寺或犹太教堂，都存在着教条主义，也有宽恕包容。科学方法也无法保证我们能够抵制虚无思想，无法阻止其带领我们走向极端。反对对人有害的封建迷信是应该的，但如果最终把科学本身又变成神的替代品就不可取了。因为科学过于抬高人类理性的地位，分离事实与价值观（见第13章），因此科学权威有两个十分危险的主张：道德无关紧要，科学家唯一的追求应该是真理。这就很容易将科学的权威扩大化，使得科学家的偏见也可

---

④ M. C. Escher(1898—1972)：荷兰艺术家。

⑤ 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作家，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能成为权威，因为（既然无关道德，那么其他层面的意见也就起不了任何作用）他们身上再无其他压力来要求他们验证自己的信念。因此就出现了一些灾难，如“科学”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所谓的“心灵论”——歧视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科学依赖于“输入决定结果”的研究方式，大部分的实验都十分复杂，并且有待商榷。如果提供输入数据的观点（正在接受验证的理论）引发了强烈的情感承诺，那么科学家们很可能会按自己的喜好来阐释这个理论。大多数宗教都会要求其信徒崇尚道德约束、自我认知以及谦卑谦逊，而科学的权威却不受这些限制，因此科学家可以脱离苏格拉底式的自我反省，将个人的褊狭当作公认的真理。

个体差异：“一个人的信仰是另一个人的理性”

从一本关于洗脑书籍的角度来讲，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带给我们有关信仰的最有趣的启示之一就是个体差异的观点。正如一些人的记忆力比另一些人更好，因此也有可能某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易形成新的信念，或更容易改变自己的信念。和记忆一样，信念的坚定程度各有不同。然而，有些人的性格本身就极为教条化——比起他人，他们有更强烈的意愿去相信（任何事物）。教条主义的程度是由特定突触的功能差异导致的，也有可能由遗传变异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信仰在将来也许可以被人为操纵。基因可以影响信仰的强度吗？这唤起了人们有关基因可以作为改造原教旨主义之灵药的想法，可以治愈所有的极端主义分子。

1960 年，心理学家密尔顿·罗基奇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书，叫作《开放心灵与封闭心灵》，副标题是“对信仰体系和人格体系本质的调查”。这本书探讨的是教条主义，或者说封闭意识。那些在教条主义测试中得分较高的人通常会对新观点产生排斥甚至抵触的情绪，对未来感到焦虑，不能容忍模棱两可的观点，思维方式更为固定，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够灵活。人们发现教条主义与智力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但它对创造力却有负面的影响。教条主义的人通常能够抵御外界的影响，因为他们自身的认知网非常牢固：罗伯特·利夫顿写道，中西思想改革幸存者中最成功、受到创伤最少的人是汉斯·巴克尔，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高度教条化的人可能非常具有个人魅力，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他们对自己信仰的强烈自信对那些意志不太坚定的人来说极具魅力，尤其对那些需要寻求安全感的人更是如此。

相反，教条主义测试中得分较低的人会对新观点展现出具有创造力和开放的心态，以及直观而灵活的思维方式，对外围群体更加包容。同时，这些人



在面对他人的影响企图时，会显示出更高的暗示感受性和易感性。他们的自我意识比较薄弱，他们的信仰更易受到质疑。这种人的魅力往往来自于他们的创造性，而非确定性，来自于他们思想的火花，而非自我信仰的光芒。

我们很想对教条主义量表的端值作出评价，很想赞同叶芝的那句诗句“精英们信心尽失，败类们却满怀激情”。但是情况远比这段描述要来得复杂。高度教条主义的人可以变得极具魅力，尤其是在社会极不稳定的时期，这种个人魅力非常具有号召力。（温斯顿·丘吉尔将英国内阁从支持和平的犹豫不决转变成为对希特勒的正面对抗，并且严词拒绝了德国发出的停战协议，从而完全改变了1940年的历史走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义性高的人往往负责执行决断，而教义性低的人负责思考如何决断。许多人可以辨认出团队工作时小组中思考者的典型形象，他们点子很多，但脑中却没有“截止期限”这个概念。如果他们被迫必须要作出一个有价值的决断，这些天马行空的思想者也可以改变世界，但在此过程中他们很可能把自己的同事逼疯。当然，教条主义和创造力并不是独立于时代背景而存在的。它们与周遭环境和人格特质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以下这样的最终结果：心不在焉的教授或魅力非凡的邪教领袖，严格的管理者或令人厌恶的强迫症患者。不论极端或中庸，都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本章小结

本章展示了从神经科学角度阐释信仰的有关观点，我相信这个角度可以提供很多新鲜的见解，但同时也会让人感到不安。是否真如这些观点所示，我们是活在自己过去记忆中的囚徒，被历史和现在的认知所操控？那么自由意志，这个存在于如此多有关人性理论核心之中的概念又如何呢？我将在第11章探讨这个最有力的反面观点。

洗脑之所以让我们害怕是因为它提出了以下观点，那就是我们最强烈的信仰——将我们所有精神集中在一起的“导绳”——无需经过我们同意，就可以被他人扭曲甚至摧毁。对大脑而言，这种操控可能吗？要找出答案，接下来我们必须探寻人脑的两大功能：情绪和停下来思考的能力。

第9章　压倒一切的情绪

夜沉沉，
让我窒息，
压迫我心，
令人惊慌，
恐惧在靠近，
罪恶冰冷地停留在皮肤上，
感觉到它的到来，
我整个身体已经没了力气，
不能把它撵走，也无法逃离，
惯常的理智，或寻常的道理，
都带不来呼吸需要的氧气。
想从这清醒着的噩梦中醒来，但又无法醒来，
我仍在这噩梦中梦游行走。

埃斯库罗斯[①]，《奥列斯特：阿伽门农》

情绪是洗脑者可利用的最具威力的一件武器。第2章我们已经提到过，唤起强烈的情感就能够把一个群体团结起来，可以使令人质疑的观点获得赞同，有时甚至能引起致命的后果。即使是在温和的影响方式中，情绪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到底是情绪的哪些方面使得它们受到洗脑者如此重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情绪对大脑所产生的影响。

---

① Aeschylus（前525—前456年）：古希腊悲剧诗人，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一起被称为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有"悲剧之父"的美誉。代表作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复仇女神》等。

人类共同的感觉

让我们回到上面所引用的《奥列斯特:阿伽门农》当中的诗句上来。预言家卡珊多拉警告说可怕的厄运将降临阿伽门农和他的家族,但在她发出警告之前,阿伽门农家族就察觉到有些不妙。埃斯库罗斯早在2 500年前就已创作了这部悲剧巨著,但其中所描述的情绪还是能立即被我们所识别。23个世纪后,对于埃德加·艾伦·坡的成名作品,比如《陷阱与钟摆》和《厄舍古厦的倒塌》,我们仍可以十分容易地了解其中人物的感受:

> 我立刻站起身来,感觉每根神经都在颤抖……每个毛孔都在流汗,额头上渗出了大颗的冷汗。
>
> 艾伦·坡,"陷阱与钟摆"
> 《埃德加·艾伦·坡作品全集》,第248页

> 我使劲尖叫……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肺好像被一座山压着,不停地喘着气,心也跳得厉害……
>
> 艾伦·坡,"过早埋葬"
> 《埃德加·艾伦·坡作品全集》,第267页

> 为什么……连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身体里的血液似乎也凝固了?
>
> 艾伦·坡,"贝蕾妮丝"
> 《埃德加·艾伦·坡作品全集》,第648页

怦怦跳动的心脏、毛骨悚然、窒息感、血液沸腾或凝固的感觉,这是两个处于截然不同人类历史时期之人笔下所描述的"恐惧",但他们使用了非常近似的词汇。这两种描述都符合神经学专家约瑟夫·勒杜[②]恐惧研究中的记录(《情绪化的大脑》)——"心脏跳动加速,血压升高,手脚出汗"。换言之,恐惧与某些生理反应相关(包括面部表情),这些生理反应特点鲜明又十分稳定,使得情绪跨越了时间和文化的鸿沟。

其他情绪,比如愤怒和厌恶,同样也由特定的身体反应体现出来。这些反应非常一致,因此,从达尔文开始便有研究者提出,某些情绪——至少恐惧、愤怒、厌恶、喜悦,也许还有悲伤、惊讶——是人类共有的特征。也许表达这些情

② Joseph LeDoux(1949—):神经科学家,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教授,他也是恐惧和焦虑神经科学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记忆和情感的生物学基础,尤其是恐惧的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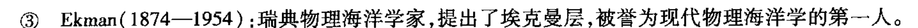
感的情境有所不同,比如日本人在某些场合会压抑自己的情感,但美国人却没有这样的禁忌。但是所有种族表达情感的方式的确相差无几。20 世纪 60 年代,埃克曼[3]等将西方人面部表情的照片展示给不识字的部落族民(婆罗洲的萨东人和新几内亚岛的福尔人),他们以前与西方人几乎未曾接触,但却能够辨认出西方人的情绪。当他们被要求根据情境做出相应的典型面部表情时(比如,"你的孩子死了""你的朋友来了你很高兴"),他们的面部表情也能很容易地被西方人辨识。

达尔文在 1872 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一书中提到,许多与基本情感相关的身体反应不仅为人类所共有,也为其他动物所共有。愤怒的狗和愤怒的人都会露出牙齿,大声咆哮。而受到惊吓的猫会竖起全身的毛,正如埃德加·艾伦·坡描写的头发竖立一样。鉴于人类和动物在情绪表达方面有极大的相似性,以及婴儿很小就会表达自己情绪的事实,达尔文便认为这些基本情感的外在表现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反应。换句话说,情感与身体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正如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4]所言:"假设我们处于某种强烈的情绪之中,然后把所有身体反应从意识中抽离,我们会发现其实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任何构成这种情绪的心理本质,所剩下的不过是感知冷漠的中性状态而已。"

感觉和生理机能

情感具有共性这一说法引出了一个发人深省且争论已久的问题。是先有情感而后引发身体反应,还是先有身体反应而后引发了情感?笛卡尔学派认为,是心理活动引发了身体反应——因在前,果在后,所以先有情感。然而,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正好相反,威廉·詹姆斯就是其中的代表:

> 与之相反,我认为对某个事件有感知之后才紧接着出现身体上的变化,我们对相同的身体变化所产生的感觉就是情感。常识告诉我们,当我们丢了财物时,会因难过而哭泣;遇到野熊时,会因害怕而逃跑;被对手羞辱时,会因生气而反击。这些假设的顺序是错误的……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因为哭泣所以感到难过,因为逃跑所以害怕,因为反击所以生气,而不是像那些例子中所说的,因为我们感到



③ Ekman(1874—1954):瑞典物理海洋学家,提出了埃克曼层,被誉为现代物理海洋学的第一人。

④ 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是教育学家,实用主义的倡导者,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最早的实验心理学家之一。



难过、害怕、生气，所以才哭泣、逃跑、反击。

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第 1065-1066 页

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在他的三部曲《笛卡尔的错误》《感受发生的一切》《寻找斯宾诺莎》中有很多关于情感的深刻阐释。他认同詹姆斯的说法，情感的外在表达先于心理活动。达马西奥将"情绪"这个词只用做外在的身体变化，而用"感觉"来表示这些变化带来的内在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意识层面的感觉只是大脑活动的副作用，就像大马路上的一只蜗牛，没有任何作用和影响力。

达马西奥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情感可以快速为我们的思想和感知打上正面或负面的标签，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周围的世界。达马西奥将这些标签称之为"身体标记"，意为来自身体的标签，因为他认为当我们把某一特定的身体状态与特定的心理活动联系起来时，就会出现"身体标记"。就像孩子被黄蜂蜇过后往往会对黄蜂产生负面感受一样，当一个人因为同事的无能而生气时，他就会形成对这位同事特有的认知网，这张认知网不仅将同事与无能关联起来，而且还会联系生气时的生理症状：心跳加速、下颚紧绷等。当他下次碰到这位同事时，相应的认知网会被再次激活，导致心跳加速、下颚紧绷，进而影响对待这位同事的态度方式。我们常说重现我们的记忆，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对情感的记忆：我们会发现自己可以再次被记忆中的愤怒所激怒。在上述关于无能同事的例子中，记忆中的情感可以让一个人提防将来再与这种无能的人合作，但同时也会阻碍与优秀同事建立关系。

记忆捷径与备忘录

情感，换个说法就是记忆捷径——用社会心理学的语言说，即情感是启发式的。情感可以鼓励或告诫行为，提醒我们上次遇到该情形时我们身体的特殊感受。我们的经历、反思和分析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能完全被情感压制，抑或在还未意识到之前就已经受到它们输入信息的引导。实验表明，即使人们没有意识到情绪的刺激，也会受其影响。比如，当人们看到以往没有见过的抽象符号时，他们对于这个符号的喜爱程度可以用以下方式判断：当展示每个符号时，人们会闪现笑脸还是苦脸。尽管脸部表情出现、消失得非常快，甚至察觉不到，但当展现的是笑脸时，人们通常会更喜欢之后出现的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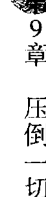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情绪。例如第 2 章提及的情绪感染，可以让人们的动作、面部表情和对话同时而快速准确地进行。根据詹姆斯和达马西奥的观点，因为这些身体变化先于情绪感受而发生，社交活动的参与

者发现自己的情绪会受到交流对象情绪的影响。然而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自身感染、模仿以及反射对方情绪状态的程度。类似的情绪共享是一种社会压力,可以促进社交的和谐与归属感。共享的情绪可以彼此促进。情绪的社会表达并非随意而行、缺乏理性;相反,它有助于达到非常实际的目的。

与信念一样,情感不易受外界影响的特质有助于提高人类活动的效率。我们没有时间思考每一个感受,我们也没有时间分析每一次感知或认识,因此记忆捷径可以有效防止我们陷入错综复杂甚至可能致命的停滞中。然而,每个管理者都知道,委任他人有利有弊。同样,信任我们的情感可能让我们远离现实,甚至可能带来危险,尤其是当我们周围有人知道如何为了自身利益而操控情感之时。比如,一个英国非主流政党所发布的宣言中便可以找到类似的操控行为:

> 从本质上来说,政治避难者被"驱逐"在我们的社区是政府的过错。英国国家党议员将竭尽所能避免政治避难者被驱逐……尽管我们认为这些政治避难者没有权利留在英国,但既然他们已经来了,那么我们将坚持"政治避难者必须偿还他们在当地社区所享有的利益",去清扫大街或是代表社区完成其他任务。但这些任务不能以牺牲当地清洁工的工作为代价——事实上还有很多垃圾需要清扫。这些工作并不代表他们拥有合法的居住权。
>
> 英国国家党,《英国议会选举宣言》,2003 年 5 月

让我们暂且把情绪搁置一旁,从认知网的角度来思考这些词语。第 8 章已经提到刺激的时机、强度和频率对加强心理联想的重要性。在上述简短的摘要中,"政治避难者"一词出现了四次;比它出现频率更高的只有"的""了"等虚词,这些常用词汇我们通常都不会太注意。同时,读者的大脑还在接收情感化的言语刺激。积极词汇比如"我们""我们的""当地"和"代表"可以把读者吸纳到英国国家党组织内。消极词汇如"驱逐""垃圾""过错""代价"将身处组织外的政治避难者进一步排除在外。注意文中是如何强调"垃圾"的比喻用法的,最开始用的是"被驱逐",然后更为明确地说政治避难者应该去做清扫大街的体力活,清扫英国良好市民制造的垃圾。再看文中出现的抽象概念:"权利""社区""合法""政治避难者"。文中完全没有对骗子和医生、经济移民和酷刑受害者进行区分。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篇散文,它用尽一切努力在你脑中植入一张认知网,向你灌输所有政治避难者都是废物的观念。(你也许希望从相反的角度来分析这段话。)由某些词汇引发的情感会加强那张认知网。换句话说,即使读一篇文章只激发了很微弱的情感,也能加强相应的认知网。



强制洗脑过程中产生的情感,比如在邪教组织中,远比读文章更强烈。因此,它们加强认知网的能力也愈强。

情感源自身体状态。这种状态常常会被一些事件所改变,比如激素释放。举例来说,紧张或危险的环境中人体会释放肾上腺素,让身体准备好与敌人对抗,或是逃离捕食者。然而,尽管激素可以被很快释放出来,但它们像放射性元素一样也有半衰期,这意味着它们的作用不会立即消逝。因此,我们会发现在一阵激烈的划船运动之后,其他参赛选手早已离开,但我们的身体却还一直在颤抖。这也是政治宣传运作的方式。情绪化的语言的作用会持续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影响我们对相近词汇的认知(比如"政治避难者"),就像人们不易察觉的苦脸或笑脸会影响我们对于抽象视觉符号的评判一样。时间上的延迟会引发错误的联想,并且将思想认知与我们此刻的感受联系起来,形成认知网。这种认知网的形成可能由引发这些思想或认知的事物所引起,也可能不是。我们在经历这些情感时所激活的任一认知网都会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感觉没有区别。

但是,如果人们情绪上有所不安,通常并不是因为他们担心会对政治避难者产生过度的消极看法。我们所担心的是情绪的力量。这与对洗脑的担心是相同的:我们害怕失去对自身的控制。因忌妒而发怒的男人可以杀死自己心爱的女人;羞耻心和恐惧可以让母亲扼杀自己的私生子。抑郁产生的绝望情绪可以让人崩溃到自杀。这样看来希腊人的描绘就不足为怪了,希腊人把情绪描绘成试图逃脱理性枷锁的野兽,或者描绘成把人逼至毁灭的复仇女神。我们的恐惧是害怕被一扫而空,害怕发现自己处于《奥斯列特》唱诗中所控诉的情境,"惯常的理智,或寻常的道理,都带不来呼吸需要的氧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因一己私利而破坏所有。

为什么有些情绪那么不可抗拒?一部分原因很可能如达尔文所言,人的基本情感都经过了长期的进化。遇到紧急情况时,我们等不及大脑充分处理所有的信息,因为这时反应速度能够决定生死,所以情绪可以作为紧急情况的先行反应开关。受到强烈情绪的控制时,我们无法思考,不能把情绪搁置一旁等到方便时再作处理。恐惧等消极情绪尤其让人难以克制。心理学家亚历山大·贝恩[⑤]称:"当受到强烈情绪控制时,我们会无视所有与之不一致的事物

---

⑤ Alexander Bain(1818—1903):苏格兰哲学家和教育家,是心理学、语言学、逻辑学、道德哲学和教育改革等领域的重要人物。他创立了《心灵》(*Mind*)杂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心理学和分析哲学杂志。

……情感的洪流会卷走一切,当时所有反对意见都会消失,好像它们从未出现过。"让我们回到前一章用到的比喻,情绪就像我们脑中积蓄的洪流。行动可以释放情绪的洪流,能够平复心绪,减少强烈情绪带来的不和谐。

压力释放伴随着情绪宣泄,其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开发出如此多激励情感文化的一个原因。不过这种情绪宣泄通常都是以相当保守的方式进行的,这倒也无妨:引发情绪的生理变化通常都很短暂。从进化角度看,情绪的作用是为了预防突发事件。比如,为了逃离险境而承受血压陡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完全值得的。但是,如果这种情绪反应被长期刺激,它的负面作用就会带来越来越多的伤害。压力有害的说法是正确的:持续的高压会增加患抑郁症和传染病的几率,并加重冠心病病人的病情。如今,人类被捕食的危险已经很小了,但正因为人类具有把抽象概念与强烈情绪联系起来的能力,因此我们在面临祖先可能难以理解的情形或事物时,却能够感受到强烈的压力。

给大脑施压

当我们感受到压力时会怎样呢?从生理学角度来讲,压力是一个多层次现象。当某人第一次遭受一种压力刺激时,他的大脑会通过激活全身的神经,提升心率,释放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进行应对。这些激素可以增加肌肉组织和大脑中的血流量,增强神经元对输入信号的敏感度,放大瞳孔使眼睛更好地察觉临近的危险,以便人体做好"战斗或逃跑"的准备。其他诸如皮肤、消化道等区域,由于并不急需血液来维持新陈代谢,因此这些区域的血液会减少以节约能量。接着会释放糖皮质激素,它能改变新陈代谢速度以促进脂肪分解,释放能量,让更多葡萄糖进入大脑以补充能量。上述所有活动都有助于我们躲避捕食者。但如果压力持续刺激人体,居高不下的肾上腺素和糖皮质激素就会损害心脏和肌肉组织,使血压上升,免疫系统衰弱,使得这个人更易遭受疾病的感染。

上文已经说过,压力可以提高大脑的警惕性,它让所有神经元都处于高度警备状态以接收任何外界的输入信号。通常情况下,大脑会在信息到达大脑皮层前将许多信息过滤掉,但在压力反应过程中,所有过滤器都会放行,让更多信号涌入。然而,神经元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当处于持续的高度警觉状态时,它们会筋疲力尽,对输入信号的反应越来越少。这是我们大脑偏好变化和新奇事物而带来的负面影响:神经元对输入信息的变化非常兴奋,但如果这个信号一直保持不变,它们便会失去兴趣。比如,"美国总统演唱约翰·

亚当斯的歌剧《尼克松在中国》"这一则新闻就颇具神秘感。广告商早在几个世纪前就明白新奇的吸引力,并且至今仍在利用它:帕拉康尼斯和阿伦森在《鼓动的年代》中写到"含有新鲜、快速、方便、改良、时髦、惊喜、令人惊叹、进口等词的广告能售卖出更多产品"。这八个词中,"新鲜""改良""时髦""惊喜""进口"等五个词,通过明确地强调变化来吸引我们的眼球。

但是过多的新信息会让我们感觉负荷难载,尤其是不断有新信息呈现时。人体进化出反抗或逃跑的反应并不是为了应付长期的压力,而是为了处理暂时的危险。前额皮质被认为是处理压力反应的主要部位,在面临高压事件比如虐待时,该部位会十分脆弱,尤其是在幼年时期。这与洗脑有着密切的关系,洗脑正是通过施加压力的方式运作的,在第 10 章我们将知晓前额叶区域能够很好地防御试图施加影响的技巧。洗脑过程中产生的压力可以攻破这些防线。

研究洗脑的评论家称,某些受害者更容易应对。这是因为个体的压力反应因人而异。这种差异源自于基因差异和个人经历。基因在子宫中就开始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人的成长。尤其是年幼时期的压力(甚至早至母亲在怀孕期间受到的压力)可以增加前额叶皮质等大脑区域在今后遇到压力刺激时的敏感度,并且可以为人的一生定下其焦虑水平的基线。个体压力敏感度差异的一个鲜明例证就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PD)。例如,在 APD 男性患者和非 APD 男性患者的脑图像研究中,施加给被试一个紧张性刺激(被要求在四分钟内准备发表一个演讲),在此期间研究人员测量被试的基本压力反应,比如心率、前额皮质的大小。结果患有 APD 被试的前额皮质明显更小,感受到的压力更小:他们的心率平均值要比非 APD 患者慢 8 次/分以上。

尽管强烈的情绪会造成生理伤害,但其力量可以压制所有的理性思考,这一点有时也被看作是情绪自身的一个益处。想得太多会让人丧失决断力,有时还会引发抑郁。强烈的情绪会将意识焦点缩小至直接正面的短期思维方式,屏蔽长远的通常比较消极的观点,例如滥交的害处、吸烟的危害,以及如果你真揍你的老板会产生的麻烦等。如果我不想为我的行为后果感到烦恼,那么让自己变得情绪化是一个避免去想这些后果的好方法。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情绪都有这种作用。适度的情绪在助长偏见的同时,也会对认知图景的形成提供有价值的指导。达马西奥在《笛卡尔的错误》一书中的观点正是围绕这个主题,情绪常常可以帮助人理性地处理事情,促进社会有效运转。机器人、计算机和仿真人被视为逻辑运算的典范,但并没有多少人真的想成为机器人、计算机和仿真人。我们有理由相信情绪是人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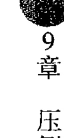
情绪借口

情绪让我们失去自控能力，做出自己不愿做的事（即在清醒时刻不会做的事），情绪的这种特点众所周知，所以在举棋不定之时可以利用内心情感来作判断。这样的判断有效吗？在这里，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后知之明和阐释学在评估自身情绪状态时的作用。例如，一位经理极力要为自己辱骂秘书的行为进行辩解时，他会回忆自己当时的愤怒情绪，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把当时的行为重新解释成是瞬间的强烈愤怒冲昏了头脑。他可能只是在说谎，但由于回忆情绪可以强化这种情绪本身，到最后他可能真的认为自己只是被激怒了。他是否相信自己是被情绪所控而无法停止对秘书的伤害，取决于他是否相信情绪能够并且的确压倒了他所有的理性克制。

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对“无法抑制的冲动”这个概念及其现代说法“有缺陷的基因可以导致人患上肥胖症，成为瘾君子和罪犯”作出了他的解释。

> 我们的文化最近越来越喜欢上了“无法抑制的冲动”这个概念以及基因引发毒瘾的说法。但在有关自制力的研究中，有一个结论一直反复再现：人们实际上默许了自身的失控。换而言之，是人自己让自己失去控制，他们是失控事件的主动参与者。不论是暴饮暴食，还是放弃不愉快的任务，实际上都是这个人自己让这件事发生的。暴力行径的发生也是如此。“无法抑制的冲动”这个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会误导我们，因为大部分暴力行为并非真的是“不可抑制的冲动”的结果，而是人们自己允许自己失控的。人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可以把某些冲动视为无法抑制的……比如，人们会把暴饮暴食或酗酒说成是一股强烈冲动导致的消极绝望的情绪。然而在自我放纵的过程中，他们还是在不断地拿起食物或酒，把它们放进嘴里吞下去。这些都是主动行为，而非被动行为。也许抵制这种冲动对他们来说很难，但在纵容自己的欲念时，他们并不单单是放弃抵抗那么简单，而是变成了主动行动的共犯。
>
> 鲍迈斯特，《罪恶》，第274—275页

关于自控能力，鲍迈斯特声称，当我们屈从于“无法抑制的冲动”时，我们会莫名其妙地“选择放弃”，无视常规，或者将我们自身置于不得不失控的境地。当然，这些常规限制越弱，就越容易被忽视。我们的大脑要如何履行这些常规，如何加强它们，我们是否具有自主选择的能力等，将是本书接下来两章



的重要主题。同时,我们完全可以说,尽管我们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对因情绪而产生的行为却能有更强的控制能力。但要实现自控需要我们进行复杂而长远的考虑和打算,避免陷入产生强烈情绪的境地,在心中牢记这样做产生的后果:当强烈情绪让我们只关注到当时发生的情况时,我们所有的其他能力都会削弱。有心人可能故意诱导当事人的情绪,使其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当下所发生的事件上,这对洗脑者来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策略,因为它抑制了受害人仔细考虑问题的能力。

情绪在大脑中泛滥

当我们感觉到自身的情绪时,大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从前文我们知道情绪源自于生理变化。因此,我们可以预想是大脑的皮层下区域负责将身体和大脑皮层联系起来,并把信息从身体传到大脑皮层。首先,这需要一个皮层下区域,或是连接脑皮层和处于大脑最低级的输出控制区——脑干——的参与。这些区域可以专门表达与情绪相关的信息,因此我将其称为情绪表征,或ERs(见图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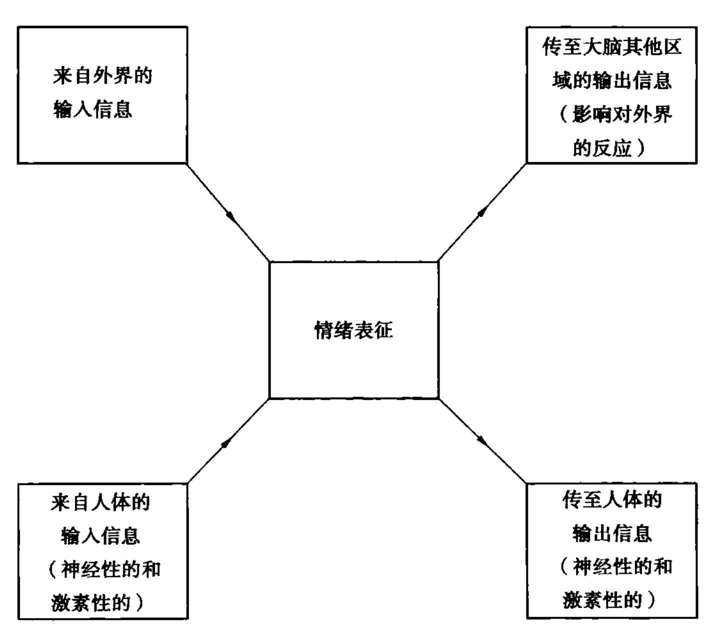


图9.1 简要地描绘了情绪表征(ERs)接收到的输入信息和ERs输出的信息。图中箭头表示信息流的方向,但这是高度简化后的图示,实际上,神经交流大部分是双向性的。

外部世界通知 ERs 侦测到了刺激物，比如正在不断靠近的捕食者。这个初步信号首先从丘脑快速传来，较慢但更高程度加工的信号则来自皮层感觉区。ERs 也接收并描述来自人体的输入信号，比如心率、血压、激素水平等。其中一些输入信息是神经性质的，意思是来自连接内脏器官和大脑的神经。另有一些输入信号是内分泌性质的（激素性质）：一些神经元具有可以被激素激活的受体，这些受体允许细胞监控激素水平。ERs 输出信号至脑干，从而调节心率、呼吸与肠道功能（因此极端的恐惧情绪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以及其他我们平时不会想到但遇到紧急情况时却需要用来保持高度戒备的身体功能。ERs 也将信号发送给脑下垂体，它是大脑底部的一小块凸起，可以调节激素水平。ERs 还将信息发送至大脑的其他区域，尤其是大脑皮层的额叶，为完整地、有意识地诠释情绪经验提供基础。

感受我们认为该感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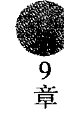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最后一点？因为有研究显示，我们如何解释自己的身体反应不仅取决于身体告诉我们的信息，而且还依赖于我们当时的想法。1962 年，心理学家斯坦利·沙克特[⑥]和杰罗姆·辛格[⑦]不顾争议，公布了一项实验的结果（见下文），这个实验后来成为了经典的引用文献。被试被告知正在测试一种维生素化合物的及时效果，实际上给他们注射的是肾上腺素或安慰剂（一种不会产生生理效应的物质）。一些被试被告知注射该维生素化合物会让他们变得兴奋（肾上腺素确有此效），一些被试被告知注射该维生素化合物会使他们感到困乏，而另一些被试则不知道注射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结果如何呢？被注射了肾上腺素的被试都感觉到了兴奋。如果他们被告知注射的药物会让他们兴奋，他们就不必再寻找别的原因来解释自己的兴奋：是“药物作用”。但如果他们没有被告知任何事，或者被告知的是注射物会让他们疲倦（实际上有意错误告知），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将身体反应归咎于药物作用，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身体反应另找原因。

沙克特和辛格利用人们能够被他人情绪所感染这一点，巧妙地对此作出了解释。他们把被试和知晓内情的人放在一起，但被试并不知晓自己伙伴的

⑥ Stanley Schachter(1922—1997)：美国心理学家，提出了情绪二因论。他认为情绪有生理唤醒和认知标签两个成分。

⑦ Jerome Singer(1924—)：美国心理学家，耶鲁大学心理学荣誉教授，美国心理学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想象和幻想心理学。



身份。伙伴会假装出高兴或者愤怒的情绪。沙克特和辛格预计,一个明显高兴或愤怒之人(被试认为这个人和自己一样也被注射了药物)的存在能让被试用以解释自身的情绪。“他被注射了药物,他很兴奋;我也被注射了同样的药,因此我的感觉也一定会是兴奋的。”这的确见效了。被试对伙伴行为的解释与来自他们自身的内部信号(产生于药物注射)相互影响,结果被试就把这些信号解释为快乐或愤怒。所思影响所感,反之亦然。

尽管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指出,沙克特和辛格的实验结果在伦理层面和科学层面都具有极大的争议,然而他们的研究却成为社会心理学课本的主要例证。这项研究受到持续欢迎的一个原因是,它把传统意义上相互分离的两个领域联系了起来:认知和情感。当我们感受到一种情绪时,引起这种情绪的刺激,以及它们在我们大脑和身体中诱发的反应,与我们储存的“历史输入信息”相互影响,从而进行不断的评估解释过程。我们利用这种情绪解释法来确定如何归类我们的感觉。生理和心理共同作用,彼此影响,才形成了我们所体验的总体感觉。

情绪系统

如果一种情绪感受产生于认知解读引起的身体变化,而我们又知道所思会引发所感,我们便可以预见 ERs 和处理情感的大脑皮层区域之间的交流是双向性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对自身的情绪有一定的控制力,我们便希望处理情绪的大脑皮层区域能够限制,或者说阻止皮层下区域的活动。而且,情绪反应十分复杂,涉及很多不同的行为,发生的时间也不尽相同:从最初的心率改变到面部肌肉的缓慢变化,譬如愤怒或微笑的表情变化。这需要一套错综复杂的控制系统:简单的输入—输出回路不足以灵活地涵盖所有选项。

事实上,神经学家已经发现:从皮质到脑干,大脑各个部位之间所有的复合反应组成了一个完善的情绪表达体系。低等生物进化出简单的反应模式,来帮助它们区分捕食者和猎物;高等生物能够知晓有时候捕食者并不在威胁范围内,或者说猎物不在可捕食的范围内。人类不仅能够辨别恐吓和承诺,还能领会上千种细微的情绪差异,比如欲望和恐慌、希望和欺骗、喜爱和愤怒。我们具有惊人的心理阅读能力:这种能力并非针对心灵感应层面,而是说我们能够辨识出表示“我爱你”的微笑和“我爱你,但是……”的微笑之间的差别。要想对此作进一步了解,我们必须先了解 ERs 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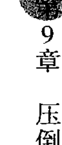
感知中的大脑

在大脑左右半球的内部，颞叶下方，有一类似杏仁的细胞群，称为杏仁核。杏仁核受到损伤时——比如遭受不幸事故的人，或实验中被故意损伤颞叶的猴子——会发生奇怪的现象。受害者会变得异常地无所畏惧，它们可能会参与更多社交活动或发生更频繁的性行为。颞叶损伤的猴子会变得非常友好，并且它会变得非常大胆，甚至可以镇定地跨过一条橡胶蛇去拿葡萄，然后又回过头来打探这条蛇。颞叶正常的猴子很难去拿那串葡萄，更不会去摸那条蛇。似乎是颞叶损伤阻碍了猴子(人)把物体和情绪联系在一起。虽然它们的视力仍然正常，但却不能理解所见事物的情感意义。

神经学的"悲剧戏团"再次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杏仁核如此重要。替身综合征是一种非常罕见可怕的疾病，患者认为他或她最亲近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已不再真实，他们是机器人或骗子冒充的。替身综合征是由于受伤部位影响到杏仁核与颞叶皮质(颞叶负责处理视觉图像，包括脸部)的联系。替身综合征患者能够辨识人，但当亲人或爱人出现时，平时喜爱的感情——让那张脸与众不同的意义——却消失了。情感信号无法到达大脑皮层。患者看见的是一个看起来熟悉，却感觉不到熟悉的人。沙克特和辛格肾上腺素实验中的被试根据他人的面部表情来解释自己的感觉，同样，替身综合征患者在解释自己的怪异感觉时，会联系到自己熟悉的事物：演员、冒充者或机器人的概念。同样地，精神分裂症患者会用文化来解释令自己困惑的症状，比如行为不受自己控制的感觉，或者身体被外界控制的感觉(被人控制的错觉)。早期，上帝和魔鬼通常被视为控制者，但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情局和外星人等也被列入了控制者的范畴。

与杏仁核相连的是下丘脑，下丘脑又与脑垂体相连。脑垂体受到下丘脑的刺激，会释放出各种激素信号，这些信号可以调节生长发育、性发育和月经周期、饥渴感，以及肾上腺素的释放。同向肌肉发送信号的神经一样，脑垂体会作为大脑的输出信号，这个信号由激素分子传输，而非神经轴突。下丘脑受到损伤会严重干扰人体激素系统的调控，并且造成一系列失稳效应，比如食欲的变化和愤怒情绪的变化。

杏仁核和下丘脑都与被形象地命名为导水管周围灰质(PAG)的部位相连。这个部位将信号直接发送至脑干神经，脑干神经控制着许多身体功能：它是神经信息传至身体的输出站点。对正在做脑部手术的病人(且是在意识清醒时做的手术)来说，刺激其 PAG 会引起患者强烈的恐惧和痛苦，以及对死亡



的惧怕,这些情绪不单单产生于脑手术经历。杏仁核、下丘脑和PAG都与丘脑中部的细胞群相连。这些细胞将信息发送至大脑皮质,经过大脑皮质处理后又传回给丘脑、下丘脑、杏仁核和PAG(见图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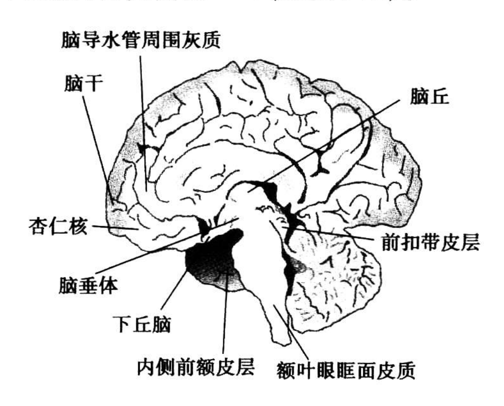


图9.2

杏仁核等中脑部位ERs的信号不单发送至脑干的运动神经通路,而且还可以调节参与某些活动的脑干细胞,比如失眠和睡眠、心情、警觉和机警。这些神经细胞会通过释放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血清素和乙酰胆碱等神经介质对整个大脑活动进行广泛的调控(许多能使心理和情绪发生变化的药物都与这些神经介质有关,它们会影响这些神经介质的运输路径)。这也是为什么情绪如此普遍且很难忽视的一个原因,它们沦为了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的利用工具。当某件事激起情绪反应时,为了处理这个情绪,大脑的大部分区域都会被激活,而用以谨慎思考的资源就少了。

神经影像学研究可以让我们观察人在执行任务时大脑的反应,能够为我们提供脑图——暗色背景下几个明亮的小点,就像小镇失眠者家中午夜的灯光。实际上,大部分任务中的神经活动类型——甚至是最简单的任务——都会改变整个大脑。为了理解其复杂性,科学家设定了门槛,只把最显著的变化列入考虑范围而忽略其他。因此,谈到"参与……的大脑部位"指的是一种注意力、行为计划、动机调整以及大脑其他部位间冲突的解决方式。它有助于解决欲望冲突,这样,人的行为就不会陷入停滞,我们便不会因为无法抉择是吃拷玛味还是咖喱味而被活活饿死。

前扣带回的前方是前额皮质(PFC),它是神经学家认定的大脑功能的另一个主要区域。前额皮质中央是内侧前额皮层(mPFC),mPFC似乎专门负责处理情绪问题。和许多前额皮质区域一样,mPFC负责调节低层次大脑区域,比如杏仁核的活动。它被看作是专门负责行为与后果之间联想学习的区域。比如,有

经验的老鼠会认为铃声意味着电击,于是集中精力逃生。在情境发生变化时,mPFC 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当它受损时,即使铃声代表食物,老鼠也无法习得,它在听到铃声时还是会以为有电击。快速、基本的反应在皮质下区域进行调控,而当脑神经通路有更多的附加层次时,就能完成更为灵活的行为。

同样位于前额皮质,在眼眶或眼窝上方,还有一个区域叫作额叶眼眶面皮质(OFC)。它与杏仁核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菲尼亚斯·盖奇案例中,他的头部被一根铁棍穿过的区域正是这个部位,这次受伤把他从一个勤奋可靠的人变成了一个行为怪诞、毫无责任感的废人。约瑟夫·勒杜在《情绪化的大脑》一书中解释道,OFC 受损会影响"有关奖励信息和当时是非对错的短时记忆,这个区域的细胞对判断一项刺激是导致奖励或惩罚相当敏感。额叶眼眶面皮质部位受损的病人无法感受到社会和情绪的信号,一些人甚至出现反社会行为"。换句话说,OFC 能够表现奖励和惩罚刺激的价值,并且有助于人在不同奖励(或惩罚)之间进行复杂的选择。如果给很小的小孩以下两个选择,立刻给他一块小巧克力或几分钟后给他一大块,他通常不会等待,直接选择前者。OFC 受损的成年人和小孩一样,也无法延迟自己的心理欲望:他们想拥有一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立刻就拥有。

前扣带回、内侧前额皮层和额叶眼眶面皮质都与控制体内情绪变化的皮质下区域有着密切的联系(图 9.3 展示的是皮层和皮层下区域之间的一些主要联系)。皮层下区域受到损害或刺激会影响到迅速、自发的情绪反应。大脑皮层区域受到干扰会对情绪解读,迟缓、非自发情绪的表达,环境变化时反应的灵活性等产生细微的影响。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情绪和社会一样,包括来自(大脑)底层结构的力量和上层结构的管理。之前我们提到过,处理情绪的区域并非只有上述讨论到的这些部位。其他部位(如岛叶,就被认为是负责处理疼痛刺激的部位)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不过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还有待进一步了解。

然而有一点很明确,情感活动涉及皮层和皮层下区域,以及身体和大脑之间各个层次的相互作用。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就是在你想清楚事情缘由之前,你就已经呆住了;更为复杂的认知网可以帮你辨别大火燃烧的街道或脚步的声响;最复杂的反应可以把黑暗与童年恐惧联系在一起,把逼近的脚步声与恐怖电影或犯罪剧联系在一起。正常的大脑如同制作精致的柠檬酥,而情感信息就像是柠檬味一样不断渗透进入其中。用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话说:"痛苦或快乐或其他介乎两者之间的感受是我们思想的基石……是宇宙中永不停止的普遍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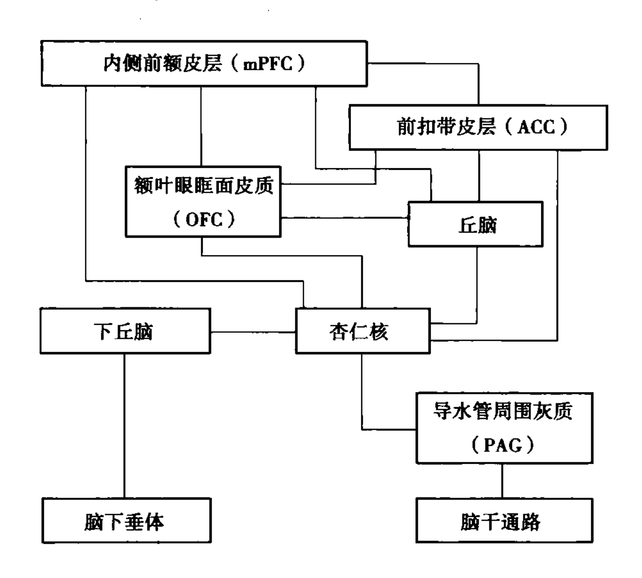


图9.3　参与情绪处理的主要大脑区域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虽然它们的功能还未得以完全了解，但我们认为应遵循以下规则：内侧前额皮层（mPFC）建立行动与结果间的联系；前扣带皮层（ACC）与动机和冲突欲望相关；额叶眼眶面皮质（OFC）体现奖惩刺激的价值，而杏仁核则获悉刺激的情感意义，或在受到类似刺激时找回刺激的情感意义。杏仁核接收丘脑和皮层的刺激信息，并输出到下丘脑和导水管周围灰质（PAG）。下丘脑反过来又作用于脑垂体，改变激素水平，同时PAG发送信息至体内器官，如肠道和血管。

受情感控制的大脑

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简直无孔不入。不同的大脑区域负责处理不同的功能：额叶眼眶面皮质与奖惩相关；内侧前额皮质与行为结果之间的联系相关；杏仁核将物体与其情感意义相联系，但通常的情况是只有这些部位（还有其他大脑区域）通过复杂的认知网连接起来，才能确保完成一种情绪体验，例如狂暴的愤怒、极端的平静、抑郁的悲痛，或无比的喜悦。一旦与这样的情绪体验发生联系，物体或思想便具有了影响大脑和身体的能力，从而对行为产生一种压力，而较弱的认知网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思考相对论可能会唤起一些皮层区域，但这远不能与目睹自己的孩子身处危险所产生的效果相提并论。然而，情绪也可以是随意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个人，身体变化可能有不同的阐释；而且因为情绪变化比思想波动耗时更长，当同样的情感价值与其他活跃的认知网联系时，思想与其价值之间的联系可能就会被掩盖。

威胁就在于此。人类已经进化出了异常复杂的沟通方式。面部表情、手势，当然还有语言，这使我们能够非常精确地刺激对方的认知网。我们可以唤起情感，在情感于脑中泛滥的同时，确保激活某个特定的编码概念的认知网，这还会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老鼠很容易便学会铃声与电击间的联系。运用文字的情感联想，像弹竖琴一样操控大脑的认知网，可教会人类进行更为复杂但又有偏见的联想：妇女身份低下、犹太人卑鄙、黑种人愚蠢，或政治避难者是社会的渣滓，等等。恐惧或厌恶的情绪是不准确的：这些情绪不会仅局限于最初引发它们的文字上，反而会去影响和侵染其他文字。事实上，我们可以像沙克特和辛格一样作进一步的尝试，利用语言或情境去唤起一个人的身体变化，然后提供现成的解释来说明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这种解释可能与现实世界有关系，也可能毫无关联。

※本章小结

情绪的特征——持续性、模糊性，以及它们带来的压力——赋予情绪以操纵的力量。当然，胜任洗脑的人一定不会不利用它们。虚无思想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可以缓冲大脑与外部世界发生的矛盾冲突。如果与虚无思想相连，情绪可能是毁灭性的，它可以否定所有相反的观点，忽视或压制任何与其不符的证据，歪曲事实以适应认知网，这些认知网因能量补充而得以显著加强。我们需要情绪——没有柠檬味的柠檬酥意义何在呢？但是，我们也需要避免因滥用情绪而造成的恶劣影响。本章之前提过"自控"与情绪密切相关，提供了避免这些负面影响的传统方式。下一章，我会探讨与自控密切相关的大脑区域——前额皮层——从其奥秘中探寻人类如何塑造和改变自身行为。

第10章　停下来思考的力量

道德文化可能的最高阶段即是当我们认识到应该控制自己思想的时候。

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起源》

正如前面章节所说,试图施加影响的企图多种多样,且并不是都能成功。一个拥有足够动机的人在屈从他人之前还是可以不时地停下来思考,回想一下是否该买,是否该信,从而避免受制于人。然而,在洗脑的情况下,一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却是难以抵抗的。洗脑者会千方百计地绕过被洗脑者的自我控制系统,使他们无法停下来思考(而任其摆布)。因此要明白洗脑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需了解大脑是如何实现停下来思考的。致使我们能够停下来思考的大脑部位是紧挨前额下方隆起的皮质区:前额皮质,简称为PFC。

管理大脑

研究人员经常把前额皮质(PFC)比作一个大公司的执行总裁(CEO)。这个比喻旨在显示前额皮质的领导功能(我稍后将会在本章继续阐释这个管理隐喻),不过,我认为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个比喻。PFC和CEO都带有魅力、兴奋和权力这些特点。和其他大脑区域或公司员工相比,他们都消耗了大量(新陈代谢或财政)资源,而且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

额前叶位于大脑的前部。相对于和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目动物来说,人类大脑顶部的高高突起的皮质要多得多,这种皮质是大脑中最神秘、最具吸引力的大脑区域。任何神经系统科学家无法解释的人类行为,任何无法用损伤或成像解释的机能都被认为是前额皮质或与其结构上紧密相连的前扣带皮质(二者经常被归为一类)的作用。意识、内驱力、自由意志、自我、决策、复杂的思想和情感、自我控制和道德思维都是它们核心功能的一部分。

前扣带负责把从下皮层情感处理区(见第9章的讨论)接收到的信息(经过前额皮质处理后将指令)再传回这些区域,如杏仁核、导水管周围灰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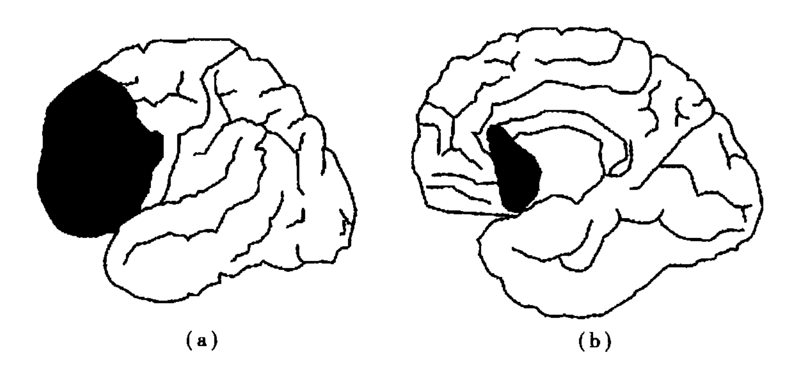


图 10.1 大脑简图。(a)为大脑的侧视图(外部视角的),黑色实心部分为前额皮质的大致位置。(b)为大脑中间纵切面图(内部视角的),黑色实心部分为前扣带皮质的大致位置。

(PAG)和下丘脑。因此,扣带拥有一个短链指令,作用于为人体反应和表达提供能量的神经和激素。虽然这些能力有时受到意识控制,但其在惊慌之时经常能够逃脱这种控制,恐慌症患者的举动便能证明这一点。身体症状也可能具有强烈激发性——疼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此提供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促使我们有所行动。扣带将处理这种内驱力的下皮层区域和前额皮质连接起来。借用第 9 章中马克思的比喻,它的工作是将能量从基层输入至上层再将指令从上层输送到基层。

我们已经用各种方式描述了前额皮质所扮演的角色。它似乎负责下达指令,组织和引导我们的行为,特别是在极具挑战或出人意料的情况下。一般认为,在多种选择、可能性解释及未来塑造难以取舍时,前额皮质就会斡旋调解。或许,时不时地,你很想修理你的老板,但你又不想丢掉饭碗。一个训练有素的前额皮质将会帮你保住饭碗,迫使你在挥出那一拳之前停下来想想。看来只有完好无损的额前叶才能使我们拥有对于文明生存至关重要的能力,即停下来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也赋予我们抵制他人对我们施加影响的能力。任何一个企图对他人实施思想改造术的人,必须首先克服对方额前叶的守护才能左右其思维。

当前额皮质工作失常时,其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视觉皮层的损伤会导致失明,而额前区的损伤却不会引起明显症状。一个额前叶受损的患者在标准脑功能测试中可能不会表现出任何异常。菲尼亚斯·盖奇的部分前额皮质在一次工地事故中受了伤,但他依然神志清醒并拥有理性思维,因为他能把事故的经过告诉最初给他做检查的医生。然而后来,医生发现,“盖奇再也不是盖奇了”。据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在《笛卡尔的错误》中的描述,在意外发生之前,盖奇是个

"有自我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遵守社会规约,依道德行事。而意外之后,他藐视社会公约;违反(广义上的)道德标准;他所作的决定并不考虑自身的最大利益;相信凭空虚构的故事……变得鼠目寸光,冲动鲁莽"。

前额皮质的损害就如同洗脑一样,会在患者不知不觉中改变他的性格,一般向坏的方向发展。受损区域不同,造成的影响也千差万别。菲尼亚斯·盖奇是眼窝前额皮层(前额皮质的底部,略高于眼睛)受损。前额皮质其他区域受损的患者,可能出现工作记忆衰退,不能事前规划以及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等症状。有时,做事之前不假思索(冲动);有时,一旦开始行动,便无法停止(持续重复症)。停下来思考使人变得灵活,它让我们成为演员,而不是刺激驱动的机械应答者。在一个复杂而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灵活性或许不是必要的(蜘蛛灵活性不高,但一直存活至今)。但一个灵活的大脑无疑促进了(人类的)长期生存及基因遗传的进化论规则。幸好是人类主宰地球,而(谢天谢地)不是蜘蛛。

前额皮质不直接与外界"沟通",但它会接收来自大脑各个部分的信息。它的作用如同一个聚集点或整合器,如神经学家埃尔克诺恩·戈德堡[①]所说,"它是大脑中唯一一个整合生物体内部信息和外界信息的区域"。像马克思描述的上层建筑一样,它所关心的是控制,是管理强大势力。正如上层建筑体现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一样,前额皮质执行大脑的意志,作出重大决策,平衡各种相抵触的内驱力和倾向。

要清楚各前额区的工作,就要知道它们是如何与其他脑部区域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感知转换为行为的通路的。在下一节中,我将以眼部移动这一最简单的身体运动为例,来描述它们的相互作用。(类似的论点也同样适用于更复杂的行为,如手臂移动或面部肌肉改变等。)从信息输入到输出,其探求的过程包括诸多细节,还请读者耐住性子。只有将前额皮质植于其神经环境中,才能了解大脑的领导功能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应当看到老笛卡尔模型——"钻石观"——对我们造成的误导:相反,我们所发现的大脑世界极其复杂,不断变化,而又美不胜收,并不像钻石般简单。通过对眼动这个简单范例的深入探讨,希望能够揭开前额皮质神秘面纱的一角。

舞蹈着的眼睛:大脑如何支配眼部活动

非盲人群极其依赖自身的视力。一般认为,我们大脑皮质的后半部包含

① Elkhonon Goldberg(1946—):神经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学家,研究领域为大脑半球特异化和"新奇常规化"理论。

了超过30个用于处理视觉信息的独立区域，有些专门处理色彩，有些专门处理深度知觉，等等。平衡这种感觉处理过程的系统控制着我们眼部的移动。通常我们只有直视物体才能识别它们，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眼动。人清醒时的眼动一小时超过一万次。被突来光线吓一跳的人，会无意识地朝光线看去，其间所做的极为迅速的眼动称为“眼跳”（来自一个意为“猛拉或拖拉”的古法语动词）。如果你看到某人在旅途中透过行驶的火车或汽车的玻璃看向窗外，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眼睛在迅速地来回移动（反射性眼跳）；但如果换做是你朝窗外看的话，则全然意识不到自己的眼球在运动：向后退去的乡村风光似乎是连绵不断，尽收眼底。

换句话说，通常情况下，我们是意识不到自身的眼跳的。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眼球运动。人类擅长玩眼跳：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移动我们的眼睛。人脑是如何达到对身体运动的完美控制的呢？如同身处一个管理有序的组织，其秘诀就是合理支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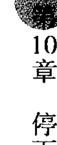
倘若把一个成人的大脑（和身体其余部分正常连接）置于一个视觉神经科学实验室。视觉刺激被呈现在电脑屏幕上，由此产生的眼动情况被一一记录在案。像一个亮点这样的简单刺激能产生一个极其迅速的眼跳。而对于像景色或脸这些更为复杂的刺激，反应则要慢些。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导致了这样的差异呢？

首站：小山丘

当眼睛后面的视网膜接收到刺激后，信息就会传到视神经进而到达丘脑中的视觉处理区，再到达视觉皮层。如前面章节所说，在到达视觉皮层前，信息已经经过了一定的处理。到达丘脑的输入信息会与（在视觉皮层产生的）大脑期望的视觉对象进行比较，依据它们之间的差别两者都会得到适当的调整。如无差异，则无须调整。不过，眼睛输入的信息不止传到了丘脑，还到达了另一下皮层区域——上丘（因意为“小山丘”的拉丁词而得名）。

如同风景画，上丘（PC）展示的是二维的视觉世界。但不同的是，画家使用不同的颜色来展现世界的不同对象（天空 = 蓝色，草地 = 绿色，等等），而上丘则通过眼睛接收不同对象所需的眼动为其定位。用电极刺激上丘便会产生眼跳，其大小及方向会随电极移动而发生平稳变化。所以，上丘中的每个点都代表一个眼跳，其中相邻的点则代表相似的眼跳。上丘是大脑中眼动指令的主要输出中心。信号从上丘出发，然后到达直接控制眼周肌肉的脑干神经元。

当刺激激活视网膜，进而激活上丘时，上丘中代表将眼球移向刺激源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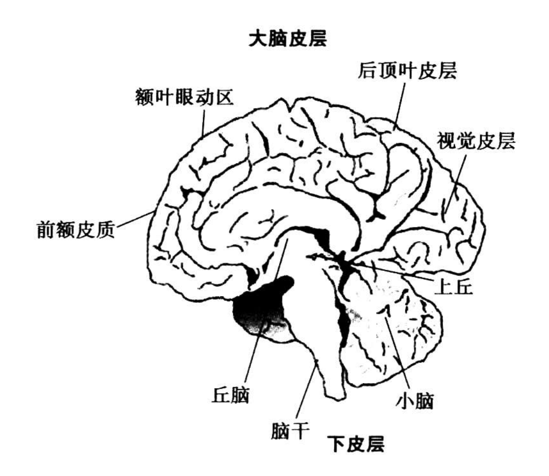


图 10.2　人脑的内侧视图,显示快速眼动(眼跳)所涉及脑区的大致位置

眼跳的神经元就会被激活。如果刺激源很简单,比如黑暗背景上的一个亮点,那么上丘神经元的活动则基本集中在一个位置(代表目光定位于亮点所需眼动的位置),其他位置都可以忽略。这很简单:只需看向这个亮点即可。触发一个快速眼跳,目光跳到一个新的位置——这一切都在当事人还未察觉到该亮点前就已经完成。换句话说,简单信息被处理得更快。这就是为什么煽动家、邪教领导、广告商及洗脑者要将信息阐述得尽可能简短:这样,他们的"猎物"就来不及停下来思考,更有可能快速而自发地作出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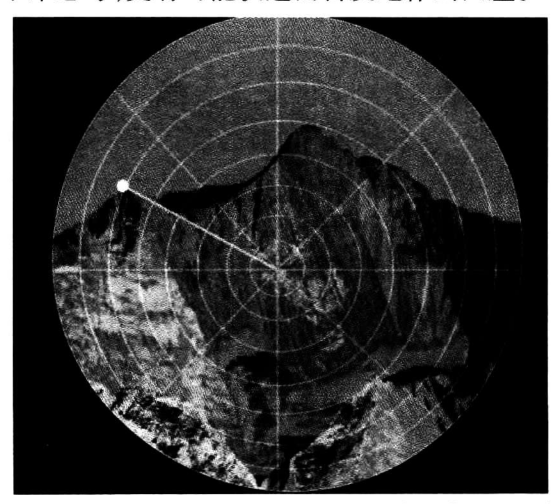


图 10.3　上丘的神经元代表眼球运动的大小和方向。该图是上丘活动地图与一个图像叠加后的示意图,犹如有人正在直视该图像中心(垂直线和水平线的交叉点)。白色实心圆表示即将发生眼动的目标位置,而看到目标所需的眼动由粗白线表示。代表目标位置及其周围眼跳的上丘神经元的活动最强烈。

但当刺激变得复杂时,问题就随之出现了。试想如果在视觉神经科学实验室的被试面前所呈现的是我窗外景色的照片:邻居花园的墙上,烂漫的蔷薇爬到墙顶,美洲茶繁茂的枝叶漫墙而过,远处是灿烂的玫瑰和繁茂的树林,邻家的一只猫咪正站在墙顶留意着鸟儿(见图 10.4(b));那么上丘活动地图的各个位置都会出现高峰,各自对应所要看的不同位置:往左是看蔷薇,正视前方是看美洲茶,往右是看猫,看树的话则要再往右一点。但眼睛一次只能移动到一个地方。其结果就是瘫痪性的冲突:所有上丘神经元都竞相争夺对眼部肌肉的控制,但没有一个能做得到。因此,既然世界不只是黑色背景上的白色亮点,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移动我们的眼球呢?换句话说,如果突然我们只能靠上丘来思考,那么作出任何有趣决定所需的时间都会过长,足以让最耐心的试图影响他人的人不厌其烦而终将放弃。

侧抑制

走出这种窘境的方式在于神经元间的"协商"。上丘用一种称作侧抑制的机制来解决各子神经元间的冲突,决定哪一个能取得眼球移动的控制权。每个上丘神经元都会向其他所有神经元释放抑制信号。越活跃的神经元就越能抑制其他神经元。当一个简单刺激在上丘的活动地图中只产生一个尖峰时(见图 10.4(a)),活跃神经元就会击败其他所有试图使得眼睛远离刺激源的神经元,快速取得眼部肌肉的控制权。但如果存在很多高峰的话(见图 10.4(b)),其中最高的一个(对应刺激源中最与众不同的部分)对其竞争者的抑制就会强于它们对它的反作用,迫使它们同意往其编码的方向移动眼球。正如邪教领导者镇压反对意见一样,最高峰会最终控制上丘景观,不过实际产生眼动过程的时间会更长些。总之,刺激源的信息会迅速抵达上丘。如果刺激源简单,眼跳迅速产生。而更为复杂的刺激源则不会立即产生眼动。相反,上丘会进入侧抑制的商讨过程,各子神经元不断竞争,直至分出胜负。

幸好,我们不用等到上丘解决完内部矛盾才开始观察周围,否则人类早就输在进化战中了。即便是面对十分凌乱的视觉场景,一个典型眼跳的编程和执行也只需瞬间就能完成。因为当上丘"委员会"同导致眼跳的视觉刺激会面时,其他脑部区域也在对它进行处理。颜色、深度、轮廓、大小、运动状态……这些位于丘脑和视觉皮层的早期感觉处理神经元的方式如同一个委员会集合体,各自集中处理输入信息的各个细微差异。它们将结果汇入两个庞大的、被神经学家称为"是什么"和"在哪里"的通道进行加工。我们会集中讲述与眼动联系更加紧密的"在哪里"通道。不过,首先我们还是稍微了解一下"是什么"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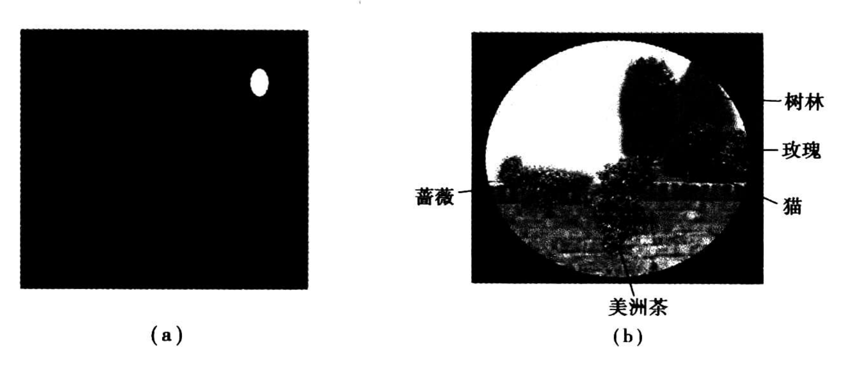


图 10.4 (a)黑色背景上的一个亮点。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刺激源,能够引起一个快速眼跳。(b)一个更复杂的视觉刺激源:一只猫在花园墙顶上的简图。

何谓“是什么”?

“是什么”通道将信息从视觉皮层发送到颞叶。在颞叶部位,更多的神经元对信息进行进一步处理。简而言之,它们的总体任务是辨别:识别和归类正在观察的事物。随着神经信号不断进入颞叶,对视觉刺激的性质的猜测就愈加精准。每一个阶段的猜测都会和其他脑区的分析相互补充、相互影响。

当一家公司存在工作效率低、士气低落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时,人们往往归咎于内部沟通不充分。当然,大脑惊人的高效反应要部分归结于其内部的完美交流。颞叶主要信息的接收者是杏仁核,它无须等待最终报告来确认其迎面而来的物体是一辆汽车(颜色、构造及车牌号等),不论人们表现得多么不明显,其第一反应可能都是躲避(和强烈的恐惧感)。虽然大脑能够根据极少的线索快速触发反应,却可能时不时、无缘无故地激怒其主人,但正是它们能够及早发现危险的这种能力使人类获得了更大的生存几率。进行完全识别是一种只有在安全环境下才能进行的休闲活动。

第二站:隔墙

知道了“是什么”;那“在哪里”呢?从视觉皮层出发,“在哪里”通道的下一站是包含专门控制眼动区域的后顶叶皮层(PPC,以拉丁词“隔墙”paries 命名)。同上丘一样,后顶叶皮层也对视觉世界进行编码:其神经元以看到各个对象所需的眼动来表示方位。不同的是,后顶叶皮层不仅从视觉皮层,还从大脑的许多其他区域接收经过高度处理的信息。这个组织的“议程”满满当当。

例如,最近眼跳的相关信息来自大脑额叶,那是上一个眼动命令的备份。颞叶的言语区会给它提供言语命令的信息(例如,一个实验者命令眼球向左移

动的指令)。关于眼前为何物的初步猜测会从视觉颞叶区抵达,并开始触发与此物相关的储存信息以及带给当事人的感觉(例如"右边的黑点可能是猫,我喜欢猫")。同时情绪处理区(见第9章)会考虑人在此时此刻的心情("在这个视觉神经科学实验室里真紧张,希望能放松一下")。这些信息连同其他输入都将影响到后顶叶皮层的活动地图。有些输入(如紧张情绪)会对所有后顶叶皮层神经元产生类似效果。其他输入(如实验者命令向左移动眼球的指令)会增加左移计划编码神经元的活动,而抑制上、下或右移编码神经元的活动。

回想一下在第8章所讲过的,丘脑神经元执行假设检验,比较从眼睛传入的信号和从大脑皮层传入的信号,大脑皮层编码大脑所预期的信号。后顶叶皮层也会将视觉皮层传来的信号("左边有东西")与其他脑区的信号("走右边,干吗不了结了那个穿白大褂的疯子")进行比较,然后告知双方其间的差异,使它们能够作出相应的调整。同丘脑一样,其结果是去增加被刺激源激活的后顶叶皮层、视觉皮层和其他脑区的活动方式的相似性。

到达上丘的最初信号确实有众多对象值得关注,纷繁的目标让上丘陷入混乱,不能立即触发眼跳。然而,当视觉信号抵达后顶叶皮层后,假设检验过程就会排除部分目标,进而加强对其他目标的好感("我想抚摸那只猫,而不是那株蔷薇")。后顶叶皮层神经元之间的侧抑制会进一步锐化后顶叶皮层的活动地图。同时,后顶叶皮层会把它的处理结果传送给上丘供其参考。这再次证明了侧抑制的重要性。被左向刺激激活的后顶叶皮层神经元会加强编码左侧眼跳的上丘神经元的活动,并且减弱编码其他方向眼跳的上丘神经元的活动。有时,这种变化对于触发眼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上丘像是一家大公司的销售团队,其任务是根据市场调研结果决定销售哪一种新产品(即眼跳)。除非调研结果强烈偏向其中之一,否则他们无法抉择,那么下一步是将他们的提议呈递给其顶头上司——小组组长(后顶叶皮层)。如果小组组长说,"就销售产品G",那么就是G了。如果还是无法决定,小组组长就会咨询上司。信息就会继续层层向上呈递,直到决议达成。

第三站:命令输出

人的大脑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后顶叶皮层的工作不足以触发眼动,信号就会继续向前传递到位于额叶的额叶眼动区(FEF)。这里再一次的匹配和侧抑制会继续锐化信号,进一步减少目标数量。到了这个阶段,来自颞叶的报告会更精确("我想这应该就是一只猫")。在这些被报告激活的关联之中将出现编码适合对象想法和行动计划的认知网。"猫摸起来很舒服";"伸手



摸摸它”;“先来看清楚它究竟是不是一只猫”;“仔细看看,确保它真的想要我摸。”激活了的认知网将这些信息发送至额叶眼动区“委员会”,作为分析的依据(还会影响后顶叶皮层和上丘正在进行着的分析)。如果与猫相关的认知网比其他认知网更活跃(如果此人的经历让他的大脑认为猫比墙、鲜花,或树林更有趣),额叶眼动区可能支持将眼睛移向猫所在的位置。在这里侧抑制将再次发挥其重要作用,额叶眼动区输出信息对上丘的影响不亚于后顶叶皮层的输出信息,会促进触发朝向猫的眼跳。

在眼动控制过程的每一阶段(从上丘到后顶叶皮层再到额叶眼动区),上丘都可能触发眼动,也可能不触发眼动。这一过程是否发生,如上所述,取决于其神经元的活动和侧抑制的结果。然而,侧抑制既发生在后顶叶皮层、额叶眼动区和上丘三者之间,也发生在各自内部。正如编码向左眼跳的上丘神经元会抑制其他上丘神经元一样,编码向左眼跳的后顶叶皮层神经元也会抑制所有编码非左眼跳的后顶叶皮层、额叶眼动区和上丘神经元,并加强向左眼跳的额叶眼动区和上丘神经元。反之亦然。如果后顶叶皮层和额叶眼动区两处的活动模式相似(也就是说,如果传入的信息与大脑期望相符),那么从这些区域传送到上丘的信号就是明确的,并将触发一个快速眼跳。如果其相似度不高,那么后顶叶皮层、额叶眼动区、上丘及其他领域将通过侧抑制协商,以促使相互之间的活动模式更接近。此协调过程持续得越久,眼跳产生得越慢。

末站:前额皮质中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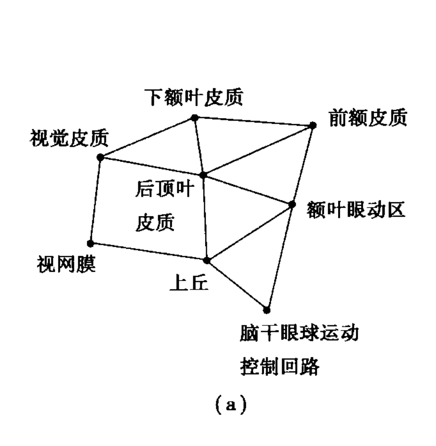
如果视觉信息通过视觉皮层一直传到后顶叶皮层和额叶眼动区都无法触发眼动的话,那么是时候该向高管请求指示了。当前额皮质被激活的时候,颞叶中的信息已经激活了众多的编码储存信息的认知网。这些信息与当前视觉场景中的对象有关,但不仅限于此,其中有相当多的信息还未被感知。在神经科学实验室里应该怎么做;当实验者说:“向左看”时,要作何反应;为什么要遵守科学家的指示;为什么不能抚摸图片中的猫;对猫的看法——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信息,都将在认知网被激活时为大脑所用。以往的经历已将储存信息(我们的个人历史信息输入)和当前输入链接起来。前额皮质相当于过滤器,用我们已知的信息来影响即将做出的行动。前额叶受损的人,往往能够获取在特定情况下该如何做的信息,但却无法按照此信息去做,因为知识与行为间的连接已经被隔断。与这类患者接触过的一位神经学家曾说:

> 在实验室对其中一个患者进行测试时,他能够理智地解决一个假定的具体社会问题,但现实中完全一样的问题则无法解决。这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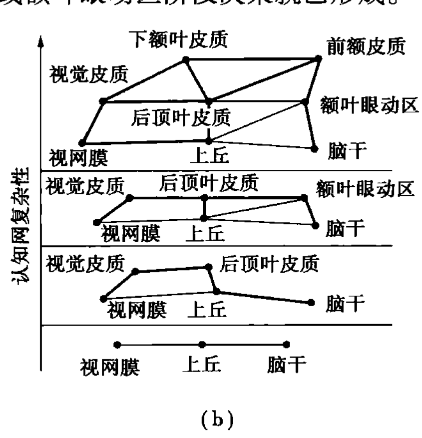
么令人困惑啊！这些患者深谙世道，而面对现实，其处理方式却又极其不妥。他们知道问题的前因后果，知道摆在面前的各种选择，也知道如何运筹帷幄。但真正在现实中处理这些问题时，却是一塌糊涂。

达马西奥，《寻找斯宾诺莎》，第143—144页

侧抑制会再次剔除一部分可能的眼动目标，进一步缩小范围。匹配过程则再次检验大脑的假设、期望、态度和记忆（历史输入）是否与从后顶叶皮层和额叶眼动区来的信号相符合。如果历史输入信号强烈——例如，如果看图片的人想起了实验者让他们向左看——那么前额皮质信号将加强后顶叶皮层、额叶眼动区和上丘中编码左视的神经元，抑制其他神经元。不过，如果他不想遵守指示，或忘记了，或真的很喜欢猫，那么输入信息会占据主导，促成向右的眼跳（向猫）。期望和记忆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我想看猫""左边太没意思""是时候告诉这个书呆子该谁做主了"。最终，协商（此时大部分脑区都会参加）会达成足以产生眼动的共识。但日常生活中，这种困扰我们的情况极少出现。大多数情况下，在上丘、后顶叶皮层或额叶眼动区阶段决策就已形成。



(a)



(b)

图10.5 (a)快速眼动形成过程中所涉及主要领域的示意图。经过一系列输入—输出叠合过程最终产生眼跳。(b)所示的是各个分离出来的路径（左边的垂直箭头指向代表认知网复杂性增加的方向，越往上产生眼跳所需的时间越长）。最快眼跳的产生是当视觉刺激信息直接到达上丘而触发的眼跳。这种情况在刺激非常简单（如图10.4(a)）时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当人正期待着刺激源出现并知道该朝哪个方向看时，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当来自视网膜的信号不能立即到达上丘时，眼跳的产生速度将会减慢。那么，视觉信息就有时间经过视觉皮层和后顶叶皮层（PPC）、额叶眼动区（FEF）、颞下皮层（ITC）及前额叶皮层（PFC）等皮质区。这些区域中哪些部分会被激活则取决于视觉刺激的复杂性及其是否与大脑所期望看到的对象相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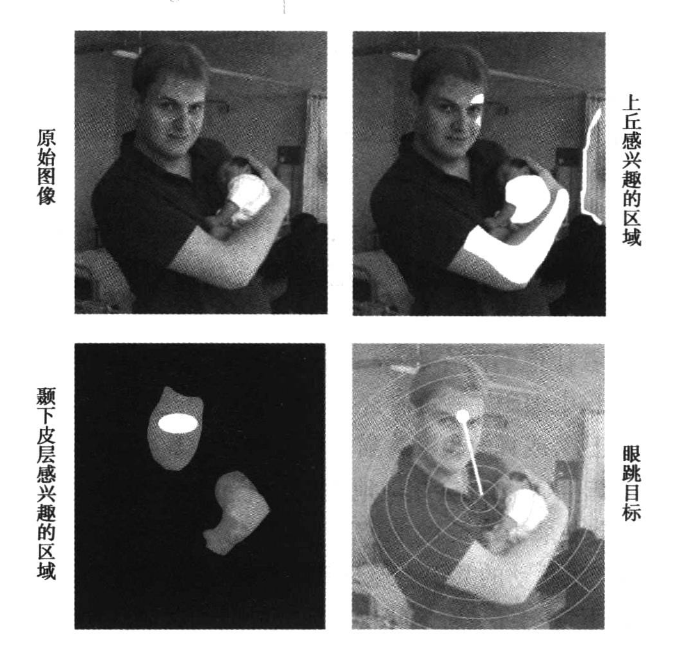


图 10.6　图示了以往的经历在决定看哪个位置这个问题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左上方的照片中一个父亲正抱着他刚出生的孩子。这是一个复杂的图像,有许多潜在的眼跳目标。下一张图片(右上方)显示的是此视觉图像在对明亮光线反应强烈的上丘中的呈现方式,令上丘神经元高度活跃的区域标示为白色;不能激活上丘神经元的区域标示为黑色。原始图像中最亮的领域是父亲的胳膊、部分面部、他头上的光线及宝宝的衣服;其次是父亲面部的其余部分和图右侧的窗帘。显然,没有一个眼跳可以一次遍及上述所有地方。

左下图为原始图像中颞下皮层神经元感兴趣(即对颞下皮层刺激最强)的区域,颞下皮层是颞叶中储存以往视觉信息的区域。颞下皮层对人的面部反应强烈,尤其是眼部,这就是为什么(除非患有自闭症)在交流时我们总要看着彼此的眼睛。因此,处理父亲面部(而宝宝的形象不明显),尤其是眼睛的神经活动很可能是最活跃的。那么,颞下皮层的信号将选择父亲面部位置产生眼跳,以便对他的表情作进一步处理。颞下皮层的干预可能打破上丘神经活动的平衡,生成一个对父亲的眼部眼跳,如右下图(白色实心圆代表目标位置,粗白线标示即将进行的眼跳)。

停下来思考:全局功能

前额皮质(PFC)是通常被描述为使大脑停下来思考的区域:抑制过程为我们争取了深入思考的时间。它能够协调储存信息的积极检索及应用,同时暂缓行动。然而,前额皮质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其他脑部区域(如后顶叶皮层

和额叶眼动区)类似功能的冰山一角。前额区能够调动我们更多的个人历史信息;它们稍后才会作出反应,而且——因为它们要收到来自很多区域的信息输入——它们被某个刺激激活的时间往往被特别延长(见图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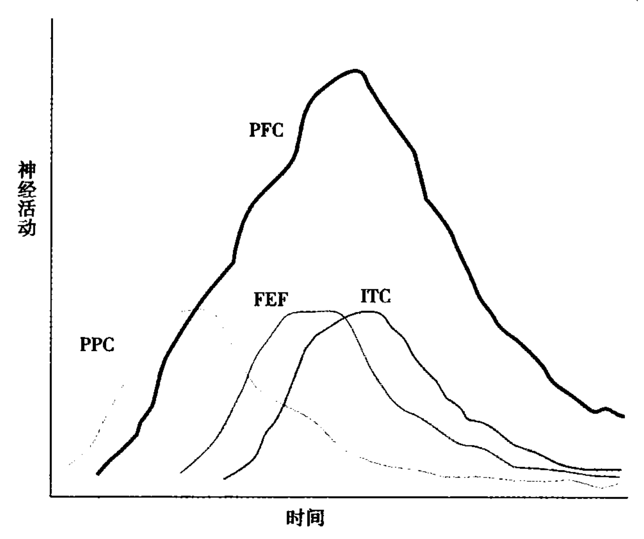


图 10.7 大致呈现了参与眼动的后顶叶皮层、额叶眼动区、颞下皮层和前额叶皮层的神经活动(垂直轴)随时间(水平轴)的变化。后顶叶皮层(PPC)是其中最早被视觉信息激活的区域。刺激导致神经活动快速上升,然后向轴线缓慢回落。额叶眼动区(FEF)和颞下皮层(ITC)的神经活动模式与此类似,只是在被激活的时间上要推后些。然而,这三个区域都在被激活的时刻向前额皮质(PFC)发送信号。因为它们对刺激反应的时间不同,致使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延迟。

正是这种延缓的反应形成了短时记忆的基础,使大脑能够持续搜索重要信息(例如一串电话号码)直到采取行动(如找个记事本或直接拨号)。

不过前额皮质所做的工作在类型上和额叶眼动区或后顶叶皮层并无区别(只有时间和输入上有区别)。这三个领域中的神经元都会激活相应的上丘神经元(通过连接由经验所形成的突触),同时抑制编码其他不同视觉目标神经元的活动(后顶叶皮层神经元)或朝向这些目标的移动(额叶眼动区神经元)。上丘阻止那些仅由最活跃神经元触发的眼动,但它们必须首先说服其神经元同伴处于关闭状态(即抑制)。

这种阻止我们眼睛到处乱看的协商,正是停下来思考的基本形式,这主要取决于即时视觉输入的特性。有时,目标很醒目(例如,黑色背景上的一个亮

点），便足以触发一个眼跳。如若不能，就须进一步"加工"（神经学家们的说法）或"思考"（其他人的说法）。输入信息达到视觉皮层后便从后往前兵分两路横穿大脑。其中稍快的是"在哪里"通道，决定接下来的眼动；稍慢的是"是什么"通道，逐步识别目标。它们在前额叶汇总，但会和途中的每个突触沟通，分享他们越来越精确的有关如何移动眼球（"在哪里"）及会看到什么（"是什么"）的猜测。后顶叶皮层可能将输入信号分析得很精确而足以使上丘触发一个眼跳。如若不然，信号就会继续向前到达额叶眼动区和前额皮质，停下来思考会一直持续直到触发眼动。

努力与适应

为了说明前额皮质的工作并无特别神奇之处，我已详细描述了眼动的控制过程。它与其他脑区一样运转，只是速度更慢、信息更充分而已。相对于低度开发的前额叶，前额皮质使得以往经历在决定当前行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过去不断地影响当前，增强了感知的持续性，这可能是人类自我意识不易动摇的原因之一。然而日常生活是不需要前额皮质进行高强度工作的：我们的行为经常是出于惯性而非思考。被实践加强了的大脑其他部位高度开发的认知网，保证了神经活动的输入输出。诸如呼吸、行走、驾驶等一些日常行为，无须麻烦高层，而由专业下属认知网负责。

在处理新奇事物或挑战时，前额皮质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表明，当学习新事物时，它最为活跃。当任务自动化变得简单后，前额皮质的活跃度随之减弱。这是因为较低层次认知网（例如，连接后顶叶皮层到上丘的认知网）比更高层次的认知网强化速率更快。第8章中讲到：简单认知网比复杂的认知网坚固，而常用的认知网比不常用的认知网坚固。较低层次的认知网比那些含有前额皮质的认知网简单（因为涉及的脑区较少），且被激活的频率更高，因为很多日常行为会激活后顶叶皮层而不会激活前额皮质。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对任务愈发熟悉，前额皮质的参与则会愈少。

如上所述，前额皮质被激活后会发送信号到其他脑区。这些信号会加强相应认知网（由以往经验链接的认知网）的活动，而抑制其他认知网。返回到第8章有关水流的类比，我们看到，这种抑制减少了泄漏。信号在无数连接中没有活动耗散，而是集中于少量认知网，从而使该部分加固得更快。因此，如第8章中所述，前额皮质可以像捏着软管的拇指，暂时提高特定认知网的流

量，使它们加固得更快。从这个意义上说，前额皮质是自限性的，其目的是减少自身的活动。其他脑区也是如此。换句话说，人类大脑似乎天生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工作量。

前额叶活动繁重，需用大量的脑资源。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行家本能地理解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聪明的推销员会先用新奇事物吸引顾客，再用大量信息狂轰滥炸，使得其前额皮质疲惫不堪而只能同意购买。

意 识

除在抵御外部干扰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外，很多神经科学家相信，前额皮质在有意识的思维活动中功不可没。当然，这里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意识究竟该如何定义，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思想家们上千年。我不会一一陈述意识理论的细枝末节（尽管其细节很迷人，但在此没有必要），只是简单地将意识分为觉知和监测两类，这和很多脑研究者的观点相近。

认知是脑部活动一种持续的结果，除了人类以外其他很多物种都具有。它是无我的一种意识，因此备受一些宗教传统推崇，比如佛教，认为明显的自我意识是有问题的。它还受到其他行家的青睐，回想一下（第4章）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所说的代理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人会沉迷细节而忽略行动更为广泛的含义。有些刺激源，特别是熟悉或反复出现的刺激源，很可能使大脑产生认知。托马斯·艾略特的描述——“或是听得过于深切/却又什么都听不到，只要余音未绝，你就是音乐”——抓住了认知的本质。

监测是一个涉及前额叶的更为专业化的过程。它是间歇性的，当面对新奇和充满挑战的事物时，就浸入认知流最活跃的部分进行采样。复杂刺激源有机会激活大脑的历史输入，从而引发监测性反应，而简单的或者熟悉的刺激则不太可能。就是这种涉及前额叶的监测性意识，使得意识能够不可思议地最大限度地减少自身活动。监测过程把我们的思想切成易控制，进而能够被操控、合并及重组的数段，从而使人类符号系统（如语言和数学等）具有潜在的无限变化的特征。

这种取样的能力对记忆力尤为重要。认知这种神经活动流经大脑时，无须意识的干预，就能改变沿途的认知网，从而记录下它的不断变化情况。这是内隐记忆的基础，通过这种记忆，我们不知不觉就可以学会新的技巧，或适应一瓶橘汁重量的不断变化。然而，我们也有用来了解事件、背单词或回忆某特

定情形的外显记忆。所有这些都需要取样的能力。当我的室友试图扩大她意大利语的词汇量时，她只想记住单词。她不需详细回忆她当时坐的沙发、旁边花瓶中菊花的香味，或邻居家剪草机的声音。她所需要的是心无旁骛地集中注意力于一点。如果她足够专心，那么涉及意大利语学习的已有输入就会强烈刺激前额皮质，可能让她精神集中以致我问她想喝点什么都听不到。如若不然，她想得更多的可能是邻居的花园而不是意大利语词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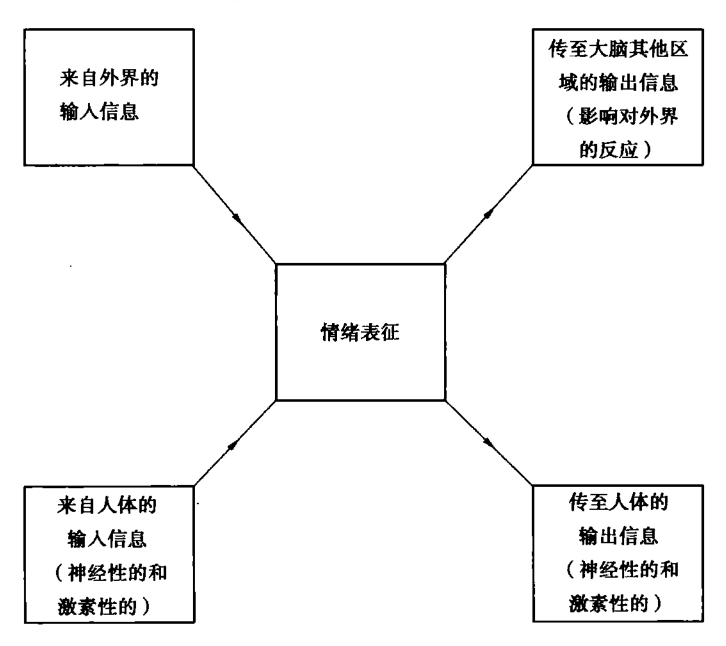


图 9.1　简要地描绘了情绪表征（ERs）接收到的输入信息和 ERs 输出的信息。图中箭头表示信息流的方向，但这是高度简化后的图示，实际上，神经交流大部分是双向性的。

个人大脑

如果监测与前额叶活动相关，那么监测的程度则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会对时间更敏感，即使他们的起居规律与其他人相似。前额叶只有在青春期后期才能发育完成，而且会像肌肉一样，越用越好用。同样，像肌肉一样，它可以通过训练变得更加高效，从而增强注意力和短时记忆。接受教育和持续的情感活动以及接触新鲜事物和复杂环境都能够促使它完善。岁月将知识层层累积，为前额皮质提供更多的历史记录。正如运动能锻炼肌肉、强身健体、抵御疾病一样，经常使用前额叶皮层则能够完善认知网、活跃思维、抵御他人影响。

有证据表明前额能力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前额皮质的功能比男性要发育得早。也有证据表明其功能还存在个体差异。例如,对前额皮质至关重要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就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基因结构。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像苯丙胺类的药物来增加前额叶的多巴胺,以改善情绪并辅助思考。也许随着对遗传学和神经科学更为深入地了解,人类会开发出更具选择性和更有效的认知增强剂。也许,将来保险公司在订立条款前,会要求参保人进行脑部扫描以评估其前额叶的功能,而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行家可能在规划其活动时定期使用神经科学调查("神经营销"这个词已经被杜撰出来了,尽管有关该领域的研究极少)。但与此同时,前额皮质如何因人而异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本章小结

前额皮质的工作原理对于研究洗脑至关重要。在本章开头我说过,这个最迷人的皮层区执行着大脑的思想。它在过去和当前之间斡旋,使行为不只是简单的刺激驱动,还受到积累的知识的影响,从而变得更加复杂。过去的经验有助于大脑形成随时间推移的连贯印象,从而有助于形成在第7章讨论的稳固感。有教育背景和广泛经验相助而又健康的前额皮质,能够(时而)让人放眼未来,抗拒当前诱惑,以免饮鸩止渴。所有这些能力都不利于潜在的操纵者。在理想情况下,洗脑者能够绕过或抑制前额皮质,使得被洗脑者动摇或打消之前的信念,屈服于当前的欲念。这种技术能否与盘绕在人们大脑前端那个惊人的"机器"相匹敌呢?我将在第14章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探讨。

然而,这个困扰人类长达两千年的疑难,仍是藏在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核心概念领域的一个黑洞。在本章及前面章节中,我只从纯因果关系方面分析了大脑。信息的流入(在前额皮质和其他地方)产生影响,反过来又会产生回应。尽管尚未完全理清构成神经活动的突触机制,但也怎么都不可能存在魔力操控的可能性。不过,人类也有其神奇的一面,我们称之为自由。有些人为了这崇高的自由而甘愿牺牲自己。第1章中提到,自我控制是自由的核心。我们把这种自我控制称作自由意志:虽然经常为诱惑驱使,但我们还是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握自身命运。这种"掌握"意识是洗脑过程的核心。没有这种"掌握"意识,那么精神控制又有什么令人称奇或可怕之处呢?因为洗脑者的操控意图就只不过是因果关系中的一部分而已。然而,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那么我们又怎能自由呢?在下一章中,我将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第11章　自由那点事儿

但愿我知道"自由"是怎样的感觉。

妮娜·西蒙[①],《歌名》

在第6章末尾,我提到了洗脑的六个核心概念:权力、改变、因果作用、责任、自我和自由意志。洗脑是对受害人施加影响,以改变其思想和行为的过程。这些变化可能会太过深刻以致影响到其核心的自我意识这个最坚定的信念。被洗脑的人没有了自由意志:他们按洗脑者的命令行事。然而,成功的洗脑却能让受害者全然意识不到这种新式奴役的存在,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有责任的行动者。除非公众都知道他们被洗脑了,否则社会也把他们当作是自由的。洗脑的本质在于:受害者意识不到自身思想和行为被他人控制。自身拥有的行动能力和自由成为泡影,自我控制也成了美丽的空壳。

自由意志的问题

洗脑似乎只是杞人忧天。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被广告和媒体所操纵,但当我们观看某个广告时,我们知道它的目的。我们可以去买些社会心理学的书籍来了解那些广告的花招,即使我们发现自己买了并不需要的产品,从根本上我们仍然觉得自己是自由的。难道不是吗?

可能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毕竟,我们是多么迷信自由!就连我们语言中的动词,也似乎暗含着随心行动或自我控制的能力。"我行"不仅是大多孩子最爱用的字眼,成人也钟情于此。我们早就开始学习控制自己的身体,这让我们领略了能动的魅力,以至于小时候我们一看到新玩具时,我们就想拥有它。瞧!我们的手就在那儿,就像殷勤的服务员,正伸出去

① Nina Simone(1933—2003):美国歌手、作曲家与钢琴表演家。她的创作歌曲类型主要包括蓝调、节奏蓝调和灵魂乐。她的演唱方式则以富有情感、带有气息的变化音为主要特色。

抓呢。从那以后，我们便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而生活却满是挫折。我们坚信我们能控制自己，直到发现其实不然；随着对世界认知的加深，自由所面对的限制也不断增多。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无论欣然与否，都接受了这些限制。我们在形成其他价值观（如从安全到地位，从法制到仁爱）的同时，不得不放弃部分自由来实现这些价值。我们甚至可以让自己鄙视被放弃了的那部分自由。然而，自由仍然是世界上最缥缈却最强大的思想之一，在无数为之献身的男男女女的尸骸上飘扬着它血迹斑斑的旌旗。

这与责任也有关。如果自由是幻想，那又如何判断我们是否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第6章已指出，自由和责任乃司法体系中重要的两个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指控帕蒂·赫斯特和查尔斯·曼森案轰动一时。一个遭少年抢劫的老太太认为，该少年当时行动自由且本可以选择不伤害她。法官判处这名男孩去做社区服务，以强行惩戒，但如果这个男孩当时的行为不受自己控制，那么法官这样的判决就显得毫无意义，甚至残忍了。

自由激励着我们。归咎责任时，我们也依靠自由。但“自由只是幻想”这个的著名观点由来已久。要了解人们为何如此认识自由，我们需要转向对此不懈探索的一个学科：哲学。

自由论与决定论

指动字成，字成指动；
任你如何至诚，如何机智，
难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
任你眼泪流完也难洗掉一字。
人称说天宇是个复盆，
我们匍匐着在此生死，
莫用举手去求他哀怜，
他之不能动移犹如我你。

《鲁拜集》，菲茨杰拉德译

在宗教思想中，“自由只是幻想”的观点以宿命论的形式出现。哲学称之为“必然性”或“决定论”；通常我们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或“天意如此”。这一度是科学研究的基石，直到量子力学问世。大多数科学家（及大部分人）仍然认为周围世界是可靠而稳定的，所以可以理解，这仍然是“决定论”



在起作用。

决定论认为,宇宙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则,人类能够掌握且利用它来预测未来。假如这些规则尽为人知,那么推测就可以准确无误,因为事出有因,因果循环。就如哲学家彼得·范·因瓦根②所说,决定论认为"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个确定的可能未来"。那个未来由所有发生过的事件而决定,因此除了后来实际导致的状态外别无其他可能。

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的所谓自由之感觉又会如何呢?我们本可以不用去考虑自由。自由意志的评论者从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决定论者说,无论我们接受与否,自由只是幻想。自由意志论者否认决定论,主张我们中只有部分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而兼容论者认为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可同时成立。

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决定论。最近很多作者对此进行了评述,但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说明。可以说,我们实在无法完全否定因果决定论。我们依赖于宇宙自身的运转。即使在推测和解释思维、行为时,我们都假定因果相连。毕竟,我们都得为我们的行为找个理由。如果我的腿开始莫名地移动,我并不会认为该行为不受因果必然制约,不会为终于证明了决定论的谬误而雀跃。我会等待移动再次发生,以证实那不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然后我会努力查找原因,如果查不出,我就去看医生,而不是哲学家。

并不是超然于因果之外才是自由——这就是为何量子理论并没有像某些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成为自由意志的救世主——随心而为才是自由。当我的腿移动时,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事出有因的,即是我想让它动它才动的。我有这个想法,也有这种能力。瞧!是我在指挥它行动。自由意味着能够实现我们的意愿,将"我行"变成"我做"。如果我可以选择不做,那我的行为就是自由的。"啊",决定论者来搅局,"但你的决定、意愿是完全由一连串的原因所致,而如果想完全追溯清楚这些原因就得回到宇宙之初。如此,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别无选择"。如果果真如此,那自由又在何方?唉,可如果它只是幻想,那为什么我们又如此坚信它的存在呢?道德责任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又该作何解释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从而理清洗脑对自由的影响,我们需要首先看看自由这个观念本身。

---

② Peter van Inwagen(1942—):美国分析哲学家,圣母大学哲学教授,是当代形而上学、宗教哲学和行动哲学的领军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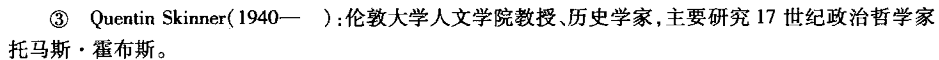
自由简史

有史以来，人们就对自由魂牵梦萦，只是表达方式迥然有异而已。例如，古代的斯多葛派学者认为，一个理智而善良的公民（当时女人通常不被当作公民）就是自由人，即使他沦为奴仆。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就是从善、理智的意志力，而该意志并不会被恶意和冲动所奴役。

然而，有些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者认为，这只是为了使人们安于不平等现状的便捷手段。他们坚持，自由的底线是自愿。另一些人走得更远，他们认为，自由不仅意味着自愿还意味着自立。如果一个人依赖于其他，比如其赞助者的施舍，那么即使他有能力做其想做的，也并非真正地拥有自由。他对可以随时改变主意的赞助者并无一丝掌控能力。真正的自由在于自给自足。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有法律，而是依法塑造自己的人生。这就需要一个比现存任何制度形式都要密集又直接的民主形式，且每个自由公民都能直接参与法律制定。

作为政治思想方面的历史学家，昆庭·斯金纳[3]强烈反对这个观点，他说这种“新罗马”自由学说在文艺复兴时期再现，主要是受意大利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4]的巨大影响。在约翰·弥尔顿等作家用此学说来抨击查理一世时，这在英国备受推崇。但是，随着王朝复辟以及强烈反对该自由学说的托马斯·霍布斯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逐渐增强，新罗马共和思想也渐渐失宠。托马斯·霍布斯认为，自由的唯一条件是自愿，而非自立。再者，随着社会愈发复杂并相互依存，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使自给自足愈发不切实际。尽管新罗马（共和主义）观念一直影响着政治思想——18 世纪政治哲学家卢梭的作品即是例子——但它在现代的影响已大不如前。

从新罗马的自立（无潜在胁迫）（如善变的赞助者实施的胁迫）到霍布斯的自愿（无实际胁迫），自由的限制减少了，范围扩大了。古时候，律法和政府干预几乎渗透到人类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如今，神权和独裁依然如此。不过许多国家都已经承认了“私人空间”这个概念，即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政府就无权干涉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这种观念导致了古典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其



③ Quentin Skinner（1940— ）：伦敦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家，主要研究 17 世纪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

④ 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重要人物，尤其著名的是他的《君主论》一书中提出的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及《论李维》一书中提出的共和主义理论。



极端形式是极权主义)在现代的对立。自由主义趋向于扩大私人空间,即尽可能排除政府干预,除非威胁到其他公民。专制主义的观点则是政府机构能够代表大众自我控制的最明智、最周全的方面(政府就如同社会的前额叶皮层)。因此,他们可能比我们自己更清楚什么对我们有利。这种观点趋向于缩小私人空间(在极权主义中,私人空间缩减为零)。

将自由—专制这种二分式看作个体—组织的关系范围可能更为合适,这种个体—组织关系范围广泛,包括了从(像弥尔顿等)强调个人自由的政治体系到(像霍布斯等)强调社会机构职能的政治体系(或思想)。在该范围中,社会的落脚点取决于对人性的普遍看法。极权主义统治将法典凌驾于人之上(见表1.1);他们认为相对于社会的稳定而言,个体并不重要,缥缈虚无的理想的实现高于一切。自我控制不在政治机构的考虑之列,因为他们不相信个人会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作出牺牲。正如邪教要求信徒崇拜忏悔一样,个体变得无足轻重,隐私也不复存在。理想情况下,每个公民头脑中的每个认知网都已由国家代理们设置好了——通过环境控制、秘密操控、语言加载以及其他极权手段——而且每一个激活认知网的刺激源也就这样被国家控制了,使公民不停地忙碌有助于让他们不断接受刺激,最大程度减少他们受到额外——潜在反叛性——认知网激活的机会;(对他人的)放纵可不是独裁者的最爱。然而,中央极权使得很多极权政府官僚化、腐败化,遏制了经济增长,也降低了人民生活质量。

自由政体对其公民的期望值很高。他们统治的无形理念就是个人自由。自我喷薄而出,想象力、创造力和隐私得到了极大尊重。只要他人不会受到威胁,约束就内化到个人,自己拥有各自的认知网。作为这种自由的交换,政府期望公民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

哪种观点正确呢? 我们是独立的个体还是可操纵的机器? 是实实在在的人还是仅为影子而已? 对于认为自由意志可以且的确与因果世界共存的兼容论者来说,自由仍有一席之地。但对于认为自由意志纯属幻想的决定论者来说,把缥缈的自由提到首要位置,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歌功颂德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持决定论的政府更加专制。这似乎也是事实。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随着科学的发展,决定论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不断加强。坚持种族是性格决定因素的生物决定论,为酿成大屠杀的反犹分子提供了额外的毒液。

然而,虽然决定论可以为反人性罪行提供方便,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终将或应该将其从哲学中剔除出局。如果自由意志只是幻想,那么我们只需重组政

治体系以避免过激的可怕行为,假如可能的话。不过,这只是兼容论沦为谬论时的无奈之举。那么,接下来就看看自由意志能否真正存在于因果世界。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共存的夙愿

近年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为自由意志辩护的兼容论著作是丹尼尔·丹尼特的《自由的进化》。如书名所示,丹尼特认为自由并非是绝对的全有或全无,地球的有机生命拥有不同程度的自由,自由的形式从低到高慢慢进化发展,这正如人的进化过程一样。他承认自由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但同时又说,自由不必为了得到高度尊重而化身为道德的绝对标杆。事实上,就是这种非白即黑的专制论使得抽象本身自我对立。而丹尼特认为这种对立正是问题的根源。相反,假如我们把自由视为进化的产物,那么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这个古老的、毫无结果的争论就分解成了一系列更小、更好回答的问题。

> 那么我们的发明、抉择、罪过和胜利又与美丽但是非不分的蜘蛛网何异呢?苹果派,一个精心准备用于和解的礼物,在道德上同一个逐渐发育以吸引果蝇为其传播种子并施以果糖作为交换的苹果又有何异呢?如果我们仅仅将其作为修辞问题来看待,暗示说只有奇迹才能将我们的创造与物质机械主义漫无目的的盲目制造区分开来,那么我们仍将继续纠结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这个问题上,陷入这个神秘的漩涡而无法自拔。人类行为——爱与天赋,以及罪行——与随机或定向运转的原子内部的运动大不一样,因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勾勒出后者的清晰构架。几千年来,哲学家试图通过一两次大胆的猜想来将它们联系起来,要么从科学的角度,要么从人类自尊的角度出发——或(正确但毫无说服力地)宣称只要深入探究,两者就能和谐并存。通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通过勾勒出能够将我们从无意识原子运动带入自由行为的科学之路,我们尽情放飞想象的翅膀。
>
> 丹尼特,《自由的进化》,第305—3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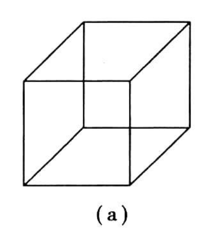
按照丹尼特的说法,自由在于有能力预测未来。这种能力使得生物体能够主动避免可能造成的伤害。之所以能够避免伤害是因为像人类这样的生物体,在进化中造就了"通过与外界相互作用而改变自身特性"的能力。而这种可变性恰是自由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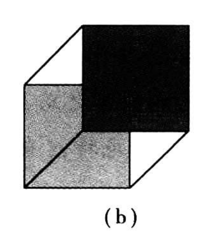
预测未来须以知识为基础。储存和检索庞大记忆内容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

在丰富的信息基础上对未来作出判断。记忆也可以延伸过去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事由范围。杯子碎了是因为我把它弄掉了,但人的这种行为却可能是由很多年前的事情(如,童年创伤)引起的。由于过去发生的一切,记忆对行为的影响大大加强了。我们不再像因果循环细绳上下滑的珠子,简单地由刺激驱动,我们行为的动因也不只是由刚刚发生过的事件而引起。当有人踩着我们的脚,我们当然会疼得大叫;但是,我们喝酒、撒谎或恋爱不可能只出于某单一原因。

能够积累并储藏知识意味着我们可以对未来作出复杂而长远的预测,以此来改变自己。准确地说,因为未来有章可循——有序且可预见——所以我们能够发现它的规律进而加以预测。这种预测能力是通过进化得来的;相比之下,有幸拥有这种能力的生物存活和繁衍的几率会更大。能够预测未来的机体已不再是完全的刺激驱动体,因为他们内部的未来模型(预测)更为发达,这些模型的认知网更有可能影响行为(通过与后顶叶(PPC)及前额叶(PFC)等区域的联系)。也就是说,预测本身成为了行为的动因。这样的机体不再生活在接连不断的意外之中,他们起码能够从容面对某些意外。由此,停下来思考的能力——抵御洗脑的核心——诞生了。

心理学家乔治·安斯利[5]在他那本引人入胜的书《意志的瓦解》中称,这种现在与未来的互动是"跨时谈判"。它发生在一个多重的自我之中,这种自我类似时常角逐利益的"内部市场"。回忆一下我在第 8 章所提到的活跃自我和休眠自我。无论何时,活跃自我总是所有当时被激活的认知网的集合。不过即使相互冲突,其他的认知网也会随时活跃起来。内克尔立方体——相互冲突的认知网被快速轮流激活的一个视觉错觉(见图 11.1(a))——就是两个矛盾认知网相互转换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从右上方(见图 11.1(b))或左下方(见图 11.1(c))看这个立方体,但不可能同时从两个方向看。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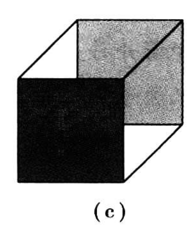

(c)

图 11.1 (a)内克尔立方体错觉,(b)和(c)是两种可能的视角,但不可能同时看到。

---

[5] George Ainslie:美国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家。

活跃及休眠的认知网一起实现安斯利所说的"利益"。有时,这些"利益"为了共同的目标(如生存)会携手合作。有时又会相互竞争:这一刻这个活跃起来("巧克力对我没好处,我不吃了"),下一刻那个又被激活("她给我糖吃,不要的话会显得不礼貌")。与预期回报(如,长远的健康和眼前的满足)相关的利益可看作是确保行为产生预期回报的施事者。长远的健康利益希望远离巧克力;而眼前的利益是立即得到巧克力。在长远利益占上风时,为得到预期回报(长远健康),无论何时看到巧克力,它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小(从长远利益向眼前利益)倒戈的机会。如安斯利所说,"有心防备赛壬的尤利西斯必须将被赛壬歌声诱惑的尤利西斯当成另外一个人,如若可能就接受影响,否则就做好预防"。事实上,当前的活跃自我(包括长远利益)和未来自我达成一个他们不会背叛的合约。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跨时谈判就不可能完成,因为有关长远利益的想法甚至无法进入竞争行列(如果你没有长远意识,就不会关心你将来是否健康)。停下来思考的能力不仅使我们的长远利益进入竞争行列,而且还一举获胜。

当然,它们也并不总能获胜。在当前自我与将来自我的较量中,倘若眼前利益主导了行动,意志就败下阵来。不过,成功抵制诱惑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很多时候我们受刺激驱动,在还未意识到自身行为时便机械地作出反应。但有时,当历史输入(如前一章所述)被激活后,我们就具备了掌控发展趋势,决定下一步动向的能力。正是这些在过去(有时甚至是很久以前)而不是在当前形成的认知网达成安斯利所说的跨时合约。如果当前的活跃自我能够借助前额叶的聚焦能力充分加强编码饮食利益的认知网,那么将来该认知网就会极容易且极强烈地被激活。当巧克力出现时,被激活和加强了的认知网就会提醒我们先前订立的合约(利于健康的)。假如之前的加强过程足够充分,那么即使再美味的巧克力也无法激活相冲突的认知网而使其放弃对于健康的追求。

如果一个人有预测未来的能力,那么在特定的时候便能够预见未来自我的可能行为。如果意志够坚定,跨时合约便会生效,并指挥未来自我的行动。丹尼特和安斯利认为,我们正是在这种改变未来自我的能力中寻求着自由。当然,也不能保证合约一定被执行(巧克力太诱人了)。自由不确定,我们的预测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

这就是能够与决定论相容的那种自由吗?是的。当前自我由于某种原因建立了一个跨时合约,就如未来自我出于某种原因须在决定如何行动时将该合约纳入考虑之列。而其中的相关原因包括被所在环境刺激源(如,巧克力的



大小、形状和气味等)直接激活的认知网,被刺激源间接激活的历史输入(如,过去吃巧克力的感觉,巧克力不利于健康的相关知识)认知网,以及代表身体感觉的认知网(如饿了,饱了)。

如上一章所述,所有这些神经通路及其他共同决定最终行为。明显的原因(如朋友把巧克力在你鼻子底下挥来挥去)会导致大脑内部发生诸多反应,从而决定你的行为。然而,大量的类似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可能,它们都整齐地隐藏在颅骨下方,这让人想起了《神秘博士》中的塔迪斯(时空穿梭机)。匹配、周旋等机制使得数量众多的各种可能分解为最终的一个唯一结果,就像薛定谔的波函数那样。

这个结果往往是可预见的(你的朋友可能很清楚你无法抗拒巧克力)。然而,由于所涉及神经通道的复杂性,也并不总能成功预测(这就是为什么行为主义——如果你想了解大脑,那么输入和输出、刺激和反应,都是你所知道的和需要知道的——这个理论模型在面对简单刺激时有用,而在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却束手无策的原因)。有时,刺激会导致预料内的行为(你接受了巧克力)。有时则不然(昨晚在浴室称完体重后,你保证再也不碰甜食了)。而有时,无论是你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你为何——或为何不——接受那块巧克力。这并不意味着你的行为就无迹可循,只是原因太复杂且其中有些连你都还未意识到。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不希望自己毫无理由地自由行动,而期望行动出于自身内部的原因。如果你说,“因为我想吃,所以才拿那块巧克力”,或甚至说“因为我无法抗拒它”,那么你承认了是你对巧克力的欲望使得你接受。这是否意味着你的行动不自由了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只有当你毫无行动缘由、欲望或这样那样的爱好时,才能获得自由。但如果你说“我想吃巧克力”与“我是自由地拿巧克力”完全兼容的话,那么即使你的行为是出于你的欲望,你仍然是自由的。同时,你的欲望也是由大脑中各种复杂反应联合形成,而这些反应又是由大量不同因素所致,如它的香味及你此前对各种巧克力的记忆。否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如同一只被控制的木偶,乱动一气。虽然欲望、信念或其他原因被重新审视为大脑活动,你会发现它们仍然属于你,由此而产生的行动也仍是自由的,这一点丝毫不会发生改变。

但难道那些原因都必须是要意识到的吗?不然,除非你认为自我即为意识到的自我,并相信晚上入睡后你就不存在了。一个从未意识到的认知网仍然可以控制行为,而有时(例如,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控制妄想)意识到的认知网却可被解释为不是你的,因此能否意识到并不保证行为受控。如果你大脑正

常的话，一般认为，你的行为在被证明不受你控制之前都是你的。仅仅因为我毫无意识地从餐具抽屉中拿出勺子吃早餐，并不意味着是别人把勺子放在我手里的，而只能说明我的意识是集中在了更为重要的事情上面。

这个有关自由的观点如何与我们日常所说的“相同情况下，我本可以不这么做”的自由契合呢？严格的决定论否认这种契合，因为它声称“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个确定的可能未来”。如果朋友给你巧克力，你接受了，那么如果完全相同的情况再次发生，你还是会接受：也就是说你不可能不这么做。

“相同情况下，我本可以不这么做”，这个条件使得自由这个概念在现实世界无用武之地。原因很简单，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种情境。即使外部事件可以重来，你自己却回不去了。你记住了上次的情形，预测能力让你可以从过去吸取教训。清楚自己难以抵制巧克力后，某些执行健康饮食跨时合约的认知网可能会被加强。如果你发现自己处于《土拨鼠日》中的巧克力情境中，一遍又一遍地面临同样的美食诱惑，你会像片中的比尔·莫雷所做的一样，不断吸取教训。“我本可以不这么做”的真正含义是“如果我想，我就可以拒绝”，但这就不是“相同情况下”了（你那时不想拒绝，而此时想拒绝）。因此，以“下次我会拒绝”来代替“我本可以不这么做”也许更好（因为我在此期间已经改变了，而这变化的后果可能我自己都无法预测）。后一句没什么用处；前一句却给了我们自由。

换句话说，自由在于可预测性和可变化性。如果你能（在过去）改变你头脑中的认知网使得你（现在）能够婉言谢绝，那么即使你接受了，你依然是自由的。如果你本可以（但没有）作出这个（回绝的）改变，那么你（接受）的行为就是可变的。类似的，你现在也可以作出下一次回绝巧克力的这种改变。改变思想的欲望本身缘于你头脑中无数交织着的认知网。其中有些是积极但无关的改变（比如当你在想其他事情时，所作出的避免把车开出车道的改变）。然而，其他改变，如提醒你今早在镜中的所见，浴室里的体重秤上惊人增长的数字，打动心上人的愿望等，都是你放弃巧克力的原因——你自己的原因。至于它们能否决定你的行为，只有时间、你的大脑以及外部世界才能证明。如果给你巧克力的人突然拿枪指着你，说不吃就得死，即使是最坚固的跨时合约也会被其他方面的考虑所撕毁（当然，除非你愿意为你坚守的原则而死）。

当前自我能够影响未来自我的这种能力也解释了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所说的自制（第10章有引用）：在明知自己是受刺激驱动，并且十分具体化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屈从”，并说“我无法控制自己不这么做”。正如我们可



以订立一个影响我们未来自我的跨时合约一样，我们也可以做些安排使合约极可能被撕毁（例如，上班时有意经过我们最喜欢的巧克力店）。跨时合约可能由长远利益订立，也可能由眼前利益订立，可能有利于机体，也可能有害于（如成瘾）机体。我们形成这些合约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前额叶皮层的功能，而它的功能随年龄、经验、摄入用于细胞再生元素的多少，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发出某个行为的）原因有很多种。有些原因明显来自外部，比如折磨、欺凌、专横的法律，也明显制约了我们的自由。有些则来自内部，但依然可被认为是外部原因，如脑疾或药物作用。然而，我们的行为是出于自己的原因。这些原因并没限制我们的自由；相反没有它们，自由就没有任何意义。而洗脑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让我们相信那些外来观念是我们自己的。当然，即使就是我们自身的观念本身，它们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你自己变得足够小，那么几乎一切都可以变成外部的了。”由此，即便是你自己的欲望也变成了外在的，成了你自由的枷锁。成瘾和一些疾病，如厌食症，往往就是这种情况：自我皱缩了，自由放任了，也开始回避责任了。过度皱缩的自我可能缩小为笛卡尔坐标系中一个孤立的点，任凭命运的摆弄，用处微不足道，甚至没有用处。不过也并非别无选择：决定论并没有逼迫我们成为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者。

自由与责任

对自由的上述描述会带来什么样的道德责任后果呢？没什么灾难性的后果。社会中的成年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们行动的特定的跨时合约（原则）。这些原则因人而异，但其中有些原则却是一致的。例如，在要开车时，我们不会让自己喝醉；也就是说，有一个自我保护原则，使我们在知道自己要开车的情况下阻止自己喝过头。这些一致原则——其中一些已形成法规——使我们能够正常社交，保证日常生活有条不紊。无论是通过正规教育、家长教导或其他途径，我们期望每一个成年人都能意识到这些原则，并形成适当的跨时合约。以此期望为基础，我们预测成年人的行为能够遵守一致原则，而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预测都是正确的。

当预测不准时，其原因往往显而易见。例如，脑疾或外部压力，可以导致跨时合约失效，当事人的行为不可避免。此时这个人就不再自由，也就无须为其行为负责。当原因并不明显时，我们会认为是其自身原因导致了他的行为。这就

意味着，这个人可以预测其自身行为的后果，而这后果会让“任何理智之人”（如那句法律名言）都改变想法，放弃此举。如果他本可以作相应改变却没有变的话，他就理应对此负责，除非他能够证明自己当时无法作出相应的改变。

责任牵涉一个社会判断的问题，像其他社会判断一样，它容易出现偏差。社会心理学表明，（在行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将责任归咎于某人，取决于这个人及其行为本身。如果是我们喜欢的人，他做得好时，我们就会大加赞赏；做得不好时，则会为其开脱。如果是不喜欢的人，情形就会相反。当然，法律对待当事人应当是中立的。但是，既然决定我们是否喜欢某人的因素之一是他（她）与我们自身的相似度，那就不由得令人怀疑这种中立的可信度（例如，法官是一个年老、保守的男性白人，而被告是一个年轻、奔放的黑人妇女）。因此，设法使司法机关更具人民代表性的做法很值得提倡。

自由感

领会丹尼特或安斯利的论述可能会隐约令读者感到不安。他们的论述扣人心弦，极具说服力，但，但……这些预测之说，不同时期自我之间的跨时谈判与合约之说，都很干涩，当然，这与人的认知有关。“自由不是‘想’到的，而是‘感’到的”。如果读者的直觉是正确的，那么人的自由感实际上是一种情绪。如第9章中所述，情绪有认知成分，但也有情感成分：提供某种动力的感觉。是什么导致人脑有这样的感觉呢？把自由看成是这种感觉有没有意义呢？倘若有，那么这种感觉的存在又为的是什么呢？

这里，我想大胆做些猜想。我想我们确实可以有效地将自由感看成是一种情绪。神经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研究和识别产生恐惧的生理条件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也能找出产生自由感的生理条件。我估计，这些条件会包含一种对人体本身十分有益的放松状态，这种状态时常伴随其他积极情绪（如快乐）而出现，并且这两种感觉（自由和快乐）说不定还受到相同脑神经区的协调（也许这些神经区的活动，有时我们感觉为“快乐”，由于其他因素的不同，有时则感觉到“自由”）。另外，这就意味着自由也能让人上瘾。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习惯了自由的人会如此拼命地维护它，而从没尝过自由的人则压根就不会想到去争取它。

自由很诱人，因为它意味着控制。当我们的控制感受到威胁时，就会感到格外压抑；因此，自由意味着没有压力。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主、客观自由。



如前所述,从孩提时期开始,我们就认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能够掌控自己。那时我们的世界很小,客观上我们能做的也很少;正因为很多事情我们还未尝试去做,所以不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这样我们的主观自由感就很强。文明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诱导我们接受一些其他价值观(如社会地位),从而降低我们的自由感,进而使我们更易接受自由的丧失。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如此轻易地放弃自由。

像其他回报一样,自由也往往会自我助长;因为,正如能适应一定程度的强效纯可卡因一样,大脑也能适应一定程度的自由。然而,增强自由的冲动不及维持它的冲动,这种冲动即心理抗拒(见第5章)。在失去自由时,人的反应很消极,就像毒品被拿走时的反应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反应通常都是寻求其他方式来弥补。当一个员工突然被告知他以后不能在工作时间抽烟了,他可能会通过在工作时间发私人邮件来弥补失去的自由。表面上看,吸烟和发送电子邮件之间并无关联。事实上,员工的反抗使他感受到了自由——他已经损害了其老板的利益,正如老板损害了他的利益一样——从而平息由其老板之苛求而挑起的心理抗拒。

那么,为什么要有自由感?拥有自由感的生物体比没有的更具优势吗?如果是,这种优势又是什么呢?再次大胆假设一下,自由感是一个安全信号。它告诉我们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就算不是,至少我们能暂时感到放松。既然如果我们能够控制环境就可以改变环境,那么自由感就意味着可变性。当我们感到行为自由时,自由感就会告诉我们的大脑它能作出相应的变化,去阻止或鼓励未来类似行为的发生(是阻止还是鼓励就取决于这个行为带来的是奖励还是惩罚)。我们的大脑无须主动计算那些可变性的程度,而是记录下我们每一次试图实施特定行为的结果。成功的次数越多,我们就越加肯定我们的这个行为是自由的。

自由感通过抗拒感来平衡。有些事情我们无法控制:这是一个威胁信号。每当我们预测不准时,这个信号便会出现。例如,员工抽烟的期望遭遇新官僚主义。当我们采取行动时,大脑会产生即将行动的预测。这个预测所形成的假设会受到输入信息的核查。如果两者不匹配,就会产生错误信号,调用更多的脑区来分析哪里出现了问题。

这种错误信号就是抗拒感。自由感很诱人,抗拒感则让人厌恶。如果一切顺利(没有任何错误信号),我们就不受到抗拒的困扰,感觉很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早餐时我在思考当天的计划,我依然认为自己从餐具抽屉取出勺

子的行为是自由的。如果我从餐具抽屉里抓出一只叉子(若真发生过一两次),大脑就会显示预测失败:预期视觉输入与我实际在看的物体不相匹配。此时,我(昏睡)的前额叶就会清醒过来并干预此事,唤醒已储存的为什么叉子不适合吃玉米片的历史输入,制订一个再回抽屉取勺子的行动计划。与此同时,我会发现世界(至少是我餐具抽屉里的刀叉世界)和我预测的不一样,这个发现会导致抗拒,与此同时,大脑会给出一个(为何我第一次拿出的是叉子的)可靠解释来抚慰这种(由抗拒引起的)不安感。

自由感及其补集抗拒感,显然是通过进化相互作用发展而来。一个生物体如果在对周遭无能为力时仍坚信一切俱在掌握之中,或者在能够掌控时又感到无能为力,那么,比起那些能够准确判断自身处境的生物来说,它就少了很多生存机会。最好能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快速可达、准确显示可变性的信号系统——更准确地说,是警示可能困境(无法控制的突发状况)的一个抗拒信号系统。

快速的可达性能够避免大脑在有意识回忆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如果可以视自由感为一种情绪,那么它就会像其他情绪一样,加快决策。例如,如果你发现对面来了一辆车,你的恐惧感就会省去对上次类似事件的回忆(如,电影里类似情节中人物的反应)。同样,你的自由感告诉你,上次你立马就挂了一个推销员的电话,而你的抗拒感则告诉你,上次你老板的电话弄得你神经紧绷、疲惫不堪。无须明确记起这其中任何一件,下次你老板电话一来,你的情绪便会低落。

信号准确有两个好处。其一,在无法改变的状况上少花时间(当抗拒信号过弱,机体就会误以为他能控制现状)。其二,准确性还能使机体抓住可能丧失的机会(当抗拒信号过强,本可以控制的状况就会被认作无法改变)。换句话说,准确的自由感能辅助其主人尽可能地把握机会和节省精力。

如果我们的自由感的确是大脑中的一种情绪,就可以有以下几个结论。自由感(及其反面,抗拒)会因人而异,正如有些人更容易开心,而有些人则更易生气。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在他的实验中发现:多数志愿者会听从指示,报告他们所认定的强电击,但总有一些不听指挥。

很明显的另一点是,基于经验的自由感只在某些情况下产生。同一个人,可能在家感到自由而在上班时会觉得拘束,或者相反。自由,像其他情绪一样,也有强弱,而不是非全即无。正如高兴的程度总体上取决于之前所有开心与伤感经历的数量和性质一样,能感受到的自由的程度也基本取决于我们所

有自由(或抗拒)经历的总和。把自由看作一种情绪,还让我想起了第9章中辛格和沙克特的试验,试验中相同的生理感觉(因注射肾上腺素)由于社会状况的不同而诠释成不同的感受。同样,同一情绪体验,在刚做完体检确认我们健康时,我们会感到轻松,而如果我们此时刚出狱,则会感到自由。

自我改变这种能力也让我们比其他人更珍视某些自由,比如被禁止吸烟而同时已决定要戒烟的员工。我们越是习惯于掌控局面,就越珍惜自由,当自由受到威胁时抗拒感就越强,反应也就愈激烈。社会因素显著影响一个人所能体验到的自由程度,有证据表明在大脑经历快速发展的幼儿时期,这些因素的作用尤其强烈。社会经历可能影响许多个性变量的基线水平和范围。例如,早期创伤可能会导致后来的恐惧感("恐惧基线水平"高)。同样,早期的行为限制可能会导致对自由的整体期望偏低,因此抗拒也较少。

自由感以大脑为根本的另一后果是:大脑的改变可能会影响我们感知自由的能力。异常脑功能会造成自由意志紊乱,如幻想受到外星人(或中央情报局、恶魔)控制的精神分裂症以及罕见的异己手综合征。这种怪异的神经状况会导致病人的手,或另一部位,脱离病人控制而进行有目的地行动。例如,抓住门把手不放,拽扯衣服,甚至试图将自己掐死。蓄意破坏或操纵某人的大脑可能影响这个人的自由感(本章已有暗示),而像异己手和控制妄想等综合征会增大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如果减少那些产生抗拒感的重要脑区的活动,会严重影响其对自由的感知,因为人体无法再收到警告自由受到威胁的信号。

有些脑科学家已经开始用现代大脑成像技术来研究自由和施事等问题。例如,有一研究小组用催眠来探索当人处于异己控制之中,即不能控制自身行动时大脑的活动情况。科学家们催眠健康被试,诱使他们认为自己发出的动作是由于外部原因造成的(如将他们的手臂绑在滑轮上)。脑部扫描显示,与被试认为动作是自己发出时相比,当被试误认为自己的动作是由滑轮带动时,他们的顶叶皮层、小脑和前额皮质更为活跃。换句话说,以一种稳定且可重复的方式将大脑的相关功能与异己控制经历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可能。这使我们在弄清为何大脑能为我们提供自由施事之感这条路上迈出了一步。但是,也只是一步而已。还有很多技术和概念问题亟待解决,前路漫漫。

※本章小结

神啊,请赐我勇气,改变能改变的;

请赐我宁静,接受无法改变的;

还请赐我智慧,辨别这两者的不同。

佚名,《平静的祈祷[⑥]》

如果世上的一切皆遵循因果决定,那我们还能自由吗?思想家丹尼尔·丹尼特和乔治·安斯利说,如果自由是指改变未来自我和周围世界的能力,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测能力,那么答案就是我们能自由。然而,自由不仅涉及认知成分(预测、跨时合约),它还是一种由大脑活动模式产生的情绪。《平静之祷》,尽管是老生常谈,但很贴切:自由感是给予我们辨别什么可改变、什么不可改变的智慧的一种情绪信号。正是这种情绪赋予虚无缥缈的自由以推翻独裁者、激发革命,甚至让人们为之献身的强大力量。

回到洗脑,这个思想控制的梦想,因为倘若自由是一种情绪,那就是说像其他情绪一样,自由也能被人操纵。正如我所提过的,如果威胁信号(抗拒)会降低我们的自由感,那么人为地减弱这种信号,就会增加自由感。相反,加强抗拒会使人异常激烈地捍卫其自由,免受所感觉到的威胁危害。这是每一个出色的煽动者都熟知的招数。就像快乐与否并不绝对一样,自由与否也不是绝对的,要视情形、心情和对象而定。

操纵(无论是为了加强抗拒或是为了抑制抗拒)可能是社会性的,比如一个女人买了在广告中看到过的或经推销电话(这不仅能安抚抗拒还能诱使你承诺)介绍的头痛药。前面的章节已表明,社会上的很多操纵——从报纸的生动头条到严刑逼供——都能影响我们。其中一些几乎无法抵抗。但它们都是通过几个世纪的反复试验发展而来的,而不是基于对大脑活动的详尽认识。比如,许多在洗脑中使用的方法都是从严刑拷问中发展而来。

近年来,我们已开始放弃对实验的依赖。新技术使神经科学家对大脑的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当然,仍有大量的未解之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中有些渴望控制他人思想的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在科学完全解开大脑之谜以前,就会利用那些已有的科学发现操纵他人。洗脑的危险不会消失。或许正如第14章所述,洗脑会变得更加可怕。

第3部分将探讨个人和社会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危险。

⑥ 《平静的祈祷》:*The serenity Prayer*,是20世纪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对最初无题祷告的统称。这则祷告被匿名戒酒互助社采纳。



第 3 部分

自由与控制

第 12 章　受害者与操控者

欲治人者，必先治己。

菲利普·马辛杰[①]，《债券投资者》

是时候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了。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爱德华·亨特在1950年提出的“洗脑”这一概念及其发展历史和用途。由于洗脑与大脑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的探讨涉及神经科学、心理学以及哲学，并采用一种更为灵活、全面的结构取代了陈旧的笛卡尔式的“钻石观”。我们已经了解到大脑及大脑中的信念是如何突然改变的，或如何随时间慢慢改变的。当强烈情感所产生的能量不断涌入正在对概念编码的认知网时，就会发生突发性的改变，并将其从单纯的观点强化为坚定的信念。而缓慢的变化程度则往往是循序渐进的，比如习惯的养成。我们同样看到，大脑可以记录我们能够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并且这种可变性信号为我们对自由及其对立面——抗拒——的感知提供了基础。抗拒能够对可能威胁到自由的行为发出警告，这也是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旦我们感觉自己被操控，抗拒便会触动“停下来思考”的程序，这是大脑前额叶为我们抵抗外界影响所提供的基础。一个足够强烈的突然改变（例如强制性洗脑所造成的情感创伤）将会强行压制这种抵抗；而暗中洗脑所带来的缓慢变化则会利用更加带有欺骗性的手段来避免我们察觉到自己所受的影响。

第3部分将运用我们目前的研究成果来回答五个关于洗脑的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关注的是洗脑的受害者：是什么致使部分人特别易受攻击而另一部分人却更善于抵抗？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洗脑的不同方法：依据神经科学及心理学，哪种技术可能最有效？哪些个体可能最容易被洗脑？在

① Philip Massinger（1583—1640）：英国剧作家。他的剧本以讽刺和现实主义，以及政治和社会主题而著称。

这一章中，这些问题都将得到回答。第三个问题（也是第13章的主题）将探讨大规模思想控制的可能性。第14章中我将探讨洗脑的前景以及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随之提出第四个问题：我们有可能桥接目前思想控制梦想与现实间的鸿沟吗？最后，在第15章中我将会着眼于第五个问题：如何抵抗洗脑并最大限度地减小洗脑的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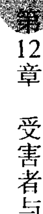
我们都是单独的个体

个体差异的重要性是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大脑，如同它们所生成的自我一样，其形状、大小，以及神经突触和认知网的数量、类型均有巨大差异。无论是从结构还是行为模式来看，没有任何两个大脑是完全相同的。首先，这种多样性源于基因的不同。然而，由于基因在大脑不同区域、不同时间开启和关闭状态不同，基因突变所产生的影响会被极大程度地放大。存在于同一胚胎里的两个细胞拥有相同的DNA。但其中一个将可能分化为表皮细胞，成为头皮屑的繁衍源头；而另一细胞的后代则可能最终分化为神经细胞，在恋人亲吻时触发激情。

基因不同的表达方式造就了这些细胞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开启”的基因有可能最终导致某种可在大脑中发挥多种作用的蛋白质的产生，包括其他基因的开启或关闭。基因的开关也可能由环境开启或关闭：化学药品、电磁刺激以及由充斥着物体、人类和思想观点的世界所激发的感官刺激。化学药品可能通过饮食、药物、身体的激素变化以及感染等途径进入我们的大脑。这些化学药品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由于神经细胞依靠电流传导信号，所以它们自身及其所携带的基因均可能受到电磁辐射的影响。这便是我们使用电休克疗法（ECT）的依据所在。电休克疗法通过向病人实施电击来治疗严重的抑郁症。最后，我们大脑所接受的刺激不仅可以激活神经细胞，还能够改变其内部的基因。遗传与环境将永远逃不掉这样的纠缠。有着如此大的变异性，人类的大脑就绝不是一个标准的程序包，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易受骗者和愤世嫉俗者

基因的这种变异性可以用于解释人的心理特质以及物理结构，包括使人易于或免于产生外在影响易感性的特质。有人面对折磨坚不可摧，有人能在骗子的骗术下毫发无损。他们有能力说“不”，这种能力令其朋友羡慕不已，也令慈善机构和推销员束手无策。如果这类人遇到斯坦利·米尔格兰姆，那他



们可能在实验初期就止步不前(实际上,他的少数实验对象确实如此)。因为他们有着一种内在力量,一种自我信念,正是这些使得他们与社会上各种形式的压力绝缘。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缺乏这种防范意识。尽管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是有免疫的,但事实却无时无刻不在证明我们错了。我们沦为骗子的猎物,接受可疑的提议,购买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并向我们实际上毫不在乎的慈善机构捐款。老实说,我们的暗示感受性应该会使我们与研究服从技术方面的专家——罗伯特·西奥迪尼达成共识,在其(极具影响力的)《影响力》一书的前言部分,他这样写道:

> 现在我可以坦率地承认,我当了一辈子的傻瓜。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在那些小贩、募捐者以及各色各样的经营者的地盘上,我一直都是个易受骗的傻瓜。当然,这些人中也只有一小部分怀有不光彩的动机。其他人——比如某些慈善机构的代表——都怀揣着最美好的意愿。但这些都无关紧要。令我时常感到不安的是,我总会发现自己订购了并不需要的杂志,购买了并不想参加的环卫工人的舞会门票。
>
> 西奥迪尼,《影响力》,前言第 9 页

影响企图的历史与其企图要影响的目标大脑一样久远。因此,现代技术的卓越程度足以与目标大脑相匹敌,这并不令人意外。换句话说,企图影响以及对这种企图的抵抗可被视为演进式军备竞赛中的两名对手。在这场军备竞赛的后期阶段,我们可能偏爱于购买或阅读像罗伯特·西奥迪尼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的著作,但即使如此也无法确保我们能够抵抗产生影响力的那些武器。我们时常忘记自己是拥有思想的独立个体;这或许是因为有时我们太过疲惫,太过忙碌、太过懒惰,抑或是太过软弱。但通常,即便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对大多数影响企图也根本无计可施。我并不在乎我水槽边放的是什么牌子的洗涤液,只要它能用就行。因此我会购买我在广告中最常见到的那一种,前提是它并没有明显比其他品牌昂贵。对所有可供选择的洗涤液进行一个详细的优缺点比较倒也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但那是对时间的极度浪费。只要最后盘子能洗干净,谁又会在乎那么多呢?

改变信念

但有时认真思考确实相当重要。有时,我们会受到操控,作出一些违背自

身最大利益的举动，无论那意味着为购买我们实际并不需要的东西而负债累累，还是为殉难牺牲而往自己身上绑炸药。洗脑的目的是要同时控制思想和行为——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够深入目标对象的大脑。在第14章，我们将会看到现代神经科学如何真正实现这个目标。然而，绝大多数的影响技术并不能直接改变大脑，因此它们会转而去改变大脑所处的环境。

远距离操作的需要给试图影响他人的人设置了两大障碍。第一个障碍便是改变信念所需的时间和所付出的精力，特别是当我们需要作出重大且持久的改变时。激发强烈的情感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新的信仰仍然需要不断反复进行强化，直到它们具有足够的惯性和自发性，以使一切可能导致新信仰发生改变的挑战都得到最大限度地削减。直到它们被安全地控制在意识临界点之下，这些新的认知网才会和目标对象其余的认知图景完全匹配。并且直到它们不再突出，不再引人注目，唤起目标对象怀疑的危险才会消失。

举例来说，这也是为什么邪教总是要求其追随者与自己过去的生活完全脱离的原因。朋友、家庭或者昔日的环境都可能唤醒某人与新教规相冲突的旧认知网，通过最大限度地减小这种可能性，邪教削弱了旧观念对新观念的挑战力。回想我们作决定时，比如，眼睛要移至哪里，大脑的不同区域会互相协调以使其活动模式趋于一致。简单地说，如果区域A希望向左移动而区域B希望向下移动，那么它们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将很可能是让眼睛进行一个飞快的向左下方对角线的扫视。在这种调节过程中，被激发得越强大的认知网越有决定权；而如果区域B的活动强于区域A，那么眼睛的这次扫视将会更倾向于往下而非往左。因此，当一套新的（与邪教有关的）信仰要强加于一个（有时会有巨大差异的）已预先存在的模式上时，决定洗脑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新的认知网比起旧者究竟强大多少。隔离削弱了旧认知网的决定权，并使得邪教环境对强烈情绪和心理的操控效果达到最大化。

试图影响他人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除非他们对目标对象非常了解，否则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工作具有盲目性。他们的目的是让目标对象接受自己所主张的信仰，如果该信仰与目标对象的原有信仰并不矛盾，那这项任务会简单许多。认知网相互间的匹配度越高就越容易被接受，因为它们激活的思想更少，因而需要付出的努力也就更少。我和你的认知网越相似，就会和你有越多的共同点，也就更有可能与你和睦相处。你对我越了解，我们的观点匹配得越紧密，你也就越容易影响我。转变了宗教信仰或政治立场的人常常如此评价其领导者：他们之所说恰是我们之所想。对于相同观念的感知，可以作

为双方共同愉悦的潜在源泉，并进而充当情感黏合剂，使人们行动一致，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组织、部落，抑或是邪教。

然而，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往往无法事先了解其目标对象的认知网的状态。因此一些人便会根据他们自己的背景知识进行猜测（向我推销打折厨房的电话推销员很是不幸：尽管我绝大多数邻居确实都拥有房子）。一些人会试图用精心设计的问题来引导和试探他们的目标对象，但这样做的风险是：目标对象可能会因此变得警惕，从而触发抗拒，或者感到厌烦而开始回避。在构成影响力军备竞赛的各种个体冲突中，冲突双方各有胜负。

然而，在一些极端案例中，强制洗脑有可能会压制住抵抗。而渐进式的暗中洗脑甚至可能逃过最警惕的前额叶的慧眼。尽管如此，有的人仍然明显比其他人更为警惕，或更具抵抗力。是什么特征使一些大脑更脆弱，而一些大脑却更善于保护自己并免受影响呢？本书第 2 部分的研究结果表明，大脑对新信仰的抵制主要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来源：现有认知网的数量、认知网的强度，以及其停下来思考的能力。让我们一起来对这三个来源进行逐一研究吧。

改变认知网

认知网的数量

一个丰富的认知图景充满了各种认知网，并能够以多变且灵活的方式处理各种刺激，这使得洗脑者很难将新的信仰强加于它。借用第 8 章中提到的关于水流的隐喻，我们便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只有少量供水流动的通道，那么每条通道的水流量都会很大，并且水流为了扩大通道面积而产生的侵蚀效应也会相应增大。如果有更多的通道可供使用，那么每条通道的水流量就会减小，通道面积的增大速度也会变慢。认知网也是同样的道理。从刺激输入到反应输出，可供神经活动选择的通道越多，每个单独的神经突触就越弱小。

这就是为什么年龄、教育、创造力以及生活阅历等都可以丰富认知图景，且往往能够抵抗各种影响技巧的原因。人类大脑中神经细胞间的链接数量并非是固定不变的；活跃的深思熟虑可以产生新的神经突触，这也正是为何“用进废退”的道理不仅适用于肌肉还适用于大脑的原因。对一个较为年轻、受教育程度较低且略欠创造力或阅历的大脑来说，与记忆中的存储信息（第 10 章

中所描述过的历史输入）相比，新进信息会占据更大的比重，因为此类个体可利用的个人历史太少。因此，他或她更容易受刺激驱使，对即时环境作出反应而非停下来思考。但对于更为年长、受教育程度更高，或者阅历更加丰富的大脑来说，大脑便拥有更多的历史输入与即时环境所需的行为抗衡。对一个更为年长的人来说，情感或许并不那么令人痛苦，需求也显得并不那么迫切——或许这是因为他早已对这些事情司空见惯了。这大概正是人们认为旅行能够开阔视野的原因：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旅行本身，而是旅途中各种各样新奇的经历（去伊维萨岛喝个烂醉并做爱也许根本没什么大不了，除非在家里喝酒和做爱也被看作是越轨行为）。在一个被各种阅历丰富起来的头脑中，历史输入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这样的头脑更加微妙且独特，它更不容易因外来刺激而有压力，因此更不容易对其实施思想改造术。

拥有更多可供利用的认知网，有助于目标个体抵抗哪怕是最极端的思想改造术。面对胁迫，经受折磨的受害者最常见的反应是：激活自己所珍视的某个特定认知网——比如，宗教信仰或所爱的人的形象——宝贵的生命就依赖于它，并从中获得精神支柱。这就是为什么高明的胁迫总会在残暴中穿插着慈悲的原因所在。面对折磨及各种伤害，爱是最好的解药，表面的关心比痛苦折磨更能有效地击破受害者的心理防线。一位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俘虏向我们描述了他在获得重生之前是如何多次被送往“死神之门”的经历。尽管逮捕他的人应该为险些杀害他而负有责任，但他却说，不久之后“你会感激他们在你快要死去的时候救了你的命……，他们救了你。他们的这种做法常常足以摧毁你的整个思考过程，直到感激之情足以让你对他们言听计从。”久而久之，同样作为产生影响力的武器，救命之恩却会比以死相逼更为有效。

认知网的力量

有些自相矛盾的是，与普通大脑相比，一个拥有较少认知网的大脑同样更难遭受洗脑。如果该大脑中认知网构建良好的话，那的确如此：在遭遇信仰兜售者时，个人自身坚定的信仰至少能够对其提供些微保护。在此需要重申的是，个体总会有差异。一些人虽然有着坚定的信仰，但在他们身上心理学家所称的“控制欲”水平却很低。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感到足够安全，因此在面对持不同意见者时，并不会感到自己的信仰受到威胁；他们会宽容地去倾听，却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信仰。即使是面对已被所在群体广泛认同的观点，有些人似乎也总是表示怀疑且难以被说服；他们不会坚定地把自己交付于任何意

识形态。有些人会把坚定信念的倾向与强加自身观念于他人的需求相结合。这样的个体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有着无比坚定的信仰——且控制欲也同样强烈。正如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曾证明过的那样(详见第5章),当自己的观点遭受任何挑战时,强烈而脆弱的自尊心易使这些高度教条化的人们产生过激反应。然而,一个足够强有力的影响方式可以将新信仰强加于目标对象——但该信仰也会随之遭到目标对象的强烈抵抗。

前额叶滥用:绕开停下来思考

但奈何令人痛苦的死亡使人迷茫,
使悲伤现出丑陋的原型,
使愚蠢者受到折磨。

萨缪尔·丹尼尔[②],《书信集》,"致坎伯兰公爵夫人玛格丽特"

停下来思考的能力

如上文所述,能否有效地察觉并挑战那些试着影响我们的企图取决于我们认知图景的丰富程度。同样,这也取决于我们认知网被激活的强烈程度:当来自强烈、简单刺激物的能量或来自坚定情感的能量向认知网倾泻而来时,某种行为可能在我们有能力停下之前就已被触发。正如第2部分所阐明的那样,人类大脑绝不是完全理性的计算装置,一个能够充分了解自身最大利益并据此作出选择的装置。即便是《星际迷航》中被标榜为逻辑思维模范的伏尔甘火神们,也会出现情绪性的表现。在控制情感方面,人类相比于伏尔甘火神要逊色许多。这种缺陷之所以能够时常演变为一种优势,或许是因为《星际迷航》的编剧们终究只是普通人而非伏尔甘火神。尽管如此,这也同样反映出一点:在有关情感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对人类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正在不断加深。如第9章所说,情感是正常人类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如果情感过多,它们也会成为麻烦——正如古语有云,"凡事适可而止"——但如果没有情感,决策的制订就可能停滞不前。

然而,完全地依赖情感也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把情感作为行动的捷径,会导致人们重视有利于短期利益的决策,而忽视更重大的长远利益。与此同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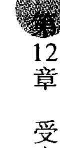
② Samuel Daniel(1562—1619):英国诗人和历史学家。

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盲目任意性。它们能够在大脑中肆意泛滥,使大脑皮质和皮质下的许多相关区域发生变化,这种能力与它们相对缓慢的时标有关。思想不会在某处停留,情感却会一直徘徊(我们会说蝗虫式思维却不会说蝗虫式心脏)。正如第9章所讨论过的,情感的持续性与思维、语言易变性之间的不匹配,使得由某种思想(单词、短语、形象)所唤醒的情感得以与其他或许完全不相关的概念产生联系,这种不匹配常常被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所利用。

在大脑处理情感的过程中,个体差异也因此显得至关重要。人们会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感及情感基线范围。有些人更加敏感,有些则比较麻木;有些人性情温和,有些却脾气暴躁;有些人闲适恬淡,有些则易于恼怒;有些人更加勇敢,有些则更为胆怯。建立一段新关系的一大挑战便是如何了解你同伴的情感基线设定范围。人与人之间这方面的差异一部分来自基因,比如神经递质——例如用以调节焦虑的血清素——的水平,但同样也有证据表明,早期的经历可以对许多情感基线范围的设定产生影响。

如前文所述,很多研究表明:每个人对压力的敏感度是不同的。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常常利用压力:通过唤醒目标对象心中的某种负面情感——如内疚、恐惧或某种认知失调——然后向目标对象呈现他们所希望唤起的那种行为,以此作为使其目标对象摆脱所有情感压力的途径。他们知道,处于压力中的人更容易条件反射式地作出回应,这些人只会进行模式化思考,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闲来考虑自身的处境。

正如我在第11章所述,个体差异同样存在于我们的自由感及自由感的补集抗拒感,它们行使着情绪功能。这些情绪的基线大约在儿童两岁左右就已设定。在这个年龄段,人类开始察觉自己的自由感,并且通常会因此变得易受伤害。正如西奥迪尼所观察到的,"绝大多数父母均证实,他们发现孩子在这个年龄段会出现更多的逆反行为。两岁左右的孩子似乎是抵抗外界压力的专家,尤其是抵抗来自父母的压力。你告诉他要这样做,他却偏要那样做;给他这个玩具,他却偏偏想要另外一个"。随着孩子们渐渐明白自己是独立于周遭世界的个体,并开始建立起包括所有施动感在内的对于自身的统治权,"可怕两岁"带来了个人主义和自主性的开端。这种自我认定的过程要求我们对社会环境进行详尽的了解。而这其中绝大部分重要信息都是在不断摸索中获得的:测试监护人的忍耐极限,以了解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这也正是在为家长们开设的课程中为何会常常建议家长行为一致的原因之一。对一个尝试着去理解社会规范的孩子来说,如果提供给他们的范例能够遵循一个明显的模式,



那么他们对于这些规范的学习会更加容易)。极限测试过程往往伴随着令人抓狂的抗拒,儿童会将其最初的虚无主义假设——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容许的——打磨得更加现实,与现实世界更加匹配。

像某些成年人一样,有些孩子顺从地接受外界的规则限制。尽管如果有机会,大多数"棘手"的孩子最终都会安静下来,但有些孩子依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放弃自我主宰的梦想。同龄人和监护人的行为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儿童是否将他人看作其随时可供利用的资源而对控制梦想紧追不放,直至成年,决定了其他自由是否可以作为补偿。

操纵我们的自由感会增强我们对影响技巧的易感度,这便是为什么尊重受害者个人选择的行为能够避免受害者的顽强抵抗的原因所在。获得新的自由对我们的影响远不及现有自由受到威胁所产生的影响大;我们通常更喜欢被巧言哄骗,更喜欢他人不着痕迹地恭维我们的控制力,而不是被他人胁迫而改变我们的行为。这种偏好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同任何一种情感一样,自由或抗拒从不会独立于大脑或身体而存在。同其他积极情感一样,控制力是自由的一大特征,一旦缺失便会触发抗拒,它关系到我们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由于失控而触发的抗拒,就像其他消极情感一样,可能会在人类或动物体内诱发疾病,甚至导致猝死。

狡猾的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明白,一旦抗拒被触发,目标对象可能随时发起反抗,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因此他们可能会尝试着让受害者感觉到自己仍然掌握控制权,比如明确地请求对方的同意——"我能占用您一点时间吗?"——或者在推销商品的言辞中加入一些短语如"您的决定""由您选择",或者"一切由您做主"。通常,自由被吹嘘的程度往往反映了它实际上被限制的程度。在独裁者的语录中很容易发现其对自由的吹嘘。一个不那么极端的例子便是英国和美国媒体向人们提供的被过分吹嘘了的"选择自由"。原则上,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最新的资讯,可供其选择的报纸、电视、电台、网站等之数量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实际上,任何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都能反映出:虽然这些新闻表面上有着不同的来源,但其本质却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所需信息的基调——自由的或是保守的,国内的或是国际的,高雅的或是肤浅的。但是,通常让我们无能为力的却是如何设定标准来决定什么可以归类为新闻,因此我们也无法决定哪些新闻可供我们选择。

对洗脑(以及其他影响形式)的易感度与大脑所处的状态密切相关。这部分取决于基因:研究表明,前额叶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基因的影响。较

低的教育程度、教条主义、压力以及其他影响前额叶功能的因素都会促成过分简单化的、非白即黑式的思考。如果忽视神经元,未能成功刺激神经突触,固执地抵制新体验,或者用药物(包括酒精)、睡眠不足、大喜大悲,抑或是长期压力来锤炼你的前额叶皮质,那么当遇到下一个极富魅力之人时,就极有可能受到其极权思想的吸引。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年轻人加入邪教组织、迷恋时尚与名流,并常常对不合时宜的行为榜样产生强烈爱慕之情的原因,这些行为令周围沉着冷静的长辈们困惑不已。

然而,前额叶滥用并不仅限于年轻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成熟起来并且获得由随之而来的对于产生影响力的武器的免疫力,但是我们必须付出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将认知图景的隐喻扩展一下,我们可以这么说,培育一个大脑就如同培植一个花园;我们的目标是将其从最初的一片荒芜改造为一个令自己及他人都满意的模式。在幼年时代,我们的园丁就是那些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监护人、兄弟姐妹以及朋友,我们受到的最初影响便来自于他们。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来越有能力接管园丁的工作,并设想自己——目前地球上最独特的物种——就是自己的园艺师。我们寻找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梦想的人和经历;我们试着去了解为何诱惑、消遣、偏离并非那么有趣,从而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年龄的增长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因为一切事物都会随之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当然,并非人人都会醒悟到自己才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主宰。有些园丁一生都在沉睡之中度过,将这一重任压在周围人的肩上。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如果另一个园丁试图接管你宽敞的花园,那么用他(她)所偏爱的样式去改造一个杂乱无章的花园要比改造一个之前保持完好的花园更为简单。花园与园丁的比喻,同样也适用于大脑与洗脑者,但值得一提的是,大脑比任何一个花园都复杂得多。即使是控制得最好的大脑也永远不可能像花园一样整洁有序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十分苛刻的园艺劳作可以让花园异常整洁有序。

前面已经讨论过情感在试图影响他人的企图中的重要性,并且也已大体了解了一个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所具有的防护性。不过,还存在着第三个因素:自知之明,即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只是黏土而非钻石的自知之明。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便会知道我们能够培养自己的认知网,如同塑造花园一样塑造认知网。了解大脑能够被改变这一事实是抵抗他人强制改变我们大脑的第一步。顺便提一下,这就是鸡为什么会对眼前从地面上拉起的绳索着迷,或是被眼前来回晃动的手指所催眠,而通常人类却不会这样。尽管

在看到一位迷人的女士从一群男学生身旁走过时,任何人都可能怀疑人与鸡的这种进化差异是否真的存在,但绝大多数人都比鸟类更难被催眠。因为我们事先知道自己是可以被改变的,而鸡却不知道。

追逐权力的人

在考虑过哪些因素可能致使我们容易被洗脑之后,现在我们可以提出与之互补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一个试图影响他人的人? 首先,最显而易见的答案便是动机: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必须有改变他人思想的欲望。在此,控制欲—— 一个人自由感基线的设定——是至关重要的。基线设定得越高,当自由受到侵犯时所触发的抗拒就越强烈,因此产生的对环境——尤其是对人类环境的控制欲也就越强。也许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以下一点:为什么先前为了自由而竭力奋斗的人一旦革命取得胜利后,便会如此轻易地转变为严酷的独裁者。

由于简单的事物使人感觉更易掌控(对比引导一个孩子和领导一个政府孰难孰易),因此高度的控制欲便往往会伴随认知上的简化:这也正是罗伯特·利夫顿所说的"极权思维"。简易对于那些处于困惑中的人们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这样的人有很多——因此表达一个简单的信息通常比推销一个复杂的观点容易得多。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如果相互竞争的利益能在一个简单清晰且可辨的信息基础上达成一致的话,那么他们能向外界施加的整体影响力便会大幅提升。实际上,同大多数社会群体一样,许多个体已经高度系统化了,从而使得单一、简洁的信息灌输并不可行。那些统治我们的人还会利用其他策略:如使命宣言、声明,当然还会诉诸虚无思想。虚无思想的模糊性被巧妙地运用从而增强了它们对公众的感染力。但当个人或政治混乱占据主导地位时,伴随极权思想产生的清晰的洞察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堪比逃离深渊的救生索。

领袖魅力

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中所看到的,领袖们的影响力通常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简单清晰的洞察力。领袖魅力——"领袖和权威的禀赋或力量;一种气场。也即激发献身和热忱的能力。"——能够通过可感知的力量,即亨利·基辛格[③]所说的"终极催情剂",得到极大的提升。魅力也可以由强烈的自我意

---

③ Henry Kissinger(1923—):犹太人后裔,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

识、目的专一的印象来获得提升。回想第11章中提到的乔治·安斯利将人类大脑描述为利益追逐的角斗场,我们便能够看出“专一”这个术语用得多么贴切。尽管各方利益进行着对抗——“吃掉这块巧克力”对抗“要坚持节食”——但迫于有限的资源,它们有时也不得不进行合作;因为人类只有一套四肢。(那么,是否拥有更多肢体可供摆布的章鱼的大脑就不如我们的大脑那么易于合作呢?)合作的程度越高——瞄准同一目标的利益越多——人就会越专一,对他人就越具有控制力。那些心思散漫的人也许会嫉妒那些具有强烈目标感的人,因为这些人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免去了冗长乏味的内部分歧。

然而,清晰的洞察力还不足以产生领袖魅力:一个人还需要足够的社会技能以及自我信念来激发其追随者的献身与热忱。如果没有这种顺畅的人际交往,那么结果就只能是独自的执着,这一点牛津大学的任何一个学院就是明证。甚至满足以上条件仍然还可能无法培养出领袖魅力。如前所说,非凡的领导能力所依靠的不仅是自身的人格魅力,还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领导者必须能够主导时代精神。机遇与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准邪教领袖最终成为曼森,还是摩西[4]。正如安东尼·史蒂文斯[5]和约翰·普赖斯[6]在《先知、邪教与疯狂》一书中曾所论述的:有时,环境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新鲜的视角—— 一个全新地看待当前令人厌烦的处境或问题的方式。这种获取信息并以新颖形式对其进行重新编排的能力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性之一。然而,一些异常富于创造力的个体会特别擅长于安东尼·F. C. 华莱士[7]所说的“迷宫道路重组”,他们能将自己关于文化的各种当前思想的元素(迷宫道路)进行重新组合,使其成为一个全新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式,从而为先前貌似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些人也容易偏执,相信超自然现象,有不同寻常的视觉及听觉体验(例如,当没有人在场的时候听到人的声音)。这些都是精神分裂症的轻微症状,并且事实上已有证据表明,高度的创造力会增加精神错乱甚至躁郁症的风险。

---

④ Moses:摩西是纪元前13世纪的犹太人先知,旧约圣经前五本书的执笔者。带领在埃及过着奴隶生活的以色列人,到达神所预备的流着奶和蜜之地——迦南(巴勒斯坦的古地名,在今天约旦河与死海的西岸一带。

⑤ Anthony Stevens(1933—):著名的荣格分析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撰写了大量关于心理疗法和心理学的著作。

⑥ John Price:与安东尼合著《先知、邪教与疯狂》,另著有《媒体研究》等。

⑦ Anthony F. C. Wallace(1923—):美籍加拿大裔人类学家,专攻美国土著文化,特别是易洛魁族文化,其研究展现了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因复兴运动理论著称。

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似乎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他们更多地依靠直觉而非传统逻辑。他们能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事物间的联系,这种灵活性使得他们能够更充分地做好准备以实施庞大的内部改组,即迷宫道路重组。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高度的创造力已被证明与颞叶的高度易变性(即处于大脑该区域的神经元异常活跃,详见第7章)有关。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其大脑也许并不一定比一般人大,但一定是联系更密切的——有更多的神经突触将其神经元连接在一起——这有可能促使他们有能力以不寻常且创新的方式联系不同观点。然而,创造力对于领袖魅力来说还远远不够:许多有高度创造力的人并不怎么富有领袖魅力。一旦迷宫道路被重组,其创造者就必须拥有足够的热情来采纳自己的新观点,并且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执行下去,同时还要具有理解和满足他人需求的能力(这样才能吸引追随者)。

尽管从长远来看,现实倾向于朝着极权主义思想家设想的那样,迫使所有人——除了最顽固者——接受自己并不受欢迎的存在。但从短期来看,极权思想家仍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最高明的煽动家会时刻注意控制局面,他们从不会忘记自己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且会利用确定的目标以及权力的光环胁迫和鼓舞其追随者。如果他们并不像我们有如此之多的顾忌,并且仅仅视我们为其达到目的的利用工具,那么这种人将是极其危险的。一个高效的洗脑者知道应该如何运用压力,如何消除紧张与疲劳、痛苦与孤立、组织魄力与屈从压力,以及如何压制促使我们停下来思考的资源,从而让我们回到本能状态。

※本章小结

你的大脑如何发展,它吸收哪些观点,追随哪些时尚,鄙视哪些幻想——所有这一切对你自己来说都是高度个性化的。我们在压力易感性方面的细微差异,所遭遇的不同观念或是在童早年时期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都会随着时间而膨胀,最终演变为成年人格中的巨大差异。我们作为成人所具有的个体差异是由基因遗传、经历以及存在于大脑中的无数认知网塑造而成的。

但是,影响我们的很多思想并不仅仅是个性化的。我们很大程度上意识不到的是,他们——还有我们——都是由社会交往、文化环境、我们所生活的群体和聚居地,以及一出生就畅游其中的知识海洋等塑造而成的。下一章中,我将对这些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进行探讨,追问它们是如何促进或阻碍大众思想控制的有关企图的。

第 13 章　思维工厂

正如种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一样，宇宙的利益也同样高于任何一个生物的利益。

《女巫之锤》

关于"宇宙"的问题，请参阅以上引用中所包含的"社会"部分，你会从中发现一些有关极权主义（可追溯到欧洲 15 世纪）的简要概述。只要是为了种族或物种的生存，无论个体经受多少苦难都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断言是结果论的社会性版本，主张"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臭名昭著的论点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尼古拉·马基雅弗利（1469—1527）有关，尽管他因此受到了强烈的谴责，但其实他并非最早提出该论点之人。相比之下，"极权主义"一词自 1926 年起（据《牛津英语词典》所载）便为英语语言增色不少。在那些极权主义者，如 20 世纪的超级独裁者希特勒的思想中，结果论得到了最强烈的体现。

20 世纪同样为我们带来了"洗脑"一词，这相当于无所不在地散布着"社会渴望独裁者"的谣言。洗脑术扬言一定能够找到科学可靠的方法来实施对人类思想的完全控制。然而，远在现代技术出现以前，掌权者一直别出心裁地利用着各种技巧——从花言巧语到严刑拷问——将自己的思想意识强加于他人。他们确信自己掌握着通向至善的钥匙，要求人类追求这种至善——无论这个要求来自上帝、亚里士多德、历史的力量还是其他权威偶像——并由此塑造了他们所处社会的思潮。正如我前面所论述过，他们改变他人信仰的企图直至今天仍能引起共鸣。

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探讨基本都集中于被我称为"强制洗脑"的问题上，你可能会在邪教或战俘集中营中发现这一形式的洗脑。然而，我也同样探讨了一种更加潜在的操控形式，即暗中洗脑，这种洗脑形式常用于国家为控制公民而传播某种思想的情况。想要了解暗中洗脑，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对于社会

主宰者来说,思想为何如此重要,它们如何得以传播,并且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些问题便是本章要研究的重点。

富于感染力的观念

谎撒得越大,其被相信的可能性就越大。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

第3章中所讨论过的模因论学说将思想比作病毒,并强调了人类对认知感染的易感性。在更古老的比喻中,思想被喻为疾病,而模因论正好成为一个新的结合点,补充了第4章中所讨论过的将洗脑看作康复疗法的比喻。例如,《古兰经》中反复将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描述为内心患有疾病的人(见《古兰经》第2章第10节)。当然,人类向来惧怕疾病。现代社会尤其恐惧传染病:即使是死亡人数极少的突发性疾病,也会成为国际新闻的头条。尽管进化论的确向我们提供了人类与微生物互利共生的许多实例,但我们肠道细菌的"知名度"却远不如它们更为致命的细菌亲属。因此总的来说,传染病仍然是个极为负面的概念。所以,"思想如传染病"的比喻,即使以所谓中性的模因论科学的形式出现,也仍然带有严重的贬义色彩。我们所感染的大脑模仿病毒,以及内心的疾病,恰恰是那些讨论这些问题的人所反对的观念。无神论者提出模因论这一术语,根据他们的观点,宗教信仰即是大脑模仿病毒的最佳范例。据世界上最主要宗教之一的神圣经文所述,没有信仰是内心的一种疾病。惊奇,实在是惊奇!

"思想如传染病"的比喻不仅有助于科学权威将思想意识伪装成科学,同时也为宗教统治者们将宗教信仰伪装成真理提供了方便。然而,它也同样有助于强调思想在人类文化中的重要性。我们头脑中所持有的观念并不只是神经元无聊之时的涂鸦;它们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与互动。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许多认知网都是公共观念。正如没有任何两只猫会完全相同一样,大脑会使认知网发生独特的屈折变化;但大脑与大脑间总会存在足够多的共同特征以保证它们同属一个物种。

认知网高度易变的一个特征就是其控制忠诚度的能力。一些信仰可以被归类为约翰·贝奇曼[①]所说的"模糊信念"。而另外一些信仰,对于感染它们

---

① John Betjeman(1906—1984):英国诗人、作家、播音员。他是维多利亚学派的创始成员,维多利亚时代建筑的激情捍卫者。

的人来说,则可能同任何一种病毒一样,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举个例子,如果你碰巧不幸和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患者同坐一班飞机,你仍有可能不被感染;即使被感染了,你也还有大约百分之十的存活几率。然而,如果和你乘坐同班飞机的是一个愿为其宗教信仰殉道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那么你的存活几率将立刻降低为零。

思想的重要性

我思故我在。

勒内·笛卡尔,《方法论》

我们从周遭世界获得的思想,或在先前无关联的认知网间形成联系时所建立的思想,正是构成由那个“魔力织机”——即人类大脑——所织就的华丽挂毯的条条丝线。这就是我们被裁剪成的那块“布”,我们所持有的思想就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信仰不是附属品,它并不仅仅是神经突触歌舞表演的伴奏者;相反,它往往起着定调的作用。对于虚无思想来说,情况尤为如此,因为它们能够开发并利用我们的情感能量。第9章中我们讨论过,在紧急情况下,情感可以充当捷径,因为此时我们无暇利用“停下来思考”的能力。(即使大脑高层管理也会对火灾警报作出反应。)实际上,将强烈情感与虚无思想联系起来会提供错误的警报。受到操控的大脑会像面对紧急情况一样作出反应,它不会停下来进行思考,而只会简单地选择最明显的方式采取行动。

在紧急情况下,这种行为方式通常也是正确的:例如从火灾中撤离,或躲避捕食者。但有时这种行为方式之所以显而易见,是因为它早已被发出错误警报的操控者提前做好设定。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发出警报向受害者施压,使其产生某种特定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并不一定符合受害者的利益)。早在阿道夫·希特勒出现以前,感染了反犹太主义虚无思想的人并非简单地认为犹太人肮脏。他们曾针对该“问题”提出过解决方案,并且多数情况下也是按照方案执行,这可以在欧洲国家(包括英国)虐待犹太人的可耻历史中得到证实。那些激发纳粹党人谩骂式的反犹太主张极为荒谬:它们要么充满逻辑漏洞,要么缺乏证据,要么二者兼有。当时有少部分人勇于指出了这一点。然而,大多数德国人仅仅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他们的情感已然被涂上了特定的底色,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德国文化中广泛存在的反犹太主义所占据,他们已无可救药地感染上了“犹太性”的虚无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恐惧或者厌

恶)。纳粹的政治宣扬由此获得了肥沃的土壤。即使是以最有力的形式呈现的理性思想也得费尽力气进行辩驳。

同个体一样,社会群体往往也需要一些刺激因素(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引发停下来思考。如果刺激因素的天平更倾向于像德国纳粹那样不停下来反思,那么虚无思想便可激发强有力的行为,即使该思想本身与个人经验直接抵触。德国的犹太人并非不起眼,其中许多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专业人士:清白、诚实、可靠。但是肮脏、病态,并且极度贪婪的负面形象已成为大家对犹太人的模式化印象,这一印象已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并且也已成为德国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至于即使有个别反例出现,大家也根本不以为然。要么将他们转移至认知图景的另一区域("我的朋友丹尼尔并不是典型的犹太人"),要么忽视他们或者尽量减少同他们的接触(比如设立犹太社区),由此避开可能挑战这种固有偏见的遭遇。纳粹激进分子做得更甚,他们将犹太人的生活质量降低到一定程度,使其无法再维持哪怕最基本的体面形象。这样一来,犹太人肮脏且病态的负面形象再次强化了纳粹的"犹太性"思想,并进一步坚定了犹太迫害者的信念,这是一个不断丧失人性的恶性循环,并最终导致大屠杀。除了屠杀,还有对于净化的需求,这种净化需要运用掩埋或火化这两种处理病害的传统方法对污染物进行完全清除。虔诚的纳粹党人认为,犹太人移居他地并不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只有完全消灭他们才能根除这种传染源头。

当有某种强烈动机使人相信某个虚无思想时,认知网将变得足够强大以致扭曲认知图景,这就类同于时空黑洞的翘曲效应。由于已建立的认知网在过滤外来刺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信息就更容易在虚无思想的支持下得到解读;认知网越强大,它就越容易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我们可能还会采取措施来制造拥护性证据,或抑制反对性的证据。不是只有甲壳虫乐队的《漂泊者》才是只看到他所想看到的。

社会群体及其共同的思想

我不想成为"我",而想成为"我们"。

米凯尔·巴库宁②,《信函》

② Mikhail Bakunin(1814—1876):俄罗斯革命、哲学家、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他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理论之父"。

虚无思想对于社会和个人自我形象的构建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对于社会的作用或许还要更大，因为个体有更多可供选择的资源来获取信仰，比如生理受限的躯体或明确定义的行为模式。相比个体，认为自身的形象并不稳固的社会将更容易诉诸虚无思想那极具吸引力的简易外表：自由、公正、公平，及其所有沾满鲜血的“亲戚”。那些无法建立有效政府及其他机构的社会尤其危险；一个更加成熟稳重的社会无须过分依赖强烈情感来束缚民众。这部分是因为社会保障是确保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将不再那么极度渴望改变现有的生活状态。抗拒以及其他负面情感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强烈，因此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必须付出努力才能激发它们。更强大的保障——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能够提高我们对不同选择的宽容度，使思想更加多样化，从而丰富（个体或社会的）认知图景。

我们越来越多地暴露于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之中，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有关恐怖主义这一令人迷惑的事实，这种现象常常同洗脑联系在一起。西方国家的政客们常常谴责恐怖分子不理智、缺乏教育且愚昧无知，但与之相反，来自中东国家的研究却表明，教育程度与支持恐怖主义成正比相关。教育为人们所处的具体境况提供了多种选择：西方的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均以各自截然不同的方式强调了极度令人向往的美好世界的愿景。在细节上，这些愿景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它们所涉及的大部分虚无思想却是相同的。（比如，伊斯兰教所崇尚的公正、怜悯、仁爱，都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所高度关注的东西。）当这些虚无思想变得唾手可得时，它们与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对比会让人更加痛苦，尤其当这种生活是处于受到高度控制或者极度堕落的社会之中时。抗拒——即大脑在思想与现实不匹配时所发出的信号——可以成为极其强大的行为动机。梦想和欲望是由现存的认知网或（宗教的或世俗的）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塑造或设定的，它们的结合能产生煽动性的结果。如果没有梦想，欲望会失去重心；如果没有欲望，梦想会失去杀伤力。给予人们目标却不向他们提供达到该目标的途径是对付抗议的秘诀，挫败抗议又是对付暴力的秘诀，而想要控制暴力就需要使自己变得比那些你意图控制的人更加丧失人性——但反过来，这又更易使人们看出你没有人性而进一步激发对你的暴力反抗。对此，可能的应对方法之一是，通过限制人们所受的教育和接触媒体的途径来剥夺他们的目标，但对于我们这个不断缩小且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来说，该方法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况且，这还与许多自由民主制国家和世界上主要宗教所

最为珍视的理想产生了正面冲突(尽管这个问题并不会一直存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虚无思想的优点之一便是它的灵活性)。

许多社会思想都是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这种传播时而明确,时而含蓄。例如,如果师生们讨论死刑的问题,学生将会学到很多明确的事实(如,"英国最后被判处绞刑的妇女是露丝·埃利斯[3],发生于1955年")。然而,这种讨论也将强化许多普遍的假设:比如,罪行应该受到惩罚(无论是否被判死刑);国家可以正当地伤害一个人(无论是否将其伤害致死),等等。我们可以将这些问题明确地阐述出来——这是促使孩子们对此提出质疑的好方法——但通常情况下人们却对此避而不谈。这些社会认知网都是社会成员广泛——尽管并不一定如此普遍——持有的思想观点(一个思想观点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被判定为全社会的思想观点取决于该思想所入侵大脑的人数)。它们可以被明确地陈述在宪法中,或者几乎绝口不提;无论是哪种方式,它们被接受的程度都决定了其影响力的大小。类似家庭这样的组织可以促进对于这些社会认知网的接受度,因为思想意识可以在家庭中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见第5章的讨论)。

媒体—调解人

实质上,任何信仰,无论是否可靠,无论是有充足的理由支持或仅由偏见支撑,都可以通过刻意的操控或无意地利用主流机构而对人们进行反复灌输,最终使人们将其看作真实的思想而被广泛接受。

默里·埃德尔曼[4],《假情报的政治学》

在现代社会,认知网还会通过错综复杂的全球大众传媒网络进行传播:平面媒体、无线电广播、电影,以及互联网等。因此,设法要对大众进行洗脑的人必须有能力控制这些媒体,许多极权主义国家对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5]在其独裁统治期间,向塞尔维亚的私营传媒机构所施加的压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然而,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就如细胞一样,它们

---

③ Ruth Ellis(1926—1955):因谋杀其情人大卫·卡恩而被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名英国女性。

④ Murray Edelman(1919—2001):美国政治学家,致力于符号政治和政治心理学研究。

⑤ Slobodan Milosevic(1941—2006):前南斯拉夫政治人物、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1989—1997)、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总统(1997—2000)、塞尔维亚社会党创党人和领导人(1992—2001)。2006年3月11日在海牙监狱中去世。

对来自外界的影响会越发敏感,并因此更易接受新思想。全球化的影响是一个久经讨论的话题(其自身就是不断加深的复杂性的产物),也正是它使控制变得更加艰难,这或许仅仅是因为有了更多思想需要去监控、审查或者限制。投入到社会"免疫系统"的能量是从其代谢功能所获得的能量转化而来的,并且极权经济体系更容易陷入停滞,这种停滞可以比敌人任何规模的政治宣扬都更有力地加速该经济体的灭亡。

这并不是说能够轻易获取信息并不能动摇极权主义国家的政权;政治活动的起因往往不止一个。正如教育一样,媒体可以为人们带来新思想,提供各种各样的愿景(例如,对西方世界美好生活的愿景),增加知识,或者挑战公认权威的智慧。这一切能否真正发生取决于这种信息馈赠所携带的动机。粗略地说,国有媒体反映的往往是国家的意愿及其控制欲,而私营媒体所反映的却是其所有者的意愿及其对利润的渴求。

中立的神秘性——即认为赤裸裸、无法解释的事实是存在的——是后现代最受欢迎的目标对象。至少自海德格尔[6]和维特根斯坦的光辉时代以来,思想家们便已迫不及待地想要攻击一种观点,用特里·伊格尔顿[7]的话来说,那就是"事实都是众所周知且无懈可击的,而价值观却是个体私有的且毫无根据的"。伊格尔顿将他的观点表述如下:

> 讲述事实(如"这座教堂始建于1612年")与作出价值评判(如"这座教堂是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杰出代表")有明显区别。假设我在带领外国游客参观英格兰时作出了第一种类型的陈述,并发现这使她相当困扰。她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要不停地告诉我这些建筑物的建造日期?为什么困扰于建筑物的起源?她可能还会继续说到,在我所生活的社会中,人们从不对类似的历史事件做记录:我们按照建筑物的朝向来对其进行划分。这样做的作用可能是展现部分无意识的价值判断体系,而该体系正是我所作的描述性陈述的依据。这种价值判断并不一定与"这座教堂是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杰出代表"属于

⑥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等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⑦ Terry Eagleton(1943—):当代西方文论界继威廉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他一直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左派"自居,对马克思的坚守和发展使其理论独树一帜,备受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意识形态"这一理论史上人言人殊的难题,是伊格尔顿思想的理论基石,是其文化批评的核心范畴,是其思考文学、美学的前提。

同一类型，但它们仍然是价值判断，并且我所做出的任何以事实为根据的声明都无法逃脱这种关系。

伊格尔顿，《文学理论》，第 13 页

我们不能孤立地理解语句，因为它们往往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有时，一句话的实质内容远不如它所传达的非言语信息重要。当我们解读朋友——或者新闻主播——的话语时，我们所依赖的是大量非言语的社会线索，用评价性的术语对它们进行评判。即使在阅读时，我们所读的也是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比如第 9 章中有关英国国家党宣言的讨论）。所有传达到我们眼前、耳边，或（如果我们是盲文读者的话）指尖的信息都注定要通过经验过滤器的雷区，受到先前预期的彻底筛选，这有可能使其永远都无法到达意识的顶峰。无论什么样的信息，一旦通过过滤器到达大脑皮层，就会被用来制造一系列复杂的猜想和假设，这个过程可能会无意识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情绪化语言的介入到血液中可能引起食物中毒的快速繁殖的病毒，这一切都可能成为影响因素。如果没有解释学层面来维持谦逊，赤裸裸的事实就无法在我们的认知图景中招摇过市。有时我们会努力使这个层面尽可能地透明——数学就是一个例子——但无论厚薄，它总会存在，且具有无法回避的评价性。哲学家们总喜欢说，你无法从“是”中得到“应该是”；但抽象概念却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从“应该是”中得到“是”。通过忽略一切背景情境，对比多个范例并从中提取出它们的共同特征，我们就能够获得一个枯燥的符号，即“事实”。换句话说，也许将“是”中所含的情感成分全部去除后，它其实就等同于“应该是”。

任何人，即使是最审慎的编辑，都无法完全逃脱自己观点的干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此总结为一切新闻来源都是带有偏见的，并且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以某种方式将其纳入考虑之中，并采取一些补偿措施呢？然而，传媒学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选择性解读比单纯的偏见更多。例如，约翰·斯特里特[⑧]就将带有偏见的观点同“模式化”观点区别开来。偏见是一个系统化的倾向，它会选择性地强调，甚至刻意歪曲某些信息。例如，一个右翼报刊可能会使用许多负面言辞对贫困问题进行反复报道，以此来支持穷人应该为自己的不幸负责的观念。恰恰因为偏见如此系统，才使其更容易被察觉：对观察者来说，一个人选择读何种报刊比他穿何种

⑧ John Street：东安格利亚大学经济和社会研究学院教授，著作有《政治与大众文化》《音乐与政治》等。

衣服所能提供的信息多得多。

许多地方媒体或国有媒体已私有化，种类繁多且竞争激烈，其所有者的社会背景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样一来，如果人们能够自由选择不同的媒体，那么偏见就更容易得到纠正。即使如此，正如第3章中所讨论过的，将大众观点简单化、标准化、迎合化（或迎合媒体所有者）的压力是削弱这种多样性的潜在力量（见第3章）。极权主义思想不是自负而极不合理的政府的唯一保护伞。正如一些人所说，之所以不能让媒体的管理落入市场那只无形之手，原因之一便是，有很多因素在削减媒体的自由度。著名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杰作《国富论》为现代资本家提供了许多可为自己辩护的正当理由，但面对英国当代媒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现代广告业、新闻记者们亲密勾结的关系网（无论是记者们互相间的关系还是与政客们的关系），大量权力落入少量国际化媒体巨头手中等诸如此类的各种其他特征——亚当·斯密本人或许并不赞同。

信息背后暗藏的模式比其带有的偏见更加微妙难辨，并且这些模式往往更能与不同的媒体来源保持一致。斯特里特提到，“尽管这些暗藏在信息背后的模式也会使人们以某种特定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世界，但它们仍然与偏见的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们不会给自身设定某个单一的意识形态立场”。相反，传媒研究强调，“新闻故事”确实只是故事。就像其他的故事一样，它们有经过精挑细选的叙事结构，会利用一些根深蒂固的假定（如，因果关系、道德品行，以及社会关系），并且会剔除矛盾的或是不相关的信息。讲故事的人，包括记者，都有大量的范本可供选择，他们会挑选出最适合的范本来对自己的故事进行加工：如“勇敢的英雄”“无能的官僚”“棘手的冲突”，等等。每一个范本——或每一种模式——都有其特定的语言特征。例如，如果有一名孩子死于疾病，那么这个孩子将极有可能被描述为勇敢、不幸且心地善良，以此来告慰其正处于悲痛中的双亲。毫无疑问，这个孩子有时也会乱吼乱叫，也会发脾气，还会欺负自己的妹妹——小孩子都这样——但这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与我们需要的模式并不匹配，因此便不会在这样的报道中被提及。而如果一个孩子是被陌生人所谋杀的，那么我们同样会使用不幸、心地善良这样的字眼，但会用“无辜”去替代“勇敢”，相应地，我们还会谴责凶手人性的丧失。

模式和偏见都是个体看待世界的共同的社会延伸。实际上，个人和社会的观点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媒体业宣称自己反映的都是其受众的意愿：对竞争激烈的私营媒体来说，其赢利动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它所传

播的信息和其受众意愿的匹配,即使是国有媒体也不能完全违背受众的意愿,否则它就会成为笑柄,在东欧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就发生过类似的事件。然而,我们在第 3 章中也讨论过,媒体还会塑造受众的观念:例如,观众对于不同电台的选择会造成其态度的显著差异。

斯特里特认为,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是“贸易需求的产物”。贸易是人际互动中的一个古老方面;经济学家海姆·奥菲克[9]指出,“人类进行交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50 万至 200 万年前”。然而,现代贸易的复杂程度可以与信息管理的复杂程度相匹配。可以推测,面对面的交易互动开始于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而在这个单位里,个体的安全甚至生存都要依靠其所在群体来提供保护。如果人们无法躲避那些自己曾伤过的人以及对方的报复,甚至在将来还会受到其他群体成员的惩罚,那么想进行欺骗的动机就会得到强化。除此之外,交易的参与者还可以利用非言语线索以及一些惯例来评判对方的可信度。尽管这种面对面的互动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政治首脑会议便是范例之一),但现在的许多交易要么无须直接地人与人接触,要么所涉及的对象事后很可能不再见面。生活在一个更大的群体中,正如现在的大部分西方人那样,削弱了群体对个体的控制,使得欺骗更有可能发生。这也同样加深了我们对信息以及信息提供者的依赖程度。

这必然导致不加分辨地依赖媒体。我们没有办法去核实媒体所说的每一句话,因此我们要么选择相信,要么在信任受到挑战时,以一种肤浅的、愤世嫉俗的态度作为回应(实际上,对任何事物都表示怀疑会使我们无法应对)。新闻机构明白信任的重要性,这就是它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指出竞争对手带有偏见,而证明自己是公正、权威,值得信赖的原因。然而,正如斯特里特所说,“新闻报道是另一种形式的修辞学,它是一门关于如何说服我们——读者或者观众——相信发生了某个事件的学问”。可以说,我们从媒体获取的所有信息都是经过事先加工的。它们就像城市居民们水管中流淌的自来水一样,会经过一个或多个系统的加工。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偏好选择报刊,但却无法选择某个特定信息的模式。我们甚至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信息是如何被塑造并赋予了偏见从而迎合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刻意关注过这个问题,因为刻意的关注可能会触发抗拒从而产生反作用。

---

⑨ Haim Ofek: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著作有《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等。

领袖魅力之于组织

作一名团伙成员也许可以获得许多从别处无法得到的满足，例如对安全感的需求、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积极的自我感或效率感。

欧文·斯托布，《善与恶的心理学》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探讨过，领袖魅力可能与个体对忠诚的领悟有一定关系。如果一个人的全部精力似乎都投入到了一个单一、清晰的目标上，那么他有可能受到崇拜也有可能遭到厌恶，这取决于其目标的性质，但对于心思复杂不专的我们来说，他们的简单与专一常常是令人嫉妒的。黑白分明的生活对于淹没在灰色阴影中的观察者来说显得尤为简单。为什么不读读教义作为消遣，来给你长期受苦的大脑皮层理所应当地放个假呢？“因为你的大脑并非极度懒惰，你也没有过度地自我放纵，更没有愚蠢到令人作呕”——这也仅仅是部分原因而已。有的人被迫变得简单并不仅仅因为懒惰、自私或者愚蠢，还因为恐惧、愤怒或挫折等那些被危险世界所激发的负面情感。自然或社会灾难提升了到教堂礼拜的出勤率；无能的政府为广受欢迎的起义埋下了种子；经济问题为极端主义者提供了支持。当周围环境变得不稳定时，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物理性的不稳定，都会凸显简单的魅力。

简单明了且带有信念色彩的教义能够使他人印象深刻，并吸引众多追随者，尤其是当这些追随者本身并没有强烈信念之时。一个表面上对这些教义深信不疑而富有领袖魅力的领导者可能会比那些对所有细节、障碍以及复杂情况都进行仔细考虑的领导者更有说服力。对于社会群体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简单且宣传良好的思想会给人留下和谐统一且目标坚定有力的印象。虚无思想，譬如真理、公正、宽容，以及自由等，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号召力有特别的帮助；它们隐秘的模糊性加深了其感染力，并且只需少量富有说服力的语言就可以很好地加以阐述。

媒体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社会可以强化自我形象。言论的一致性，尤其是在那些把一定的变化作为常态的私有传媒机构中，可以对媒体的消费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言论的一致性也可以促进社会的统一，并提升政府对人民的控制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忠诚的统一战线同样有用。（团结和忠诚是群体最珍视的美德。）在大多数时候，媒体关于虚无思想的荒谬言论也许并不具有明显的危害性。它只有在反映痛苦的社会分化现象时才会

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时，老套的言论基本上无济于事。

请思考以下言论："伊斯兰教即是真理""男人比女人高一等""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共产主义是一种高尚的主义"。这些言论如果得到认可，便是对其各自支持者正面形象的一种提升。但这一切也可能受到同样抽象之言论的反驳："唯有耶稣可以指引我们通往真理的道路""女人比男人宽容""美国是依靠奴隶的劳动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才是最好的"。如果你唯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你的支持者自我感觉更好（从而更加效忠于你），那么这样的言论可以很好地起到这个作用。然而，如果你是要试图调和，比如，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你就需要抛弃那些虚无思想。我们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能让我们察觉到的个人自由的提升；也不是无懈可击的真理，而是承认真理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曾侵犯过人权，也曾为自己的理想作出过让步。如我们所见，即使是由于自身局限而不得不迫使相互竞争的利益趋于合作的大脑，也可以容纳互不兼容的思想。即使是经过长年冲突而出现两极分化的社会，也更加不受约束。例如，在中东地区，你会发现，有些以色列人极端厌恶当局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巴勒斯坦人也会为因自杀式炸弹袭击而丧命的以色列人哀悼，并且这两个阵营的成员会携手合作，致力于一些调停和教育项目。同样的选择还出现在世界上其他的冲突地区，如北爱尔兰、斯里兰卡，或者苏丹。但这种对位的声音并不经常出现。因为它们并不符合这些故事通常依赖的"棘手的冲突"的模式。

大规模洗脑

在第 1 章的开头，我们给出了词典中洗脑的定义，即："系统并强制性地将固有思想——特别是一些政治思想——从人的头脑中移除，然后用另一套思想取而代之。"贯穿全书，我一直在强调洗脑这个概念的政治属性——但我所指的是最根本意义上的政治属性，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处理个体同其所参与的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试图施加影响的技巧，有四种形式的组合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个体影响个体、个体影响组织、组织影响组织，以及组织影响个体。

一直以来，洗脑就与强制性高压联系在一起，但强制也会带来它自身特定的问题。对某人使用强制手段会触发激烈的抗拒，进而唤醒受害者的情感本能，以捍卫自己受到威胁的自由。尽管洗脑者也许有能力施加足够多的强制

手段来战胜这些抗拒，但这可能会给受害者带来精神创伤以致造成机能障碍，并且，在洗脑者看来更重要的是，还可能会使受害者变得不可靠。从朝鲜归来的美国战俘中，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很高。利用强制手段进行的大规模信仰改变有可能获得成功，但如果受害者无法受到密切监视和持续高压，从长期来看，这种改变是不稳定的。对个体进行洗脑需要洗脑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受害者有可能压制住自己先前的思想观点，但也无法保证强制手段被解除后，这些思想不会再次浮现。（从这个方面来说，洗脑便能与它的鼻祖——刑讯区别开来。刑讯只需实施短期的强制手段，但它常常会造成受害者的死亡，而且其目的是要唤起某种特定的行为而非信仰的改变。）这类相互作用的确存在——家庭暴力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但此时，所付出的工作量已具有了相当的威慑力。即使向被洗脑者施加高压的工作可以让组织成员共同分担，但要对单个人进行控制和监控仍然需要大量的投入，更不用说对很多人了。对于最后一种组合，即个体影响组织来说，施加强制性影响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资源。

不过，我们有另外的选择：暗中洗脑。我对它的定义很宽泛，包括广告和媒体的细微之处、富有魅力领导者编织的虚假乌托邦，以及所提到的思想控制技巧（关于这个问题，下一章有更多的说明）。如果能够成功，暗中洗脑将比强制洗脑拥有更多优势：它能避免触发抗拒。当然，这种方式也有风险，因为受害者一旦不合时机地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就会产生激烈的反应。而暗中施予影响的人往往在这种情况真正出现之前早已达成目的，寻找下一目标去了。因此，他们的目标就是要确保受害者不会将他们的行为定义为影响企图。

相对于强制性洗脑来说，暗中洗脑是个更简单的选择，尤其当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暂时性的信仰改变时。它并不需要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实际上，如果施骗者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或者他能令人信服地佯装成那样，那么成功的几率会很高。这并非如其表象那样，是一个不成熟的二分论：有的发言者在为某事进行辩论时，会感觉自己对自己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而一旦情感的火焰熄灭，其信念并不一定比争论本身更持久；但只要火焰还燃烧着，他们就是完全真诚的。人类已经开发出了非常精密的测谎仪器，但这些仪器却并非绝对可靠。对于受害者来说，要察觉出连撒谎者自己都相信的谎言（即使只是暂时地相信）是件难以办到的事。

然而，暗中操作对于意图进行大规模控制的洗脑者来说也有其困难之处。在一个有着各种不同背景、信仰和欲望的群体中，暴露的危险会加倍，如果这



个群体拥有多种信息获取途径的话,这种危险系数还会增加。即使是在当今限制最严的社会里,真理的来源也不止一个。对洗脑者(无论是国家或是个体)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将他们的目标群体孤立出来。但如果这样行不通的话,我们还可以想办法使目标群体感觉自己是孤立的,例如,夸大其词地向他们描述外部威胁可能带来的危险(即定义或强化"组织外"的概念)。一个明确标志的敌人(如基地组织)往往是很容易树立的,尤其当这些敌人自身并不总是易于识别时:我们可以通过向人们暗示这些敌人的存在而在目标群体中掀起更大的不安。洗脑者总是希望使自己的目标群体处于紧张或繁忙之中,抑或两者皆有,因为这可以降低他们停下来思考的可能性。

考虑到现代社会的规模,对于单独的个体来说,如果没有团体的支持,想要进行大规模的信仰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想要获取这样的支持,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就需要用到贯穿本书的各种方法。他需要用一些虚无思想来装饰自己华丽的辞藻,巧妙地利用语言使受害者的大脑与一些相关联的事物挂上钩,并确保他的教义是简单且令人难忘的。正如柏拉图对话录中所记载的苏格拉底一样,在企图改变受害者思维的每一阶段,他都会试图获得对方的认可。尽管他的目的是让受害者感觉到不幸,于是让其受害者向自己寻求事实上早已为之准备好的"援助",但他仍要竭力使自己显得可爱、幽默且充满人性;同时,他会通过嘲笑而非使用武力去压制一切威胁到自己观点的挑战,并时刻向受众强调自己同他们的共同之处。他可能还会给人留下能够与人坦率沟通,甚至善于自我批评的印象(比如,在早有预谋的讨论中利用自己的追随者进行自我批评);但他所传递的信息却往往是相同的,尽管有时他所谈论的似乎是其对立面。与此同时,他还会特别注意避免给人留下不可靠的印象,他会利用自己信念专一的形象来提升自己的领袖魅力。他会希望通过以上方法来宣扬自己的事业,获得定期接近媒体的机会,让人们开口说话,并使那些受人尊敬的权威们在提到他的观点时,能心服口服地认为它们不仅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

人类的大脑早已被设定好了,用以探知所接收新信息与已储备旧信息之间的变化和不匹配。因此,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可以通过使自己显得新颖独特、与众不同来吸引注意力,他们的确也是这样做的。但这样做的缺点是,他们试图强加给目标对象的思想与早已存在于目标对象头脑中思想间的鸿沟会减小这些新思想被接受的概率。相反,循序渐进却更易被消化。(采用足够细化的步骤能够将一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转变为一名冷血杀手。)了解自己的目标

受众同样有助于塑造洗脑者的陈述风格。除了利用大脑对压力和改变的反应外,洗脑者还会使用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现存的社会压力。通过将自己选定的"组织外"与一些社会所不容且有害于组织的性格特征如自私、背叛、下流、疾病以及会引起大面积瘟疫等联系在一起,洗脑者一方面加重了组织外对目标群体的威胁感,另一方面也给予其受众以信心,让他们相信自己并非自私、不可靠、污秽之人,也不会给地球带来瘟疫。这一切不仅适用于组织,也同样适用于个体,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暗中洗脑可能会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本章小结

同强制性洗脑一样,无论使用哪种具体的技术,暗中洗脑都会有其局限性。使用暗中洗脑往往有一个不幸的副作用,即会加深洗脑施予者自身对他人的怀疑心态。(试想,如果你能行骗,那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呢?)随着控制程度的加深,暗中洗脑可能也会随之使用强制性手段——试图从欺骗转变为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强制性洗脑以确保被洗脑者屈从——因为单靠暗中洗脑将永远无法完全舒缓被洗脑者的恐惧和猜疑。另外一个问题是,尽管暗中洗脑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者能够改变认知图景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但它似乎无法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做到传统意义上要求洗脑所需达到的系统性转变。并且,正如我们从整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即使是以上那些问题——尽管有时候这样的改变可能让人印象深刻——也可以用社会心理学的术语进行解释。作为改变信仰的洗脑肯定存在;但我们还未发现"神奇子弹式"的洗脑存在的相关证据。

然而,"神奇子弹式"的洗脑却恰恰是实现控制,特别是大众控制所需要的手段。尽管一些科技人员已毫无疑问参与了现代世界某些最糟糕的暴行(这并不是近代才有的趋势,阿基米德和莱昂纳多·达·芬奇都曾致力于战争武器的研究),但他们仍然无法想出一个能进行思维控制的万无一失的方法——除了肉体上的消灭,这种方法自该隐杀害其弟亚伯时就已存在。然而,对准洗脑者来说,仍然有希望。最近,科学技术已经开始揭开人类大脑的一些奥秘;而且知识至少是潜在的力量。也许那颗神奇子弹终究会被发现。

在下一章中,我将会着力探讨在不久的将来,大脑科学可能为那些怀揣思维控制梦想的人提供些什么。

第14章　科学与梦魇

人的思想是被操控了的；我只是想让人们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B. F. 斯金纳①，《访谈录》

在1977年首次出版的《探寻"满洲候选人"》中，记者约翰·马柯斯深入调查，描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历时数载并耗费巨资研究万无一失地给人们洗脑的方法。尽管马柯斯承认中央情报局大量关于思想控制的研究遥遥领先于与其相对应的学术研究即行为科学，但就他所知，该项研究失败了——至少目前没有成功。中情局官员就洗脑策略做了调查并开始了他们的研究计划，"他们指望运用最新技术手段来取得进展。通过十年的研究，中情局得出了颇为可怕的结果，中情局的官员们始终未能找到他们认为可以完全依赖的洗脑技术"。

美国通过招募世界一流的研究人员并给予他们足够的发展空间。它的这种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曼哈顿计划"中充分体现了其价值。曼哈顿计划取得了当时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突破：第一颗可投入战斗的原子弹诞生了。然而，中情局用了更长的时间，倾注了如此多的人力和物力却仍然无法攻克思想控制的难题。或许这种挑战终究难以攻克。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完全不必再对洗脑有什么畏惧。然而，1977年，约翰·马柯斯并未因此而放松警惕。"一个自由社会防范不道德的行为矫正的最好方法是：公开披露和公众觉醒……如今，行为技术已覆水难收。研究工作注定要继续前行。"

尽管中情局关于洗脑的调查研究仍可能无法达成其最终目的——即取得对人类思想及行为的完全控制——但该机构在这个过程中也探讨并应用了许多不同的技术手段：例如，能改变思维的药物如LSD（LSD指的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是一种强烈的中枢神经致幻剂）、催眠术、感觉剥夺，甚至是"模式分

①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也是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斯金纳引入了操作条件性刺激。著有《桃源二村》《超越自由与尊严》等。

离"实验,该实验使用强烈的电击疗法,并常常伴以药物,导致目标对象持续性睡眠,其目的是要将目标对象的头脑变为一张白纸以强行输入新的信仰。偶尔,我们会出于道德缘故而废弃一些折磨手段,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实验证明它们并不可靠。例如,尽管"模式分离"能够抹去记忆,使受害者变得迷惑且被动,但实验表明,要将新的信仰强加给受害者远比预期困难得多。其他洗脑技术,如药物、催眠术,以及感觉剥夺(例如,给罪犯戴上头罩),仍在被人们使用。此外,自马柯斯的著作写就以后,我们对人类大脑的科学认识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那么,将来甚至当下的神经科学研究是否能为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提供帮助,以使思维控制的梦想转变为现实呢?这也正是我们本章要探讨的话题。

重温大脑构造

从第 7 章中我们得知,构成大脑的基本单位是神经元。这些微小的细胞频繁地浸润在液体中(脑脊液),接受、合成、传送电信号。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是通过喷射化学物质(神经传递素)并渗过神经元之间的间隙(神经突触)来实现的。这些化学物质在受体神经元表层与特定分子(受体)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大脑的行为。

换句话说,神经元——乃至大脑——是电化学实体。他们都受到多种分子和电刺激的影响,因此也受到磁场的影响,因为迈克尔·法拉第[②]和詹姆士·克拉克·麦克斯韦[③]早在 19 世纪就向我们展示了电和磁作为潜在统一体的两个表现形式。实际操作中,人们往往把导致思想转变的影响细分为很多类型,这些类型反映了传统的科学划分。物理性影响包括自动放射、电磁辐射(包括视觉影像、温度变化、磁场等),以及最近刚刚提出的量子效应。从技术层面讲属于该分类,但通常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器械或机体影响:如外科手术、机体损伤和疾病。机体损伤和疾病通常不易区分。例如,脑瘤可能通过两种方式严重危害人体:一是改变体内化学物质的分泌水平;二是物理性地破坏细胞的生长,甚至两种方式同时进行。化学性影响包括神经传递素、荷尔蒙、饮食和药物(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分类常常会产生重叠)。这些作用物一部分会直接作用于神经元,另一部分则会在人体内转化为活性物质。它们有的

---

② Michael Faraday(1791—1867):世界著名的自学成才的科学家,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发明家,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者。

③ 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经典电动力学的创始人,统计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麦克斯韦被普遍认为是对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9 世纪物理学家。他对基础自然科学的贡献仅次于艾萨克·牛顿、艾尔伯特·爱因斯坦。

会影响神经元的内部结构以及浸润细胞的脑脊髓液的电平衡;有的会作用于细胞膜,有的甚至能穿过细胞膜进而改变神经细胞的内部运作。当那些神经元内部运作包括了神经元的基因时,那么破坏这些神经元的作用物通常又会被归类为基因影响。最后还有社会影响:如对语言、文化、人际关系等方面笼统的描述。

同基因影响一样,社会影响也被认为是由大脑的电化学变化引起的。然而,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无法完全清楚地解释它们究竟如何发生(或者说,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这的确是无法解释的)。当一个细胞生物学家提到"基因开关"时,这其实是在阐释一个复杂的机制,而该机制是经过多年耐心研究才揭示出来的(而且至今仍未完全了解)。当神经科学家提到"思维理论"或"面部识别"时,这种阐释涵盖了更多的假设,缺乏足够的实践支撑,因为社会神经科学远比基因复杂,发展也落后于基因科学。无论如何,除非有人能够提出有实践支撑的、经得起检验的反面言论,否则这种假设,即认为一切造成大脑变化的影响都归咎于大脑内部的电化学变化,将很有可能一直保持其稳固地位。

物理性影响

本书已有提及,从理论上讲,试图改变大脑中的思想的人有两种选择:一是对大脑本身进行直接操控;二是对大脑所处的即时环境进行间接操控。实际上,大多数致力于改变思想的努力都涉及对环境的改变。中情局有关控制思想的尝试,绝大部分都是以这种间接形式进行的:如感觉剥夺、仿苏联模式的审问手段等。

我们周遭环境的一个明显改变便是大众传媒——如电视业和互联网——的发展,这种改变(不同于感觉剥夺实验)所拥有的力量能够同时影响很多人。这些技术是对物理科学的具体应用,它们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脑科学家苏珊·格林菲尔德④在她的著作《未来的人类》中预测道: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们将跨入复杂的虚拟现实领域,创造出越来越多幼稚化、易受刺激驱使,且不善社交的用户,这些用户的每一项需求都能够通过无比警惕的信息技术得到预测和满足。格林菲尔德认为改变了世界,就改变了生存在这世界上的人。生活在富饶西方的我们所冥思苦想的变化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性。

---

④ Susan Greenfield(1950—):英国科学家、作家、播音员和上议院议员。她的专业是大脑生理学,致力于帕金森症和阿尔兹海默氏症的研究。

在20世纪，中央情报局并没有将虚拟世界的系统整合纳入技术成果的范围。中情局的一些极具争议的尝试，如模式分离实验，采用的是直接干预的方式。自从怀尔德·彭菲尔德[5]等神经外科医生发现向患者的大脑通入电流能够唤醒知觉、运动或记忆后，对于那些有着高度控制欲的人来说，通过向大脑或人体植入某种物质来对人类进行直接的控制就成为了一种令人激动的可行行动。近年来，经颅磁刺激(TMS)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它通过直接向大脑施加电磁影响，(暂时性地)大规模干扰神经元。人类已经尝试过对一些简单的动物行为进行控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彭菲尔德认为该方法也可以运用于控制较简单的人类行为。而要控制一些更为复杂的行为——如个人思想等——则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人类是如此多变且难以捉摸，而当今的微电极和神经植入技术又极不精确，这使得我们目前还无法征服自己头颅中那个神秘的世界。

要了解和控制人类，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阻碍便是技术问题。神经成像技术可以让科学家窥视活体大脑，但若要进行细节化的思想操控，这样的图像仍然不够清晰。类似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这样的技术，其理论依据是:血流会涌向大脑中努力工作的区域。但是，在神经元周围血管加快其运输速率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神经元才开始活跃起来；而在此之前，许多认知网早就完成了短暂的"闪耀"，继而"暗淡"下来了。脑磁描记法(MEG)能够对大脑中电磁场的变化进行测量；这种技术避免了时间滞后的问题，但与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不同的是，它无法渗透到大脑的深处。然而，这两种技术成像的纹理都不够细密，除了能够看到大量神经元簇外，根本无法提供任何可以认识大脑的细节信息。但即使是在如此低的分辨率水平下所产生的信息数量也对当今的信息技术和统计分析产生了推动作用。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理论上说，这些方法论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而实际上，想要为精确的思想控制提供帮助，神经影像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如何，我们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足够的技术精度和运算能力，以从活体大脑中隔离出独特的认知网，并追踪特定的人受到刺激后体内独有的神经通路。或许，我们会有足够先进的统计技术，以极高的精确度在嘈杂的环境中辨别信号。也许科技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使得我们可以对大脑实施秘密监控。目前，要对大脑进行扫描的话，需要将大脑及人体置于一种类似于巨型洗衣机

---

⑤ Wilder Penfield(1891—1976)：美国出生的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他一生致力于心智功能的研究，思考人类灵魂的存在到底有无科学依据。

的仪器。这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极其幽闭恐怖的经历,因为若想要获得有效的实验结果,被扫描的大脑必须保持清醒且不能移动。换句话说,不管实验对象多么不情愿,他也必须积极配合。但如果实验对象意识到自己的大脑正在遭受扫描,那么他或她的大脑活动模式就会扭曲失真。秘密监视和分析需要我们对人类活动的人为干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而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做到这一点,但这并不代表它将永远无法实现。

假如这种秘密监视大脑的技术真的实现了,那么物理学"宝库"或许也能为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们提供一些方法,以期对利用该技术而确定的认知网实施直接影响。詹姆士·蒂丽·马修斯⑥的"空气织机"是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影响施予机器的构想,它能够将强大的射线聚集到受害者的大脑。未来"空气织机"可能会用电磁辐射来影响,甚至烧尽正在特定认知网内执行任务的神经元。在纳米技术支撑下诞生的微型设备可能通过注射、皮肤接触、食物,甚至呼吸直接进入人体,这些微型设备将按照已设定的程序搜索并摧毁相应的神经对象,或者改变连接它们的神经突触。也许精密的经颅磁刺激技术可以使原本活跃的认知网变得顺从,或者通过纳米电极巧妙地控制离子流,抑或运用目前量子领域尚未开发的技术。谁知道呢?但有一点似乎很明确,那就是,因为拥有如人类大脑这般错综复杂的系统,人类的聪明才智将为未来的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提供无限选择。

器械影响和机体影响

在未来的外科手术中,把特定的认知网作为目标可能仍会涉及对活体大脑的实际干预。鉴于上文提到的物理技术适用于秘密操作,即在实验对象相对自愿并且干预手段十分理想而不被人觉察的情况下,外科技术往往发挥权威(如以国家做后盾的医生)的力量来抵制那些被判定为病态或反社会的个体。进行这种思想改造手术能否征得同意,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未来的社会如何看待自身以及它们所持有的虚无思想。

无论能否征得同意,那些神经外科兼精神病医生都很可能拥有许多供其自由支配的、更为精密的工具。他们还可能利用微型机器人、精确的激光仪,以及强大的计算能力来移除那些不受欢迎的认知网和易引发问题的信仰,因为这些

---

⑥ James Tilly Matthews(1770—1815):来自威尔士的伦敦茶商。1797年被关进贝特伦精神病医院,他被认为是第一个记录在案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坚信一伙精通"电气化学"的罪犯和间谍通过名为"空气织机"的机器释放射线折磨他。

认知网和信仰都会致使病人产生功能障碍行为。神经移植——在技术上已经切实可行——能够在某些特定行为发生前就对其发出预警,就如同一个体内气象站,能够对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中逐步堆积的压力以及颞叶中即将暴发的风暴进行预报。或许,在一个人出生时就对其进行基因筛检能够及时发出预警信号并施行预防性手术,以避免将来患上药物成瘾、精神病、恋童癖,以及其他任何为社会所不容的情况。神经植入剂可以改变神经传递素的分泌水平或对体内既存的酶进行补充(例如,使酒精更快得到分解),使得身体器官对某些激素的分泌量增加或减少,免疫系统获得对违禁药品的免疫,或者促使饮食规范化。考虑到目前西方世界对社会成熟度的轻视及对科学魔力的推崇,不难看出人们偏好简易而非繁复,喜欢快速解决而非深思熟虑,这种倾向将使我们一如既往地依靠医学手段而非改变社会本身来解决大部分社会问题。

化学性影响

另一种方法源于我们对疾病不断加深的理解。一旦神经突触出现问题——即那些牵涉进问题认知网的突触——能够从它们的同伴中被识别出来并被设定为目标对象,我们就可以通过破坏神经元来对其施加影响。输送到细胞附近的病毒,通过增加细胞内的带电粒子数量扰乱细胞的电化学平衡;扰乱细胞的内部机制甚至导致细胞的死亡。只要能够有效地进行识别和运输并能可控地移除,所有这些方法都可以用来干扰个体神经元。

随着我们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学习知识,或许我们就能够识别出在突触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化学物质。也许化学模式分离实验——即通过将神经突触重新设定到基准水平来抹除大脑部分机能的能力,终有一天会成为可能。这里我们再次重申特异性这一问题,因为遭此法被完全清除记忆的人,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或许都已经毫无价值可言。若我们所使用的"大脑清洁剂"仅仅作用于在产生某些特定想法时才会活跃的神经元周围,或者仅仅作用于活跃的神经突触(而这又是另一个可怕的技术挑战,因为这种神经元可能遍布于整个大脑),那么这种特异性就会提升。该药剂只能在很短的时机内发挥作用,例如,它可以作为一种或多种不活跃的、貌似无害的先导化学物质而被运输到目标神经元,然后激活某些酶,并在完成破坏后又再次降低酶的活性。当药剂正在起作用并从我们的认知图景中清除某些认知网时,受害者脑中的这些不受欢迎的认知网(如质问他:"那么,请问琼斯先生,你恋童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可能被激活。当然,这样做会间接地损害其他认知网,因为在药物生效时,受害者的大脑处于神游状态。但是,任何一个准备在其公民身

上试验这种洗脑技术的社会可能都会认为,他们对公民所造成的附带损害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这种损害终究也只会伤害到那些原本就已逾越了道德底线的人,如恋童癖患者。的确,比起目前身处的过度拥挤、敌意重重而又危机四伏的大牢,那些恋童癖患者或许更愿意抹去自己以往的认知经历。

遗传影响

我是机器之灵魂,
我是基因之天才。

《神曲》,"沉迷杜松子酒的男孩"

毫无疑问,随着我们对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认识的不断深入,基因研究将为未来的脑科学家们提供丰富的施加影响的潜能。就这一问题,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幸运的是,公众目前的讨论已远远超越了基因损害的谜思,即不再认为"基因决定命运",而转向承认基因和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随着基因控制技术的不断提升,尤其让我们感兴趣的是神经科学未来发展的前景。许多科学家正试图了解基因开闭是如何促进活体大脑生长、改变,并对其造成损害的,而不在寻找同性恋基因、犯罪基因,或是天才基因等问题上浪费时间。

本书前文已经提到如何在活体大脑上运用有效的技术,而不必动用复杂繁琐的外科手术来改造个体神经元。然而,由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神经元都有可能参与到多重认知网之中,因此我们就可能省去改造神经元的麻烦,而仅仅对神经元的特定突触进行调整。神经科学家们在解释突触形成及变化这一极富挑战性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终有一天我们或许能够重组或分离我们的认知网,办法就是在极其细微的水平上操控个体大脑中的个别突触。

当今的许多科学家预测,未来科学那炫目的探照灯光将彻底把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⑦称之为"机器之魂"的蒸汽挥发殆尽,使其精髓沦为历史的遗迹,让思想严严实实地包裹在因果关系网中。我们能够控制遗传物质这个事实,无疑对该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脑中,基因操控将不仅能帮助我们应对常见的疾病,还能提高我们改变或强行输入认知网的精确度。随着我们开始了解哪些基因参与控制突触的可塑性——一项已经在实施的项目——我们也许能够控制人们对信仰的选择及其强烈程度;控制哪些记忆需要被保留,哪

---

⑦ Gilbert Ryle(1900—1976):英国分析哲学牛津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批评笛卡尔的二元论,提出"机器之魂"的概念,其代表作有《心的概念》(1949)。

些需要被遗忘;哪些行为可以构想,哪些却又超乎想象。我们甚至还可能找出对基因进行远程控制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不会产生过度有害的副作用,还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达到更高的精度。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对认知网的识别和操控,那么其所隐含的深远意义绝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尽。或许,我们不仅能够创造某种信念,而且还能对其进行修缮直至以后的任何修改都无法进行,即产生终极的无法受到任何影响的教条式信念。假如简和丹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富裕的家庭并有着相似的宗教传统。如果某些差异使简成为了原教旨主义者,而使丹成了自由主义者,那么这些差异就可以追溯至遗传差异,继而在(在人类出生之时甚至更早就进行的)基因筛选程序中,我们可能会对强烈的信仰做出基因标记。或许,我们最终能够改变与生俱来的暗示感受性,通过使用精确的基因治疗筛选或培养出未来的极端狂热者。相反,我们或许也能够熔化、重塑认知图景的不同区域,使其达到我们偏爱的规格,赋予自己或孩子设计师般的思维。设想一下,如果丹和他的新搭档能够通过"融合"彼此的想法来彰显自己的热诚,或是能够消除简的恐高症,那么这将是多么美妙而实用的技术啊!但是,如果我们在该技术变得可控可测之前就投入使用,那么肆无忌惮的控制狂就会在受害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恣意地删除其思维中难以驾驭的观念,而那些无辜受害者也只能任其摆布,这又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或许未来的药物将包含一个整理大脑的工具包,使患者能够移除自己不想要的认知网。首先,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产生的幻觉;抑郁症患者自我指责的想法;以及创伤后压力失调的痛苦回忆。其次,还有难管教的孩子,社会压力,以及对无害对象的无端恐惧等。再次,还包括不停在颞叶周围嗡嗡作响的令人讨厌的歌曲,前妻那些令人不悦的言论,以及来自老板的羞辱等。自从学会察言观色之后,我们的思想就丧失了隐私,而学会语言则加速了这一揭下"萨洛米"面膜的过程。这种解密现象将以极快的速度继续发展,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可能愈演愈烈,届时人类微妙的生理结构——首先是身体文本和语篇,然后就是大脑脚本——都将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或许将来的法律中会包含对大脑进行强制性矫正的条款,以消除人类那些不恰当的想法,从而防止不当行为的发生。早在这些高度专业化的设备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可以利用植入剂对那些高危人群进行远程的监控和操纵。例如,如果科学家们能够确切地将杏仁核或眼窝前额皮质的活动变化与自我失调和随之产生的暴力行为(即使是自残)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检测到这些变化,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暴力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另一种可能的措施是"成瘾控

制”，即利用植入剂，如那些已被使用过的非法药物，使个体对稀缺的化学物质产生依赖，从而顺从于化学物品的供应者。

基因调整还有其他的用途。当我们想要对付自己的政治对手时，如果能够使用某种病毒载体（即向该病毒的基因密码中插入额外的DNA）来破坏他的大脑，让他自己败坏自己的名声，那又何苦再去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开展反对他的政治运动呢？就让这些病毒载体携带上基因指令，去启动对手前额叶皮质中某些通常处于静止状态的基因，由此引发的恶性肿瘤将很可能给他的行为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由此一来，你便能事半功倍地解决问题。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综合征以及其他精神病的噩梦（也许还有一些我们尚未发现的病症）都能用作武器。我们甚至不难想到，国家还可能通过在罪犯体内刻意诱发疾病来惩治罪犯。

当然，使用基因技术来让已认罪的罪犯、国家公敌或其他组织外成员患病，不论是癌症还是克雅氏病，不论是人为造成的厌食症还是痛苦难耐的关节炎，都会被视为惨无人道、伤风败俗的刑罚。但是从道德上讲，如果我们有可供使用的科学技术而不去使用，那这种观念是否和人类的其他行为大相径庭呢？或许如此吧。然而，我们回顾历史想起了奥斯威辛和塔斯基吉⑧，想起了原子弹、生化武器，想起了被五马分尸的卖国者，想起了被活生生烧死的女巫——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这类可怕的案例。就像本章中提到的其他投机取巧的方法一样，通过在罪犯体内诱发疾病来将其处以死刑并没有逾越任何尚未被逾越过的道德底限。事实上，尽管遗传控制能够毋庸置疑地改善思想控制技术，但在一般方法切实可行的时候，我们无须使用遗传控制。因为人们在很早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社会影响

许多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都曾有过一种观点，即在我们的思维和“真正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个“知觉之幕”：它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阻止我们去了解世界“真实的”模样。正如我们在上文所了解到的，在苏珊·格林菲尔德所设想的未来世界中，虚拟现实巩固了知觉之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自身一贯的、纵情的、令人慰藉的错觉包裹起来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表面上我们不仅可以控制环境，还可以控制周围的人，从而满足我们对控制的向往。从

---

⑧ Tuskegee：塔斯基吉梅毒试验，是美国在1932—1972年间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在亚拉巴马州对400名非洲裔男子进行的一系列人体试验。美国政府在1997年对受害者进行了赔偿，并表示道歉。

虚拟男管家到实用机器人，再到从不抱怨或挑剔的网友，我们可以不用再让那个被惯坏的自我作出妥协，不再需要放弃童年那希望与众不同的幻想——成为王子或公主，做那受命运青睐的人，或者至少是“这个不停转动的世界上的一个静止的点”，当然，我们仍需对某些行为设定限制，至少是对那些需要社会交往的场合，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仍是自己那小小的虚构世界的主宰。这是幼稚的唯我论者的完美秘诀；但是倘若周围的机器可以成功地控制我们，那谁还会去注意自己的行为呢，更不用说在意了？

正如我在第11章中曾提到过的，主观自由和客观自由并不同。有时，就像罗伯特·布朗宁所写的诗《安德烈亚·德尔·萨托》中那个画家一样，我们会发现——“我们看似越自由，束缚得就越紧！”——但是我们常常过于心烦意乱、疲惫不堪，抑或是懒惰成性，因而无法注意到我们那被制约了的生活。闭路电视监控系统随处可见；政府策划查阅我们的电子邮件；超市也记录下我们购买的任何商品——但我们必须保证个人隐私安全，如果人们毫无隐私可言……零售商又将如何为我们提供我们应得的为客户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服务呢？况且，生活是美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很多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因此，我们放弃客观自由而选择了它的虚拟替代品：我们上网匿名聊天而不与朋友谈心；我们阅读时尚杂志而不试图从同辈压力中寻找自由；我们想得到消费者的选择（光卷筒卫生纸就有30种，太棒了！）而不是拥有除了消费者之外的其他角色的自由。我们变得越来越墨守成规，越来越容易被形形色色的试图影响他人的人看穿心思，但我们仍然相信个性主义者的宣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比以往更加自由。

未来学家的另一个担忧是，人情世故会导致雾化。粗略地说，根据这一悲观的信条，既然真实的人令我们如此讨厌，那么假如有机会选择，我们会更青睐那些虚拟的替代品。隐退于一个满是虚拟朋友的世界，通过设定好的程序关爱我们，我们将丧失那些目前能使人类个性发展成为各种有趣人格（有时甚至是中庸之人）的制约条件。其中主要的制约条件是：我们必须和其他人一起生活。正如沙滩上的鹅卵石，相互接近磨去了粗糙的棱角，变得圆滑。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会降低，甚至完全消除我们打磨自己认知图景的需要，也即作为一个社会生物的需要。

很多人对于失去真实社会纽带的想法都感到深恶痛绝。因为他们从群体归属感、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爱情中获得回报，并将这些快乐看作生活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他们将自己与社会的联系看作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这些联系替换为一种网络关系，就会导致他们对自身的存在意义产生怀疑。然

而,对有些人来说,统治地狱似乎要比服务于一个并不怎么像天堂的真实世界强得多,尤其是如果地狱中充满人性慰藉(或者这些人恰好在爱情和友情方面很不幸)。当然,随着科学不断揭示出这个魔法织机的编织原理,人类设计虚拟伴侣的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如果雕塑家皮格马利翁[9]能够爱上他自己创作的雕像,那么或许我们对于情感依附的需要便可以从依靠信息雕刻出的仿制品中得到满足。有时候,一个仁爱的网友远远胜过真实的朋友(在英国,死于家庭暴力的儿童仅仅是实际存在的监护人虐待儿童事件的冰山一角)。但我们终究还是会做梦、会幻想,会阅读小说,会观看电影。换句话说,我们正一步步地使自己远离现实。移居至一个虚拟世界只不过是科幻作品中人走入镜子的那最后一步。

即使在今天,想要完全躲进自己的世界也是有可能的。但绝大多数人仍然徘徊着不愿跨入那面镜子,因为他们同情并鄙视那些已经躲进里面的人。幻想使我们不致淹没于单调乏味的工作中;在小说、电影或者药物的帮助下,我们或许能短暂地逃离现实;但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日常生活。因为我们都根植于社会这个大环境来汲取养分,所以提倡用虚拟世界来包罗万象,无疑使我们深感不安。我们同情在彼得·威尔[10]导演的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楚门。他自出生就伴随着一台精心设计的电视机长大成人,他执意要揭穿那些伪装者。我们着迷于看《1984》和《美丽新世界》,好奇于柏拉图的洞穴和笛卡尔的恶魔,但我们仅仅将它们看作恐怖的幻影,而不是理想的乐园。我们的抗拒感能够察觉出结局与预期的错配,并发出警告——因而让我们不断探索真理——一想到现实与表象之间的鸿沟,我们便会勃然大怒。

要想成为洗脑者,需要学习的东西显而易见。以表面自由作为回报,我们可以说服他人放弃客观自由并交出对自身生活的控制权——换句话说,只要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获得的自由,并且对自己所放弃的自由不屑一顾,抑或毫不知情,他们就能被说服。自由感是人们的基本情绪反应,但它与某些特殊能力(如,表达我们的思想,去我们想去的地方等)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习得的。洗脑者的诡计就在于破坏其间的联系(或是一开始就防止这种联系的

---

⑨ Pygmalion: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国王,据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中记述,皮格马利翁为一位雕刻家,他根据自己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创作了一个象牙塑像,并爱上了他的作品,给"她"起名为伽拉忒亚。爱神维纳斯非常同情他,便为这件雕塑赋予了生命。皮格马利翁的故事被后世许多艺术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演绎。

⑩ Peter Weir(1944—):澳大利亚电影导演。拍摄的影片有《三个要走》(1971)、《死亡诗社》(1989)、《楚门的世界》(1998)等。

形成),使大脑无法发出警报信号,这样一来,比如在言论自由权受到侵犯时,抗拒就无法被触发。由此就不再会有情感反应,不存在需要浇灭或强制扑灭的狂热。目前,我们的洗脑技术见效慢、精度低:反复淡化那些有疑问的自由的价值,强调可能使自由无法持续的潜在威胁,提供令人愉快的干扰,等等。将来,我们可能会掌握一些其他方法,使得我们——或者那些控制我们的人——能够准确地找出与之关联的神经源,并将它们齐整地从我们的思维中移除。

贯穿全书,我反复强调人类 DNA 细微的差异是由于人脑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差异造成的。大脑皮层褶皱和裂缝的大小及位置均因人而异;有些人主要用右脑处理语言而非左脑,正如我们在第 12 章描述的那样,人脑的大小也千差万别。这些差异以及个体的其他差异,对于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来说一直都是个噩梦:要越精确地进行思想控制,就越需要高度个性化。当张三考虑要殴打自己的同伴时,如果能将他大脑中被激活的那组神经元、神经元簇或大脑区域识别出来,那么我们就可能通过神经的改造来纠正张三的恶习。但是对于李四、王麻子以及其他所有虐待其同伴的人又该怎么办呢?当想要实施虐待行为时,李四和王麻子大脑中被激活的区域可能和张三相同,但也可能不同。即使相同,从神经元或神经元簇的层面上说,他们的行为模式与张三相同的几率也极小。因此,从对张三的改造中获取的经验很可能对于李四的改造没有丝毫借鉴意义。

当然,中情局非常清楚某些个体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因而必须实施有针对性的思想改造术。然而对于大规模思想控制来说,这种思想过滤器无须如此精细:比方说,大规模思想控制影响的是所有的脑区而不是个别的认知网。即使是这种粗糙的影响形式也可能奏效,尤其是在受到人为情感诱导,然后与特定刺激相联系时(“只要对杏仁核实施快速刺激,就能将它们除掉……”)。直接大脑控制与间接大脑输入控制相结合有效地改进了当今的思想改造术,比如某些被极端政党所利用的手段(详见第 9 章)。

面向未来

未来的人类是否能够抵制住其更具掠夺性的同类对于他们的掠夺呢?组织实体(国家、部落、社区或其他任何称呼)是否已经很好地理解了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从而能够控制其成员的一生(从出生之前一直到被处以安乐死)?我们是否能够逃离 20 世纪的文学作品(如奥威尔、赫胥黎、J. G. 巴拉德[11]、菲利普·

⑪ James Graham Ballard(1930—2009):英国作家,“科幻写作新波”的重要成员,最著名的小说有《撞车》(1973)和自传体小说《太阳帝国》(1984)。

K. 迪克[12],以及许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以及电影(如《大都会》《黑客帝国》《银翼杀手》《超世纪谍杀案》等)所描绘的反乌托邦的愿景？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

然而,我发现想要变得和反乌托邦者一样悲观绝非易事。在大脑科学正式宣称能够解决那些在电影《智人》中出现的由个体差异引发的问题之前,其要处理的问题还很多。人类是伟大的奇迹,污秽卑鄙、机能不良且执拗难处,人类的未解之谜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挫败最优秀的思想改造专家。现代西方文明也有很多值得赞许的地方,但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技术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问题当然很多,但并非无法解决。关键在于如何解决:是人们欣然去解决呢,还是迫于外部压力才去解决。

同大脑一样,人类组成的系统往往厌恶极端,在面对极端行为时总是倾向于进行自我修正。如果需求下降,价格就会下跌;如果失去了爱,人们就会去别处寻找新欢;如果有人对你怀有敌意,你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以怨报怨。一个政治上的例子便是西方国家的傲慢和自私,它已然塑造并培育出了好战的伊斯兰教以及反全球化运动等反对势力。西方国家崇尚经济发展和消费资本主义,将人们大量填塞到大都市中,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古老的社会纽带,而它培育出的公民似乎并不幸福。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人们不幸福的原因,那我们也许能够改变那些致使人们不快的期望,例如,增强人们的集体观念和相互之间的责任感,淡化金钱万能的谬见等。在国际大舞台上,我们可以改革关税,支持国际法律体系——坚定不移地——停止扮演世界上以大欺小的恶霸角色。社会思想——即个人和国家看待自身及他人的方式——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社会思想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思想控制技术赋予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更多的支配力量之前,我们尚可挑战诸如思想控制的梦想这样的想法;我们亦可改良观念——如正义与自由,通过更加公正地对待他人,从而消除他们对于西方世界及以其为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仇视心理。鉴于神经科学并不是科技进步的唯一源泉,那么人们便有可能使用原子弹或生化武器来快速泄愤。我们的前景不容乐观,现在是时候对其采取行动了。

与此同时,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人类的奥秘终究会被揭开。那些思想家鼓励西方人将自己看作前线的战士,想象自己正在抵御一个正在不断逼近的,拥有一切资源科学支撑而又无比强大的国家的入侵。历史上,不少科学家都曾不亦乐乎地为那些强国效力——然而,崇尚创新的科学却并不总会给予历史教训适当的重视。如果思想控制的新技术能够得到发展,

---

[12] Philip K. Dick(1928—1982):美国的科幻小说作家。

那么它们能否远离政府的控制，科学家们能否通过相互合作来帮助弱者，防止犯罪，制造更好的武器，抑或是其他？假如这一切都实现了，那么我们的后代最好留意一下自己的自由权，假如他们仍有自由可言的话。或许我们应该站在他们的立场以及我们自身的立场上看待并考虑科学加速发展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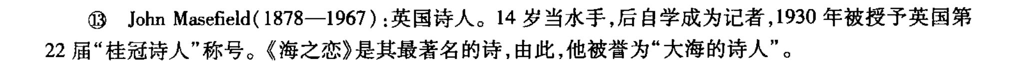
※本章小结

目前，探索人类思维的那些科学可以直接揭秘大脑内部。他们可以观察活体头盖骨的内部构造——一个在脊椎柱顶部保持平衡的盒状骨头，并绘制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细微的大脑活动变化。不论是潘多拉的魔盒，还是约翰·梅斯菲尔德⑬的《幸福的盒子》，盒盖总是虚掩着。未来，至少在改造个体思想方面，我们有可能实现思想控制的梦想。但我们需要花费多长的时间来提升技术以及这些技术是否能够付诸实践，就无人知晓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根本无关紧要。科技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尽管它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阻碍或进展，但它的全部潜力已经隐含在了思维控制的梦想之中。随着梦想渐渐贴近现实，对于思想控制的憧憬也可能随之发生改变，但这个改变很可能只是范围上的缩小。正如我们所知，某些事情确实不可能发生。梦想本身已然拥有了完全的主宰权，它已有能力确保没有什么“错误的思想存在于世界的任何角落，无论它多么隐秘、多么微不足道”。那么，如何进一步增强这种势不可挡的观念呢？

一直以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我们如何运用它——这取决于我们的思想、外界普遍接受的信仰，以及由谁来定义正确与错误。如果我们仍然带着恐惧和敌意看待差异性，如果我们为了安全而放弃自由并且接受国家控制和公民毁灭，那么思想改造术就将会被应用于遭到社会排斥的人身上。如果处境更为安全的公民在接受思想控制时不加反抗，那么那些以执政为目的的思想控制技术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将其魔爪伸向更多的社会群体。

我们将何去何从？是否可以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来提高这种可能性：个性迥异的我们及后代在整个21世纪都不受任何影响地自由思考。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作为个体和公民，我们可以采取哪些防御措施。


⑬ John Masefield(1878—1967)：英国诗人。14岁当水手，后自学成为记者，1930年被授予英国第22届“桂冠诗人”称号。《海之恋》是其最著名的诗，由此，他被誉为“大海的诗人”。

第 15 章　选择一个立场

许多毛病的药方就在我们手中，可我们偏要寻求上天帮忙。

威廉·莎士比亚，《皆大欢喜》

影响企图，从最温和的说服到最具强制性的洗脑，就如同光线和腐烂一样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要想与他人共存，我们就必须相互改变。从教化孩子到惩罚罪犯，人类及其文化都为此提供了大量无法避免的影响来源：这些思想能改变盘旋于我们头颅之中的认知网。它们或无害，或恼人，或有益。从巴赫的音乐到广义相对论，一些极具启发性的思想不断推动着各类迷人奇迹的出现。而有的思想，如思想控制的梦想，却是极其恶毒的。

本章我们将描绘消除这个控制梦想的危害的方法及其他有关事宜。在探讨社会如何保护自己及其公民之前，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个体如何抵制洗脑技术。

持续的影响

尽管我们希望避开所有影响企图，但我们并没有用以察觉和应对的认知资源。根据多年前的一个统计，“普通的美国人平均每天会面对 254 个不同的商业广告”；并且这个数据仍在不断增长，而这些数据涵盖的仅仅是广告。我们从新闻、网络、书籍与杂志、朋友和家人，以及数小时的电视节目中获取大量的信息，它们或内隐或外显地轰炸着我们的大脑——这些灌输给我们的信息无不旨在改变我们的思想。为了把这种轰炸程度降低到个体能够监控影响企图的水平，我们首先要实现的就是社会隐退（没有人际交流，没有电脑、电视、收音机及各类平面媒体）。但除了那些最坚定的隐居者，我们似乎并不可能做到这一步。

几乎没有人愿意完全独自地生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绝大部分的影响企图都处于能谱中能级较低的一端，它的产生几乎无须能量注入。它们是如此温和——如此明显——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值得挑战。更多时候我们总是随大流，认为自己没有时间、精力或动力来作出改变。这种漠然的态度对于试图

影响他人的人来说既有益又有害。对那些想要改变他人思想却又不愿暴露自身行为的人而言,使用这种“滴水穿石”的方式来反复强化一些内隐假设(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对我们有益”“你就是你所拥有事物的一部分”,等等)是很实用的。但当我们想要从众多信息中辨别其中一个,或是为了使该信息被吸收、考虑并融合到认知图景之中而触发目标对象的监控和反思能力时,这种方法就会出现问题。例如,在广告宣传中,一个广告或许会包含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用浮华的外表来吸引眼球(如使用带有强烈叙述性的、诙谐的、有特色的音乐或色彩,等等);二是用更深层次的结构强化某种社会信仰(如用“女主内”宣扬传统的“家庭观念”,“男主外”强调有偿工作的重要性,等等)。即使其表面吸引没有成功,但其深层寓意(通常是一些保守的信息)却会得到强化。

漠不关心、愚昧无知和忙忙碌碌让我们躲过了许多试图改变我们思想的企图。另外,试图影响他人的人也无法在完全脱离社会的情况下工作。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提出了劳动分工原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在这个原则的引领下,我们已将大部分有关影响监控的工作移交给了专业人士。我们期望报刊记者能够揭露政府的暗箱操作;期望电视新闻能够揭发报刊编辑的不道德行为(反之亦然);同时,我们还有专门的机构来规范电视节目的内容,等等。我们对专家们的种种期望恰恰构建了对于他们的信任,并且只要我们还继续信任他们,便不会觉得自己有必要去重复他们所做的工作。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未来的科学技术将会为影响施与技术提供额外的武器,即与目标大脑进行直接的互动。当然,我们并不奢求能够抵制一切形式的思想改造术。没有人能够完美或强大到不需要从新思想中吸取精华,也并不是所有的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对我们来说都意味着(或者会造成)危害。但有些的确对我们有害。那么,我们将如何保护自己呢?

大脑模仿病毒疫苗

知识就是力量。

弗朗西斯·培根[①],“异端”,《宗教沉思录》

采取预防措施是堵住试图影响他人的人的枪口的一个方法。如果简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相信某首摇滚歌曲中包含了撒旦的信息,那么为了避免

① Francis Bacon(1561—1626):第一代圣阿尔本子爵,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作家、哲学家、政治家,是古典经验论的始祖。



受到黑暗王子的影响,她会果断地关掉正在播放这首歌的收音机,毁掉相关的唱片,甚至发起禁止在公共场合演奏它们的运动。她的另一选择是,仔细聆听这首歌并作出深入的分析,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敌人。她可能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宗教仪式,希望自己的虔诚能够赢得上帝的青睐和庇佑。她还可能去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从他们那里获取抵抗(存在于摇滚歌曲或其他地方的)邪恶影响的秘诀。她甚至可能组建一个自己的基督教摇滚乐队。

换言之,简能够采取各种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被她视为邪恶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所带来的危害。她会避开那些可能使自己沦为影响目标的情况,这便需要她与未来的自己建立跨时合约(请见第11章),从而把“逃避摇滚乐”视为自己的重要目标。她会收集信息来丰富自己相关的认知图景,使自己蜕变成具有高度积极性且善于察觉影响企图的专家。或者,她会更加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因为她知道这些信念和影响企图所宣扬的信息相悖。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或为自己所持信念寻求新理念或社会支持,简能够利用自己对撒旦的了解来预测其可能采取的影响方式,从而抵制它的影响。她利用思想对抗思想,用一些特定的信仰来免疫自己的大脑,以抵御那些在她看来是有害的、具有潜在侵略性的大脑模仿病毒。

如果简强烈地想要维护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并抵制邪恶,那么她头脑中与“邪恶”相关的认知网和与“信念”相关的认知网将会同能对特定刺激产生自发反应的强烈情感建立联系。就像厌食症患者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与食物有关一样,她坚定的信仰能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她的行为。新思想,尤其是那些与旧思想相悖的新思想,将很难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区域立足,因为新思想对自身进行强化所需要的能量总是会被先于其存在的认知网吸走,这些认知网会对新思想进行“顽固的抵抗”。尽管简感到恐惧,但是摇滚乐并不会对她造成危害。也许她更多的是在为其他人担忧。也许只有派出一名思想改造专家——或由撒旦一方做出坚定的努力——才能瓦解简的信仰。因此,坚定的信仰往往是抵御洗脑的有效措施。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简一样坚信自己的信仰。虽然我们无法进行顽强的抵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采取其他措施。就像简一样,我们也能预测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这意味着,在影响企图发生之前,我们可以利用知识和/或社会支持来削弱其影响,或在受到其攻击时进行自我保护。如果玛丽从她痛苦的经历中了解到自己在醉酒后会失去自控力,那么如果她想要降低产生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她便会要求自己远离酒精。玛丽预测到了自己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可能发生的行为,并使自己作出改变以避免陷入那种状况,这

就是第9章中所讨论的“选择放弃”行为的相反形式。她成功地把先前引发喝酒行为的社会诱因和新的认知网连接起来，这是一种通过回忆曾经的窘迫来促使人们停下来思考的方法。同样，承认思想改造术有存在的可能是预测你可能出现的反应并相应地改造你的大脑和行为的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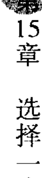
停下来思考：影响企图的解药

我们用于抵制影响企图的许多方法都会触发停下来思考的功能（见第10章）。批判性思维、怀疑论以及幽默感都是停下来思考的具体反应。批判性思维和怀疑论对信息进行分析，检验论据的逻辑性、情绪语言的使用，以及事实陈述的准确性。同时，它们也对信息来源的权威性及动机提出质疑。而幽默则常常挑战权威，尽管它所重视的是情感而非论据。

停下来思考的反应取决于我们的“情境性”，取决于以下事实，即终其一生，人们总是沉浸在记忆之中，沉浸在乔治·斯坦纳[②]所说的“实际、真实、现行的日常世界”的持续体验之中。如果电影院放映的片子很有趣，那么你很可能会被其情节完全吸引，你的视觉皮层会开足马力。相比条件反射，刺激这时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炎热的周五下午，被困于办公室无聊会议中的你或许会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走神，发现天平倾斜到了另外一边。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输入来占据你的大脑，那么它便会重新利用由回忆和反思提供的内部资源。如果你的回忆是美好的，那么这很好；但是如果你的回忆是个不确定且令人不快的环境，例如监狱，那对曾经的悲惨遭遇进行反思将很难激发你的斗志。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提高输入信号的水平。大脑能够自动进行这种活动，这也正是为什么忙碌的人不会注意到闹钟滴答声的原因，除非他们正受困于一个无聊的会议之中。当然，从你周围找一些有趣的事物也是一种毫不含糊的策略。

爱德华·亨特在其《洗脑》一书中叙述道，一些战俘被隔离了好几个月，并被剥夺了一切可以消磨时间的途径，他们通过编写和背诵诗歌——通常是以幽默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处境，并分析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以及逮捕他们的人想要达到何种目的。有些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向审讯者编造一些貌似可信的谎言，他们用这种高风险的游戏愚弄了自己的敌人，而且没被拆穿。一旦自己的谎言被相信，他们的自信心就会得到增强，目标也

② George Steiner(1929—)：欧洲出生，极具影响力的美国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小说家、翻译、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写了大量有关语言间关系、文学和社会，以及大屠杀所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的著作。



变得更加明确。一些人甚至研究苍蝇的飞行学以排遣空虚和无聊。

识别与抵制

在未来的社会中,思想控制的科学融汇到政治统治中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认为,这个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现在所作出的选择。

卓乎林和欧波同,《心灵机械手》

强制性手段、暗中行事以及科学技术是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可能采用的三种改变思想的方法。对目标对象而言,他们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识别出有人正试图对他们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其自身利益至少存在着潜在的危害。这将触发足够的抗拒来诱发停下来思考的反应。对使用强制性手段的技术和目前的科学技术而言,被识别出来通常不是问题。而对暗中行事来说,正如前文所言,防护性思想——如各种坚定的信仰、怀疑或批判性的态度或是曾经类似的、遭遇过影响企图的经历——会在其大脑中形成适时启动的触发开关。然而,我们觉察欺诈手段的能力并非完美无缺。对于在较长周期内采用循序渐进方式进行的影响企图(如第5章中曾讨论过的家庭暴力)来说,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将进行欺骗性影响的事件公之于众并对其进行惩罚;训练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参加公开的辩论;或者从他人的经历中学习经验。在确定自己充分了解自身信仰的前提下,无论是否利用自己的知识,我们都可以降低这些信仰被改变的可能性。

第11章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即使是科学决定论学说——可以阻止我们突出重围,采取某些甚至所有防御措施,只要我们想到了就能够做到。我们是施动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因此我们当然可以自己改变自己的大脑,除非我们更愿意被别人改变。我们也可以加深对自身行为的了解,从而提高自我决定能力。了解我们对社会因素——如组织内和组织外区分的诱惑、压力的典型强化作用等——的易感性,也许能帮助我们了解外界影响是如何对我们起作用的。

一旦人们成功识别出了影响企图,那么他们所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便是如何抵制这些企图。暗中进行的思想改造术能否成功取决于它的隐秘程度,一旦被发现,它不但会失败,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朋友会告知正在谨慎地研读新摇滚专辑的简"不必担忧",因为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可疑的歌曲并没有包含如撒旦般邪恶的信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简可能会直接相信朋友的话。然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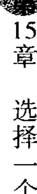
如果停下来思考一下,她可能会认为朋友这么说只是为了消除她的疑虑,因此她会向朋友追问该信息的来源或询问这个调查是由谁实施的。如果实施该调查的权威是正统的(如简的居住地的牧师),朋友向简施加的这种影响最终仍可能是成功的。但如果该信息来源于一位无神论科学家,那么简不仅会拒绝接受这个信息,并且会更加坚定地认为摇滚音乐是危险的。

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许多经典的洗脑情境都会涉及胁迫甚至明显的刑讯。强制性手段从不试图避免被目标对象识别,但它会触发抗拒和抵制行为,这正是它必须克服的问题。一位被充分激发的受害者也许连刑讯都能成功抵制,无论他所采用的方式是心理逃避还是精神寄托(就像宗教殉难者通过冥思上帝的教诲来抵挡痛苦一样)。暂时地屈从也许是另一种策略。事实上,对使用强制性手段的理论家而言,从信仰转变中辨别出假意的屈从一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在上一章中,我预测了利用新技术实现思想控制梦想的可能性。然而,科学技术的用途通常不止一种,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技术使用者或创造者都渴望控制他人。许多在人类冲突中产生的科技进步都会遵从这样一种普遍存在于生物进化中的模式:人类会进行装备竞赛,即针对一方发明的新武器(或防御工事),另一方会很快产生相应的防御工事(或新武器)。思想改造术,从其本质来讲,是其目标对象和侵略者之间的斗争,因此也会延续这个传统。也许双方的斗争会一直持续,直到资源耗尽,也或许随着人们逐渐失去对洗脑梦想的热情(我们终究会艰难地放弃一些幻想,比如用来为奴隶制辩护的种族优越论),政治环境也会随之改变。与此同时,大脑防御领域的神奇土壤可能会产出一连串奇妙的果实:从反教化的药物到"电磁微波防护盾"以保护大脑免受电磁干扰。

思想扭曲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从自我保护的范畴转移到一些其他相关的问题上,比如,如何消除洗脑对他人的影响。思想就像病毒,它们会给人带来不同程度的损伤。其中最有力的损伤——某些虚无思想——其破坏力之强足以控制甚至摧毁被侵袭的大脑。就像埃博拉病毒,它们会给受害者——无论是感染者自身还是他们所伤害到的无辜者——带来极大的痛苦。与大多数病毒不同的是,虚无思想可能会受到目标对象的欢迎,而且他们可能会强烈抵制对这类感染的清除。我们对邪教的敌对反应往往低估了邪教能够满足成员需求,并获取自愿、忠诚追随的能力。



在一些极端案例中,感染了虚无思想的人会变成令人咋舌的怪胎和思维单一的狂热者。占据主导地位的认知网能从其他与之抗衡的思想中汲取能量,并最终封闭感染者的视野。被感染者的认知图景被扭曲,眼界也变得狭隘。被感染者对一切事物的认知都无法摆脱与该主导思想的联系,并因此产生了一种“阴暗契约人格”。例如,一名患厌食症的少女固执地认为只有瘦的才是好的。许多现代西方人也不同程度地持有这种观点。然而,厌食症患者对此信条的笃信程度能使他们把保持体形看得比自身健康甚至生命还要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厌食症患者对食物的关注和对饮食的控制会逐渐从刻意维持的举动转变成自发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近乎成为其性格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这么说,一个慢性的厌食症患者无时无刻不惦念着自己所吃的食物,对她来说饮食控制的确无比重要。我们越来越难想象,那些有人格障碍的人如果脱离了这些障碍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在人类历史中,最具危害性的虚无思想之一便是那凌驾于所有道德或法律标准之上的绝对权威。无论我们所提到的权威是上帝、党派、科学、真理,还是国家,从古至今人们一直都在用这些特定的虚无思想为某些暴行披上合法外衣。它们把人类视为谋取利益的工具而非服务的对象,把某些抽象目标看得高于人的生命及生活质量。无论它是否与极权主义政权有明确的关系,这种绝对权威思想都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明确例证。

正如艾滋病患者可能会死于通常情况下并不致命的肺炎一样,当不同的虚无思想结合在一起时,它们往往格外危险。“权威”这个词本来是一个我们频繁使用且毫无不良反应的概念。然而,当把它强化为极端权威并将其与一些意图改善世界的极权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时,其结果却可能是致命的: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实现这种理想并以此作为终生唯一的奋斗目标,而这种动力又甚至高于其自我保护的本能,那么他会将任何阻拦他的人送入地狱。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结果是,他会变成一个喧嚣不休、令人讨厌且蛮不讲理的极权主义分子。他认为,我们应该为了拯救用于实验的小狗而杀死科学家,为了守护信仰而杀死作家,为了催生新的世界秩序而杀死成千上万的平民。而最坏的结果是,他将变成圣战士、好战者或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他不会将自己的愤怒和沮丧浪费在无用的叫喊上,而是会将其全部能量奉献给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降低这些扭曲思想所带来的危害呢?对这个问题并无简短的答案,因为各种虚无思想在其致命程度方面各有不同,并且能从不同的来源获取生存所需的能量。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对其无计可施。虚无思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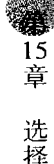
能量一部分源于其抽象的、不可挑战的简易性，一部分源于它们能够轻松适应现存的其他信仰，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它们与强烈情感产生的联系。若要将它消除（至少在技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直接改变大脑的方法之前），我们可以向其发起正面挑战，努力削弱为其提供支持和力量的信念及情感，也可尝试在第一时间内阻止此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摆脱束缚

让我们假设有这么一个叫萨姆的年轻人，他认为杀死相邻部落的成员是为族人谋取自由的最佳方式。于是，萨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自由的追求之中并做好了随时为之牺牲的准备；并且，这两个部落之间也的确存在着长久而艰苦的斗争。因此，我们找来萨姆（或者如果我们足够小心的话，可以派代表过去）并与他讨论他的这个想法。我们听他诉说自己的处境，并指出一些问题。他所指的自由究竟是什么？他认为应该杀死多少人？这可能吗？他难道没有意识到，相互残杀只会使双方更加固执和更加敌对，并由此陷入暴力的恶性循环吗？难道他不认为理性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吗——那么我们是否能够主动充当双方矛盾的调解者呢？至于萨姆是会先礼貌性地倾听再选择无视我们，还是更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可能取决于他对我们有多重要这一问题的评估。他绝不可能说："好吧，你们是对的，我以前从未想到过这些；你们最好赶紧去隔壁部落替我道歉，我们会马上进行和平谈判。"

固然，我们不是萨姆部落的成员，也不是筹划萨姆所参与的暴力行径的领导者。所以，假设我们有办法说服这些领导者中的一员，比如 X 先生——一个萨姆非常崇敬的极富影响力的思想者，让他认识到这种行为的错误性并请他向萨姆传达同样的观点。那么，萨姆会就此妥协并从此远离暴力吗？

答案也许是否定的。使萨姆成为杀手的信仰是虚无思想，它扎根于极权主义。如果想同他人交流这些思想，X 先生会首先强调它们的简易性和绝对权威性，就像他自己当初被灌输这些信息的时候一样。只有彻底摧毁这种绝对权威思想，他才能改变自己的看法并迫使萨姆作出选择：要么放弃他所珍视并投入了诸多精力的信仰，要么断定 X 先生头脑发昏、失去理智，或是已然变成了叛徒。萨姆为他的信念投入了太多，以致他不可能因为现实生活的复杂、变化和缺憾而放弃它们。虚无思想所能带来的乐趣之一便是其超强的辩解能力和让一切事物都看起来简单易懂的能力；这些或许正是萨姆投身于那些信念的原因。相比于承认个体差异的细密之处来说，将世上所有人明确地区分



为“我们”和“他们”的做法对认知资源所施加的压力要小得多。

来自组织外和组织内的正面挑战可能都不是消除虚无思想的最佳办法。同暴力手段一样,它也会直接面临抗拒所带来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做出更多细微的努力。方法之一是,将萨姆的虚无思想视为一张环环相扣的认知网,这样一来,某些核心信念除了能从其他信念中获得支持外,还能从认知网中汲取力量。这样或许可以弱化外界支持。萨姆也许并未见过多少敌对部落的成员,倘若如此,那么向其宣扬这些部落成员的仁慈或许会有所帮助。将萨姆的好战情结通过其他破坏力更小的方式排解出去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在英国有一种很流行的排解方式叫“踢足球”)。教育和政治举措可能会打开他的认知视野,并为他当前的受限处境提供更多解决方案,同时促使他采取更为和平的行为方式。

这种缓慢瓦解虚无思想的做法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大可能取得成功。想要使其生效,我们还需要另一种方法的协助,那就是:尽量削减能为萨姆的虚无思想提供能量的情感。这或许是采用得最少的一种方法,因为它也恰恰是最困难的方法。这需要我们进行公开讨论来分析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真诚地倾听萨姆及其敌人的意见)。接着还要进行细致而长期的政治干预,这无疑意味着一大笔开销。人们不会某天醒来就突然觉悟到:“好,今天我要做一个冷血的偏执狂。”人们之所以采纳虚无思想是因为他们身不由己、被迫无奈,因为有一股他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向他们施压并激起了强烈的情感反应,致使他们不得不作出简单直接的回应。虚无思想唾手可得,在他人的宣传下就像灵丹妙药一样为人争抢。(“只要能使我们获得自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无所谓。”)萨姆想为自己和后代谋取更好的生活,这种愿望如此强烈,因此他愿意随时为之而战,而这也正因为他目前所遭遇的生活无比糟糕。改善萨姆目前的生活状态——如收回对邻邦的控制权,坚持萨姆的权利应该受到尊重,建立民主选举制(并接受其结果)及独立的媒体,改革土地制度,并逐渐提升萨姆的个人自由——这一切都比威吓或说服更有可能削弱萨姆的信念。

那么,我们又有什么预防措施呢?削弱虚无思想之影响的一种有效方法是为其制造大量的竞争对手并广泛开展公众讨论。从恐怖分子训练营到邪教再到家庭暴力,这些洗脑情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并不仅仅是简单地灌输一些(通常数量很少)坚定信仰,而且在整个过程中还伴随着目标对象眼界的缩小。正如我们在第 8 章中曾探讨过的,建立起来的认知网越多,某个单一认知网的强度就越弱。我们鼓励传播和探讨新思想;为所有人提供受教育和接触独立媒体的机会;我们并不局限于使用简单罗列大量事实的方法来教授历

史知识、批判性思维及社会心理学；让大家了解外国文化传统；鼓励讽刺、评论和批评；通过这些及其他诸多方法，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为丰富的认知环境，这也将有助于削弱极权主义阴谋的吸引力。

至此，我们已经就如何抵制有害思想及如何不受其蛊惑作出了讨论。正如我强调过的，为了保护自己，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说某些想法或行为是情绪化的，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可控；如果像第 9 章所说，人类的认知弥漫着情感因素，那么反之亦真。我们可以改变动机，也可以改变动机意图瞄准的目标。

大规模抵抗：从个体到群体

个人主义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有时人们会接受并笃信某些对他们有害却挥之不去的信仰。对这样的人来说，这些信仰都有着积极的价值（它们的认知网与一些积极情感相联系，比如友谊或满足感）。换句话说，与某个信仰相关联的感情并不一定能反映其持有者的长期利益。一个我们已经提过的例子便是厌食症患者。患有厌食症的青少年（多半是女性）会认为自己瘦身的信念是积极正面的，而旁观者则认为这无疑非常危险。厌食症患者往往早夭或患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并常常过着高度受限且不幸福的生活。由此说来，旁观者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不管怎么辩解，厌食症患者都是错的，因为她的信念对她不利。这是我们把厌食症描述成心理疾病时的一种说法：由于某些主观利益（保持体形和饮食控制）已在认知图景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这些目标成为支配思想和行为的关键所在，因此患有厌食症的人已无法继续追求他们的客观利益（如健康、自由、幸福，等等）。

换句话说，正如我们在第 4 章提到的，将某人认定为精神病患者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社会判定。当二者出现决定性冲突时，判定对人们有利或有害的客观主体思想会战胜个体的主观感受，进而取得控制权。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评判方式（分别代表着客观利益和主观利益）会得出相同的答案。我们为幸福、自由或实现自我价值投赞成票，并期望我们的邻居也能这么做。

相对论

他补充到，他的祖先斯基罗斯人是这个地球上唯一存在过的诚实的人种，尽管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曾经吃过自己的同类，但这丝毫未影响其民族荣誉。

伏尔泰[3],《查第格》

但谁又能证明大多数人的看法就是正确的呢？相对论者认为我们不能将不同的文化拿来作比较，因为“吾之甘露，彼之砒霜”，没有任何旁观者有资格评判甲乙孰对孰错。相对论已被广泛地运用于道德层面以摧毁绝对的（通常是宗教的）道德权威思想。它同样被用来阐述道德的不可比性。也就是说，如果根据甲文化的习俗，人们可以在周六晚上炙烤意外降生的婴儿，那么乙文化对于该习俗的异议只对其自身成员有效，却不适用甲文化的成员；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中，如果甲、乙文化毗邻而居，那么乙文化成员对该习俗的反感绝不应该触犯甲文化成员的风俗习惯。显而易见，如果相对论是正确的，那么厌食症患者以瘦为美的信念就如同她的邻居希望她身体健康一样正常，因此正常人也就没有权力将自身的观点强加于她们。

相对论是一种乍一看完全合理的学说：尊重他人观点的行为完全值得赞赏。但实际上，它所造成的诸多后果都十分有害以致每个试图去给他人洗脑的人都会对其顶礼膜拜。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相对论支持了西方国家的一种主张，即当那些贫困国家，如朝鲜、乌干达或刚果，在通向毁灭、虐待与折磨的道路上挣扎前行之时，西方国家应该袖手旁观，并在某些情况下对他们的目标对象进行洗脑（想想那些乌干达反叛组织中的娃娃兵们恐惧的表情吧）。

如前文所述，当被应用于厌食症或其他精神疾病领域时，相对论会引导我们去尊重个人选择，即使这些选择是明显有害的。但实际上往往我们还是认为这是错误的，并认为自己有道德义务去干涉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实际上，我们会从相对论者所提倡的“每个观点都有其正确性”的主张中赦免某些特定的个体，以此来解决这种两难的困境。我们称他们为精神病患者，并剥夺他们所有的个人责任；如果他们无法自己作决定，那么从道德上讲，由他人对其进行掌控便可以接受。我在第4章中说过，这是一种试图将洗脑合理化的托词：“你病了，你并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所以我们必须告诉你如何思考。”这个逻辑极其不可信：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在其生命的某个阶段作出错误的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作任何决定。这种逻辑同样非常危险，因为它鼓励对精神疾病运用强制性手段。最终，它会将精神病患者逐出社会，并视其为局外人，这将导致一系列负面结果，它所伤害的绝不仅是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和生理健康。

---

③ Voltaire（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

这些后果可能还不是相对论主张所带来的所有问题。正如政治理论家斯蒂文·卢克斯④所指出，在理论上对相对论的异议还有很多。其中之一认为相对论依生于：

> 某个对文化完全误解且绝不适用的概念……文化绝不是“无窗的盒子”。它们往往是开放的系统，争论与异质并存，各种思想交汇融合相互滋养，没有明确的界限。人们应该永远铭记的是，任何简化文化内部连贯和特殊性的行为都是利益双方的恶作剧。
>
> 卢克斯，《自由派与食人族》，第19-20页

想要将不同文化区别开来的人往往有着自己的目的。而且，相对论“无法解释存在于文化内部及不同文化之间道德批判的践行”。同时，声称“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并不能解决文化之间的道德冲突问题（除非加上一句“但某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平等”）。乙文化的成员仍然不得不忍受甲文化成员炙烤婴儿时散发出的恶心气味。

相对论低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甲文化和乙文化都由人类构成。人类的行为方式多得令人难以想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克萨斯人和德黑兰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存在根本区别。当然，每个人所设立的基本目标各不相同，但这些目标的本质却很可能极为相似。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捍卫了出版自由，而在英国内战所带来的震撼之下，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将社会保障看得远比自由更重要——但相同的是，两名作家都非常看重这两种价值观。人类大脑和身体在其结构和性能上有一个普遍的相似点，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翻译语言或（借用一下第9章的例子）理解埃斯库罗斯和爱伦·坡关于恐惧的不同描述的原因。全世界的人们都看重快乐、幸福和自由，而厌恶疼痛、苦难及受制于他人。比起陌生人，人们往往对自己的亲人更好，他们会对朋友微笑，并会为他们的离世感到悲伤。谋杀、折磨、毁尸等行为，除了在某些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如宗教仪式）下，通常都是严厉禁止的，而这些行径的受害者往往也都不是组织内成员。就如禁忌一样，那些被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如自由和幸福，都是在人类几百年的混居生活中得以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要么已经顺应具体的社会环境以便更好地服务人类，要么已经灭绝。因此，它们往往能够准确地反映大多数人的需求。

请注意一下我对限定词的使用：“绝大多数人”“通常”。个体差异不容忽

---

④ Steven Lukes(1941—)：政治和社会理论学家，目前是纽约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



视,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而且,即使某两人的价值观彼此相似,但他们之间仍有可能存在冲突,例如:双方都很尊重人权和物权,但其中一人必须依靠对另一个人的偷窃才能得以生存。从个人层面上说,关于自由的价值观可以从某些特定的例子中提取出来:如谋生的自由、访友的自由、以不同方式改变世界的自由。当一个人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家庭走向社区再到国家时,这些思想将变得更加抽象和虚无。它们失去了自身的特殊性和明确的定义,但它们仍然与个人经历(有时极其情绪化)有关,而这一点使得虚无思想能够吸引众多追随者。

正如在第9章中讨论过的,人类天生就是擅长评价的生物。当要求某个个体去评判某个特定观念(例如"远离折磨"和"被欺骗")是好是坏时,他往往会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然而,从组织中提炼虚无思想的过程却忽视了个体差异的存在,这便导致了一个不幸的结果:虚无思想不能被简单地认定为或好或坏。(比如,在教育孩子时,你会认为思想控制并没有错,但当你从某个推销电话中脱身时,你就会发觉它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虚无思想如变形虫般多变,因此比起徒劳地纠缠于为其施加评判性规则,我们不如采取另一种策略:尽量降低虚无思想造成的有害影响,而不是去限制他们的传播。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只需动用一样人们经常使用的武器——政治。

社会凝聚力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能够自全。

多恩[⑤],《突发事件的祷告》,《沉思录》第十七篇

不论文化背景如何,绝大多数人在其早期生活中都经历了社会化过程。他们知道应该对他人报以何种期许,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知道哪些人可以被归为"我们",哪些人只能被归为"他们"。社会化的一大功效便是建立了与不被社会采纳之行为相关联的、受到强烈抑制的认知网。例如威廉·米勒[⑥]通过观察得出结论:"任何父母都知道,一两岁的孩子对于粪便和人体排泄物是毫无厌恶感的,即使父母急切地想要将这种厌恶感灌输给他们,他们也能对此保持愉悦的免疫,并不受感染。"米勒指出,"只有人类才能感知厌恶,而对厌恶的感知过程就

---

⑤ John Donne(1572—1631):英国詹姆斯一世时期的玄学派诗人,他的作品包括十四行诗、爱情诗、宗教诗、拉丁译本、隽语、挽歌、歌词等。

⑥ William Miller:新墨西哥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酗酒、物质滥用和上瘾中心研究员。

是人类化的过程";至少,"真正意义上的厌恶需要发展空间"。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禁忌,如谋杀、折磨以及其他形式的伤害行为。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认知网可以有效阻止人们实施严重的伤害行为。只有非常强烈的感情才能越过它们设立的门槛。然而,如第2章所述,成为一个组织——尤其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组织(如曼森家族)——的成员,能够削弱这种阻力,并为突破这种约束提供额外的情感力量。组织成员的自控意识在他们逐步陷入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所称的"代理状态"时会被日益削弱(请参见第4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需要强化那些受限的认知网并削弱组织凝聚力。一种方法是降低组织成员在脱离组织时所需付出的代价——从遭受排斥带来的不便到人身威胁,这就需要我们坚持让所有组织都能在一个维护人权的法律体制下运行。另一种方法就是确保一个组织中的成员也同时具有另一个组织的成员身份,比如在另一个组织中接受主流教育或从事工作,这样便可以使他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思想。最糟糕的选择是,如从美国政府在琼斯镇的发现以及而后又在德克萨斯州韦科市再次得到的验证,主张与该组织发生正面冲突并凌辱它;但将自身塑造为强大的敌人恰是增强对方组织凝聚力的最佳方式。

直接攻击组织所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存在"倒洗澡水时将孩子一并泼出"的危险,并不是所有的虚无思想都有害。有时,如果能够获得足够的肯定,它们其实对社会是有益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小有害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为有利思想提供发展空间。上文所提及的相对论主张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通常情况下,一个组织总是处于其他组织的压迫之下。但这种纠正不公的方法并不是赐予某些组织的特权(例如保护甲文化炙烤婴儿的习俗不受乙文化的阻挠),因为这样会不可避免地给组织内外成员带来更多的不公,同时还会激起组织间为争夺特权而引发的斗争。如果成为甲组织的成员可以使你逃脱谋杀或其他形式的虐待,那么非甲组织的成员为了自我保护也会希望建立自己的组织。与此同时,如果甲组织的成员发现自己的特权逐步受到侵蚀,他们便会采取防御措施,增强自身的组织凝聚力并以更加敌对,且以带有成见的方式对待其他组织的成员。事态还会不断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组织参与到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之中,而极权主义思想又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组织间的不信任很可能会加剧而非缓和。



政治哲学家布莱恩·巴里[⑦]在对多元文化论的批判《文化与平等》中曾中肯地表示,刺激组织成员(这并不是理想的降低凝聚力的办法)并不是制止该书中所描述的组织恶行的最佳方法。相反,我们应该努力维护个体的基本权利,以确保任何组织都不持有特权,从而削弱极权主义思想的统治地位。我们应该保证所有组织都遵守法律,这样一来便没有任何组织的信条可以无视个体的自由选择权,无论该个体是否是其成员。我们还应保证所有的信条都是可以公开接受探讨的,保证每位公民都有平等的投票权,保证每位成员离开组织的成本不会过高,保证任何组织在得到目标对象的知情同意前都无权向其强行灌输自己的意愿。最后,因为我们知道可以通过改变信仰来改变自己和他人,我们知道只有百家争鸣才能催生最好的思想,所以我们应该对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公开的辩论,同时借此警告其他明显有害的思想。我们应该赞美自由及人类施动的力量,倡导视人类为目标对象而非利用工具的理念,颂扬高效思考与分析的价值,以及人类经验,并且珍视自由(Freedom)、代理(Agency)、结果非手段(Ends-not-means)、思考(Thinking)和复杂性(Complexity)等思想观点。为了简便,也为了纪念我曾经做过的用于批判笛卡尔二元论的"钻石观"暗喻,我把上述几个单词调换了一下顺序,将其简称为"FACET 方法"。要了解这个方法为何能够抵御洗脑的恐惧,我们就需要回忆第 1 章曾讨论过的问题:洗脑发端于极权主义思想。

调整策略

只要是奴隶,无论多么知足,
都无法领略自由的万千魅力。

威廉·考珀[⑧],《餐桌谈话》

我们最后一次再谈谈罗伯特·利夫顿认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八个主题思想:环境控制、神秘操控、要求纯洁、忏悔崇拜、神圣科学、语言加载、教义至上,以及决定存亡(见表 1.1)。为了更好地了解 FACET 方法如何为我们提供帮助,让我们一起来对这八个主题思想逐一进行探讨吧。

---

⑦ Brian Barry(1936—2009):道德和政治哲学家。融合了分析哲学和政治学,以及政治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是一位公共选择理论的批评者。

⑧ William Cowper(1731—1800):英国诗人,通过描绘日常生活和英国乡村场景,改变了 18 世纪自然诗的方向。他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先行者之一。

环境控制

FACET 不只强调个体权利高于组织权利，还强调个体施动能力的重要性。通过鼓励发展批判性思维，视不同文化（如其他组织）为异质且强渗透性而非封闭内聚，FACET 方法往往能削弱组织的凝聚力，从而减少组织实施环境控制的可能性。我们鼓励人们把自己看作拥有改变自身生活自由和能力的主宰，从而使他们更有可能向将其视为利用工具的极权主义思想发起挑战，并反抗那些践踏其个人自由的行为。

神秘操控

同样，受到强化的自由感也会在此起到积极作用。当受害者很快以强烈的抗拒作出回应时，洗脑行为就很难唤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因此也就难以诱使受害者相信这种强烈情感是自发的，这就无法达到神秘操控的要求。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对于抵御洗脑行为同样很有帮助，因为它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信仰和动机，因此也就能分辨出哪些想法属于自己，哪些衍生自洗脑者。正如第 12 章提到的“大脑就像花园”的类比：越是精心维护的花园越不容易被重新布局。如果大脑清楚地知道自己信什么不信什么，那么想向其灌输新思想就会变得愈加困难。

要求纯洁

FACET 将复杂性视为一种美德而非缺点，或者它至少承认那是自然属性的一部分。如果你做的是钻石生意，那么要求纯洁无可厚非。但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纯洁的人，也没有完美的公民或组织成员。人类实在是太复杂、太善变了，以至于根本无法同极权主义者所设计出的简化范畴相匹配。这使得要求纯洁变成了无稽之谈，这种对于纯洁的要求认为组织内和组织外的分化绝对存在。它们并没有这种力量；它们只是思想观念而非事实。那么，要求纯洁如何为自己对他人生命造成的摧残进行辩护呢？要求纯洁需要简单的虚无思想。而 FACET 会对过度简化的危险发出警告。

忏悔崇拜

通过承认人类的复杂性，FACET 承认个性的深度和差异。它同样赞美个体自由——包括选择掩盖自己思想的自由。它强调人类的施动能力和进行批

判性思考的能力,使得个体能够看穿并挑战极权主义所憎恶的东西,即隐藏于忏悔崇拜背后的隐秘而又独立的思维。

神圣科学

FACET 是求真务实的,它以反复摸索和实践为指导。就像科学一样,它通过实践不断调整自己,针对具体案例并结合实际情况来塑造自己的原则。相反,极权主义思想视原则高于现实,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用主义服从于绝对权威,个体服从于组织。相对论认为,不同文化的差异性高于其基本相似点,因此相对论实际上也要依仗极权主义的某些思想,比如组织力量。也就是说,相对论假设:“文化”都是同根同源且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组织。而这种假设受到了斯蒂文・卢克斯的挑战。只要对比一下真正具有凝聚力的组织,比如曼森家族,我们便能清楚地发现这种假设的错误所在。

极权主义者都是各种绝对事物的狂热爱好者。例如,只有绝对的权威才能产生效力。(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现某个文化有杀婴行为,那么这对于视这种做法为不道德行为的文化观念来说是一个致命打击,因为这种文化观念是建立在适用于一切人类道德权威之上的(“杀人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神性——或本性、理性,甚至科学——不允许我们这么做”)。由于缺乏这种普适的道德权威,极权主义者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偏袒任何文化观念。但是这种想法正确吗?

未必如此。如果绝对权威不再值得信赖,我们不妨将其法律般的纯洁替换为某种更加凌乱但又务实的统计方法。根据统计结果所作出的预测同那些从等式中得出的结果一样有用,有时甚至用处更大。数学模型是由逻辑支撑的;只要该模型的基本公理受到认可,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它所支持的任何事实都是成立的。然而,在一些复杂的情况下,人们并不能把每一个可能变量都建立到模型之中。一个统计学“法则”指出:长期吸烟会导致疾病,因为常年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更容易患病。尽管也有常年吸烟但仍然身体健康的人,但这并不能证明吸烟对身体无害。这只能说明某些幸运之人患病的概率较低而已。

这些数学理论也同样适用于道德问题。一些道德准则似乎确实受到了人类社会的广泛认可。现实中的确会偶尔发生精神病患者享受连环谋杀的快感或强暴自己女儿的事件,但这并不有悖于人类对谋杀和乱伦的反对。换句话说,我们并不需要追求绝对的纯洁或每个事物的准确性来确保我们调查资料的有效性。人类基本需求的相似性意味着,对于我们大部分人都适用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人(反之亦然)。因此,根据某个信仰是否会对其持有者及

他人造成危害，我们便能够对信仰进行评判（不论它们的文化起源是什么）；而这也是在实践中我们倾向于采取的措施。

语言加载

FACET 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视有助于了解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是如何操控语言的。通过强调自由和施动能力的重要性，它赋予了人们挑战过分简化的思想和极权主义思想的勇气和信心，也由此使得思想控制更加难以实现。

教义至上

FACET 鼓励人们在遵守某些限制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它将这些限制的范围尽可能降至最低，目的是为了缩小国家（或其他组织）的控制范围，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而非组织）的自由。FACET 并不认为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它只是认为不论我们从属于哪个组织，我们都应该受到（同公民一样的）平等的待遇。因此它坚决反对认为思想及持有这些思想的组织有权无视个体意愿的学说。无论是通过暴力、科技还是隐秘手段，试图向他人灌输思想的洗脑行为对 FACET 来说都是不可饶恕的。

FACET 坚持认为理想形成于个体的实际体验之后，由此使得思想服从于现实。这也反映了最有可能确保大脑存活的个体策略，即对于环境的准确监控和感受，其中环境是由定义明确但灵活可变的认知网所平衡。极权主义思想就像一个出了故障的大脑，为了提升虚无思想的地位而颠倒了顺序，其对外部世界愈加漠视的态度往往是致命的。即使是在被称作自由民主发源地的西方国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社会已经痴迷于极权主义思想，而这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可否认，复杂而务实的 FACET 比极权主义思想更加难以实施。但它却对我们更有利，尤其因为它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世界应当存在的方式。

决定存亡

正如我之前所说，将自己看作自由个体的人不会轻易屈服于独裁主义手段。如果他们不能接受"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如果他们有能力发现极权主义思想的漏洞，那么他们就不会轻易地交出手中的权力。即使最残暴的独裁者也需要大众的支持才能达成其进行大规模统治的目标。使用 FACET 方法也许无法完全消除这种支持，但至少可以将其削弱。



为什么要采用 FACET 方法?

目前为止,我们对 FACET 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思想观念层面。然而,正如该书曾一次次反复证明过的,思想需要从刺激中获取力量。最强有力的虚无思想可以被强烈的情感刺激,进而使目标对象实施谋杀或自杀行为,抑或二者兼施。那么,FACET 如何能够成功达到刺激因素的标准呢? 答案它自有办法。它能赋予个体更多的自由,从而(正如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⑨]曾说过的)推动其发展并提高生活质量,使他们更加快乐。它强调人的施动能力,使公民感觉对自身情况具有高度掌控权。它将事物的复杂性看作一种自然机遇,而非视其为对过分简单学说的一种威胁。它将人看作目标对象而非利用工具,从而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停下来思考的能力,进而提升他们的幽默感、宽容度和控制感。最后,对于这个越来越拥挤的星球来说,比起总是依赖于杀戮、洗脑或其他虐待手段的极权主义观念,FACET 将是一个更好的长久之计。对于大脑缺乏管理的目光短浅的思考者来说,虐待也许有它自身的优势,但当前世界不断加深的互联性使得我们越来越无法忽视公正、国际干预或(个人层面的)心存报复的同类,虐待的那些优势正在不断减弱。

使其成为可能:实施 FACET 方法

实施 FACET 需要公开辩论,需要公众对专家、权威及体制——诸如自由独立的新闻和司法机构之类——的信任,从而维持人们对 FACET 的信任,确保公开透明并避免其沦为对许多政府来说都极具诱惑力的绝对权威。它要求我们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并严格执行拥护个人自由的法律条款。它要求我们接受以下观点:思想似黏土而非钻石,我们被嵌入自身的存在之中,受困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但这些束缚还不至于使我们变得完全无助。我们必须接受思想控制所教授的以下内容:人类可以被改变——也可以进行自我改变——只要给予恰当的刺激、思想和机会。有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艰难任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自己是可救赎的。这不仅适用于组织外,也同样适用于组织内;不仅适用于精神病患者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也同样适用于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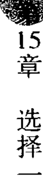
---

⑨ Amartya Sen(1933—):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9 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他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 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革命性的创新，至少在西方国家不是。FACET 一直就稳固存在于自由民主制的传统之中；从这个方面来说，它并无什么新颖之处。但在过去，自由民主制国家一直遭受着极权主义国家的漠视。强调自由和宽容的传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致使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享受这种奢华。即使处在最佳状况，自由民主制国家也远远无法达到 FACET 的要求。

犬儒主义者认为，这种想法纯属异想天开。相对主义者认为，这是在将我们的思想强加于他人。右翼分子认为，这是空泛的自由主义垃圾。虽然我尊重伏尔泰有关言论自由的主张，但至少目前为止，我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是误导。FACET 绝非异想天开。它以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伟愿景避免了极权主义思想，并承认人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体现在思想塑造要适合环境。此外，我们还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人所拥有的自由越多，其生活质量就越高（欲了解有关该问题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阿玛蒂亚·森的《作为自由的发展》一书，或者比较一下英国和波斯尼亚，或挪威与朝鲜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时的不同发展）。认为“其他人并不需要我们西方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快乐”这一假设是无礼且自私的。作为一名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和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我认为我们已经，或者最终能够，找到世界上一些最严重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我们是否有那样的政治勇气来执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然而，我相信，这些方案会得到尝试，并且最终能够起作用；当然，其作用不会那么完美，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完美；但它们却足以使一切恐怖主义形式垮台。在找到实施这些解决方案的决心之前会有多少人因暴力而牺牲，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

FACET 也并不意味着要将所有西方消费资本主义的糟粕强加给不愿接受的人。要让人把自身看作目标对象就必须给予他们尊重——赋予他们更多的自由，并且不强求他们必须跟我们做同样的事。人权与美国汉堡包无关。也许某些对世界上主要宗教的特定解释对你来说是毒药，但 FACET 却能与之兼容。那些相互矛盾的解释应得到重新阐述或直接废弃。一个宗教、文化或理想自身并不足以纠正恶毒的行为。有些理想显然需要从人类的“保留曲目”中废除，并且越快越好。如果某个宗教、文化或传统（包括科学传统）坚持认为自己有权伤害他人，并且将人看作能助其达到某种意识形态目的的利用工具，那么它最起码有义务提出一个比信念、宗教权威及传统更易让人接受的理由。那些话语常常被用来终止对话或作为（用罗伯特·利夫顿的话来说就是）思想终结的陈词滥调；但其权威只有在我们不敢对其表示质疑的情况下才会生效。如果某些思想对人们有害，那就将它们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辩论，使其遭受嘲讽直至绝迹，不管它们的来源是什么。为了减少可能引致人们相信错误思



想的诱因——如貌似“神圣”的强制性特权及使信徒绝望的不公平遭遇——而改变政治氛围绝非易事,但那并不代表不可能实现。

FACET 也绝不空泛。一个以实用主义取代权威的学说会存在一些棘手问题。一方面,它期望其公民是成熟的,并因此要求他们做出一定的努力。它挑战了特定的辩护和既得的利益;并要求文化和宗教所考虑的因素服从于个人利益。维护一些如独立媒体的各种职能机构,意味着政府必须和感激说再见,至于阿谀奉承就更不用提了。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做错事,然后接受民众批评。而这些民众本身或许就是懒惰、冷漠或无组织的,但这并不会挫伤他们批评政府的锐气。如果 FACET 想巩固这些普遍主义的各种要求,那么采用该方法的国家必须协调好国内问题与一致对外政策间的关系,并且要以身作则而不是勒令执行。

※本章小结

> 某些环境拥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使许多人做出同样的举动。但即使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每个人的特性,如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如果是组织,那其特征就是他们的文化),都将影响他们对事件的反应。多数人都不会冲进正在燃烧的房子中救人,而有些人却会。
>
> 欧文·斯托布,《善与恶的心理学》

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总是按照别人的预期行事的。一个期望其公民政治老练、适度成熟并有社会责任感的国家会比那些将自己的公民看作奴隶或小孩的国家更有可能培养出具有上述特征的公民。教育、经济和政治自由以及对他人信息的慷慨传播,均有助于培养能够欣然认为自由理所当然,并且随时愿意同他人分享自身利益的公民。如 FACET 之类的自由主义手段并非毫无瑕疵,但与其他一些竞争体系相比,它们已然先进许多了,因为它们鼓励思想的自由流通,促进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且——正如本书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坚定的虚无思想所带来的危害,从而降低诸如洗脑之类虐待行为的发生频率。极权主义思想一次次食言,它无法成功地向其追随者提供曾经承诺过的回报。尝试降低极权主义思想的吸引力意味着要引导人们远离如思想控制梦想之类的恶性愿景,而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个人自由,并向那些依然试图追随这一梦想的人发起挑战。

这一切都毫无新颖之处。我们已经拥有,或者能够轻易地获取这种技术、知识和能力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至少能够解决那些最紧迫的问题,即使我们

当前的资源有限(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有足够的刺激因素、足够的政治意愿,我们将能够改善自己的社会——即使永远无法使其达到完美。能够肯定的是,我们至少可以远离那个可怕的世界,比如琼斯镇。向这个目标迈出的第一步便是了解我们所持有的信念:它们所拥有的力量,它们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如何开始改变它们。

我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试图说服大家:洗脑并不仅仅是20世纪50年代的偏执狂留下的遗物,也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在感觉受到他人信念威胁时所抛出的与虐待有关的术语。极度虔诚的邪教分子和极度狂热的恐怖分子一直不断地给我们制造麻烦,但如果我们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却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当作异类进行遣散,因为正如"9·11事件"向我们表明的,他们所能造成的损害程度同其规模相比极不相称。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明白洗脑既不可笑也不神秘。原本遵纪守法的人实际上能够被说服去追逐思想控制的梦想,甚至掉进自杀或谋杀的深渊。但正如我试图向大家证明的,随着我们对大脑自身运行的方式及同其他大脑的互动方式理解的加深,我们可以明白洗脑究竟是如何达到其可怕目的的。相互理解给予我们以力量,无论它有多么不完善:这是一种能够改变我们的大脑、行为以及政治立场的能力,它能使虚无思想变得不那么诱惑。我们拥有这种力量,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力量。